

纪实史学丛书



回眸“布拉格之春”

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



叶书宗 著
刘明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纪实史学丛书

回眸“布拉格之春”

——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

叶书宗 刘明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眸“布拉格之春”: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
叶书宗,刘明华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
(纪实史学丛书)
ISBN 7-80149-456-3

I. 回… II. ①叶… ②刘… III. 苏军侵捷事件(1968)
IV. D85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0768 号

纪实史学丛书

回眸“布拉格之春”

——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揭秘 

著 者:叶书宗 刘明华

责任编辑:柳楠

责任校对:同文

责任印制:同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开 本:850×1168毫米 1/32开

印 张:9.25

字 数:221千字

版 次: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456-3/K·047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纪实史学丛书》出版者的话

读史使人明智。

读解历史，常读常新。

历史没有终点。

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指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逐步接近历史真实的，而这种认识的基础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然而史料本身并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人们解开以往的历史谜团，这里需要历史学家付出艰辛的努力。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著名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的确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历史学家创作史书，读者通过历史学家创作的史书了解历史。摆在读者面前的史书，很多确是历史研究成功之作，颇具学术价值，但因其含意深奥，描述刻板和文字拘谨而使广大读者望而却步。历史学家固然应致力于学术研究，但历史创作的根本目的还是要人们了解历史。因此，除了供学者之间交流的研究著作之外，历史学家还应该让史书以一种可以为多数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历史研究领域，那种认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就一定只能是“象牙塔”内的陈列品，或通俗的历史著作

就一定缺乏深厚的研究功底的想法,未免失之偏颇。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大多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般读者都是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作者的写作手法是否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专门为学术交流的作品是需要的(学术论文、专题研究成果大抵就是如此),但为广大读者阅读的作品也是非常需要的(大部分历史书籍理应如此)。而要写出这后一种的作品,作者除应踏实地在研究上下功夫,还要在表现形式上下功夫。当然,这种表现形式是基于纪述历史的真实,以使读者了解真实的历史为目的,而不是“演义”、“戏说”等文学创作,后者的目的是借助历史故事给人以文学的感受或娱乐,人们不会认为那就是真实历史。

“纪实史学丛书”则是要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上做一番努力:

第一,我们首批选择的大多是苏联历史上引人注意的热点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或者过去的史书中没有说清楚,或者以往的研究带有片面性,或者歪曲了事情的真相。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历史上有很多谜团,它既是专家学者注意研究的课题,又是一般大众感兴趣的问题。而解开这谜团,既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又是广大读者的需求。

第二,毫无疑问,只有掌握了大量史料,历史研究才会有深度。我们丛书的作者具有多年从事历史研究的经历,又掌握有大量史料,有条件拿出令人满意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末以来发表苏联历史中新史料的俄国杂志多达150余种,各类专题及文集更是层出不穷。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我们确定以纪述史实为主的写作形式,不求过多的理论分析和评论。以描述历史过程为主线,把作者的观点、分析、评论溶于史实记叙述之中。显然,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是否能尽到这一职责,将由读者来判定。

如果我们的作品尚能令读者满意,我们当继续努力,拿出更多更好的历史读物奉献给读者。

前 言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涌起了改革的热潮。诚然，这场改革是经过长期酝酿、逐步推开、次第演进的，但它总的目标是明确的，就是要摆脱苏联一手操纵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控制，走出斯大林体制的误区，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情出发，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型社会主义。在争取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复兴社会主义”的口号。这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经济上排斥市场、自我封闭的计划经济，政治上排斥法制的个人专制政体，思想观念上否定人的独立人格地位，泯灭个性的统制，这种“非人道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体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式嬗变；捷克斯洛伐克应当走自己的路，恢复社会主义的市场、法制，尊重人的独立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源。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应当是多元的，捷克斯洛伐克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权决定在世界上如何交往。捷共和国政府领导层中，虽然有些人已经习惯于听命苏联，安于成为新权贵的地位，顺从地走斯大林体制的路，但是，1967年，由于社会危机加剧，人心思变，举国翘首盼望改革，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使捷克斯洛伐克从“苏联化”变为“捷克斯洛伐克化”。种种条件使中欧这方12万7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风云际会。

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书写的，因为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创造历史是通过杰出人物的手写出来的，因为历史演进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是由站在锋线上的首脑人物作出选择的。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多变之秋，捷共领导层中冲出了一匹黑马，产生了一位杰出的领袖人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杜布切克以清醒的头脑、坚定的立场、灵活的策略，挑起了改革的重担，迎来“布拉格之春”。杜布切克很快跃升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旗帜和希望。诚然，杜布切克当政的时间很短，在历史的寰宇中像天际的流星一闪而过，但是流星的光芒是那么耀眼，使暗夜中摸索的人借以辨认方向。1934年入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在莫斯科工作的奥地利著名共产党员恩斯特·菲舍尔说：“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之春’从1968年1月至8月20日的几个月中就把捷克斯洛伐克建成了一个某一时期曾经存在过的最自由的国家。”当然，杜布切克最终是一位悲剧人物，不！是一位悲壮人物，但是丝毫不影响他在20世纪东欧历史上的人格定位，何况历史又怎能以成败论英雄？！

杜布切克不愧是东欧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人物。

20世纪60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之后，推行没有斯大林的新斯大林主义，实际上是勃列日涅夫主义。苏联的历史全面回潮，应了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的老话。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走入了左的歧途。这样，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成了20世纪实践社会主义的全局性问题，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东欧各国人民也都以复杂的心情，关注着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发展。

当杜布切克崭露头角时，勃列日涅夫曾经援手，让他取代日益不得民心的诺沃提尼，希望通过换马来加固苏联在东欧的

盟主地位；到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局势明朗之后，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不过是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相互勾结，企图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离开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把捷克斯洛伐克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变成帝国主义阵营打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楔子。苏联还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是苏联以巨大牺牲为代价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的，苏联绝不能容许捷克斯洛伐克离之而去，绝不能容许 20 年前的南斯拉夫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重演。

苏联在使用种种威胁手段，施加种种压力，包括军事威胁都无法让捷克斯洛伐克屈服之后，终于纠集华沙条约组织的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国，以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的名义，出动 50 万大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苏军逮捕了杜布切克等改革派精英，押解到莫斯科，用枪托压下他们高昂的头，以屠杀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居民相要挟，迫使杜布切克等人在苏联草拟的“协议”上签字画押。不久，苏联又颐指气使，更换捷克斯洛伐克的党、政领导人。在完成这一切手续之后，索性将杜布切克等人开除出党。苏联在“国际主义援助”的喊叫声中，武装占领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绑架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这是勃列日涅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大创造。捷克斯洛伐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改革被苏联以武力镇压下去。“布拉格之春”夭折了。

抖开欧洲历史的长卷，可以看到“布拉格之春”及其夭折既是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失败，也是东欧第三次民族民主运动的失败。

民族关系复杂的东欧地区，打从欧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建立民族国家以来，一直成为西欧各大国和俄罗斯帝国争

夺的对象，在夹缝中备受压榨与欺凌。历史老人既然把欧洲推到建立民族国家的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勃兴也在催发着东欧民族意识的增强；与此同时，大国之手又要扼杀东欧建立各自民族国家的生机，这自然要导致东欧掀起争取民族独立运动的层层巨浪。

19世纪中期是东欧的第一次民族民主运动浪潮，匈牙利的民族独立运动是这一浪潮的前锋。东欧争取民族独立运动虽然失败了，裴多斐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成为举世传颂的东欧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正气歌。

大国竞相争夺东欧，东欧自然变成涌动的地火，毫不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最先在这里响起。战争是历史以财富和生命为代价换取进步的筹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德意志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政教合一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俄罗斯帝国，相继灰飞烟灭，这就给东欧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客观条件。美国总统威尔逊创导的“十四点计划”精神、巴黎和会上对东欧民族民主运动的某种认可，也给东欧人民以一定鼓舞和支持。1918年前后，东欧成立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这是东欧的第二次民族民主运动高潮。

东欧各民族独立国家的建立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也是东欧各国人民的幸事。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凡尔赛体系，一方面把东欧各国纳入战胜国集团和战败国之间纷争的漩涡；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东欧各国还卷入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体系抗争的角力圈。这使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出生证书的东欧各国，从开始起步就艰难曲折。30年代，法西斯德国崛起，东欧各国立刻成为希特勒首选的鲸

吞目标。东欧各国先后沦于德国法西斯的魔爪之下，遭受空前的民族灾难。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欧洲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无条件投降，东欧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也赢得了重大胜利，迎来了东欧第三次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战后，东欧各国的重建是苏军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余威，进军东欧予以实现的。这样，东欧的第三次民族民主运动也和东欧各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结合在一起。因此，东欧的第三次民族民主运动表现为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民族民主运动；或者说：社会主义民族民主运动是东欧第三次民族民主运动的基本特点。

东欧各国人民赢得了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重建新家园，民族民主运动的历史任务可望得到圆满解决。但是，历史的发展又出现了原先意想不到的曲折，“布拉格之春”及其夭折是这种历史曲折的高音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两个超级大国，开始争霸全球，加上意识形态的对立，战后形成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东欧各国地处东西方对峙的前沿，自然成为冷战格局中的敏感地区。为了东欧各国人民的解放，苏联固然付出了牺牲；但是，苏联也有意使东欧成为抗拒西方的缓冲地，兼作自身的安全防护带。东欧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来就不是东欧历史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苏联越俎代庖的创作。不仅如此，苏联还强行把自己僵化的斯大林体制移植到东欧，包括强使东欧各国一一上演苏联自 30 年代以来大清洗的幕幕悲剧，镇压稍有表示的不同政见；在国际交往中也强使东欧各国必须服从苏联一国的利益。南斯拉夫首先不堪忍受，以“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抗拒来自苏联的干涉，走上“不结盟”的道路。东欧国家还不得不听命于苏联，连任命一位政府部长也要事先听取克

里姆林宫的意见。东欧各国人民刚刚擦去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激动泪花，又痛楚地发出“俄国佬，滚回去”的吼声。

东欧的民族民主运动尽管遇到了曲折，但不会沉寂下去，即使以革命的名义也不能使被压迫者俯首贴耳，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1956年夏的波兰事件、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就是东欧第三次民族民主运动浪潮中的一次次涌动。“布拉格之春”和苏联出兵武装干涉是东欧民族民主运动历史发展的“剪不断，理还乱”的难解情结。

近年来，陆续发表的许多著作得以拂去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尘封，揭去苏联高层领导决策的神秘面纱，看清了勃列日涅夫“保护社会主义兄弟大家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前尘隔海，往事如烟，重现当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蹉跎岁月，是对站在争取民族民主运动斗争前列的勇士们的一种纪念；是对东欧人民不屈的斗争精神的一曲讴歌；是给后人的一点思考。

值此书面世之际，要特别感谢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沈志华主任，因为是他倾注全部精力，投入研究组织工作。此外，还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朱庭光研究员，是他热情扶持、培养出苏联史研究的学术队伍，而我也正是在这支队伍里互相砥砺，水涨船高的。

本书的撰写严格根据历史事实，不作任何演绎，以保证历史所应有的严肃性，也使有深厚理论修养的读者在读后能有所思考；在写作方法上，则力求通俗、形象，使不论从事何种职业的读者，只要一读都能津津有味地读完。当然，这是我努力想做到的：第一点，我能切实做到；第二点，也许还需要努力。

目 录

前 言	1
-----	---

一、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危机 1

1. 沉重的积怨	1
2. 一浪高过一浪	9
3. 诺沃提尼和他的历史遗产	17
4. 60年代社会危机的激化	20

二、经济改革的起步与挫折 26

1. 希克——新经济体制的创始人	26
2. 计划管理能够完善吗?	30

三、诺沃提尼的倒台 35

1. 新的起点	35
---------	----

2. 布拉格的政治之花	39
3. 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46
4. 捷共中央九月全会	54
5. 诺沃提尼失去了靠山	63
6. 铤而走险，诺沃提尼画虎不成终类犬	66

四

布拉格绽开报春花 72

目次

1. 杜布切克——一匹黑马	72
2. 共和国总统易人	82
3. 党中央主席团重组	95
4. 《行动纲领》出台了	104

五

苏共的思虑与决策 114

目次

1. 勃列日涅夫看走了眼	114
2. 处于包围圈中的杜布切克	124
3. 杜布切克与苏共的周旋	133
4. 勃列日涅夫还未下最后决心	144
5. 徘徊于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的十字路口	156

六

寒潮袭来 165

目次

1. 《两千字宣言》引来的风波	165
-----------------	-----

2. “大家庭”又一次把“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关在门外	172
3. 切尔纳会谈	176

七、同室操戈，心狠手辣 191

1. 军事行动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	191
2. 箭在弦上	206
3. 血色的“8月20日”	212
4. “革命政府”胎死腹中	222

八、“布拉格之春”意识不死 230

1. 捷克斯洛伐克新形式的全民抵抗	230
2. 勃列日涅夫吃回头草了	236
3. 捷共在谈判桌上的不屈抗争	243
4. 勃列日涅夫是输家	258
5. 布拉格的春天过去了，但是春天还会再来	264

后 记	275
-----	-----

一、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危机

1. 沉重的积怨

地处中欧的内陆国家捷克斯洛伐克，12.78 万平方公里领土，1530 万人口，在世界上属于小国。全国基本上由捷克人（约 65%）和斯洛伐克人（约 30%）组成，全境大致分为西部捷克盆地区和东部斯洛伐克山地区，流经首都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自南向北，汇入易北河。捷克斯洛伐克的东面是苏联，北面是波兰，西与德国相连（德国统一前，西北为民主德国，西南为联邦德国），南与奥地利、匈牙利毗邻。996 年，捷克公爵依靠教会的支持，统一了捷克各部族，建立中央集权的普舍美斯封建王朝。

打从中世纪开始，捷克的手工业、采矿业和金属冶炼业就非常发达。首都布拉格是东欧的经济中心。创立于 1348 年的布拉格查理大学是欧洲、也是世界的著名大学。使用水力鼓风炉和机械锤使炼铁业迅速发展，铁制农具几乎供应欧洲大陆。14 世纪后，捷克兴起了枪炮制造业，捷克的火器运销全欧洲。经济的发达带来财富的积聚，捷克国王成为全欧洲为数几个富有的国王之一。15 世纪前期持续 15 年的胡斯战争以后，捷克沦于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受德意志民族的奴役，城市自治权被取消，捷克文的书籍被大量销毁，德语被定为捷克的国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和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德意志帝国战败投降，1918年10月建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18年5月，捷克战时成立的流亡政府在美国匹茨堡宣布国家独立，并颁布了宪法）。1919年9月，战胜国与奥地利签订的圣日尔曼条约，承认捷克独立并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属西里西亚划归捷克。

在奥匈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无论在托·加·马萨里克（1850～1937）任总统（1918～1935）期内，或者是在爱·贝奈斯（1884～1948）任总统（1935～1938、1945～1948）期内，都是欧洲自由议会制度运行规范的国家。1921年在布拉格附近的工业城市克拉德诺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以下简称捷共），一直积极地参加议会活动和各种社会斗争。20、30年代，捷共约有8万党员，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四大政党之一。1925年议会选举，捷共在有300名议员的议会中取得41个席位，以5席之差落后于农民党，成为议会的第二大党。1938年9月，在那场恶梦般的慕尼黑阴谋中，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给了希特勒德国。

在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捷共和贝奈斯的原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责任，都勇敢地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克·哥特瓦尔德（1890--1953）任总书记的捷共，一面在莫斯科成立党的国外领导小组，一面在国内组成党的地下中央委员会，开展反对法西斯占领的斗争；贝奈斯则在伦敦建立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参加民族抵抗运动和民族阵线，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应当说，他们都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解放事业付出牺牲、做出贡献。

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苏联的态度，这点，稍有政治眼光的人都看得十分清楚，贝奈斯当然分外忧虑。

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苏联对贝奈斯的流亡政府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1941年7月18日，苏联政府承认了捷克斯洛伐克在伦敦的流亡政府。1943年12月，贝奈斯访问莫斯科，和苏联政府签订了《苏捷友好和战后合作条约》。斯大林对贝奈斯的流亡政府基本上持支持的态度。1945年1月，苏军解放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罗塞尼亚）和东斯洛伐克的部分领土，贝奈斯为这些地区今后的命运而担心。1月23日，斯大林以个人的名义致函贝奈斯，重申对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支持并表示“罗塞尼亚领土问题将由苏捷双方协商解决”^①。

1945年3月17日，贝奈斯再次访问莫斯科，同苏联政府商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组建以及一系列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斯大林设宴热情招待贝奈斯。席间，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无意推行沙皇俄罗斯帝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已没有现实的基础；斯拉夫诸国为确保安全，历来有着共同的目标，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特别重大。斯大林还说：有人担心苏联想使欧洲布尔什维克化，他本人也理解贝奈斯可能有同样的疑虑，但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苏联政府将按现

① 罗塞尼亚又称外喀尔巴阡乌克兰，面积4800余平方公里。1920年6月4日，战胜国与匈牙利签订的特里亚农和约，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划给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3月15日，在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同时，匈牙利吞并了外喀尔巴阡乌克兰。1945年1月23日，斯大林虽然表示这块土地由苏捷双方协商解决，但是1945年6月29日签订的苏捷条约，仍将这块土地归苏联。

实情况调整它的政策，各国共产党将要变成关心本国民族利益的政党^①。斯大林还当着贝奈斯的面对出席宴会的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和鲁道夫·斯兰斯基（1901～1952，1945～1951年任捷共中央总书记）说：“当然，我希望你们像学习别国经验那样学习我们的经验。不过别再犯我们犯过的错误。千万别忘记，你们得到的一笔遗产和我们的不同，在许多方面比我们的还幸运。你们应该寻找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照你们自己的方法走下去。”^② 斯大林的承诺和意见，使贝奈斯对捷克斯洛伐克在战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1945年4月4日，在斯洛伐克州的科希策组成了第一届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按哥特瓦尔德的说法，民族阵线联合政府是工人阶级同农民、中产阶级、劳动知识分子和部分资产阶级的共同专政。5月9日，已于1944年10月18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作战的苏军解放了布拉格。第二天，即1945年5月10日，联合政府迁回布拉格。1946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举行战后第一次制宪议会选举，一致选举贝奈斯继任总统，哥特瓦尔德被任命为政府总理。新政府由26名阁员组成，他们来自国家社会党、人民党、斯洛伐克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贝奈斯的民族社会党和共产党（包括捷克共产党和斯洛伐克共产党）等6个不同政党以及2名无党派民主人士：国防部长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后于1948年加入捷共）、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托·马萨里克之子）。

① 参见《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集：1945年，第4卷，欧洲》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5, Vol.4, Europe (GPO, Washington, D.C., 1968)

② 转引自里亚库斯《南斯拉夫的铁托》，第170—171页，三联书店，1963。

1947年夏秋，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特大干旱，农业严重歉收。鉴于捷克斯洛伐克退出了马歇尔计划，美国就不愿提供援助。原来1947年7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不征求苏联意见的情况下，一致通过参加马歇尔计划。当这一消息传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大为震怒。7月7日，政府总理哥特瓦尔德和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司法部长普·德尔季纳被召到莫斯科，要求他们就此事向苏联作出解释。贝奈斯总统因轻度中风而无法行动。在苏联的压力下，哥特瓦尔德从莫斯科打电话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在7日晚上召开政府紧急会议，宣布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关于这次捷苏会谈，哥特瓦尔德在莫斯科下榻地对马萨里克说：“我从未看到过斯大林那样大发雷霆……他严厉谴责我接受邀请参加巴黎会议。他无法理解我们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他说我们的行动似乎准备背弃苏联。”^①马萨里克则私下对朋友说：“我去莫斯科的时候还是一名自由的部长，而回来时已成了斯大林的雇农。”为了解救粮食歉收的燃眉之急，苏联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20万吨小麦。7月10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表一个声明，宣布退出马歇尔计划，说：如果参加马歇尔计划，捷克斯洛伐克“可能会被解释为一个反对与苏联及其他斯拉夫盟国友好的行为”。这是哥特瓦尔德独立行动所挨到的当头一棒。

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由经济困难引伸到外交困难，进而影响到政局的稳定，终于引发了政府危机。而政府危机的实质是谁挤走谁、谁吃掉谁的问题。因为诚如哥特瓦尔德所说，民族阵线联合政府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各阶级、各政党的

① 转引塔德·舒尔茨〔美〕《“布拉格之春”前后》第43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4月。

“共同专政”，但共同专政最终要归结到由谁来独掌领导权。为此，各方都在准备、都在等待时机，一场最终的较量是在所难免的。

较量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1947年10月6日，斯洛伐克政府宣布破获了一起叛国阴谋案，随即逮捕了380人，其中主要是斯洛伐克民主党人。在马歇尔计划问题上受到斯大林严厉斥责的哥特瓦尔德，再也不敢麻痹大意了。他一面与苏联保持密切联系；一面在11月27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提醒全党：国际形势正在恶化，外国反动派正在威胁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派钻进民族阵线；斯洛伐克政府破获的叛国阴谋案，参加的不仅有斯洛伐克民主党，也有民族社会党和天主教人民党人。捷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城市、乡村、工厂、农场，纷纷建立革命行动委员会，准备反击“反革命暴乱”。刚刚欢庆过解放的首都布拉格，又笼罩着紧张和惶恐的气氛。

双方终于摊牌了！

1948年2月13日（星期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举行例会，听取司法部长德尔季纳关于斯洛伐克叛国阴谋案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德尔季纳指责内务部不适当地干预调查，干扰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德尔季纳还指责内务部长、共产党人诺赛克，无故解除布拉格警察部队9名非共产党警官的职务以共产党员取而代之。他要求政府撤销内务部长关于调换布拉格警官的命令。政府总理哥特瓦尔德以替换警官是内务部长职权范围内的事为由驳回德尔季纳的要求。经过争论，政府仍然以多数票通过决议：内务部必须履行德尔季纳提出的要求。内务部长诺赛克在哥特瓦尔德的支持下拒绝履行政府例会的决议。

2月18日，政府中的12名非共产党部长联合声明：内务部如不履行政府的决议，他们将拒绝参加政府工作。同时，他们向贝奈斯总统递交了辞呈。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演变成政府危机了。

2月19日，不久前还是苏联驻捷大使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瓦列里安·亚历山大罗维奇·佐林来到布拉格。佐林的使命是传达斯大林的指示。佐林匆忙地拜访马萨里克及其他几名非共产党部长，掷出这样几句话：苏联对捷国内反动分子的活动感到不安；正在恶化的世界局势要求捷更加忠实于苏联及其斯拉夫盟国；苏联希望哥特瓦尔德的政治努力获得成功，不然的话苏联将被迫采取必要措施来保卫捷的独立，因为苏联永远不会丢弃自己的朋友。这几句极有分量的话，使贝奈斯不寒而栗。

2月20日，国家社会党机关报《自由之声》在头版刊出题为《我们决不容忍警察制度！》的文章，局势已由开始时反对内务部擅自调换警官，扩大到反对国家的警务体制。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捷共中央主席团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头目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下，有意制造政府危机，阴谋夺取政权。捷共中央主席团发布《告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书》，号召全体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哥特瓦尔德为中心的民族阵线周围，并指示各地的党组织作好充分准备，把反动分子清洗出民族阵线。2月20日夜，捷共中央把全布拉格市的7000名民兵武装起来，宣布从第二天上午6时起处于战斗状态。捷共中央进一步在全国各地发动群众举行集会，要求贝奈斯总统批准国家社会党等12名政府部长辞职。

2月21日，布拉格老城广场举行10万人的群众集会，哥特瓦尔德在集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总统批准12名政府部长辞职

广场大会的一名代表面见贝奈斯说：“总统先生，我不过是一名普通工人，但我很清楚，假使国民的大多数希望怎么办，那末，即使你是总统也该服从。”贝奈斯对这种行为十分不满，回答说：“我们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以至由街头决定我这个共和国总统该不该接受辞职。”^①

2月22日，内务部宣布破获了国家社会党军官企图破坏国家电台的阴谋。哥特瓦尔德命令警察和国家武装力量进入紧急状态，占领所有公共建筑物，并进行广泛的搜查和逮捕。

2月25日中午，捷共代表递交给贝奈斯总统一份新政府成员组成名单，并要求总统当天必须作出决定，贝奈斯只好照办。25日当天下午，哥特瓦尔德到布拉格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向早已聚集在那里的20万群众宣布新政府成立。新政府成员中仍然包括有国家社会党、人民党、斯洛伐克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捷共、斯共及扬·马萨里克等无党派人士。3月10日凌晨，在外交部大楼契尔宁宫，在马萨里克居住的4楼洗澡间窗外的地上发现了扬·马萨里克的尸体，他因绝望而跳楼自杀^②。6月7日，贝奈斯总统辞职。6月14日，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哥特瓦尔德为共和国总统，安·萨波托斯基（1884～1957）被任命为政府总理。这就是捷克的“二月事件”。在二月事件中，捷共巩固了在全国的绝对统治地位，也是冷战开始后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加固了抵御西方的铁篱笆。

① 伊特瑞赫·维谢里：《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二月事件纪事》，莫斯科1960年，转引《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4分册第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

② 又一说法是马萨里克在被谋杀者谋杀以后，抛尸窗外的。但是马萨里克的死，至今仍充满神秘色彩。

2. 一浪高过一浪

二月事件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欧其他几国一样，结束了“共同专政”成为完全的人民民主国家。1948年4月17日，捷共和捷克社会民主党联合发表《关于统一的声明》，两党于6月27日正式合并为捷共。9月28日，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解决斯共和捷共组织关系的建议，斯共成为统一的捷共的地区性组织。这样，捷克斯洛伐克实际上成了捷共的一统天下了，接着就在全全国猛烈推行苏联化计划。

1948年12月27日，捷国民议会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法案。和苏联一样，五年计划规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金属冶炼和重型机械制造业。五年计划要求农业要实现以集体化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哥特瓦尔德在1949年5月25日召开的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说：“在我国，农村不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不顾本国国情照搬斯大林体制，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有所发展，反而造成严重恶果。盲目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失衡、劳动者的收入不能增加、生产中浪费严重。盲目强迫农村集体化、违反农业生产的规律，使农业减产。直到1955年，农业产量也只达到战前的95%。

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苏联化，严重扰乱社会生活，特别伤害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是从1949~1952年的4年里，反复进行大清洗，制造了8次震惊全社会的冤案，使冤狱遍国内。

大清洗的前奏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集权制，便于最终确立如同斯大林体制那样的个人集权制。二月事件后，捷共中央

成立了中央主席团。1951年，又在党中央主席团内成立了政治书记处，由哥特瓦尔德、斯兰斯基、萨波托斯基、西罗基、诺沃提尼等9人组成。

在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同时，警察机构也进行了新的构建。二月事件后，切皮契卡调任司法部部长，他和捷共中央干部部部长科普日瓦成为捷克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直接对哥特瓦尔德负责，不受任何同级机关的检查与监督。而他们的幕后指挥者是1949年9月斯大林派来的苏联顾问、苏联内务部将军利哈乔夫和马卡罗夫。在苏联顾问的指挥下，从1949~1952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制造了8个令世人震惊的“案件”，将捷共中央总书记鲁·斯兰斯基以下的80多名副部长以上官员和成千上万的正直人士，或者绑赴刑场，或者关进监狱。

大清洗的第一个浪潮是制造所谓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集团案件，清洗的主要对象是以克利门蒂斯为首的原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人。

弗拉基米尔·克利门蒂斯1902年9月20日生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青年时代担任律师，1924年加入捷共，1935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38年捷克被吞并后，他移居伦敦，因表示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被开除出捷共。1945年重新入党，担任国务秘书。1948年扬·马萨里克死后，他接任外交部长之职。

1949年秋，在苏联顾问的指挥下，捷国家全部就开始罗列斯洛伐克民族主义集团的种种罪名：从30年代起就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破坏民族解放斗争；破坏1944年8月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和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联合，反对捷克民族和捷克工人阶级；对苏联的态度动摇，等等。1950年5月，在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点名批判。

1951年2月21日，克利门第斯的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集团被上升为“间谍破坏活动和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党宗派集团”，“在捷共中央全会上被彻底揭露”。这样，克利门第斯及其同案人就从“政治案件”上升为“叛国刑事案件”。捷公安部长拉吉斯拉夫·科普日瓦根据哥特瓦尔德、斯兰斯基、萨波托斯基的决定，下达了逮捕克利门第斯的命令，同时被捕的还有斯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古·胡萨克、斯共中央委员拉·诺沃麦茨基、斯洛伐克民族议会议员达·奥卡利、驻匈牙利大使伊·霍尔瓦特、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副主席拉·霍尔什等一批斯共的高级官员。他们被撤销一切党政职务，判处死刑和长期徒刑。

1951年2月22日又出现了“布尔诺案件”，指控捷共布尔诺州委第一书记奥·什林格，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副书记、捷克民族英雄扬·什维尔马的妻子玛丽·什维尔莫娃等领导人不给战前的共产党员安排比较重要的职务；慢腾腾地选择苏联的政治经验；对地方上的特殊不敏感；把保安因素和专政方法带到党的工作上来；不了解工人阶级的思想倾向；计划夺取政权，把捷克斯洛伐克变为第二个南斯拉夫的叛徒和阴谋集团的领导人等莫须有的罪名，什林格被处决，其他人遭长期监禁。

最令人震惊的是1952年审判以斯兰斯基为首的“反国家阴谋中心案”。

鲁道夫·斯兰斯基，生于1901年7月31日，青年时期就投身革命，是捷共的创始人之一。1927年任捷共奥斯特拉发州委书记，1929年成为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他是捷共莫斯科小组的领导人之一，1944年又成为乌克兰前线游击队总部的成员，领导了斯洛伐克民族起

义。1945年，斯兰斯基任捷共中央总书记，他和哥特瓦尔德以及萨波托斯基一起，是捷共“三巨头”中的“老二”。斯兰斯基做梦也不会想到，“叛国犯”的厄运怎么会降临到他的头上，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却成为滴血的现实。

斯兰斯基案件是苏联顾问导演，斯大林亲自审定的冤案。

还在1951年6月，苏联顾问就警告捷克国家保安部门，暗示“已获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特别是关于斯兰斯基和捷共中央国际部部长贝·盖明德的材料”。哥特瓦尔德同意对这些“材料”进行调查，以便能够“揭发出有关酝酿中的阴谋活动的全部事实”。

1951年7月20日，得知苏联顾问的报告，斯大林，从莫斯科给哥特瓦尔德发来一封密码电报，内称：已收到揭发斯兰斯基和盖明德的材料，但“这些材料不足以作为控告的依据，因为材料都出自著名罪犯的告发”。电报中，斯大林批评苏联国家保安部驻布拉格顾问弗拉基米尔·博亚尔斯基“对工作的态度不够认真”，决定将他召回莫斯科。当天，哥特瓦尔德立即回复斯大林，顺着斯大林的口气说，他“从一开始就对来自被揭发的罪犯那里的口供的可靠性抱有怀疑”。回电中，哥特瓦尔德为博亚尔斯基说情，说博亚尔斯基“为捷克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帮助”，希望让他继续留在捷克斯洛伐克。

就在这两天里情况发生了变化。7月23日，哥特瓦尔德的女婿，已升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成员、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阿列克赛·切皮契卡，带着秘密使命，代表哥特瓦尔德出席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切皮契卡对斯兰斯基“材料”的介绍，并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二天，斯大林给哥特瓦尔德又写了一封信，信中虽然还认为来自罪犯口供的“揭发材料”不一定可靠，但说到：“根

据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顾问的报告，斯兰斯基在干部政策上犯了许多错误，所以不能留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

接到斯大林的信后，哥特瓦尔德不敢怠慢，立即于7月26日给斯大林回信，表示同意斯大林的“建议”，解除斯兰斯基的现任职务。1951年9月，捷共中央召开全会，主要内容是批判斯兰斯基在“分配干部方面存在严重错误，以致被敌人利用”；“把党的机构置于国家机构之上，搞第二个权力中心”；“不能正确理解到底怎样使用权力这个原则性问题”。斯兰斯基被解除捷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调任政府副总理。

1951年11月初，斯大林派“更强和更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苏联国家保安部将军阿·贝斯恰斯诺夫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的总顾问，接替博亚尔斯基的工作。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米高扬突然来到布拉格，交给哥特瓦尔德一封斯大林的亲笔信。原来11月初，斯大林接到驻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顾问报告，说“侦察到斯兰斯基可能叛国，逃亡西方”。于是，斯大林紧急“建议”哥特瓦尔德“尽快速捕斯兰斯基”。米高扬和哥特瓦尔德紧急会谈时，虽然亮出斯大林的亲笔信，但哥特瓦尔德对是否要立即逮捕斯兰斯基仍犹豫不决，理由是“从9月任命政府副总理至今的两个个月里，拿不出任何可以作为依据而逮捕他的新材料”。米高扬生怕有辱使命而惹火烧身，只好中止会谈，到苏联使馆向斯大林请示。在通话中，斯大林坚持自己的“建议”，并要米高扬“提醒哥特瓦尔德，注意他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哥特瓦尔德再也不敢顶了，只好说：“斯大林一般都是根据可靠的材料得出结论的，他的建议肯定是好的”。哥特瓦尔德屈服了。在此之前，他曾经同苏联顾问们乃至同斯大林抗争过，他想保护他身边的同志免受无妄之灾，也不甘俯首贴耳的

屈辱地位，但在国家尊严、民族独立和个人的身家性命、荣辱地位的天平上，他倾向于后者。只要一失足就会愈滑愈远，哥特瓦尔德从此成了斯大林个人专制体制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积极奉行着。

斯兰斯基及捷克斯洛伐克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命运就这样被拍定了。

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捷国家保安部向哥特瓦尔德报告：1951年11月9日，截获了一封寄自国外情报机构间谍的信，收信人是被称作“伟大的清洁工”的斯兰斯基。这封信警告收信人：“类似波兰审讯哥穆尔卡的案件正在威胁着他”；信中向他介绍了越出国境，进入国外政界，以及安全保护、使自己生存下去的办法。事隔近半个世纪，斯兰斯基及同案的被害人早已平反和恢复名誉，但是这封子虚乌有的、寄给“伟大的清洁工”的信，究竟是谁、是怎样编造出来的，至今仍然没有确凿的档案来解开这个谜团。不管怎样，哥特瓦尔德决定于11月24日晚上逮捕了斯兰斯基，同时被捕的还有盖明德尔等一批高级官员。

1951年12月6日，捷共中央在布拉格的赫拉德强尼城堡西班牙大厅召开全会，宣布撤销斯兰斯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哥特瓦尔德满脸严肃地宣读对斯兰斯基的“控告书”，内称：斯兰斯基“有意识地支持敌对和犯罪集团的一切颠覆活动”；“试图另建一个特别的党的中心”。哥特瓦尔德还说：“在调查各种被捕的地下集团的过程中，很清楚地查明，斯兰斯基是积极地参加了这些阴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反党反国家阴谋的领导成员。”“控告书”最后说：“西方帝国主义特务机关计划让斯兰斯基逃往西方。我们已掌握了它们的计划和确凿的证据。”全会通过了《关于鲁·斯兰斯基叛变和领导反党、反

国家阴谋中心》的决议，将他们作为间谍、敌人和叛徒，开除出党，送交法庭审判。

审判斯兰斯基“反国家阴谋中心案”的舞台就这样搭建起来了。1952年12月18日，在捷共全国代表会议上，那位曾带着秘密使命、代表哥特瓦尔德出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捷克国防部长切皮契卡，无意间把制造“案件”的幕后主使者带了出来。切皮契卡在“揭发”斯兰斯基的种种阴谋活动之后说：“如果我们不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最亲密的和最好的朋友斯大林同志那里得到帮助，要消灭损失和在短短的两年内迅速增强我国的防御能力是不可能的。”

1952年8月以“反国家阴谋中心案”审判斯兰斯基及其他同案人。“审判”自始至终除了那封“伟大的清洁工”的信之外，没有任何材料足以构成起诉的成立。至于“伟大的清洁工”这封信，连侦讯员和苏联顾问们也明白，它根本不能证明斯兰斯基同国外有联系。

其实，舞台早已搭好，“审判”只不过是演戏而已。在审讯时，起诉人和被告都从事先精心录制、几经修改的录音带上记熟自己的“角色”以及所要背诵的“台词”，然后在法庭上“表演”，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斯兰斯基案件的主要起诉人是布杰约维采的检察长约瑟夫·乌尔瓦列克，另一名起诉人是国家检察长瓦茨拉夫·阿列什，他们心里都明白，被起诉的人根本就没有罪证，而制造出来的“罪证”是相互矛盾，不堪一驳的。他们都因在“审讯”中将无罪“审”成有罪而有功，乌尔瓦列克升任最高法院院长，阿列什升为国家总检察长。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破坏法制的种种恶行，苏共和苏联政府强调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这对捷克斯洛伐克有所震动。乌尔瓦列克和阿列什被问到为什么要把明知无

罪的人送向死亡和监狱时答道：“难道我们应对此负责吗？这是党的决议，我们只是执行来自上面的命令。”这是真实的回答，也是绝妙的回答。捷共的创始人之一、捷克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党中央总书记，竟至遭此下场，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只有苏联和它控制下的东欧，才能制造得出。真是法制何在？天理何在？至于斯兰斯基自己，至此方才明白，他曾用来处置克利门第斯的做法，现在由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用来对付他本人了。1952 年 1 月，斯兰斯基在自杀未遂之后，承认“第二中心”的存在，承认一切对他的“指控”。

1952 年 11 月 27 日，被控叛国、搞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军事政变的斯兰斯基等 14 名党政军要人中 11 名被处死刑、3 名被处无期徒刑。谁也没有提出上诉；谁也不理睬他们请求赦免的要求。12 月 3 日，斯兰斯基等 11 名副部长以上官员被处决。接下来的是大批撤换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近 20 万名党员和预备党员被开除出党和除名。与此同时，在制造一连串“案件”和“审讯”中有功的人员受到奖励：14 人获共和国勋章、6 人获劳动勋章、47 人因“勇敢”而获得奖赏、几十人得到提拔，当然每人还有大批奖金。

1952 年 11 月 28 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博·贝鲁特写信给哥特瓦尔德，说：“请同意我们的安全机构人员前来你国，目的是弄清被判决的斯兰斯基和其他人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他们与哥穆尔卡、费尔德的联系。”哥特瓦尔德同意了这一“请求”。

正当清洗的大网越张越大、杀人的屠刀越举越高的时候，一件事使大清洗的浪潮受到突然抑止，这就是 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因脑溢血而逝世，苏联终于停止了无休无止的大清洗。不然的话，虽然河清海晏总有时日，但不知又有多少人无辜被

绑赴刑场、关进监狱。

哥特瓦尔德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1953年3月14日病死在莫斯科。萨波托斯基继任共和国总统，威廉·西罗基被任命为政府总理。9月4日，安托宁·诺沃提尼被选为捷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3. 诺沃提尼和他的历史遗产

诺沃提尼接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外部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客观形势曾为诺沃提尼创造了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大好条件。

1953年4月4日，即斯大林死后一个月，苏联内务部宣布：在对1953年1月的“医生间谍案件”重新做了缜密的检查之后确定，前国家保安部对被告的逮捕是不正确的，那些供词“是前国家保安部侦讯部门的工作人员用苏维埃法律所不允许并严厉地禁止的侦讯获得的”。苏联内务部同时宣布，释放该案所牵涉的一切人，完全恢复他们的名誉。那位在“医生间谍案件”中因告密有功、诬告受奖的季马舒克医生，也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追回所授予的列宁勋章。

1953年4月6日，《真理报》发表题为《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是不可侵犯的》社论，强调任何人不得破坏苏维埃法律，苏维埃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高原则，就是保卫苏联宪法所保证的苏联公民的权利。把保证宪法、保护宪法所规定的苏联公民权利提到这样的高度，这是自1918年苏俄（苏联是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第一部宪法颁布以来所未有过的，表示苏联新领导在明显地改变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气氛。1954年，

苏共中央成立了以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对自苏联成立以来、尤其是 30 年代以来大清洗中的“案件”进行重新审查。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上，正式为“列宁格勒案件”平反，为在此案中受害的所有人恢复名誉。

苏联的变化很快在东欧引起反响。1953 年 6 月的比尔森事件成为东欧的第一声春雷。

波希米亚西部的工业城市比尔森不仅有斯柯达工厂这样的汽车工业基地，还是驰名世界的啤酒生产地。1945 年 5 月，美军曾从德国法西斯手中解放了这座城市，因而，比尔森较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地方更多受西方民主气氛的熏陶，对层出不穷的政治“审判”极度反感。

郁积已久的不满情绪终于因币制改革而激化起来。1953 年，捷政府的币制改革规定以 50 旧克朗换 1 新克朗，又缺乏相应的补偿。火山爆发了。6 月 1 日（星期一），斯柯达汽车厂的工人用重型卡车撞开工厂的大门，涌上街头。5000 来名工人的游行队伍，高喊“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掠夺！”的口号，奔向市政府，抗议掠夺性的币制改革。市长迈因策尔向游行队伍解释：“你们有一位工人总统，政府是支持劳动和工人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工人的利益。”队伍发出了嘘声，高喊：“我们要自由选择！”示威者冲进市政府，把斯大林、哥特瓦尔德、萨波托斯基的半身像扔出窗外，烧毁苏联的国旗。直到天黑，从布拉格调来大批军队和坦克，才将示威群众驱散。

半个多月后，民主德国发生更大规模的骚动。6 月 17 日，东柏林几千市民集会游行抗议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罢工和游行的浪潮很快扩展到全国近 10 个大中城市，近 30 万人参加反

政府的示威游行，造成 25 人死亡，近 400 人受伤的流血冲突。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开始了一场后来称作“非斯大林化”的浪潮。

在“非斯大林化”的浪潮中，其他诸如 1954 年波兰哥穆尔卡的被释放，1955 年 5 月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和苏南两党、两国关系正常化，1956 年 10 月的匈牙利事件，都对东欧的政治生活形成巨大的冲击波。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稍有政治敏感的人都意识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平反冤假错案已是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潮流。但是，诺沃提尼既不会透视历史，也不能洞察现实，仍旧在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划定的框框里转圈。当苏联为医生间谍案件平反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则继续在加紧审判，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尽管诺沃提尼及其他捷共领导人收到许许多多申诉信，但他们拒不检查，拒不为无辜受害的人平反。1955 年 12 月 23 日，诺沃提尼在捷共中央全会上作题为《关于重新复查一些法律案件的报告》，竟违背已经知道的事实，不真实地解释政治审讯的原因和性质。苏共 20 大以后，“解冻”的春风也荡漾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捷克斯洛伐克的广大党员和群众对捷共的工作，尤其是对大清洗提出激烈的批评，要求捷共中央进行认真检查，解决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出现的迫切问题。

1956 年 4 月 19～20 日，捷共中央召开全会，讨论苏共 20 大的结论对捷共工作的意义。全会对个人崇拜在捷共内的表现提出严正的批评，要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要求重新审查历年来的那些“案件”。在这样的形势面前，诺沃提尼却以撤销切皮契卡的一切党内外职务，批判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中犯了严重错误”来掩盖一切。为了堵住缺口，诺沃提尼居然把斯兰斯基设想为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利亚，在 4 月 20 日的中央全

会上，通告新成立的“复查斯兰斯基案件委员会”说：“今天已经清楚，我们将不对斯兰斯基及其同伙的案件进行任何平反。”1956年11月19日，捷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完全中止了刚刚开始部署的平反工作。为了压制要求平反的呼声，诺沃提尼把主张对以往的审讯进行重新审查的人称作“宗派主义者”，以堵住不同声音。1957年11月13日，共和国总统萨波托斯基病故，诺沃提尼兼任了总统，集全国党政权力于一身。诺沃提尼在工业生产领域提出要发挥计划的优势，制订远景规划，在农业领域加速实现合作化，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1958年6月，捷共召开第11次代表大会，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已基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和建成了社会主义基础”。

短短的几年，诺沃提尼的所作所为足以表明，他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坚持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体制，在捷克斯洛伐克确立他的个人专制体制。

4. 60年代社会危机的激化

1960年6月12日，捷克斯洛伐克通过了新宪法，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阶段。7月初，捷共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指令草案。第三个五年计划指令草案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为建设共产主义积累力量和物质源泉。该草案还具体规定了各项极高的指标。

当诺沃提尼兴冲冲地向建设共产主义冲刺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国内经济也随之—落千丈。

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依托者苏联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5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开垦荒地破坏了原来的生态平衡。1960年3、4月间，“黑风暴”（中央亚细亚沙漠地区因暴风而卷起的“沙雨”）使新垦区受灾耕地面积达400万公顷以上。1963年，哈萨克斯坦又有2000万公顷的耕地受黑风暴侵害，中亚地区4500万公顷的耕地受大风的侵袭。缺乏综合考虑的大规模开垦荒地，破坏了水土保持，以致伏尔加河、顿河、马拉尔河下游河床每公里每年淤积泥沙12500吨。有些地方的水库由于泥沙的淤积，5年内储水量减少了85%。1962年干旱的夏季，风化侵袭波及几百万公顷。仅巴夫洛达州，就有150公顷沃土被风刮走了。1963年，苏联粮食严重歉收，以致动用850吨国家储备黄金向加拿大购买600万吨谷物，其中的140万吨就是给捷克斯洛伐克的。

60年代初，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追随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恶化了和中国的关系，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华贸易随之急剧下降。

在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萎缩的同时，由于苏联和西方国家关系趋于紧张，捷克斯洛伐克和西方国家的贸易通道也随之堵塞。

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改变斯大林时期的僵硬外交政策，力图通过谈判和协商调整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1955年9月13日，苏联和联邦德国建交，两国同意互派大使，迈出了同西欧国家调整关系的决定性一步。

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伊·米高扬（1895～1978）以“休假”为名，在美国停留近20天，呼吁苏美举行双边会谈。1959年9月15～28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1894～1971）应美国总统

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访问美国。苏美两国首脑举行戴维营会谈，苏联还正式邀请艾森豪威尔在 1960 年春夏之间访问苏联。苏美两国关系似乎将朝着缓和、宽松的方向发展，但接下来的 U—2 飞机事件、新的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一连串事件，苏美两国关系又急转直下，双方又剑拔弩张地对峙。

戴维营会谈苏美两国关系虽无实质性的进展，但毕竟是苏联获得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表明美苏两国的关系已发生了变化。艾森豪威尔原定 1960 年 6 月初出席巴黎四国最高级会谈之后，正式访问苏联。艾森豪威尔访苏眼看就要成行，1960 年 5 月 1 日发生了 U—2 飞机事件。这一事件不仅中止了艾森豪威尔访苏，而且使东西方关系在苏美对话的大门打开以后的形势下重趋紧张，冲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生活。

美国的 U—2 高空侦察机自 1956 年投入使用以来，由于能飞到 23000 米以上的高空以及优良的各项技术性能，一直飞临苏联领空侦察和拍摄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军事设施、导弹和核实验基地等情报资料。苏联虽然知道美国有此举动，但苦于截击机和地对空导弹都无法企及，只能吃哑巴亏。经过几年的努力，苏联终于使导弹性能有了新的突破，研制出了对付美国高空侦察机的地对空导弹。

1960 年 5 月 1 日，美国 U—2 高空侦察机又进行侦察飞行。上午 9 时左右，U—2 飞机在苏联乌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导弹击中，驾驶员美国空军上尉弗·加·鲍尔斯在飞机爆炸前的一刹那被弹出机舱，跳伞着陆后被苏联俘获。5 月 7 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了击落美国间谍飞机并活捉驾驶员的消息。艾森豪威尔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于 5 月 11 日承认 U—2 飞机 4 年来一直是根据总统的命令飞行，以便充分了解苏联的军事工业状况。艾森豪威尔的自我辩解是：谍报行为

虽然令人厌恶，但是十分必要。

1960年5月16日，世人瞩目的东西方四国最高级会谈在巴黎的爱丽舍宫召开，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各怀不同的心情走进爱丽舍宫这间当年曾是路易十四和他情妇的私人餐厅。会议开始后，赫鲁晓夫激烈谴责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指派U-2飞机侵犯苏联的无耻挑衅行为，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向苏联公开道歉并宣布今后不再侵犯苏联领空。艾森豪威尔面对赫鲁晓夫的激烈言辞，自感理屈气短，但只肯承诺在他任职期间（他将于1961年1月总统任职期满）停止这种飞行，拒绝作更多的承诺。虽经戴高乐竭力调停，双方都不肯让步，四国最高级会谈不欢而散。随着四国最高级会谈的流产，赫鲁晓夫也收回了对艾森豪威尔发出的访苏邀请。开始改善的美苏关系又紧张起来。

1961年4月，美国策划武装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失败，赫鲁晓夫抓住这个时机，在6月初举行的苏美两国维也纳最高级会谈中再次提出，要将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如果美国拒绝，苏联将单方面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苏联想以此种办法将美国和西方国家逐出西柏林。当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断然拒绝。尽管苏联进行种种恐吓和威胁，民主德国也在沿东、西柏林的分界线筑起“柏林墙”，封锁通道，但肯尼迪作出强硬反应，在7月25日晚的电视讲话中声言，为维护柏林的利益，不惜一战。美苏双方的坦克在柏林墙的两侧对峙，柏林危机达到顶点。

柏林危机刚刚缓和下来，1962年8月，苏联又以保卫古巴为名秘密向古巴运送导弹和修建中程导弹发射场。10月22日，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苏联在联合国观察员的监视下，迅

速拆除和撤走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美国还声称武装封锁古巴，拦截前往古巴的舰船，听候美国检查。苏联自知远洋舰队在加勒比海地区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只得按美国的要求从古巴撤回导弹。

东西方关系的紧张使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捷克斯洛伐克的出口贸易大幅度下滑，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困难。

60年代初的国际条件固然对捷克斯洛伐克不利，但造成捷经济恶化的根本原因是内部条件：继续贯彻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排斥市场的集中计划经济使捷的国民经济走进了死胡同。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工业生产要提高56%，其中机器制造业将提高76%；农业生产要求提高22.8%。农业投资由于严重不足，到1962年《红色权利报》就承认，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1938年的水平。1963年，国民收入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2%^①，工业生产下降0.7%。1963年捷克斯洛伐克成了处于经济停滞状态的惟一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被迫宣布放弃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社会引起了很大震动。

经济困难必然反映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政府总理西罗基从理论上说应对经济状况的恶化负责。1963年9月20日，西罗基被解除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政府总理职务，理由是“贯彻党的路线不力”。直接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雅罗米尔·杜兰斯基虽然保留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位，但被解除副总理职务，改任一个有名无实的工作——捷中央生活水平问

① 据美国统计，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民收入，1963年比1962年下降3.7%。见塔德·舒尔茨著《“布拉格之春”前后》，第265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4月。

题委员会主席。40 岁的斯洛伐克人约瑟夫·列纳尔特接替总理一职。

面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失败所出现的经济困境，诺沃提尼也感到难以为继，希望有所变革。在国民经济处境危难的逼迫下，捷共中央启用 44 岁的改革经济学家希克，开始经济改革。

二、经济改革的起步与挫折

1. 希克——新经济体制的创始人

俗话说，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个已走上现代文明道路的国家，怎能在斯大林模式这一棵树上撞死？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失败，使早就怀疑计划经济体制的捷克经济学家们更加积极地去寻求新的出路，他们之中极有创新精神的代表人物就是希克。

奥塔·希克 1919 年 9 月 11 日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普里森市，少年时就读于布拉格的一所中等技术专科学校。1936 年从该校毕业后，进入布拉格的一家电器工厂工作。捷克斯洛伐克被法西斯德国吞并后，希克参加了抵抗运动。1940 年被捕，在茅特豪森集中营里苦熬了 4 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方始获释。1947 年，希克进入布拉格政治社会大学学习，捷共将他作为一名党的青年干部进行理论深造。1952 年，希克从布拉格政治社会大学毕业，进入捷共中央党校任教，很快成为一名有学术影响的青年教授。1958 年，他的《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一书问世。此书一反苏联经济学界仅从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差别去认识商品经济的旧思路，从计划经济的运行机制去阐述商

品经济的积极意义，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均引起强烈反响。这一年，他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教授并当选为捷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年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1963年被任命为捷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主持、设计了经济改革方案。

希克从50年代初参加《资本论》捷克文版的翻译工作开始，就系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50年代，东欧各国在实行斯大林模式中，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种种困难，出现了连寻常人都难以理解的种种怪现象。希克以经济学家的学识和智慧、以捷克斯洛伐克普通公民的良知，求索其中的矛盾和解脱的办法。

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矛盾和斗争是世界总体矛盾和斗争的一部分，是世界性矛盾和斗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映。

20世纪的世界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政治经济体制、两种价值观并行实践的世界。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生活实行议会民主制，经济生活实行市场经济，奉行以人为中心以体现人的自身价值为追求的价值观。以苏联为主体、以斯大林模式为规范的社会主义世界政治生活实行个人专制，经济生活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奉行以国家为中心以体现国家整体价值为追求的价值观。由于这样的根本对立，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产生截然相反的分野，20世纪就充满着彼此争斗的缤纷色彩。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以奥地利经济学家冯·米塞斯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世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症结问题在于不可能建立真实的价格体系，因而也不会有对利润的追求，也不会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当然也没有合理的资源配置。他们的结论是：计划经济注定是无效

经济。

苏联的经济学家们则遵循列宁在 1918 年提出过的、斯大林后来予以发挥的思想，认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工厂，在经济形式上应以产品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在管理方式上应以全面的计划化取代无序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他们的结论是：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影子；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才不知经济危机为何物。苏联的经济学家视市场经济为资本主义所特有，计划经济则属于社会主义的专利，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置于 20 世纪社会经济生活对立的两端。

然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计划经济运行中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已是尽人皆知的。尤其是东欧各国，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苏联以军事力量帮助它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强使实行计划经济，因而对计划经济的弊端深有切肤之痛，从 50 年代初开始，就不断寻求新的出路。东欧的经济学家们大都从现实的计划经济的弊端出发，偏重于经济运行层次的研究，产生了姑妄称之为“改革经济学”，希克是其中的一员，是改革经济学中的佼佼者。

希克不像西方经济学家那样，从理论上根本否定计划经济，而是从计划经济实际操作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层面，实际地提出计划经济内在的缺损。他指出：计划经济下的计划管理已完全行政化，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对生产、流通和分配的调节作用；而计划手段又单一化，似乎只有指令性计划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加上计划目标只注重数量指标，忽视效率和效益。这种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无效经济，希克敢于直面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认为即使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而不是为生产而生产，更不是为实现计划而生产。

因此，社会生产必须保证不断提高社会消费水平，不断满足社会对各类商品的质和量的扩充需求。社会生产还要不断调整，使资源配置合理化，提高生产效率。此外，社会生产也应尽可能地使生产量同需求量相适应。可是，斯大林体制的计划经济，仅仅局限于用行政手段平衡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这实际上是无视制约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多元因素，用行政手段主观地予以单一化，这种计划必然脱离实际，是无计划。希克认为：“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性，就是在整个国民经济的范围内，在考虑到一切基本的、内在的经济联系的条件，对各种经济活动的发展作出某种全社会的、有目的的规定，并且要做到使计划中的经济活动同这种活动的未来的实际发展始终保持一致。”^①

希克在源于实践的对计划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市场的新认识。

姑且不说人类社会自有商品以来就有了市场，而当代社会生活就是市场生活，很难设想社会生活可以离开市场。希克终于说出，把市场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希克认为，任何一个中央计划机关都只能提出一个总的生产增长计划，至于微观发展和技术发展的具体决策，只能由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制定，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也只能依靠市场来解决。社会主义应当有更完善的市场，完善市场的要素在于打破市场垄断、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如果排斥市场，必然出现重大的经济失误。

希克既肯定了计划的合理性，又肯定了市场的必要性，

① 转引于潜等编著《东欧经济理论——东欧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改革思想介评》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7月。

率先提出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思想。在肯定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前提下，希克认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应当是多元的。在多元的所有制结构中，既脱离私人资本，又脱离国有资本的股份所有制，应占有重要地位。希克称这种股份所有制为“中立资本”，这种中立资本属于“劳动者企业”。这种“劳动者企业”不是传统观念上的“劳动者集体所有制”，而是资本以分成的形式直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让企业的每个职工成为企业的共同占有者，资本也成为集体所有制资本。希克希望建立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就是股份制。希克把这种企业称为“劳动者企业”，它应是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重要形式。此时，希克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企业中的所有权和产权的概念，但已经若隐若现地区别所有权和产权的思想。

以中立资本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构成希克关于捷克经济改革的基本构想。

布拉格之春的意识是从经济改革发出来的，赋予布拉格之春以新的意识的是希克。希克被称为捷克斯洛伐克新经济体制的创始人。

2. 计划管理能够完善吗？

希克的改革目标是追求多元所有制结构、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对希克的经济改革理论，捷共中央领导层中的古斯塔夫·胡萨克斥之为“修正主义的希克主张”，但是就捷共中央总的倾向来说，包括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在内，都希望有所变革以摆脱经济困境。希克的经济改革注重完善运

行机制，这点尤其能被捷共中央所接受。捷共中央决定启用希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完善运行机制，使国民经济有新的发展。

以希克为主席的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提出以方向性计划代替指令性计划，增加企业在生产和投资方面的自主权；企业的收益和职工的收入都必须同市场上实现的经济效益相联系，把企业逐步推向市场。同经济改革相适应，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还提出企业干部知识化的建议，把企业逐步推向工人自治。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的建议，经捷共中央讨论，形成捷共中央《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草案》（以下简称《原则草案》），于1964年10月公布。

《原则草案》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除了保存制订中央长期规划的机构之外，逐步把国家机器的有关部分变成企业和超企业组合的行政机构，同政治性的国家机构分开；

二、党机关活动中免除其指挥经济的工作（估计指挥经济的工作约占当时捷共机关工作量的2/3），把党机关的工作集中于政治工作和国家大政方针决策工作；

三、企业应当成为尊重市场规律和生产效果的经济活动独立单位，提高专业干部在企业中的作用，弱化政治干部在企业中的比重和作用；

四、重新解决工会、工人和企业行政人员在工厂和企业的管理工作中所应发挥的作用问题，让企业的全体员工通过奖金（利润提成）直接感觉到管理不善的恶果，为此，必须让他们对管理拥有某种形式的发言权（建立某种形式的自治机构）。

看得出，《原则草案》并未对计划经济体制有带根本性的触动，仅仅是想在有限的程度上注入市场经济的活力，使企业从

原来的完全面对计划，半转地、或者说是“一只眼睛盯着国家计划，另一只眼睛瞄向市场”。为此，必须削减党的机关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干预，并使企业员工的收益直接和企业经营的效益有所联系。《原则草案》距市场机制还很远，但在60年代中期的东欧，已经是对斯大林计划经济模式的大胆挑战，是当时东欧的一个既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现实出发，又是勇敢地承认和接受市场规范的改革方案，不过，捷共中央虽然公布了《原则草案》，但是规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是供“讨论”的，到1966年以后才正式启动运作。

在捷共中央内部诺沃提尼虽也摆出一副急于改革的样子，实际上只想摆脱由第三个五年计划失败所造成的困境。而按照希克关于新经济体制的构想，是要让企业发挥经济自主的积极性，运用市场的影响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如果按希克的构想运作起来，势将打破官僚机构臃肿的中央集权制，拆毁经济领域里的行政专制体制。

按希克的构想，企业应当成为尊重市场规律和生产效果的独立单位。在这样的独立单位里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干部，自然必须是富有各方面学识的专业人员。而目前充斥于企业领导岗位的政治型干部必将面临市场的挑战；尤其是今后选择企业干部也会从政治型转向专业型。企业干部结构的变化，势将动摇捷克斯洛伐克现行的专制体制。

按希克的构想，随着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走向市场，将影响庞大的国家机器结构和无所不包的党的权力结构。市场机制的运作，国家机关只需要保留制订中央长期规划的机构，现行的对所有经济活动都发号施令的国家机关都会变成如马克思所说的“寄生赘瘤”。而且，在作为执政党的捷共的活动中，将会失去其很大一部分指挥经济工作的职能，庞大的党的机构

的一部分也会显得多余起来。

因此，捷共中央内部的很大一部分人虽然不反对改革，但是害怕损害自己的权力和权益，因此给实现具体改革措施设置种种障碍。设置障碍的主要做法是：仅限于对改革进行讨论，但不采取具体步骤；收集各种论点来说明某种改革构想是无法实现的，或者慢慢创造条件再实现。这样，《原则草案》一出台就遇到来自捷共党内的阻力。

此外，《原则草案》本身也充满矛盾：一方面要取消强制性指标，逐步实行市场价格；另一方面又限定只能有 10% 的企业产品允许放开市场价格，强调计划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1965 年 1 月，市场价格还没放开，捷共中央又紧跟着通过关于改进计划管理系统的原则，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应有计划发展，在经济运行中要发挥集中管理的优越性，强调国民经济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主要工具，这实际上是把《原则草案》中的市场机制要求，冲到爪哇国去了。何况《原则草案》在外贸、财政和银行信贷工作方面，几乎没有要求。《原则草案》所表现出来的骑墙态度，反映了捷共中央内部对改革的意见分歧。《原则草案》公布了一年多，而改革的各项举措实际成效很小。捷共中央这种迟疑不决的态度使全国群众对经济状况不满的情绪更加激化起来。

1965 年 12 月，捷共中央全会研究了国民经济状况，并且研究了即将召开的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1966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4 日，捷共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重申 1962 年 12 月举行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长远目标仍然有效，就是说，十三大要坚持十二大的方针。十二大的基本精神是恢复已经修改的国民经济比例，中止改革试验，恢复 1958 年以前的国民经济管理体制，重新实行集中化；

在计划指标上，又把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定为中心指标。捷共十三大的反复使捷共中央内部一部分坚持改革的人感到，要推动捷克斯洛伐克向前发展，仅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真是难上又难。

三、诺沃提尼的倒台

1. 新的起点

新经济体制改革处处受阻、举步维艰、收效甚微，不仅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经济改革的期盼形成极大的反差，就连捷共的上层人士也对诺沃提尼的统治、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蓄积起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越出了计划经济的层面，越出了单纯希望摆脱苏联控制的范围，从社会主义的本源上思考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使“布拉格之春”有了不同于 50 年代东欧各国社会骚动的新基础。

60 年代初，哥特瓦尔德当政时期领导集团中的主要成员萨波托斯基和科别茨基^① 已经去世。1953 年起任内务部长的鲁道夫·巴拉克也被诺沃提尼作为大清洗的替罪羊，于 1962 年 2 月逮捕，开除出捷共。在捷共中央主席团里增补了斯洛伐克人列纳尔特和杜布切克。经过这番调整，诺沃提尼达到他当政 15 年

① 瓦茨拉夫·科别茨基，生于 1897 年 8 月 27 日，1921 年加入捷共，1931 年任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 年成为捷共在莫斯科的领导成员，战后一直是捷克中央主席团委员，曾任情报部门部长、文化部部长、政府副总理，1961 年 8 月 5 日病歿。

中的权力鼎盛时期。但是诺沃提尼不思进取，在经济危机面前虽然也赞成改革，实际上是个十分保守又喜欢玩弄权术的人，缺乏政治家的起码气质。

诺沃提尼生于1904年12月10日，1921年加入捷共，1937年任捷共霍多宁州委书记。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德国吞并后，诺沃提尼在国内坚持地下斗争，1941年不幸被盖世太保逮捕，监禁在茅特豪森集中营。茅特豪森集中营是德国法西斯迫害政治犯的最残酷的集中营之一。在严酷的环境下，诺沃提尼曾对难友说，如果能熬到出狱，他不想再过问政治，将专门照料家庭、住房和花园。不管诺沃提尼说此话时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总是他对政治斗争的艰危性估计不足的某种流露。

1945年，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捷克斯洛伐克在苏军的帮助下获得解放。诺沃提尼走出集中营之后，担任布拉格州委第一书记的重要职务，1946年自然地成为捷共中央委员。

1948~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政治风云激荡，接连发生“二月事件”以及清洗克里门第斯、什林格、什维尔莫娃、盖明德尔、斯兰斯基等8大冤案，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也因而腾出许多空缺。像苏联、东欧这样的国家，在斯大林体制运作顺利的年代已经走上高层政治仕途的人物，要么往前冲，要么掉下来，很少能保持不偏不倚、不升不降的平稳状态。诺沃提尼在这几年里从捷共中央委员、国民议会议员，上升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共中央书记、捷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理的高位。诺沃提尼的迁升并不是因为他的才干出众，而是由于他积极地“揭发党内的敌人”并狂热地开展“反斯兰斯基分子”的斗争。

捷克斯洛伐克最高检察院保存着诺沃提尼“选购克里门第斯床单和中国瓷餐具”的文件。原来克里门第斯、斯兰斯基等

高级官员被处决之后，他们的财产被贱价拍卖，活着的高级官员享有优先选购权。克里门第斯担任外交部长时，诺沃提尼曾到他家做客，十分喜爱克里门第斯家的一套中国瓷餐具。于是诺沃提尼就选购了克里门第斯的床单和中国瓷餐具。诺沃提尼此举表明了他的思想境界不高。

诺沃提尼在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初，在和他的兄弟喝咖啡时两手托着脑袋说：“我不称职，我干不了，我没有这份能力。”诺沃提尼确实才疏学浅，也没有多少文化素养，任布拉格州委第一书记时，大多数干部认为他是一个行政官员，不是一个政治家。因而担任了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就在权术上多下功夫。他曾在私下谈话时说：“不必要求人们同意你，但必须要他们喜欢你，最重要的是要他们尊敬你。”诺沃提尼使周围的人喜欢他、尊敬他的办法之一是：下令在伏尔塔瓦河畔靠近奥尔利克城堡的人工湖附近，为最高级领导层修建了一片别墅群。这些具有西欧现代化水平的别墅专供主席团委员、苏联驻捷大使及其他首脑人物享用。而他自己则在离开别墅群的高地上，按乡村农舍的式样建了一幢专用休养所，把这所孤零零的房子取名为“老鹰窝”。

诺沃提尼没有什么理论修养，在多年实际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拼盘知识使他不可能对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生的问题有稍为深入的认识，自然也不可能对捷克斯洛伐克今后的发展提出方向性的意见。从本质上说，他是希望循着斯大林体制的老路走下去；在赫鲁晓夫改革的触动下、加上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失败的压力使他转向赞成经济体制改革。可是，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加上改革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时，他又想退回去。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在新的起点上认识到经济改革的挫折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

会主义提出新认识。

以 1956 年 10 月匈牙利事件为代表的 50 年代东欧民族民主运动，其中心内容是反对苏联干涉、要求“俄国人滚回去”。60 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新一代人对苏联的干涉想得更深、更远，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多少接受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本义应当包括正义和自由、不受阻碍地交流思想，每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把以往的大清洗、把苏联的干涉和强制推行斯大林体制都同违背社会主义的正义和自由联系起来。当经济改革受阻之后，他们就在新的起点上向捷克斯洛伐克的现行体制提出挑战。每当这种时候，民族问题又往往成为挑战的缺口。

首先叫阵的是斯洛伐克的文化刊物。1964 年 2 月开始，斯洛伐克的综合性文化刊物《文化生活》、《文化创造》和《源泉》相继发表有关阐述社会主义本义问题的文章。《文化生活》还连载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拉·姆尼亚奇科创作的、激烈反对苏联斯大林体制的小说《迟到的报告》。《迟到的报告》把斯大林式的大清洗不是作为少数人的暴行，而是看作是对社会主义本义的歪曲。布拉迪斯拉发出版社很快将《迟到的报告》印成单行本发行。对这样的苗头，诺沃提尼是敏感的。他立即下令解除《文化生活》主编帕·斯特夫切克的职务；将姆尼亚奇科调离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团，并且禁止他竞选国民议会议员。1964 年 4 月，《红色权利报》公开指责斯洛伐克的报纸是“抗拒的和思想上敌对的”。

反对诺沃提尼的政治火苗并非那么容易就能扑灭的。1964 年 5 月 2 日，3000 来名青年学生聚集在布拉格佩特仁公园里的 19 世纪捷克爱国诗人卡·希·马哈的塑像前，举行争取民主、自由诗歌朗诵会。在几百名警察的驱赶下，学生们高喊“自由万

岁!”“打倒盖世太保!”等口号拥到瓦茨拉夫广场,继续举行游行示威。1964年10月11日,布拉格的大学生们又涌到瓦茨拉夫广场举行游行示威。一名青年爬上脚手架的顶端高喊:“谁拥护共产党?”,下面的人群齐喊“没有人!”游行用这种方式发泄对诺沃提尼政权的不满情绪。

6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已经在更深的层面上反对诺沃提尼的专制统治。

2. 布拉格的政治之花

在希克提出经济改革的系统理论、进行新经济体制改革受阻、社会上政治风云涌起的时候,捷共党内另一名新秀姆利纳日从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上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法理依据并成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之花。

兹德涅克·姆利纳日生于1930年6月22日,1946年春还不满16岁的他,抱着年轻人特有的、同旧世界彻底决裂的激情加入捷共。当时,苏联是东欧革命者公认的冲击旧世界的中坚堡垒,斯大林则是中坚堡垒的核心。姆利纳日半懂不懂地吞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这时的姆利纳日充满自信,觉得自己已经认识了真理,掌握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姆利纳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中央机关工作,和其他职位比自己高的干部一样,不分白天、黑夜,也不论周末或法定节假日,经常自愿到矿井、工地和农村参加义务劳动。

1950年9月，姆利纳日被捷共中央作为青年干部中的精英，选送到苏联去留学，并被指定为捷留苏学生党组织的负责人。姆利纳日进了莫斯科罗曼诺夫大学法律系，研读法律。

此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接连掀起了大清洗的狂飚，大清洗运动也把在苏联留学的捷留学生卷了进去。在留学生中，捷共中央也号召党员要“勇敢地、大胆地揭发党内罪恶的破坏者匪帮”。姆利纳日作为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党组织负责人，理所当然地要响应号召，他给国内审查什林格和什维尔莫娃委员会写过“揭发信”。但是，根据捷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留苏的捷留学生应“擦亮眼睛”在自己的周围寻找“暗藏的敌人”。姆利纳日因为是捷克留学生中的最高领导人，被作为寻找的聚焦点。姆利纳日被揭露出：“在对苏的态度上觉悟很低”；“工作方法同党内的帝国主义主要代理人斯兰斯基有相同的特点”，等等，他被解除职务并等待布拉格的判决。

1952年12月，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共中央书记、政府总理萨波托斯基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西罗基来到莫斯科，参加在莫斯科的捷留学生会议，处理“揭发敌人”的工作。

萨波托斯基和西罗基把所有曾经写过揭发信的人统统找来，在表示了对大家的关心之后说道：“党送你们出国不是来学习写这种信的。你们不应该互相猜疑，而是要相互信任，努力学习。”在缓和了一下气氛之后，萨波托斯基接着说：“你们要好好学习，真正掌握知识，这就是你们的任务。……你们在这里生活，看到了苏联人的生活条件，你们知道，我国人民在这样的条件下是活不下去的。当你们内部谈论这个问题时，不要把它当做什么大问题，要努力去理解这种现象，理智地解决问题。”显然，萨波托斯基的这段话是有所指地为姆利纳日开脱，因为姆利纳日曾多次以嘲讽的口吻谈论苏联物资的匮乏、商品

质量低下、人民物质生活贫困等等。最后，萨波托斯基就留学生中的“揭发内部敌人”工作宣布：“这一切都算告一段落，谁也不要再向中央写信了。没有理由从日前提出的怀疑中对任何人做出结论，这也是哥特瓦尔德同志的意见。”^①萨波托斯基的讲话，可以说是大出捷克留学生们的意外，不过也使捷克的留学生们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再也不要人人自危了。对于姆利纳日来说，由于捷共最高领导人的出面保护而免受无妄之灾，这件事使他加深了对党的信仰。

姆利纳日在苏联留学的五年对苏联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感触极深，使他加深了对斯大林体制不可救药的认识。

1954年冬，姆利纳日在莫斯科市检察院实习。当时，莫斯科检察院规定每周有一天“接待日”，听取劳动人民的申诉。每逢接待日，总有成百人排着长队，怀着申诉冤屈、讨回公道的真诚企望，虔诚地等待，但实际上这种接待日只不过是一种“演戏”。

一个寒冷的冬日接待日，姆利纳日作为实习检察官和值班检察官一起参加接待。几位来自距莫斯科大学20来公里的集体农庄庄员申诉团诉说：一年多以前，为了保证新大学^②用电，发电厂把他们好几个村子的电都停了。当时，电厂说这只是临时性措施，但一年多过去了，至今仍未恢复供电。代表诉说：为此，他们多次写信，还直接跑电厂、法院，但是谁都不理他们。申诉团中的一位庄员比较激动地说：现在，他们都在点煤

① 转引兹德涅克·姆利纳日著《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9—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4月

② “保证新大学用电”是指保证位于莫斯科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新校址用电。莫斯科大学全称“国立莫斯科米·瓦·罗曼诺索夫大学”，建于1755年，列宁山上的新校址1953年建成交付使用。

油或松明子照明，一旦引起火灾，该谁负责？值班检察官根本不理诉说的内容，却被庄员的最后这句话惹火了，接着出现下面的问答：

值班检察官怒冲冲地：“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用电？”

集体农庄庄员：“1938年。”

值班检察官：“好吧，在这以前你们点什么？还不是松明子？这说明你们不是不会使用松明子。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我们就把罪犯抓起来，依法制裁！”^①说完，让民警把申诉团赶出门外。

看到值班检察官差不多都是这样用5、6分钟时间打发一位投诉者，姆利纳日心里着实不是滋味。事后，姆利纳日婉转地问值班检察官：像庄员用电一类问题，检察院是否能从中做点什么工作？不想值班检察官像老师教育小学生似地说：“如果插手这类事，检察长就要到莫斯科市委去挨一顿批评；检察长回来再让你挨一顿批评。管不得，这种事情复杂得很。”然后，值班检察官像是自我解嘲地说：“反正这些人早就习惯点松明子了。”^②这件事深深刺痛了姆利纳日的心，他既为值班检察官对待劳动人民申诉的这种漠然态度而寒心，更对苏联司法制度的装模作样而愤懑。以后，姆利纳日几乎一亮灯就想起当年苏联检察官接待劳动人民申诉的那一幕。

1955年夏，姆利纳日在苏联度过了整整5年，从莫斯科罗曼诺夫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到布拉格。已成为“法律专家”的姆利纳日，尽管在苏联到处遇到与想象中的苏联相矛盾的事情，

① 转引《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21页

② 参见《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22页，松明子是将松树脂劈成一根根小棍子，用于作火把照明。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农村大多数农民仍住在没有窗户的小木屋里，晚上用松明子照明。

但他仍然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甚至是一名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忠实信奉者。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之一，对此，姆利纳日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和那些并不相信共产主义思想，只是为了赶浪头才参加党的人相比，斯大林式的极权专政的柱石，亦即那些坚定分子，才是阻碍改革党的政策的巨大障碍。赶浪头的人只要时机对他有利，就会改变立场和态度，而坚定的有觉悟的共产党人只有等到他确信改革必要时才会同意改革。但赶浪头的人很难成为推行改革的人，因为在倡导新事物的初期往往对他们的功名不利，甚至要冒风险。相反，改革的积极推行者只能是那些有觉悟的人，但在他们下定决心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内心矛盾的发展过程。”^① 姆利纳日的这段话讲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积极的社会主义改革者的一致性的道理，因为只有真正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为重的无私的人才能成为改革的倡导者，古今中外皆然。

姆利纳日返回捷克后，起初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总检察院工作，1958年转到捷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科学研究所，从事法学的理论研究。1959年，姆利纳日在《红色权利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学问题的理论文章，引起捷共中央领导的重视。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研究所所长克纳普院士还专门找姆利纳日谈了一次话，鼓励他更多地把自己的理论、思想介绍给读者，尤其是要让捷共中央领导了解。

1964年开始，姆利纳日进入捷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工作，开始担任秘书，不久就成为法律委员会书记，成为捷共中央有关

① 转引《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7页

法律问题的主要发言人。

当时，捷共中央设立了诸如经济、意识形态、农业、青年问题以及法律等委员会，各委员会的组织关系隶属于捷共中央书记处领导。捷共中央规定，这些委员会都作为捷共中央领导的咨询机构，实际上却成为捷共中央的“大脑”机关。因为各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捷共中央机关各有关职能部门的领导以及中央国家机关的部长或主任、科研机构 and 高等学校的知名专家等；捷共中央的所有决策、决议，几乎都由各委员会草拟和提出，然后提交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段时期，姆利纳日逐渐形成了他的法制思想，在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966年，姆利纳日被任命为捷科学院国家和法律科学委员会主席。1967年11月，他成为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跻身于捷共中央最高领导层，成为“布拉格之春”政治改革的设计师。

姆利纳日认为，像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到60年代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内部的主要问题了，作为镇压对象的阶级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政治问题应当是正确地体现整个社会的需要和利益，注意不要让人们局部的特殊需要和利益挤掉劳动人民的整体和共同需要。很明显，姆利纳日主张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主张把经济建设提到首位，把法制建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

姆利纳日还提出评价有利或者不利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问题。他认为评判这个问题的原则只能是：对任何问题作决定都要以专业知识为依据；应当让社会实践自身来表明，什么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姆利纳日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体制应当保证这两条原则的贯彻；如果离开这两条原则，就很难判断化学工业是增长5%，还是降低5%对社会主义有利？也无法界

定是华尔兹舞曲，还是爵士音乐更适合社会主义的需要。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问题，姆利纳日提出：应当让专家在经济和文化领域里实现他们的主张；同时，应当让工会、青年组织和各种群众团体能真实地说出它们的利益何在。国家机关只有在寻求社会整体利益的过程中，让局部利益得以兑现，才能判断什么是社会的整体利益。

关于法律，姆利纳日说：“不能把法律解释为汇集到一起的随心所欲的规章条例。”法律可以限制人们的权利，但应当保证局部利益的代表也有条件表明自己的利益何在。

关于党的领导作用问题，姆利纳日肯定共产党是整个社会的领导力量；但是党也不能因为过去在阶级斗争中有功，就自认为一劳永逸地具有领导作用，党应当在新条件下不断地争取其领导作用。姆利纳日把党的领导作用比作乐队指挥，“不能以党去代替应当独立行事的国家和社会机构。”^①

姆利纳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在捷克斯洛伐克新一代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作家卢·瓦楚利克的一部描写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主义斯大林体制下知识分子被强迫改造的小说《斧头》出版。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记者，他的最终结论是：“捷克人的所有发明就是：我们是如此民主地对自己实行恐怖统治，无人能够幸免，以致达到无人可杀的程度。”^②捷作家协会不顾捷共中央的反对，授予瓦楚利克 1966 年文学奖。另一位青年作家米·孔德拉创作了一部描写一名士兵，由于倾向于民主意识，被上级作为“政治上不可靠”而送去强迫劳动的小说《玩笑》，也于 1967 年出版。1964 年被调离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

① 参见《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 68、69 页。

② 参见《“布拉格之春”前后》，第 287 页。

团的姆尼亚奇科，用两年时间创作了一部书名为《权力的滋味》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青年时代是一位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后来当上了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员，竟蜕变成一个享乐腐朽的独裁暴君。姆尼亚奇科的小说《权力的滋味》的用意和寓意都十分明显。姆尼亚奇科这次不仅没有遭到惩罚，反而获得“功勋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1966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布拉格照例举行节日游行。不过，这次的节日游行没有像往年那样欢呼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游行队伍也不再庆祝“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而是高呼“我们要自由！”“我们要民主！”“只有死了的共产党员才是好党员！”等挑战性口号；游行队伍遇到警察就高喊“盖世太保！”当局只好出动大量军警，驱散游行队伍，逮捕了25名在游行中特别出众的人。5月25日，被捕的25名游行出众者分别被判处5~17个月的监禁。

国内的经济、政治形势，都表明诺沃提尼政权已岌岌可危。

3. 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在经济、政治动荡不安的形势下，捷共于1966年5月31日至6月4日召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诺沃提尼既未对经济、政治的严峻局势作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分析，更未对今后采取的应对措施作出能够挽回危局的决策，空谈“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还制订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6~1970），该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全面巩固国民经济和创造经济储备”。即是说，第四个五年计划将全面加强计划经济。

诺沃提尼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对知识分子中出现的不满情绪进行了严厉的、猛烈的攻击，从而与诺沃提尼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后退形成鲜明对比。诺沃提尼在党代表大会上说：在捷克，“存在着错误的政治思想引起的某种不正确的风气，反映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实持片面的、不客观的、否定的观点，也反映在攻击党及其政策上”。诺沃提尼指责大学生“对我们社会的价值持破坏性态度”；某些文艺刊物刊登“虚伪的、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文章。诺沃提尼在说到捷克斯洛伐克高等学校中的马列主义教员时，更是愤愤地说他们“受到否定一切的观点”的影响，所有这些思想混乱“导致宣传同资产阶级立场相联系而虚构出来的人道主义，主张不加批判地、妥协地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思潮或形式”。诺沃提尼表示：“我们将作出一切努力来迅速改变和克服毒害全体青年的这种思潮。”^①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重申：捷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长远目标是正确的，仍然有效。1962年12月举行的捷共十二大提出一个空洞的长远发展目标，但是决定中止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试验，强调执行经济政策和完成经济任务的责任和纪律。可见，捷共十三大的基本方针是停止改革试验。

与诺沃提尼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相对照的是，就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进行期间，希克在布拉格就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与新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希克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进行新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进行基本的政治改革；捷克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惟一办法就是自我革新。也是在这前后，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社，组织了50几位美国主要工业家前往捷克斯洛伐克“旅行”。应他们的要

① 参见《“布拉格之春”前后》，第293页。

求，会见了希克并进行了坦率的交谈。美国工业家们的深刻印象是：从希克身上发现了一种已经很强烈的自由市场倾向。^①

此时，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的 28 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物理学家、建筑学家，在哲学研究所拉多万·利赫塔的带头下，联名发表了一份题为《处在十字路口的文明》的综合性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尖锐地指出了世界性新科技革命到来时捷克斯洛伐克所面临的问题，警告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不理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意义，要把国家拉回到粗放式工业化的斯大林方法中去。

1967 年，按捷共中央排定的时间表，全国正式启动 1964 年 10 月公布的《原则草案》，推行新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一起步不仅未能解决原有的经济困难，反而加剧了日用必需品供不应求、物价上涨、工人失业等现象。全国普通劳动者在改革中几乎没有哪一部分人能明显得益，这就招致群众更大的不满，要求实行更大力度的经济、政治改革，在国家体制上，直接提出了实行联邦制。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经济局势更加激荡不宁。

1967 年 6 月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把全国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都引向诺沃提尼。

1967 年 6 月 27～29 日，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在布拉格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 400 来名作家。捷共中央书记伊日·亨德利赫、弗拉基米尔·考茨基、捷克政府教育部部长伊日·哈耶克也出席大会。

亨德利赫生于 1913 年 12 月 28 日，1934 年加入捷共，任克

^① 参见雅各布·比姆著《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第 114 页，商务印书馆，1981 年 9 月。

拉德诺州州委常委。捷克斯洛伐克被纳粹德国占领后，他转入地下抵抗运动。1941 年被捕，关入茅特豪森集中营，直到 1945 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才获自由。亨德利赫 1946 年成为捷共中央委员，1951 年任捷共中央书记，1958 年成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共中央书记，任捷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亨德利赫青年时就读于布拉格大学，当过新闻记者，是诺沃提尼时代捷共高层领导中有学识的成员之一。从亨德利赫的经历来看，他是在诺沃提尼时代成为捷共中央的核心圈人物的。从亨德利赫本人的真实思想来说，他倾向于改革，实际上对希克、姆利纳日等经济、政治改革设想给予了某种支持，使他们的设想能与捷克斯洛伐克公众见面；但在公众场合，亨德利赫是诺沃提尼的坚定支持者，尤其不能容忍知识分子中在当时被认为是“越轨”的言行。在公众形象中，亨德利赫是与知识分子对立的。在诺沃提尼倒台以后，亨德利赫明白自己的处境，平静地要求退休。苏军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以后，在胡萨克统治年代他和其他的普通退休老人一样，经常漫步在布拉格街头，会向熟人提一个诙谐而有寓意的问题：“怎么，你们还骂 60 年代吗？”1977 年 5 月病逝。

出席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另一名捷共中央书记弗拉基米尔·考茨基，生于 1920 年 12 月 13 日，1938 年加入捷共。捷被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他是领导国内地下抵抗运动的捷共中央委员。战后，1952 年出任《红色权利报》主编，1958 年成为捷共中央书记。考茨基在青年时期也当过新闻记者，研究过逻辑学和数学，俄语、英语、德语都很熟练，了解世界的情况和文化的发展状况，是捷共中央领导层中富有学识的人物。斯大林体制使很多人的心灵被扭曲了，考茨基是捷共中央领导层中被扭曲了心灵的典型。考茨基的内心是主张、赞成文化应当按

文化自身的发展轨迹发展，不应用行政命令横加干预和制订种种“规章”加以规范。考茨基的房间里甚至不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作品，而是悬挂现代派印象主义的作品来装饰。考茨基在政治上倾向于欧洲共产主义。他曾期望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能同欧洲共产主义有某种契合，认为如果得不到这种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将很难有成效。考茨基的这一思想，表明他把社会主义的改革看作是一种世界性潮流，各国共产党，不管它是否能和执政党相互支持和理解，是改革取得成效的必要环境。

但是，考茨基在公众场合完全是一位诺沃提尼极权专政的维护者，因为他是在诺沃提尼时代才上升到显赫的位置的。考茨基不满足于捷共中央书记的位置，他极想进捷共中央主席团，却始终可望而不可及。正由于此，考茨基才违背自己的良知，充当诺沃提尼在文化界的杀手。考茨基一生都没有改变他的这一习性：1968年8月苏军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虽然他也认为苏联的武装入侵是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的，但他却在1969年捷共一月中央全会上首先提议：撤销捷共中央主席团谴责苏军入侵的决议。

出席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捷克斯洛伐克教育部部长哈耶克生于1913年6月6日，自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初，他就被投入集中营，直到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他才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1946年，哈耶克到布拉格查理大学担任教授。从1952~1965年的13年里，他担任过捷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捷驻英国大使、捷外交部副部长、捷驻联合国大使和常驻代表等外交方面的重要职务，1965年被任命为教育和文化部部长。1967年3月，诺沃提尼为了加强对高等学校和知识分子的工作，将教育和文化部一分为二，哈耶克留任教育部部

长。哈耶克被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是他们的朋友。

诺沃提尼指派亨德利赫、考茨基、哈耶克三人组合，参加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既体现捷共中央对这次大会的高度重视，也希望大会能细心体会捷共中央的意思，自觉遵守诺沃提尼的文艺和政治方针。亨德利赫在会前，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同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孔德拉和瓦楚利克商讨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决议的写法。亨德利赫坚持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决议，其主要精神应当贯彻这样的思想：存在着两种艺术：一种是只供少数有闲阶级享受的艺术，一种是为广大劳动群众所拥有的艺术，只有后一种艺术才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捷作家应当为创作和繁荣后一种艺术而努力。孔德拉和瓦楚利克都反对把这一思想作为贯串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决议的红线，几次商讨都是不欢而散，这已经预示着代表大会将会有一场风浪。到此时，捷共中央已无法停止或延迟代表大会的召开，只能硬着头皮让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希望亨德利赫和考茨基这两位意识形态的铁腕领导人的亲自坐镇，能对代表大会起到一种震慑作用。但是，在布拉格捷交通部礼堂举行的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无视诺沃提尼的意愿，终于成为反对诺沃提尼统治运动的转折点。

代表大会开始后，孔德拉的发言直接对着诺沃提尼的方针和地位并极具火药味。孔德拉的发言连以往一直习以为常的八股式开场白也没有，一开始就对捷克斯洛伐克 20 世纪复国以来的文艺发展作一个总的评价。他说：“捷克文化最大的繁荣时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可是，这一发展首先由于纳粹占领，然后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而中断几乎长达 1/4 世纪之久。捷克斯洛伐克文化同周围世界隔绝，它的丰富的内在传统被破坏，它竟沦落为一种枯燥无味的宣传工具，这是一个悲剧，其后果

将使捷克民族永远脱离欧洲文明。”孔德拉面对 400 多名作家代表，无视坐在主席台上的亨德利赫和考茨基，继续说道：“我知道，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就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受到当时的知识水平、教育水平甚至成见等等的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时期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则不同，把维护禁区仍看作是比冲破禁区为更大的美德。”^①台下对孔德拉的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台上的亨德利赫和考茨基神情严峻。

亨德利赫还没有等轮到在大会上正式讲话，就和代表们激烈地争辩起来，严厉批评孔德拉的发言。在会议厅外，他甚至抓住瓦楚利克的上衣，指责他同纽约的捷克流亡分子有秘密联系。

瓦楚利克在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首先说这次代表大会不是作协成员决定要开会就召开的，而是在统治集团宽宏大量地批准开会之后才召开的。统治集团这样做是希望我们报以尊敬，但我主张让我们自己像个大人、像个上了点年纪的人那样行动吧！瓦楚利克接着激烈地批评了用人和干部选拔制度，批评这种干部选拔制度只能是庸人当道，真正有才华的人从舞台上消失。这种干部选拔制度造成文学方面情绪压抑、精神委顿、虚无主义；文化方面的成绩恰恰是不顾我国统治集团多年来如此倒行逆施而创造出来的，“这些成绩简直是从它们那儿诈骗出来的”。

瓦楚利克接着尖刻地批评了书报检查制度并对这种制度的存在总结性地说：“我们老是讲争取自由，这使当局感到气恼，

①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 315 页

但它就是不理解，只有在那些不需要谈论自由的地方，自由才真正存在。人们谈论着他们看到的现实，这使当局生气。可是它不去改变客观现实，却想去改变人的眼睛。”瓦楚利克最后说：“当我批评统治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当前的统治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①

这次大会上更为激烈的事情是帕·科霍乌特在批评了捷政府在1967年6月5日发生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支持阿拉伯人的政策之后，竟然朗读了亚·索尔仁尼琴写给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但被禁止在大会上宣读的信。当科霍乌特在朗读索尔仁尼琴的信的时候，亨德利赫气得脸色铁青，穿上上衣，退出会场。此事招来苏联政府的抗议，认为是对苏联内政的干涉。

亨德利赫在大会上两次发言，严厉谴责作家们的不负责任言论，说：党把文化当作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伟大斗争中的一个积极因素，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党的政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努力加以发展。但是更多的作家指责捷克斯洛伐克“极端缺乏民主，压制自由”；认为党“践踏文化的发展”，使文学“成了政权和市场的牺牲品”，以致“民族生存本身也受到威胁”。^②捷共中央禁止在《红色权利报》上刊登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发言，但是捷共中央仍然无奈地同意代表大会通过的模棱两可、可以各自作出解释的决议。决议宣称：“对于一个政治制度的最大控诉莫过于缺少伟大的文化。”关于社会主义和文化，决议写道：“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在于，它的纲领

①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322页

② 见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516页，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4月

使它能自觉地抵制文明进步中的非人道方面，抵制它的非人道主义倾向，以保卫自己。这样，社会主义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就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经济总结，就同解放人们之间的关系、争取更大的自由密切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对文化的人道主义的重要性认识得越是充分，它对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自由越是努力促进，那么，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就越是巩固，越是经得起考验。”^①

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6月30日，诺沃提尼在布拉格捷共中央党校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讲话。诺沃提尼讲到刚刚闭幕的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压抑不住满腔愤懑地说：“有的代表说，我们在过去经历了‘第二次黑暗时代’，对于这种诬蔑，我们是决不容忍的。”“那些人攻击党的政策，攻击国家的内外政策，主张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否认阶级斗争。面在当今的世界上，在两条阵线壁垒分明、互相对立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正以十分尖锐的形式进行着。”^②

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及结果表明诺沃提尼的统治已处于舆论的对立面。

4. 捷共中央九月全会

现在，摆在诺沃提尼面前的是三大难题：经济问题、知识分子的强烈对抗、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的民族矛盾，面对这三个死结，诺沃提尼几乎一个都解不开。由于解不开这三个难题

①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324页

②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324页

使捷共中央领导内部原就存在的分歧更趋明朗化，分野也更加清楚，双方对这三大问题的形成和解决办法出现了带根本性的对立。

自正式实施新经济体制以来，经济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希克制订的《原则草案》将日用商品的批发价格提高 19%，但是由于经济体制的基础没有触动，各联合公司在计算成本时都尽量往高打，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去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通过下放管理权让生产企业拥有更大的灵活性，结果使生产成本越算越高，1967 年第一季度的日用商品批发价格实际提高了 20%，造成市场上日用商品价格猛涨，企业利润也刺激了通货膨胀，而商品的短缺现象依旧存在。

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浪费现象更加严重，它反过来又阻碍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剧劳动者对捷共和政府的不满情绪。

东欧的社会主义各国移植斯大林模式，消灭劳动力商品。捷克斯洛伐克也和苏联一样，把消灭劳动力商品看作是劳动者获得解放的标志，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坐标。希克也尚未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原则草案》也没有触犯这一禁区。捷克斯洛伐克 1960 年宪法规定，保证每一个公民有劳动权，于是政府部门就编制计划，用行政手段分配劳动力；劳动者也态度冷漠，层层欺骗，生产效率低下。

物价上涨、外贸出口减少、劳动生产率低下，自然阻碍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改善，突出地反映在住房问题上，住房短缺几乎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悲剧。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奥斯特拉发、科希策等大中城市，很多青年男女因为没有住房而不能结婚；而很多已经结婚的夫妇因为没有房子，夫妻也只能各自住在集体

宿舍里，不能有孩子，没有社会意义上的“家庭”。这种状况几乎招致全民的不满，全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忙着建设社会主义，结果把建设住房给忘了。”

经济改革如此艰难，连希克也感到估计不足，因为希克原估计经济改革会遭到居于领导地位的经济界或社会上的恶霸们的反对。到1967年5月，希克承认自己早先的估计过于乐观，他曾对一名来访的外国记者说：新经济体制只是在一些企业中和一些小事情上被采用，阻力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有害；当然，我们现在还可以继续把它当作儿戏，但是到了明天，政府被迫必须进行改革，因为不可能有别的出路。

面对知识分子的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诺沃提尼几欲采取强硬措施予以镇压，但是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不敢贸然坚决行动。他甚至对亨德利赫也十分不满，认为他过于容忍。1967年9月1日，诺沃提尼在总统府举行宴会，招待捷军事学院毕业生。诺沃提尼在讲话中说：自由主义正在全国泛滥，目前迫切需要公开站出来反对这种现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允许传播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与共产党格格不入的意见和思想”。

就在诺沃提尼讲话后的两个星期，捷共中央候补委员扬·普罗哈兹卡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托·马萨里克逝世30周年的文章。文章热情赞扬马萨里克能始终容忍和自己相左的意见，因而他始终是一位得到人民拥护的导师和教育家，他始终和这个民族的坏习性进行不断的斗争。文章无异是对诺沃提尼9月1日讲话的公然蔑视。

民族矛盾虽然从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复国之初就一直存在，但是，由于经济濒临困境和知识分子日益激烈的反对，使民族矛盾趋向激化，特别是知识分子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

一起。

捷克斯洛伐克国土西部是一个三面隆起的四边形捷克盆地，盆地内大部分地区在海拔 500 米以下，居住在这里的是占全国人口 65% 的捷克人。从历史上来说，居住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捷克人是跟维也纳、西欧联系在一起的。1867 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接受匈牙利自由主义贵族提出的方案，组成二元制的奥匈帝国，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的两个“历史省”。捷克曾是奥匈帝国的工业中心，捷克历来是把民族的精英送往维也纳，大贵族切尔宁伯爵是奥匈帝国的最后一任外交部长。

捷克斯洛伐克国土的东部是西喀尔巴阡山脉较高的地带，构成斯洛伐克山地区。斯洛伐克山地的北面被沿波兰边界的塔特拉山和贝斯基迪山包围，山地区大部分在海拔 1000 米至 1500 米之间，山地的南面向着匈牙利平原。捷克斯洛伐克西部的伏尔塔瓦河流经首都布拉格，汇入易北河的上游拉贝河；流经东部的国际河流多瑙河，注入黑海。斯洛伐克属多瑙河流域，布拉迪斯拉发是多瑙河航线上的最大港口。居住在斯洛伐克山地上的、占全国人口 30% 的斯洛伐克人，从奥匈帝国时代开始就倾向于帝国的第二首都布达佩斯，倾向于东欧。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说，西部捷克主要是工业区，东部斯洛伐克山地主要是农业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战败投降，多民族的二元帝国分崩离析。当时的斯洛伐克要想成立一个独立国家，几乎不大可能实现，斯洛伐克人从马萨里克及其同僚那里，争得在联邦内享有自治权的许诺，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但是在马萨里克时代，斯洛伐克从来就没有享有过自治权。捷克被纳粹德国吞并后，斯洛伐克是抵抗运动的主体部分。1943 年成立了抵抗运动斯洛伐克委员会；

1944年8月，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人领导了反法西斯占领的斯洛伐克民族大起义。

战后，斯洛伐克共产党就成为斯洛伐克民族情绪和民族利益的表达者，很多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因此遭到镇压。克里门第斯于1952年被处决；就连古斯塔夫·胡萨克也于1951年被捕、开除出党，195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60年代初，诺沃提尼采取措施，大幅度削减斯洛伐克的地方权限。斯洛伐克的机关直接依附于布拉格的中央部、局。在共和国最高法院中，没有一个斯洛伐克人；在派往国外的318名医生总数中，只有14名斯洛伐克人。诺沃提尼的儿子主管的一个专营艺术品的“阿尔委亚”公司，选购、经营的艺术品，99%都是捷克艺术家的作品，只有1%是斯洛伐克艺术家的作品。

60年代以来，在清算以往的大清洗中，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情绪又重新激越起来，知识分子对诺沃提尼的激烈情绪是和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情绪交叉在一起的，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尤其反对诺沃提尼。1967年8月，诺沃提尼偕夫人到斯洛伐克视察，希望缓和那里的民族主义情绪。他在视察时发表演说，说斯洛伐克问题已不存在了，自1945年以来斯洛伐克地区在中央的帮助下欣欣向荣，提出“联邦制问题”更是错误。他的演说，不仅绝口不提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根本不承认存在这一问题。他的视察不仅使广大的斯洛伐克人十分不满，就连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杜布切克、比拉克等也极度不满。比拉克曾当面指着诺沃提尼说：“你没有权力侮辱斯洛伐克人！”在激烈的争论中，诺沃提尼气得立即返回布拉格。

全国日趋紧张的形势明显地集中反映为以上的“三大问题”。1967年9月，捷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研究、讨论这“三大问题”，希冀有所突破，挽回诺沃提尼统治的颓势。

1967年9月26日、27日，诺沃提尼主持召开捷共中央全会。

关于经济问题，全会讨论了1967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发展情况的报告，对于造成的经济困难没有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而是强调加强中央的集中计划管理。希克要求实行地方分权，进一步让企业走向市场的计划，实际上是被否定了。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全会作出强硬的处置：全会取消普罗哈兹卡捷共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将瓦楚利克、姆尼亚奇科等4名激烈分子开除出党；孔德拉、科霍乌特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取消捷克作家协会对捷克作家出版社的控制权，将大部分编辑调走或撤职，削减作家出版社的纸张供应。亨德利赫在全会上说：“我国社会的伟大的集中的努力，正在受到那种脱离阶级内容和社会主义内容去侈谈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的说教的破坏。”

在捷共中央九月全会上，坦露了知识分子问题的症结是捷共中央关于政治、经济方针的分歧。杜布切克站出来谴责诺沃提尼对知识分子的强制措施，切尔尼克也反对镇压知识分子。

杜布切克在全会上指责经济情况的恶化是因为没有认真按《原则草案》规定的办，而是处处阻挠《原则草案》的贯彻。杜布切克更具体地说：计划规定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28%用于斯洛伐克，而实际上用于斯洛伐克的投资不到22%。杜布切克要求建立一种投资基金，以便合理地分配现有资金、纠正愈来愈损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九月全会不仅丝毫无助于缓和捷克面临的三大问题，反而使捷共中央主席团内部从对政策方针的意见分歧发展到壁垒分

明的对立。党中央向全国 600 个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没有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进一步增加，广大党员对党的领导极为不满。在这样的形势下，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根本谈不上，势将出现严重的政府危机。10 月 30 日，捷共中央又举行特别全会，诺沃提尼希望以严厉手段消除中央主席团内部的分歧。但实际形势的发展对诺沃提尼更为不利，提出了要诺沃提尼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

十月特别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诺沃提尼要求全会通过一项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决议，要求全国各州、县的领导人确认，只有服从重新确立的捷共中央的领导才能结束日趋严重的混乱局面。其实，决议所要求的“重新确立捷共中央领导”，就是要求重新服从诺沃提尼的领导。诺沃提尼又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

特别全会没有按诺沃提尼的要求去讨论，而是对中央党政机关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的矛头尤其是对着诺沃提尼，指责他“经济改革不力，政治不民主”；在民族问题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采取措施去解决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的相互关系问题”；“对已经出现的真实情况熟视无睹，也未能作出正确判断”。^①全会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发展“自己类型的社会主义”。全会还提出：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不应当由一个人兼任。

在这次特别全会上，杜布切克的讲话成为反对诺沃提尼的最强音。杜布切克指责诺沃提尼的行为“像一个独裁者”；“蓄意破坏改革”；任意干预斯洛伐克的事务，“损害斯洛伐克的经

① 见《苏共中央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向党的积极分子的通报》1968 年 3 月 23 日，载《祖国档案》1993 年第 3 期，第 86 页。（俄文）

济”。杜布切克还责难亨德利赫“擅自改动了党中央主席团早些时候通过的关于党的作用的基本决议内容，损害斯洛伐克的利益”。杜布切克最后把问题提到带根本性的高度，实际上已向诺沃提尼 14 年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提出挑战，他说：“这已经不再是个斯洛伐克的问题了，而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政治制度问题。在讨论经济分立之前，我们必须讨论政治分立，从上面分起，从党的领导分起。”^① 诺沃提尼早就称杜布切克为“斯洛伐克民族主义集团的头领”，此时更直呼杜布切克的名字，说杜布切克既然对过去这些事务的处理方式提出了异议，那么斯洛伐克可以自行其是，只是别再指望得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帮助。诺沃提尼抓住扩音器，指责杜布切克和支持杜布切克的人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斯洛伐克的中央委员们都坐不住了，他们都站在杜布切克一边，要求对捷共的结构、工作方法以及党和国家的关系实行根本性的改革，说：这不仅是斯洛伐克人的看法，而且也是使共产党重新得到全国人民信任的一项基本要求。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问题不仅是斯洛伐克人，捷克人也反对诺沃提尼。会上几乎一致指责诺沃提尼“保守”；政治不民主，经济改革裹足不前；民族问题上对斯洛伐克人不平等。会议上，几乎都要求在对外政策上摆脱苏联的控制；要求发展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议党的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不能由一个人兼任。最后，会议喊出了一个令诺沃提尼心惊的声音：诺沃提尼应该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

在布拉格总统府西班牙大厅举行的这次中央特别全会，虽然通过了一个题为《关于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① 见《“布拉格之春”前后》，第 346 页

的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的提纲，连通常那样的决议也无法提起，到后来已经完全离开了诺沃提尼事先安排的议程；诺沃提尼已经根本无法掌握会议了；对他来说，会议只会愈开愈糟。诺沃提尼宣布休会，理由是党的领导人要去参加在总统府另一个大厅举行的、筹备庆祝俄国十月革命 50 周年的活动。诺沃提尼是想以此来平息一下激昂的情绪，也让自己有时间考虑应付目前局势的对策。

诺沃提尼采取了一项非常愚蠢的做法：下令掐断了杜布切克到布拉格处理公务时住宿的“布拉格饭店”房间里的电话线；派秘密警察盯他的梢，这使杜布切克更为愤慨。

就如何看待形势以及改革是一往向前，还是退回到捷共十二大的原路上去，党中央主席团内部明显分成两种意见。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胡迪克，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博胡斯拉夫·拉什托维奇卡，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政府总理列纳尔特等为一方，他们被称作“传统共产主义派”。他们几乎全盘肯定以往的内、外政策，坚持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把目前出现的不稳定形势说成是“有些人不关心党的统一，只想利用大学生和肆无忌惮的知识分子来牺牲诺沃提尼”。^①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切尔尼克、杜兰斯基等为另一方，坚持激进的改革主张，并把矛头对准诺沃提尼。他们在中央主席团以外得到更广泛的支持。捷共中央主席团在改革道路上产生的尖锐分歧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综合危机的集中反映。

① 见《苏共中央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向党的积极分子的通报》

5. 诺沃提尼失去了靠山

苏联一直关注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苏共中央通过其驻布拉格的大使馆、驻布拉迪斯拉发的十分活跃的领事馆以及从在莫斯科各党校学习的捷克高级党政干部那里，包括从东欧其他经互会国家的共产党那里，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情报，观察局势的发展与变化。当然，其中的主渠道是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大使馆几乎把历次捷共中央全会的讨论和分歧、知识分子和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及大学生游行等情况，详细汇总报告克里姆林宫。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更是步步小心，生怕发生由于大使馆的疏忽而出现的问题。

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契尔沃年科，1915 年生于乌克兰，1940 年加入苏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只是一般从事哲学和教育研究的干部，在赫鲁晓夫当政后，开始跃升为苏联政坛的重要人物。1955 年，他以乌克兰党中央科学文化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开始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出头露面。契尔沃年科矮胖、秃顶，有点近乎赫鲁晓夫，但他不像赫鲁晓夫那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是个沉默寡言、好从眼镜后面看人的哲人型人物。1956 年，他被赫鲁晓夫提升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多次跟随赫鲁晓夫出访。195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他作为陪同人员，随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参加中国的十年庆典。随后，他被苏联任命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要职，1961 年，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64 年 10 月，随着赫鲁晓夫下台，契尔沃年科被作为赫鲁晓夫的亲信，免去驻中国大使的职务，奉召回国。勃列日涅

夫对契尔沃年科还算网开一面，1965年4月，任命他为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心里明白，虽然仍旧当大使，实际已被降级，而且苏联一直把捷克斯洛伐克看作是经互会里顺从的小伙伴。契尔沃年科到任后，恰逢捷克斯洛伐克涌起要求改革的春潮。契尔沃年科面对这样的驻在国局势，更是处处谨慎小心、生怕出错。他居住在布拉格的布贝内奇区的苏联大使馆里，基本上只跟捷克斯洛伐克的亲苏派接触，更不敢自作主张。契尔沃年科已看出诺沃提尼的艰难处境，希望勃列日涅夫来稳定局势。10月的捷共中央特别全会后，契尔沃年科亲自给克里姆林宫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勃列日涅夫尽快来布拉格，以便亲自决定在当前捷共内部两派极端对立的形势下，怎样做才是符合苏联的利益。

诺沃提尼也知道碰到真正的麻烦了，十分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来加重自己的分量。他曾含蓄地向契尔沃年科提出，希望得到苏共中央一如既往的支持。契尔沃年科确实是把诺沃提尼当作一位明智的兄弟党领袖，建议苏共中央在他困难的时候拉他一把。1967年11月初，诺沃提尼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50周年庆典，希望借机同勃列日涅夫单独会见。但是，勃列日涅夫没有安排单独会见诺沃提尼，使诺沃提尼在返回布拉格之后就有一种失落感。

鉴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愈来愈动荡不宁，契尔沃年科请求勃列日涅夫尽早来访以帮助诺沃提尼度过难关。经过与诺沃提尼的紧急磋商，克里姆林宫宣布：应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的邀请，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将于1967年12月8日到捷克斯洛伐克休息和打猎。勃列日涅夫的突然来访，除了诺沃提尼最亲近的几名亲信之外，其余的捷党政领导人几乎都感到突然，一时气氛十分紧张。杜布切克方面的人很清楚：如果

勃列日涅夫支持诺沃提尼，他们要么和莫斯科公开对抗；要么放弃改革，继续让捷克斯洛伐克在诺沃提尼统治下苦挨。

为了决定自己的行动，勃列日涅夫也在准备。几个月来，虽然汇集了大量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情报，但是勃列日涅夫及其周围的人都难以决定在捷最高人事中的变动。临行之前，勃列日涅夫曾问主管捷克斯洛伐克事务的助手：“他们那里谁是第二把手？”助手回答：“在目前形势下，人事上还看不清楚。”勃列日涅夫说：“那好吧！”就没有再说下去。勃列日涅夫并无绝对支持诺沃提尼的打算，主要原因是他想起诺沃提尼的靠山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下台后，诺沃提尼曾表示惋惜，勃列日涅夫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此外，勃列日涅夫也觉得诺沃提尼不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诺沃提尼不赞成苏联在捷长期驻军。

12月8日，勃列日涅夫来到布拉格。他没有休息，更没有去打猎，而是紧张地同诺沃提尼会谈，会见捷的各方面党政要人。在那几天，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除杜布切克回到布拉迪斯拉发工作之外，其余的人都在布拉格。勃列日涅夫会见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时，多次问起杜布切克，但对是否支持诺沃提尼，却不吐露丝毫口风。12月9日晚，捷共中央主席团设宴招待勃列日涅夫。当宴会进行到一半时，勃列日涅夫站起来说：他即将离开布拉格回国。关于捷共的问题，“同志们，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这句话使在座的人，尤其是使诺沃提尼愕然。原来勃列日涅夫在布拉格接触了各方面的人士之后，发现诺沃提尼已陷于孤立，因而不愿做他的政治担保人。勃列日涅夫在回国途中，特地在布拉迪斯拉发作短暂逗留，看望在那里主持工作的杜布切克。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特殊表示。对于勃列日涅夫的闪电访问及态度，改革派的中坚、当时还是捷共中央委员、林业和水利部部长的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说：“当我们得知有

人要求勃列日涅夫同志来访时，我们担心的是，他为什么要来。但是，当我们知道了他的观点时，大家都很高兴。”

勃列日涅夫的态度使诺沃提尼的心都凉了。诺沃提尼只好孤注一掷，以求一逞了。

6. 铤而走险，诺沃提尼画虎不成终类犬

诺沃提尼自从1953年9月4日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至1967年秋冬，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出现了上下呼应的倒诺沃提尼运动，诺沃提尼统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已达整整14年了；诺沃提尼兼任共和国总统也已整整10年了。10几年里，不能够说诺沃提尼一无是处。10几年了，如果他确有才能，已有充分的时间供他施展抱负；但是，10几年的统治捷克斯洛伐克的实践已足以证明，诺沃提尼是一个既不会透视历史，也不会洞察现实，且对外部世界发展变化趋势的感应超乎常人的迟钝。到了60年代后期，他根本无法解决捷克斯洛伐克跟上世界潮流发展的问题；不，实际上，他根本不想解决。世上没有开不败的花朵，何况诺沃提尼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独裁者的气数已尽，连“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勃列日涅夫也不愿保他了。如果他还能有常人的理智，最体面的选择是主动提出辞职。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传统和社会风尚、文化积淀是倾向西欧的。近现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西欧社会除西班牙的佛朗哥等个别独裁统治者之外，在政治舞台上也都大都或按一定游戏规则，或根据某种法定程序“按时上、下班”，习以为常，诺沃提尼统治捷克14年后离开最高领导者的岗位，完全属于正常。

苏联、东欧在这方面却是另一种情况。苏联的列宁、斯大

林都是因病逝世，自然生命和领袖地位同步结束。尽管列宁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开始半身瘫痪并丧失说话能力；12月中旬第二次中风，整个半身瘫痪完全丧失说话能力，医生从医学科学角度出发已经严禁列宁参与政治活动。实际上，列宁也分别于12月23、24、26日以及1923年1月4日对1922年12月24日的信的补充，对自己身后的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作了安排和最后的嘱咐。这些口授的信已习惯地称作“列宁遗嘱”。这些口授的信是断断续续的，说明列宁的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到不能再恶化的地步了；但是信的内容深刻，对问题的认识和提法都一针见血，逻辑严密，说明列宁的思维仍然迅速、敏捷。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列宁在明知自己已无康复、重返政坛的可能；而且由于自己的这种状况，活跃在政坛上的“亲密战友们”对他的说话也是或阳奉阴违，或各取所需，而列宁恰恰只字未提辞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的事情（当时的俄共（布）中央总书记是斯大林，当时的总书记并不具有后来作为全党最高领袖的职务含义。列宁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政治局开会时已习惯形成的政治局会议主席。列宁病重后，此位置由加米涅夫代理——作者）。活着的列宁“亲密战友们”，当然谁也不便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列宁自己为什么不主动提出来呢？

当然，可以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新经济政策刚刚实施，无论是国家或党都面临严峻的形势，无论从哪方面说都需要列宁这位领袖等等情况来解释。不过，华盛顿胜利地领导了北美独立战争，创建了美利坚合众国后，他在担任了两届联邦总统之后，于1796年9月19日在费城的一家普通报纸《美国每日新闻报》上刊登了告别演说，决意在第二次连任总统期满之后，退出政坛。告别演说是华盛顿积8年任职总统的经验、教训，

集内外政策之大成，对美国人民提出忠告，对国家未来提出希望。华盛顿的告别演说震动了美国上下，普遍表示惋惜，有的人甚至流出眼泪。美国 1787 年宪法只规定总统每任 4 年的期限，至于连任的次数并未限制，何况当时美国面临的问题也十分严峻，18 世纪即将结束，19 世纪即将来临，全国上下都希望华盛顿连任。但是华盛顿决意退出政坛。正是华盛顿的二任引退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罗斯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特殊情况，连任 4 次总统。由于这一例外的出现，1947 年美国第 80 届国会把总统连任的次数限定为两次，载入美国宪法。我作这番历史的比较，不是说列宁在这点上不如华盛顿，我只是提出一个疑问：列宁是否在彻底否定“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时，无意之中在领导人物的任职问题上开了另一种先例？因而苏联要更换赫鲁晓夫的位置时，只好采取宫廷政变式的“逼宫”了。诺沃提尼已主政捷克斯洛伐克 14 年之久，即使已面临四面楚歌，也绝不引退。

东欧各国的领袖们在这方面都没有对“苏联模式”提过意见，波兰的贝鲁特、匈牙利的拉科西、诺沃提尼的前任哥特瓦尔德、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和契尔文科夫、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民主德国的威廉·皮克，等等，他们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如果不是自然死亡，要想更换职位，就要戴“反党活动”之类的帽子，被搞下台。这样，诺沃提尼铤而走险以求一逞，也就没有什么特别奇怪了。

诺沃提尼使出来的杀手锏是历来统治集团在激烈争夺统治权位时的惯用手法，即：密谋策动军事政变。

还在勃列日涅夫来访之前，诺沃提尼就已经在准备了，诺沃提尼在 1967 年 12 月 4 日，就布置在布拉格周围举行军事演习。军事演习过后，诺沃提尼暗示捷共中央机关的武装部（第

八部)部长米罗斯拉夫·马穆拉、捷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谢伊纳少将、国防部副部长扬科上将等人，在捷人民军高级军官和党的高层领导人中串连，想乘勃列日涅夫来访的东风，以苏军为援手一举将倒诺沃提尼的人统统抓获；然后召开中央全会，宣布他们是“民族主义阴谋反党集团”，进行处置。他还以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的态度为强心剂，鼓动军事政变。可是，勃列日涅夫到达布拉格后，并不支持诺沃提尼，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计划。

勃列日涅夫回国后，诺沃提尼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军事政变。此时，他也顾不上事先向克里姆林宫请示，决定于12月16日将驻扎在布拉格以北25英里姆拉达军营的第一装甲师及第十三步兵师开进首都，逮捕包括杜布切克在内的改革派领导人。之所以把行动日期选择在12月16日，是因为捷共中央预定在这一天开会，诺沃提尼预感此次全会将提出撤销他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诺沃提尼虽然心急火燎，但是具体部署军事政变的将军们提出，四五天时间来不及部署部队和动员预备役部队，必须推迟几天。诺沃提尼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中央委员会全会必须延期。在这种时候，诺沃提尼没有说出足以使中央委员们信服的理由去擅自更改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的开会日期，引起了改革派的警觉。他们也在多方做工作以解开诺沃提尼延期召开中央全会之谜。他们已怀疑诺沃提尼是否要采取什么意外行动！

果然，谜团被解开了。12月17日，捷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捷共中央委员瓦茨拉夫·普尔赫利克上将得悉了军事政变的计划。普尔赫利克生于1922年8月25日，1945年起成为职业军人。他1948年加入捷共，1956年晋升少将，1958年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1961年晋升中将，1963年晋升上将。他从1955

年12月开始就担任捷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要职，60年代中期是军队中坚决支持改革的人。他在得悉军事政变计划后，一面劝说各军区司令不要卷入这场党中央的争执、稳定军队；一面立即向杜布切克作了汇报。

12月18日，杜布切克等改革派先发制人，立即召开党中央主席团紧急会议，在会有根有据地指控诺沃提尼违背党章的基本准则，意图通过军事政变来建立独裁统治。杜布切克等人不给诺沃提尼以喘息的时间，接着在19日召开党中央扩大全会，公开了诺沃提尼的军事政变计划，使会议哗然。会上，大多数人要求诺沃提尼就此事向中央全会作出解释。这时，有人正式向中央全会提出，要求诺沃提尼下台。诺沃提尼佯称对这一阴谋一无所知，实际上是因为军队尚未部署妥当，而且国防部长洛姆斯基大将、捷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上将等高级将领都反对搞军事政变，因而使诺沃提尼不敢贸然行动。他只得又施缓手，宣布“准备过圣诞节，暂时休会”。

19日的中央全会之所以没有立即把诺沃提尼赶下台，是因为在党中央主席团里反对诺沃提尼和继续支持诺沃提尼的双方出现僵持的局面。在党中央主席团里继续支持诺沃提尼的有：拉什托维奇卡、列纳尔特、胡迪克、西穆涅克，包括诺沃提尼，在主席团里拥有5票；要求诺沃提尼下台的是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科尔德、亨德利赫、杜兰斯基，也是5票，但是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拥有更多的支持者，无论哪一方都不足以压倒对方，无论哪一方都不希望在党中央主席团里立即摊牌，于是就有了诺沃提尼的“准备过圣诞节”。

休会期间，诺沃提尼急于想在公众舆论中挽回影响，在新年演说中极力把自己装扮成社会主义民主的维护者。但是，到这个时候诺沃提尼还出来东施效颦，只能招来舆论的嘲弄。在

休会的几天里，诺沃提尼虽然竭力活动，效果却适得其反，促使列纳尔特倒戈，转向杜布切克一方。

1968年元旦一过，1月2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复会。列纳尔特在眼看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最后选择了杜布切克，诺沃提尼已变成绝对少数。1月4日，主席团就是否要求诺沃提尼下台进行表决。始终支持诺沃提尼的是：拉什托维奇卡、西穆涅克和胡迪克。诺沃提尼被撤销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同时，主席团还作出一项决议：将共和国总统和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分开。立即复会的中央全会批准了中央主席团的决议。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14年之久的诺沃提尼终于被推下来了；主席团还让诺沃提尼留任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一决定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权转换上也是空前的：布拉格要求民主和法制的改革派确以自己的实际政治行动表明他们将奉行新的游戏规则。

四、布拉格绽开报春花

1. 杜布切克——一匹黑马

1968年1月4日，诺沃提尼被撤销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但是，该由谁来接替诺沃提尼，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尚未最后确定。

出现这种局面的决定因素是苏共中央的态度，或者说是勃列日涅夫的态度。

不要说是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哪怕是捷共州委第一书记的人选，事先都要经过苏共中央的批准，对于捷共来说，这已是不成文的法规。究竟由谁来当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当然是一言九鼎。1967年12月9日晚，勃列日涅夫在捷共中央主席团为欢迎他来“休息”而举行的宴会上，表示让捷共自己决定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回国途中又特意去拜访杜布切克，这是一种微妙的、不是指定性的表态，姑妄称作“偏好性表态”。勃列日涅夫之所以作这样的表态，是因为他虽然看好杜布切克，但当时的捷共中央在诺沃提尼之后，确实还没有人可以称作“第二把手”。这样，在考虑新的第一书记人选时，仍然有一个范围：死活支持诺沃提尼的人，当然不在考虑之列；只

能在反对诺沃提尼的党中央主席团成员中遴选。在这个范围内，勃列日涅夫留给捷共“自主”。

在要求诺沃提尼下台的 6 名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政府总理列纳尔特因为是在最后时刻倒向杜布切克的，且口碑不好，当然不在考虑之列。杜兰斯基已是 73 岁的老人了，已经过了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年龄。亨德利赫一直遭到知识分子的反对，无法被捷共的广大党员和国内群众所接受。剩下的是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科尔德等三人，新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要从这三人中产生。至于究竟谁更合适呢？勃列日涅夫在表示了偏好之后，确实是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了捷共中央。从这点上说，勃列日涅夫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乃是心口一致的。由此可见苏共中央对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已作过周密的考虑，绝不是听任捷共中央自行其是。

在产生新的第一书记人选上，中央主席团曾经提到切尔尼克、科尔德，但他们两人都辞绝。诺沃提尼提名由杜布切克来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提名杜布切克，因为他认为杜布切克虽然在斯洛伐克问题上有许多糊涂观点，但不失为是一名党的忠诚干部，而且诺沃提尼也已体味出了勃列日涅夫那引而不发的态度的真意。杜布切克也极力推辞过，说自己既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也缺乏担任这一职务的能力。但是，杜布切克是主席团能够普遍接受的惟一人选，众人都劝说他接受这一职务并表示全力支持他工作。在这样的情势下，杜布切克算是勉为其难。杜布切克被捷共中央主席团一致通过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并且象征性地拥抱了诺沃提尼。此时，1968 年 1 月 5 日（星期五）的晨曦，已经照进了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室，主席团委员们已个个疲惫不堪。1968 年 1 月 5 日晚上 9 时，捷克广播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播送了诺沃提尼辞职，杜布切克任

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新闻节目。

人自从懂事明理之后，一生也许永远处于感情和理智的矛盾之中。生活中的人不能没有理智。试想，如果一个人丧失理智，任凭感情驰骋，岂非人性沦丧？反之，如果一个人过于理智化，缺乏感情，岂非近乎冷血动物？在政治生活的舞台上，感情和理智也是同时存在的，无论是一介草民或居于高位的达官贵人，包括领袖人物，恐怕都是如此。中国的古人说，伟人都要“喜怒不形于色”。总揽东晋朝政的谢安，指挥谢石、谢玄、谢琰和桓伊等将领，以8万之众在淝水大败前秦苻坚的80万大军。捷报送到他手里，他正在和客人下棋，声色不动。客人问他什么事？谢安淡淡地说：“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打败了敌人。”下完棋，客人走了，谢安用理智竭力抑制着的感情，就像决堤的河水一样奔腾而出，高兴得舞跃入室，不觉为履齿之折。可见谢安也不是“喜怒不形于色”，而是在理智的控制下不让感情不分时间、地点、场合，随意流露而已。

对于诺沃提尼来说，辞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应是情理之中的事。他提名让杜布切克来接任这一最高职务，因为他认为杜布切克是一名忠诚的党的干部，由他来担任这一职务，使党不致沦落于“修正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之手。这是诺沃提尼的理智的一面。但是，在另一方面，在感情上诺沃提尼又是另一回事了。他仍然接受不了这一现实。诺沃提尼是否想东山再起，目前尚无历史档案的依据，但他在去职之后确曾对亲信们说过：“你们别担心，这很好。杜布切克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他不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中央书记们也都是一些窝囊废。最后还要靠咱们！”1968年2月，考茨基也回忆说：1968年1月捷共中央全会上，诺沃提尼曾预言，他下台之后捷克将会出事，“可现在有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当了那么久的党中央第一书记，

一旦被迫辞职，诺沃提尼的这种感情只能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杜布切克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从上到下都是平静的。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人事更动不仅没有像往常那样的对诺沃提尼的批判、公布“罪状”和随之进行领导层的大换血；而且诺沃提尼仍旧担任共和国总统，列纳尔特照样当政府总理。《红色权利报》上连一篇例行的祝贺文章也没有。杜布切克当选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当天就回布拉迪斯拉发去了，因为那里有一场冰球比赛，他要赶回去观看。斯洛伐克人民也很高兴，新当选的第一书记坐在他们中间，一起观看冰球比赛。这一事例很能表明杜布切克的性格和工作作风，他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人。1月6日，他收到由勃列日涅夫签署的贺电，祝贺他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贺电表示坚信“苏捷两党和两国之间现有的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牢不可破的原则基础上的兄弟般真诚友好的关系，将继续巩固和发展，以利于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两国人民，以利于他们为我们共同的伟大理想而进行的共同斗争。”^① 勃列日涅夫还邀请杜布切克作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正式访问莫斯科。勃列日涅夫的贺电表明苏共中央已接受了这一事实。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更换完成了全部程序。对于勃列日涅夫的邀请，杜布切克“愉快地接受”，但同时提出“考虑先进行一次非正式访问，以便为一次正式访问、就某些问题进行磋商作预先准备”。这点，勃列日涅夫立即同意了。这样，杜布切克算是坐定了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这把交椅。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生于1921年11月27日。他的父亲曾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举家迁往美国。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捷克斯洛伐克复国后，又搬回捷克，其父也加入了捷共。1925年，父亲带着全家移居苏联。杜布切克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苏联的中亚度过的并在苏联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直到1938年才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说，杜布切克自小就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并对苏联怀有特殊的感情。

杜布切克返回祖国正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杜布切克投身于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斗争。1939年，杜布切克加入捷克共产党，参加反对法西斯德国占领的地下斗争。1944年8月，他参加了著名的斯洛伐克民族反法西斯占领武装大起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杜布切克是在捷克中部城市特伦钦酵母厂工作，从一名工人成为工厂的党委书记。1948年他成为负责组织工作的县委书记。

1951年，杜布切克奉调到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这成为他一生政治生活的转折点。从某种意义说，也是那几年接连不断的大清洗为他走向高层领导留出了位置。但是，杜布切克对大清洗是深恶痛绝的。以后每谈及大清洗，杜布切克都止不住失声痛哭，说再也不能让大清洗这样的悲剧重演，这也许是杜布切克形成“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之一。因为杜布切克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理论、政策，几乎都是来自于实践，都是为了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先创立一套理论，建立一套改革的理论体系，再进行改革实验。

1951年，杜布切克还成为国民议会议员，第二年又担任斯洛伐克民族阵线中央第一书记。1953年，杜布切克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州的州委第一书记，成为捷共地方一级的实权性干部，这对杜布切克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1955年是杜布切克政治生活上留下重要标记的一年。这年的年底，他

被选送到苏联莫斯科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是苏共专门培养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摇篮，能有幸进这所学校的人，可望在这里修成正果。杜布切克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整整学习了三年，直到1958年才返回捷克斯洛伐克。

杜布切克回国后，立即被选为捷共中央委员，起初任斯洛伐克共产党西斯洛伐克州州委第一书记，不久就担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书记处成员。1962年成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3年4月成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成为捷共中央权力核心圈里的重要人物。

综观杜布切克的成长历程，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苏联渊源；二是从基层工作起步的实践性。第一点，使他被勃列日涅夫看好，在倒诺沃提尼的群众性浪潮中，顺利地接任了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当然，并不是说没有勃列日涅夫的事先默许，杜布切克就绝对不可能当上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但是至少会添很多麻烦，费很多周折。1956年10月波兰哥穆尔卡的复出就是一例。

1956年10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八中全会，党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决定让贤，党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由原党中央书记、刚刚平反出狱的哥穆尔卡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这样重大的人事变动事先没有报告苏共中央，引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震怒。赫鲁晓夫直临华沙并出动军队，兵临城下。几经周折赫鲁晓夫才接受了这一事实。10月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才正式选举哥穆尔卡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

杜布切克的注重实践性使他成为一个务实、真诚、刚毅的人。他很少与外界交往，也不爱在公众场合露面，更少发表演

说，是一个腼腆、内省、深沉的人。杜布切克也不是一个想揽权的人，从而炫耀自己的权力。杜布切克生活简朴，自己开汽车，他的业余娱乐是游泳。

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所表现的出奇的平静，恰恰显示了杜布切克的清醒和冷静。杜布切克十分明白：只要诺沃提尼仍然是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仍然坐在共和国总统的位置上，在没有建立起拥护和愿意推行改革的班子以前，任何改革都是谈不上的，这可能是杜布切克 20 几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所积累起来的最实际的经验。因此，1968 年的第一季度，他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进行改革的班子并让诺沃提尼“自动”辞职。因为杜布切克不愿意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和强迫命令来贯彻自己的意图，一直坚持“说服同志们”的工作方法。他还清楚：诺沃提尼不是单个的人，执政 14 年之久的诺沃提尼属于一定的、权力地位很稳固的帮派；不是要把属于这个帮派的所有的人赶走，而是要把这些人所构成的帮派打散，将他们作为一个帮派排除出政权之外，只有到那时，才可能进行真正的改革。

1968 年 1 月 29 日，杜布切克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对莫斯科作非正式访问。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会见了来访的杜布切克，双方讨论了从加深苏捷两党、两国的合作，一直到各种重大的国际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双方就捷共中央一月全会以来的事态发展方向问题，进行了详尽的交谈。勃列日涅夫虽然是礼貌的，但不失盟主口吻地告诫杜布切克：在当前形势下，捷共队伍、尤其是它的领导机关的团结，至关重要；在当前复杂的条件下，积极实现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更为突出。为了表示对杜布切克的支持，勃列日涅夫提出：让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都派出高

级代表团，参加捷共 1948 年二月夺权 20 周年的庆祝活动。对此，杜布切克诚心地接受。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同杜布切克还特别讨论了拟于当年 11 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问题。杜布切克保证，捷共中央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更换而改变对这次会议的支持；捷克始终是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忠实一员。这次访问的公报说，苏捷两党领导人“热烈友好、诚挚，对会谈中涉及的问题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访问公报还称：会谈的结果“取得了友好的谅解，这是同两党兄弟关系的性质相符合的”。从会谈公报的热烈用词中已足可看出勃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所流露出来的满意心情。

2 月 4 日，杜布切克在斯洛伐克南部、紧挨着匈牙利的边境小城科马尔诺，会见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杜布切克会见也在谨慎地进行经济改革的匈牙利党的首脑时，气氛比较轻松。杜布切克与卡达尔早就相熟，加上杜布切克能说一口流利的匈牙利语，两位党的领导人的会谈就像两位老朋友的相见一样。杜布切克给了卡达尔以很好的印象。

2 月 7 日，杜布切克又在靠近波兰边界的摩拉维亚工业城市奥斯特拉发，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举行会谈。杜布切克向哥穆尔卡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争取哥穆尔卡的理解和支持。

杜布切克和哥穆尔卡的会见是十分微妙的，因为波兰人民自 1956 年 10 月以来的 10 多年里，对哥穆尔卡已从拥护到失望，再转为不满了，波兰人民甚至希望有波兰的“杜布切克”上台。

还在 1966 年 10 月 20 日，这是哥穆尔卡复出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 10 周年纪念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原想借机大事庆祝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重树正在颓落的威信。未料想政府和报刊对此却不置一词，连波兰统一工

人党对此也态度冷漠。10月21日，华沙大学历史系教授莱·科瓦科夫斯基为华沙大学历史系举行公开教学，讲授的题目是《“波兰十月”10周年》。科瓦科夫斯基在讲授中认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没有把“十月变革”进行到底，工人自治的试验也被终止了；对社会科学成果的检查是限制“创作自由”。科瓦科夫斯基批评哥穆尔卡执政的特点是：愈来愈严厉地进行压制，缺乏民主，不能容忍不同意见，极端官僚主义和思想僵化。^①大学生们热烈的掌声几乎把挤得水泄不通的教室的天花板也要震落。

哥穆尔卡的秘书纳米奥特凯维奇从内务部长莫查尔那里知道了科瓦科夫斯基讲课的情况，立即报告了党中央书记克利什科。克利什科知道后，又立即报告了哥穆尔卡，还建议把科瓦科夫斯基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哥穆尔卡听了克利什科的报告后大喊道：“科瓦科夫斯基这种修正主义分子，不应该让他这么长时间呆在党的队伍中。没有他，党会更好。”克利什科找来华沙市委第一书记科乔韦克，越过华沙大学党组织，越俎代庖式地直接宣布把科瓦科夫斯基“开除出党”。这一决定宣布后，华沙22名党员作家签署一份联名信反对华沙市委的这一决定，更抗议华沙市委这种无视党章规定的蛮横作风。华沙市委不仅不考虑联名信的正确意见，而且变本加厉，第二天就宣布把22名作家中的16名“开除出党”。这就是1966年10月著名的“科瓦科夫斯基事件”。这一事件，更加激化了哥穆尔卡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全国人民的矛盾，恶化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

1968年1月，华沙民族剧院上演19世纪波兰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的反俄诗剧《先人祭》。密茨凯

① 见刘邦义著《哥穆尔卡评传》，第23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2月。

维奇青年时期因反对沙皇俄国统治^①，被沙皇政府逮捕，流放俄国。1855年，俄、土（支持土耳其的还有英、法两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时，密茨凯维奇赶往前线参加和俄国作战，因染上霍乱死于君士坦丁堡，壮志未酬。《先人祭》是激烈反对沙皇俄国的诗剧，是密茨凯维奇的代表作之一。华沙民族剧院上演《先人祭》的寓意是非常清楚的。演出期间场场爆满；每场演出几乎都成为反对苏联控制的大示威，台上演员的道白和台下观众的齐声朗诵汇成一片：

囚徒：

我将获得自由？是的，这是哪来的新闻我不晓得，
但我深知莫斯科鬼子的恩赐是什么货色：
坏蛋们只是摘下了我的脚镣手铐，
我的灵魂却会被他们钉得更牢。

俄国军官：

咱们在这里挨骂，你不必大惊小怪，
整整一个世纪以来，
从莫斯科派到波兰的坏蛋，
简直是成千上万。^②

观看演出的苏联驻波兰大使中途退场以示抗议，称《先人

①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俄、普、奥三国第三次瓜分了波兰。波兰的大部分领土组成波兰王国，附属干沙皇俄国，并由俄国沙皇兼任波兰王国国王，波兰王国的宪法也由俄国沙皇“授予”。

② 转引《哥穆尔卡评传》，第236页。

祭》的演出是“反苏的拙劣演出”，命令波兰政府禁演此剧。哥穆尔卡按苏联大使的嘱咐，下令波兰文化部作出禁演《先人祭》的决定。1月30日，华沙民族剧院演出最后一场《先人祭》，剧场充满悲壮气氛。演出结束后，华沙的大学生们组织了捍卫《先人祭》演出的示威游行，政府逮捕了35名学生。《先人祭》虽然被禁演了，但是，波兰的反苏情绪却更激烈了，哥穆尔卡的地位也更不稳了。

1968年2月7日，哥穆尔卡是在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与杜布切克会见的。哥穆尔卡对杜布切克更多的是怀疑和不信任。

2月19日，捷共中央书记考茨基飞往布加勒斯特，向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齐奥塞斯库介绍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争取罗马尼亚共产党对捷共的支持和理解。这样，杜布切克在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妥善地做好了这些外部准备工作，然后集中解决内部问题。

杜布切克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在党中央主席团中先做加法，不做减法，即原有的主席团委员一个不减，增加了四名新成员。1968年1月增加的主席团委员是重工业部副部长扬·皮勒尔、布尔诺州委第一书记约·什帕切克、多兰尼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主席约·博鲁夫卡以及斯洛伐克一家钢铁厂的党委书记埃·里戈。减法肯定是要做的。怎样做呢？杜布切克在等待时机。这样的时机终于出现了。

2. 共和国总统易人

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减法”是1968年3月22日诺沃提

尼辞去共和国总统开始的；共和国总统易人标志着诺沃提尼时代的最终结束。

1948年2月25日，是哥特瓦尔德改组贝奈斯总统的原政府、进而迫使贝奈斯总统辞职、组成由捷共绝对领导的政府，捷克从此走上完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日子。1968年2月22日、23日两天，捷克斯洛伐克举行1948年二月夺权20周年的庆祝活动。勃列日涅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来参加庆祝活动。苏联党政代表团成员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苏共中央书记卡图谢夫，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伏尔加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库利琴科等。哥穆尔卡、卡达尔、乌布利希和齐奥塞斯库等，也分别率本国的党政代表团来到布拉格参加庆祝活动。

杜布切克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这次讲话虽然已不是他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但确实是他对捷共20年来历史的正式评价，也是对今后捷共工作方针的一个正式描绘。

杜布切克讲了几句欢迎各兄弟党代表团、保证加强和各兄弟党的团结友好合作的客套话之后，很快转入了正题。杜布切克的讲话直接批评了捷共20年来所犯的严重错误。杜布切克说：50年代初以来，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不幸的是，当时党的领导令人遗憾地没有能够避免的错误和缺点，竟然也和这些确实伟大的变革一样巨大”。杜布切克列举这些“和伟大的变革一样巨大的错误和缺点”，主要有几个方面：在无端怀疑的气氛下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在科学文化工作领域公式化、缺乏耐心和要求过急，使科学文化工作者普遍产生失望和幻灭之感；党同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紧张，党不信任他们的工作；对青年一代

的工作光靠训斥和告诫，把青年的热情限制在歌颂党的成就的框框里；把党的领导简单地看作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解决枝节问题的机构，行政部门、经济部门以及公众机构的工作缺乏有意义的实际内容，等等。杜布切克在历数这些严重错误的同时，指出党今后将致力的各项工作。

杜布切克提出：“为整个社会和党的全面民主化”是今后党的工作的目标。他说：“我认为，替一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忠诚地为祖国效劳过的人们真正恢复名誉，发展我国的进步事业和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为整个社会和党的全面民主化所作的努力的组成部分。”杜布切克表示要从政府系统和党的系统两个方面，彻底地、毫无保留地去努力。

关于科学文化工作，杜布切克认为这是党的活动中最复杂、最敏感的一部分。杜布切克表示要把党的政策建立在信任和卓有成效的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凡是对科学发明创造和艺术创作有害的东西，凡是有可能引起关系紧张的东西，我们都必须加以消除”。

关于青年工作，杜布切克表示“必须给青年提供条件，使他们能够发挥其积极性，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工作”。

关于党的工作，杜布切克说：为发挥群众的创造性、积极性而创造种种必要的条件；为各种意见的争论和交流提供更为广阔的天地；让每一个共产党员充分地、如实地、及时地了解国内外大事，以便对党的政策，对他工作的部门的党的活动，尤其是对确定党的政治路线及其行动提出意见，是目前形势下充分实现党的领导中心问题。杜布切克最后概括说：“简言之，这在目前就意味着在保持基本的集中制的条件下，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更多地、特别是更深入地发展各种形式的民主，不

仅是在党的上层组织，尤其要在下面，在党的基层和党员群众中发扬民主。”^①

杜布切克的讲话，虽然语气平和，实际上是对迄今为止的苏联和东欧各国党的领导观念、体系、方法以及社会主义民主体制，提出了否定性意见，并表示要按“为整个社会和党的全面民主化”目标，身体力行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加以贯彻。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废止用革命和暴力推进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路线；平反冤假错案，强调社会主义法制；抑制个人崇拜，恢复党的集体领导。1968年2月，杜布切克把12年前曾经震动世界的赫鲁晓夫所提出的内容，都作为建设和实现整个社会和党的全面民主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因此，杜布切克和赫鲁晓夫相比，已经在更高的层次上来理解和进行他所从事的事业了。

在此以前，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对杜布切克是支持的，虽然也仍旧带有观察的成分。但是，杜布切克的这次讲话确让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苏联代表团成员们都吃了一惊。《真理报》在报道布拉格的庆祝活动和杜布切克的讲话时，把所有这些内容都去掉，剩下几句干巴巴的套话。

在庆祝1948年二月夺权20周年的大会上，诺沃提尼以为自己仍然是共和国总统，曾要求在大会上讲话，却被杜布切克制止了。作为贵宾，勃列日涅夫应邀在大会上讲话。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实际上是和杜布切克的讲话精神相对的。他着重赞扬捷克斯洛伐克在过去的20年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彰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在反对民族主义倾向斗争中所表现的良好态度。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还提醒杜布切克等人：“我们同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其

^①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401页

他社会主义盟国一起，正在加强我们在华沙条约范围内的集体防御。目前，在美帝国主义执行侵略冒险的方针，西德复仇主义、军国主义势力日益猖獗的情况下，这一任务特别重要。”^①

诺沃提尼虽然没有获准在 22 日的庆祝大会上发言，但他仍旧要竭力表现自己，以表明他作为共和国总统的存在。23 日，他在布拉格老城市政厅的庆祝会上发表演说。诺沃提尼的演说竭力宣扬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实际上也是冠冕堂皇地自我吹嘘；然后把勃列日涅夫昨天在庆祝大会上的意思重复一遍；最后轻描淡写地承认捷克斯洛伐克（不是诺沃提尼）“犯了不止一个错误”，“我们的社会里有许多困难和矛盾”。他的讲话，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声例行掌声。

诺沃提尼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该是落幕的时候了，他在政治舞台上多挨一天，实际上都为他的彻底倒台多添一分狼狈相。杜布切克自己没有搞过任何反诺沃提尼的运动。在捷共中央主席团里杜布切克仍旧同诺沃提尼一起开会并经常提醒周围的同志：诺沃提尼同志还是共和国总统。作为政治实践家，杜布切克也很清醒必须从政权中清除与自己为敌的帮派，在国内的各级机构，尤其是在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中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些工作比发表纲领性声明、提出改革方案和举行党代表大会选举都重要得多。但是杜布切克坚持，这要用民主的方法、通过民主的途径来解决，让诺沃提尼自己提出来。谢伊纳少将的叛逃使诺沃提尼在总统的座椅上摔了下来。

2 月 23 日，捷国防部机关报《人民防御报》刊登新任的捷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埃·佩比赫少将的一篇署名文章，纪念 1948 年二月夺权 20 周年。文章赞扬捷人民军建设的成就，表示支持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4 集，第 32—33 页。

和拥护杜布切克进行改革。在谈到改革的曲折时，文章赫然揭露说：军队内的“一伙人”，居然在1967年12月企图搞“军事冒险”，镇压改革派，维护旧的独裁政权。文章第一次公开揭露了1967年12月未遂的军事政变，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谁的名，但参与军事政变的人的结局，也可想而知了。

直接策划1967年12月未遂政变的主要人物、捷共中央机关武装部部长米罗斯拉夫·马穆拉已于1968年1月被解除职务，调任北摩拉维亚州委第一书记，不久，又被派到特列尼亚尼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去当职员，接替这一工作的是原捷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上将。马穆拉的被撤职是杜布切克改组保安系统使之接受政府指挥的第一步；佩比赫少将的署名文章意味着即将开始全面清理保安系统，曾参与密谋搞军事政变的人自然是坐立不安了。2月25日，参与军事政变的捷共中央机关武装部副部长谢伊纳少将，带着18岁的儿子秘密离开本国，前往匈牙利，再从匈牙利乘汽车到南斯拉夫，再转道到达罗马。谢伊纳到了罗马以后，随即前往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要求在美国政治避难。美国中央情报局将谢伊纳作为可居的奇货秘密送往美国，因为谢伊纳知道很多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和华沙条约联合武装力量的军事情况，这些都是美国迫切想知道的东西。

谢伊纳的叛逃无论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或华沙条约组织和苏联来说，都是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和军事泄密事件。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拉什托维奇卡立即召集国民议会紧急会议，剥夺谢伊纳的议员豁免权，由司法机关对谢伊纳提起刑事诉讼，指控他“曾经贪污政府的价值2万美元的三叶草和紫苜蓿”。2月28日，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苏联元帅伊·雅库鲍夫斯基飞抵布拉格，与杜布切克、诺沃

提尼、政府总理列纳尔特以及国防部长洛姆斯基等举行紧急会谈，商讨由于谢伊纳的叛逃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华沙条约组织在情报系统和安全工作方面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采取补救措施。

马穆拉被撤职、谢伊纳叛逃等接连发生的事情使诺沃提尼密谋策划未遂军事政变的计划，在全国面前显山露水，诺沃提尼已难辞其咎了！3月8日，捷人民军总参谋部就谢伊纳叛逃事发表了一封致全国人民的公开信。公开信在谴责谢伊纳的同时，点名抨击诺沃提尼和马穆拉。全国各地党组织纷纷要求诺沃提尼对谢伊纳的叛逃“承担个人责任”，要求诺沃提尼总统辞职。3月9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马·瓦楚利克发表声明，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同在政治上损害党的人脱离关系”。声明认为中央全会“应该形成对政治事态发展的统一的、有目的的和积极的控制”，“必须在党内消除违反民主原则的一切现象，保证公民的一切权利和尊严”。^①人民军总参谋部和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的呼声可以看作是捷共和捷政府的正式声音。3月9日当天，诺沃提尼作出一个表态：以共和国总统的名义宣布取消谢伊纳的军衔，剥夺授予他的一切奖章和勋章。3月13日，捷克斯洛伐克驻美国大使卡·杜达照会美国国务院：根据1925年的引渡条约，要求引渡谢伊纳，因为谢伊纳犯有贪污罪，已被控告，照会还附有捷公安部门签发的逮捕谢伊纳的逮捕证。要求引渡的照会被美国国务院拒绝。捷政府也明知美国政府不会同意引渡；捷政府这样做是给国内公众，特别是做给未遂政变的策动者们看的一种姿态。

3月14日，参与未遂军事政变密谋的另一重要人物，捷国防部副部长扬科上将自杀。扬科上将的自杀自然是给摇摇欲坠

^① 见《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519页。

的诺沃提尼再击了一掌。3月20日，捷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致信诺沃提尼，敦促他辞职。信中说：只有总统的辞职才可能“使目前的复兴过程全速前进，并取得积极的结果”；提醒诺沃提尼要认识“目前个人利益必须让给集体利益的重要性”。^①

勃列日涅夫虽然不支持诺沃提尼一直集党政最高职权于一身，但是在诺沃提尼已经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现在连共和国总统的地位也保不住了，勃列日涅夫又不愿意了，他要帮助诺沃提尼保住这席政治领地。局势已发展到这一步，勃列日涅夫的努力已经无法挽救诺沃提尼彻底垮台的结局了。

至此，让诺沃提尼自己提出辞职的“说服工作”都做好了。3月20日，捷国民议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就总统问题讨论国内政治形势。国民议会主席团下属的各委员会提出对诺沃提尼投不信任票的动议。诺沃提尼到这时总算被“说服”了。3月22日，诺沃提尼向国民议会正式提出辞去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诺沃提尼的辞职书写道：“尊敬的同志们，议员们：我谨通知你们，我已决定辞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我这一决定是根据国内当前形势，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其目的是希望这一步骤能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壮大成长。”当然，在辞职书中，诺沃提尼也没有忘记把自己全面表扬一番，最后说：“我已将我辞去总统职务的决定通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②当天下午，国民议会主席团就总统的辞职问题进行表决。主席团投票表决通过，接受诺沃提尼的辞职。根据捷克宪法，在新总统选出之前由政府总理代行总统的职权。列纳尔特成了

① 见《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519页。

②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415页。

捷克斯洛伐克代总统。在这同时，捷共中央主席团也同意诺沃提尼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主席团会议公报说：目前的复兴过程是一股巨大的创造力，不仅能克服过去的缺点，也能利用以前的一切积极成就，从而以新的行动造福于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报还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将拒绝任何分裂或削弱社会主义进步的企图”；捷克斯洛伐克将捍卫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同苏联的友好关系。^①主席团还同意诺沃提尼辞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共中央委员、捷共中央书记等一切党内职务。诺沃提尼在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时，想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自己今后“不再参与积极的政治活动”并担心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发展“将导致极端政治观点的强化”。电视讲话的讲话稿也拟好了，但被杜布切克的捷共新领导所制止。至此，诺沃提尼被彻底逐出了政治舞台。1968年5月，诺沃提尼又被“暂时停止党籍”，变成全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号无人理睬的人。

关于新总统的人选，在捷共中央内部经过了一番微妙而又细致的考虑。

不少人，尤其是青年人都提名齐萨日为新总统候选人。

切·齐萨日被捷克斯洛伐克公众认为是开放的党内思想家。齐萨日青年时期在法国读完中学后，曾在法国的中西部城市第戎上大学，接受过较深的西欧民主思想的熏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国，加入捷共，50年代初在捷共中央机关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工作。由于他有出色的文采，曾为斯兰斯基的一本书写过书评。为此，在斯兰斯基事件后，被调到基层工作。1956年以后，齐萨日重新受到重视。他先是担任捷共比尔森州的州委

① 见《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520页

书记，1957年调任捷共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副主编。继之又从事理论宣传工作，1961年担任捷共中央的理论月刊《新思想》的主编。他写过一本书名为《我们与时代一起成长》的小册子，以极有文采的笔调，描述了捷国家和捷共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这本小册子在普遍流行的八股式的、干巴巴的宣传品轮番轰炸中，十分吸引读者，赢得诺沃提尼的好感。1963年5月，齐萨日被提升为捷共中央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工作。齐萨日从思想上倾向自由政策，主张营造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时间，被布拉格的知识分子称作“宽宏大量的夏天”，这自然引起诺沃提尼的不满，被调任教育部长。1965年，因为他的女儿参加了布拉格大学生反对诺沃提尼专制统治的化妆游行，齐萨日连教育部长也当不成了，被调任捷克斯洛伐克驻罗马尼亚大使。但是因此，齐萨日也受到大学生们的普遍欢迎。1968年3月，他被从驻罗马尼亚大使的任上调回，被任命为主管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党中央书记。在党中央提名新总统人选时，齐萨日也被提名，大学生们还曾聚集在街头高喊“拥护齐萨日当总统！”这时，杜布切克冷静地劝阻说：提名齐萨日为总统候选人，将会被苏联人看作是一种挑衅；而且从资历和威望等各方面考虑，齐萨日也不合适。

总统人选的另一提名是斯沃博达。

卢德维克·斯沃博达生于1895年11月25日，1931年任赫拉德尼采军事学院教授。纳粹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他在苏联组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参加反法西斯战争。1942年在苏联组织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第一营，任营长。1944年任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军军长。1945年4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届政府在斯洛伐克的西部城市科希策成立，斯沃博达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授大将军衔。2月夺权后，1948年斯沃博达加入捷共，

1949年5月在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1949年捷共中央在斯大林的直接干预下，开始进行大清洗，斯沃博达虽然是在苏联红军的指挥下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虽然也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但是因为他是“旧军官”出身的将领，仍被莫斯科列入“不可信任者”的行列。1950年4月8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在给哥特瓦尔德的机密信中，拒绝国防部长斯沃博达提出的、关于向捷国防部派苏联顾问的要求。信中说：“我们的军事工作人员认为斯沃博达将军不应受到信任，不可能同他公开谈论苏联的军事秘密。”这样，斯沃博达立即被调离国防部长的岗位，改任政府副总理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明升暗降。当时还是捷共中央总书记的斯兰斯基在谈到斯沃博达时也说：“他虽然加入了党，但实质上他对党是疏远的。他周围的军官如德尔加奇、德尔内茨、克拉帕列克、诺瓦克、布兰德尔^①，这些人都曾是旧军团的成员和受过西方军事学说教育的人，对苏联军事学说持否定态度，正如现在布兰德尔将军案件中所证实的那样，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曾是英美的直属间谍。我们的错误是，把斯沃博达和他的追随者留在军队的重要岗位上的时间如此之长，根据斯大林同志的紧急劝告我们才清除了他们。”由于斯大林同志的“紧急劝告”，斯沃博达被栽上：“英国情报机关的成员”；“1945年派人到比尔森向美军提供重要情报”；“正在策划军事政变”等等罪名，于1951年12月被捕，关押在布拉格著名的鲁津监狱。

历史往往是这么矛盾，以致像我这样毕生从事历史学研究

① 西蒙·德尔加奇、弗拉基米尔·德尔内茨、K.克拉帕列克，捷人民军将军；兹德涅克·诺瓦克，捷人民军大将，第三军区司令；R.布兰德尔，捷人民军大将。他们均于1950~1951年被监禁，1958年最高法院撤销了对他们的原判。

的人也说不清历史发展的规律究竟是什么。斯沃博达完全是由于斯大林模式的大清洗，甚至是斯大林的直接插手，才遭飞来横祸；但是斯沃博达又正是得到斯大林的关照，后来又由于有赫鲁晓夫直接出面，才得以平反昭雪。1952年11月23日，捷驻苏大使在使馆为庆祝哥特瓦尔德的56岁生日举行宴会，斯沃博达的女儿当时在莫斯科上大学，斯沃博达的女婿是使馆秘书，二人都出席了这次宴会。宴会进行中，卫国战争时期的明斯克州地下州委第一书记兼游击纵队司令员瓦西里·伊凡诺维奇·科兹洛夫将军举杯说：“为斯沃博达将军的健康干杯！”所有捷驻苏使馆的人都默然。为了打破僵局，使馆有人将斯沃博达将军的处境告诉了科兹洛夫。科兹洛夫为斯沃博达的不幸而忿忿然，叫斯沃博达的女儿打电话给布拉格的母亲，说：“苏联人相信，斯沃博达是无辜的！”参加宴会的苏联将军将宴会上发生的事情报告了斯大林。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情，斯大林立即给哥特瓦尔德发了一封电报，内中说：“请释放斯沃博达将军。”

哥特瓦尔德犯难了！凭什么抓他，又凭什么放他？总不能说因为斯大林怀疑他所以抓他；现在斯大林说放他，所以就放他！公安部部长卡罗尔·巴契列克奉哥特瓦尔德的指示，到鲁津监狱来探望斯沃博达，转达哥特瓦尔德同志对他的“问候”，说斯沃博达的这种“处境”，“多多少少是出于误会”。斯沃博达冷冷地问：“我为什么要呆在这里？”巴契列克回答说：“我们怕你逃跑，怕你自杀。”斯沃博达大声说：“如果我有什么罪的话，你，巴契列克、萨波托斯基，还有哥特瓦尔德，也应当跟我一起坐牢。”巴契列克无言以对，匆匆地走了。过了一个星期，斯沃博达走出了鲁津监狱。想起这段经历，斯沃博达说：“真的，是斯大林间接救了我的命。在监狱里他们（指苏联人——作者）对待我是相当不错的。”斯沃博达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哥特瓦

德拒不落实政策，把他下放到特热比奇农业合作社当会计。

斗转星移！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也由哥特瓦尔德换成了诺沃提尼。尽管赫鲁晓夫已经在苏联着手平反冤假错案，但是诺沃提尼却拒不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平反昭雪工作。1954年6月11~15日，捷共举行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借参加这次大会之机，向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详细介绍了斯大林粗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情况，以及苏联着手为无辜受害者恢复名誉的工作。谈话中，赫鲁晓夫要求捷共中央主动着手这一工作。赫鲁晓夫有意提出，要会见“反法西斯战争年代的老战友”斯沃博达将军。尴尬的诺沃提尼只好把斯沃博达从特热比奇农业合作社接回来。当时，布拉格的一位记者说：赫鲁晓夫“帮助将军又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于是他获得他的权利。”但是，诺沃提尼明显地不满赫鲁晓夫为斯沃博达而施加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压力，拒绝在政府部门安排斯沃博达的工作，说“他（斯沃博达）只能使问题复杂化”。1954年11月，象征性地安排斯沃博达为国民议会主席团委员、国民议会农业委员会委员。1955年，斯沃博达被任命为哥特瓦尔德军事学院院长。1959年，64岁的斯沃博达退休了。

1965年，苏联隆重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20周年，勃列日涅夫有政治性地封赏还健在的、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将领。斯沃博达被苏联授予苏联英雄的最高荣誉称号并被授予苏联的最高奖章列宁勋章。在勃列日涅夫的“将军”下，诺沃提尼也授予斯沃博达捷克斯洛伐克英雄的最高荣誉称号。斯沃博达（свобода）在俄语里是“自由”的意思。这位白头发、蓝眼睛，面容慈祥的老英雄十分珍惜重新获得的自由，恢复名誉后他专心于撰写军事历史，在捷国内有很高的威望；苏联那些胸前挂

满勋章的元帅们几乎都是他当年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的战友。杜布切克向捷共中央主席团提议，斯沃博达是总统的最佳候选人。这一提议被主席团一致接受。3月30日，国民议会根据捷共中央主席团的提议，斯沃博达作为惟一的总统候选人进行表决，在288票的总票数中，获283票通过。斯沃博达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后，特地来到布拉格东南25公里的拉尼镇，向前总统托·加·马萨里克的墓献花，这一自1948年2月以来从未有过的行动意味深长。斯沃博达不仅自己渴望自由，他还想带给全捷克斯洛伐克以自由。

3. 党中央主席团重组

在“说服”诺沃提尼辞去共和国总统的过程的同时，重组党中央主席团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杜布切克的目标是明确的，即在领导层中建立以杜布切克为核心的集团。

1968年2月1日，杜布切克在布拉格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统一农业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话，这是他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话。杜布切克在声明捷共将坚定地维护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和一致、巩固华沙条约组织之后，向到会的农民代表说：捷共新领导像信任工人一样地信任农民；捷共新领导希望在今后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能得到农民的真诚的支持。然后，杜布切克用较长的时间讲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杜布切克说：虽然过去党和政府只强调纪律，但是民主和纪律是同样重要的。“民主不仅是一个人有权利、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也包括处理人民意见的方式：人民是否真正感到他们对国家大事负有共同的责任并能共同作出决定，

他们是否真正感到他们是在参与和处理决定这些重大问题。……政府机关必须努力创造最好的条件，让农民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和主动性，而不是向他们发号施令，叫他们何时和怎么去收割和播种。”^① 杜布切克实实在在的讲话赢得到会代表的拥护；杜布切克关于民主问题的讲话像是在会议上放了一把火。到会代表不顾事先的安排，自行跑上主席台去发言、提问题、批评以往的工作。会议开得空前的热烈，以致把事先拟好的、准备让会议代表举手通过的决议也扔在一旁，通过一个在会议进行中临时形成的决议：要求建立一个能够自由地维护农民利益、能够给制定国家政策的人以影响的全国性农民组织；要求农业合作社享有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组织同等的权利。

杜布切克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初，他所依靠的主要是切尔尼克和科尔德。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科尔德从 60 年代开始就相互信任。

德拉霍米尔·科尔德，生于 1925 年 12 月 29 日，青年时代当过矿工，1945 年加入捷共，1951 年任奥斯特拉发市市委第一书记。奥斯特拉发是靠近波兰的捷克采煤和冶金工业基地，有捷克斯洛伐克的“钢都”之称，机器制造业也很发达。科尔德的特殊经历，使他在工人中拥有很高的威信。1961 年，科尔德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第二年又成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共中央书记。和杜布切克同龄的切尔尼克，1956 年就成为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60 年代，切尔尼克是希克的经济改革方案的积极拥护者。这样，杜布切克在上台的初始阶段，捷共中央主席团内形成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科尔德的“三驾马车”。

①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 387 页。

捷共中央和政府的各职能部门，杜布切克也在悄悄地进行调整。

1968年3月14日，国民议会对内务部部长约瑟夫·库德尔纳、总检察长扬·巴尔图什卡投了不信任票。第二天，两人被撤职。同时被撤职的还有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米·胡迪克和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米罗斯拉夫·帕斯蒂日克。这几个人的被撤职是杜布切克在要害部门中清除了几个昔日诺沃提尼的亲信，对推行改革是极为有利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亨德利赫被解除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共中央书记、捷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考茨基也被撤销捷共中央书记的职务，调任捷驻苏联大使。“驻苏大使”看似一个重要的职位，由于当时捷苏两党、两国的联系，几乎稍微重大一些的问题都由两党、两国的高层领导直接交涉，“大使”成了一个“闲职”。杜布切克将齐萨日从驻罗马尼亚大使的岗位上调回，任捷共中央书记，主管教育、科学和文化工作。

在这几个月中，一批改革的中坚人物也在群众性的改革浪潮中涌现出来，有的被杜布切克破格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突出的人物就是斯姆尔科夫斯基。

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生于1911年2月26日，青年时代当过面包工人，1931年加入捷克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成为青年联盟的中央委员。1933年加入捷共，任布拉格青年红色工会书记，曾经赴莫斯科列宁共产国际大学学习，1937年任捷共布尔诺州州委书记。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斯姆尔科夫斯基一直坚持地下斗争，担任民族委员会副主席，是1945年5月布拉格起义的组织者之一。1946年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1948年又当选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此后，他转向议会工作，1948年任国民议会主席团委员、国民议会农业委员会主席、农业部副部长、

国营农场经理和农业部畜产品组组长。在接连不断的大清洗中，斯姆尔科夫斯基也成为大清洗的对象，1951年4月被捕，同年8月被无端判处无期徒刑。

1955年11月，斯姆尔科夫斯基获得假释，先后在国营农场和林业管理局做日常的普通工作，1959年被安排在一个农业合作社当主席。1963年捷共中央终于为他恢复名誉，安排他担任中央人民检查和统计委员会副主任。1966年捷共“十三大”上，斯姆尔科夫斯基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1967年1月出任农业和水利部部长。“布拉格之春”时，斯姆尔科夫斯基已经57岁，头发已花白。但是，他认为这是实现了个人一生的希望和信仰。他带着这样的自觉为理想而斗争。

1968年1月21日，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工会的机关报《劳动报》上发表了一篇对时局的看法的文章。作为捷共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文章以饱经风霜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口吻说：“我们必须坚决纠正、调整和克服过去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我们不能容许再度发生这种情况。关于问题应如何解决的不同观点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用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决不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高级领导职务不应当是终身的。”“在社会领域中，必须恢复民主精神，必须创造一种自由交换意见和互相争鸣的气氛，让最有价值的先进思想战胜保守落后的思想。”^①

这时，一些偶然的事情也会成为激发民族精神的火把。1968年2月25日，在法国东南部伊泽尔省格勒诺布尔市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冰球比赛中，捷克队以5:4击败了开赛以来保持不败纪录的苏联队。当几十万捷克斯洛伐克人从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这一结果时，布拉格几乎万人空巷，涌上街头，演成

①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374-375页。

抒发民族激情的大示威。3月13日，斯姆尔科夫斯基以冷静的长者风度劝告青年人搞这种“冰球政策”的危险性，因为外交关系、政治斗争和体育比赛毕竟是两回事。斯姆尔科夫斯基说：“我们常常看到年青人表露出他们对苏联的厌恶，在冰球赛的时候尤其明显。当然，爱什么或者不爱什么，这是个人的私事，是不能勉强的。可是，你们必须考虑一个现实，你们去看看地图，在学校里或者在家里看看地图，看看我们的国境线，谁是我们的邻国，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政治之中。”他希望青年人不要把政治当儿戏，不要低估自己对国家安全所负的责任。

3月20日，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卢采尔纳大厅发表演说。他在说明捷共的“复兴社会主义”的目标时，再次提醒青年人不要过火。他说：“你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成为更加激进、更加革命的人。但是我们年纪大一些的人却应该注意使我们的国家在这个伟大变革的时期不至于发生任何意味着灾难的事情。”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公众中的形象越来越突出。

杜布切克在作了这些准备并让不同的人都有机会在社会风浪中表现自己之后，1968年4月2~4日的捷共中央全会，改组了捷共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共和国政府和国民议会等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机构，产生了新的党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共和国政府和国民议会主席团。

4月4日，产生了新的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捷共中央原主席团委员中，亨德利赫、杜兰斯基、西穆涅克、胡迪克、列纳尔特均辞职。米罗斯拉夫·帕斯蒂日克也辞去捷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在书记处里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原中央书记帕斯蒂日克、亨德利赫、考茨基、马·瓦楚利克等都辞去中央书记的职务。经改组后的捷共中央主席团由11名成员组成，他们是：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科尔德、斯姆尔科夫斯基、皮勒尔、

什帕切克、比拉克、里戈、什维斯特卡、克里格尔、巴尔比雷克；3名主席团候补委员是：马·瓦楚利克、布拉格捷卡德机械厂经理安托宁·卡佩克、列纳尔特。到5月，西蒙增补为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处成员有：杜布切克、齐萨日、姆利纳日、英德拉、科尔德、列纳尔特、萨多夫斯基、沃列尼克、斯拉维克、埃尔班等10人。书记处成员的分工中，齐萨日、斯拉维克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埃尔班兼民族阵线书记，萨多夫斯基主管农业和中央机关财务工作，姆林纳日主管研究和制订政策工作，沃列尼克是奥斯特拉发州委书记。

4月4日，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取代原来的拉什托维奇卡。4月6日，列纳尔特总理代表政府向斯沃博达总统提出辞职。总统同意列纳尔特辞职，同时要求切尔尼克组织新政府。4月8日，切尔尼克出任总理，组织新政府，与捷共新领导一起，奔向“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这样，拉动“布拉格之春”的“三驾马车”从1968年初的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科尔德，重组成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

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重组中，明显地贯彻了杜布切克的两点意图：

第一，增加了改革的核心力量，将锐意进取的、务实苦干的有能力的人安排到关键的职位上。斯姆尔科夫斯基取代拉什托维奇卡，任国民议会主席；切尔尼克取代列纳尔特，任政府总理，和已任命的共和国总统斯沃博达，组成了杜布切克掌舵的最佳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可能是捷克斯洛伐克自1948年二月夺权以来的最佳领导班子，这个优化组合的班子甚至比当年赫鲁晓夫改革的班子还要强得多。

赫鲁晓夫从1953年9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开始改革。1955年2月，迫使反对改革的马林科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的职务，任命布尔加宁为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6月经过“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事件”，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被撤销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在这一事件中，也参与反对赫鲁晓夫、要求赫鲁晓夫辞职的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仍然留在苏共中央主席团里，前者仍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后者仍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8年3月，布尔加宁被迫交出政府首脑的大印，由赫鲁晓夫自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0年5月，伏罗希洛夫被解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任命勃列日涅夫来担任这一职务。赫鲁晓夫改革的11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既坚持革新，又务实谨慎的党和国家领导班子。赫鲁晓夫在当政的后期也喜欢“一言堂”；政策朝令夕改，也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有的甚至是赫鲁晓夫随心所欲的，这和赫鲁晓夫没有建立起好的领导班子，不无关系。

第二，杜布切克重组党中央主席团、书记处与国民议会主席团和政府，显然是考虑到尽可能减少改革的阻力：既要发挥立志革新者的积极性，使他们有用武之地；也要留给不同态度的人有可能表达自己意见的地方，这是杜布切克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

在“布拉格之春”前后闪射出光和热的出色人物是希克、齐萨日、斯姆尔科夫斯基、姆利纳日、切尔尼克等，当然就不说杜布切克自己了。但是，杜布切克对他们的使用 and 安排都是慎重的、考虑周详的。杜布切克在劝阻提名齐萨日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已表现出他的考虑问题的细致。“布拉格之春”的经济改革设计师希克，只是捷共中央委员，连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圈子也没有进去；在政府的圈子里他只是政府副总理、经济委员会委员，负责实现经济理论方面的工作。

姆利纳日的安排也是杜布切克煞费苦心的。姆利纳日被增补为捷共中央书记，但是姆利纳日却不是捷共中央委员；姆利纳日被任命为捷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席，负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工作。杜布切克的安排，为“布拉格之春”的起步减轻了阻力，至少是减少了来自苏联的阻力。

杜布切克在考虑党中央主席团、书记处的人选时，并不是追求“一个声音说话”，而考虑到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他意见的人。在党中央主席团里，像接替杜布切克任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比拉克，早在50年代中期任东斯洛伐克地区第一书记时，就专横地把东斯洛伐克地区的东正教会并入乌克兰东正教会，甚至主张东斯洛伐克民族属于乌克兰民族。60年代中期，比拉克也是以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反对变革。比拉克的思想和主张，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和国际（与苏联的关系）上，都有一定的基础；对比拉克所代表的人和思想处理太急，是不利于改革的。直到1968年8月，发现了比拉克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保持秘密的、密切的联系时，才解除了他在捷共党内的职务。原政府总理列纳尔特只是到最后时刻才转向支持杜布切克，但在思想上仍不赞成杜布切克。尽管如此，杜布切克对列纳尔特是容忍的。在解除了列纳尔特的政府总理、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之后，仍然留任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

应当特别提起的是，在改组政府时，杜布切克提名由英德拉担任交通部部长；雅盖什被提名为捷共中央监察和检查委员会主席。雅盖什曾经是60年代初库德尔纳任内务部长时的副职，后来因阻挠平反昭雪工作被调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般委员。雅盖什被提名遭到不少人的反对，认为他同原保安部门的联系过于密切，不适宜担任党中央监察和检查委员会主席的要

职。但是杜布切克出来做工作，说“雅盖什是个好同志”。提名英德拉和雅盖什，杜布切克是出于苏联方面的原因，以减少阻力。

总之，杜布切克对锐意改革的人和不赞成改革的人以及对于改革有不同态度的人，在安排和使用方面都采取慎重的态度，考虑到各方面的关系，妥善处置，在这方面，杜布切克也明显地强于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在台上有 11 年，赫鲁晓夫改革的结局是赫鲁晓夫自己，是他所推行的政策造成的；杜布切克在台上只有 8 个月，其时间的短暂，一如 1917 年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临时政府。如果杜布切克在台上不是 8 个月，而是 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肯定会呈现新的局面，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可能开创另一种局面。

人们已经习惯于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并且把这一认识当作真理来接受。其实，这一认识是片面的。应当说：历史是可以假设的，但是假设不是历史，这样才全面，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说历史是可以假设的，是指历史的演进轨迹也像人的一生那样，有许多十字路口。当历史行进到十字路口的时候，究竟如何发展就有着多种选择，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华山一条道”。处在十字路口上的历史，究竟选择哪个方向，即采取什么政策，实行何种措施，都是由处在关键职务上的人作出来的。处于关键职务上的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是由人的品格素养、兴趣爱好、感情，乃至其他一些条件、偶发因素，等等所制约的。当然，这种种条件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大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历史是由无数的偶然事件拼接而成的。所以，历史是有多种选择的；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但是，成为历史事实的，只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不可

能将多种可能同时付诸实践。这也是人们之所以接受“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这一“理论”的原因。这里，人们恰恰忽略了：成为历史的只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但是不能因为只有一种可能性成为历史而否认多种可能性的存在。这样来理解历史，就不至于把历史都看成干巴巴的“规律”了。如果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能像 1956 年 10 月赫鲁晓夫干涉波兰统一工人党事务那样，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前景与杜布切克的结局就会是另一种情况了。所以，现在许多国家的改革措施都采取在小范围内搞试点，取得经验，看看实际效果和社会反映，然后作出决断。这样做是力图在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中作出最佳选择，因为很多历史的选择并不是最佳选择。对于“布拉格之春”的凋零和杜布切克的结局，只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人”！

4. 《行动纲领》出台了

1875 年 5 月 5 日，马克思就有关当时的德国工人党纲领问题，致威·白拉克的信中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①《行动纲领》并非捷共的纲领，是捷共 1968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纲领。但是，《行动纲领》的公布，确实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捷克斯洛伐克 1968 年改革水平的里程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296 页，人民出版社，1995 年 6 月。

碑。自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苏联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进入了实践的阶段。在实践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社会主义自身的改革与完善的问题自然也成为现实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改革的阻力实在太太，难度实在太太，代价实在太昂贵！

1934年前后，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为代表的有些干部，流露出调整苏联某些政策的倾向，立即引起斯大林的警觉。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大楼斯莫尔尼宫内遭歹徒暗杀。自此开始，在斯大林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发生了延续长达4年的、暗无天日的大清洗，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上上下下对国家政治问题都噤若寒蝉。

1948年前后，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辛斯基为首的一批干部，表达了局部地调整党和国家政策的愿望，又招来斯大林的坚决镇压。苏联又开始了新一轮大清洗。

1953年3月斯大林死后，苏联社会已是问题成堆，有的问题几乎达到爆炸性的程度。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从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继之缓和同全国农民的严重对立，取消“义务交售制”，再扩及其他领域。赫鲁晓夫的改革着眼于解决急需解决的尖锐问题，且急功近利；是无论证、无计划、无目标的“三无改革”。赫鲁晓夫的改革是水平不高，但是毕竟打破了斯大林模式的僵化体系，推动苏联发展成世界一流的超级大国；提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构想，在社会主义世界掀起一个思想解放的新浪潮。

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新领导已经有了一个改革的政纲。

还在1968年的捷共中央一月全会上，中央全会就作出决定：委托捷共中央主席团制定当前时期的《捷共行动纲领》。为了拟定改革的政纲，捷共中央主席团组成了以科尔德任主席的“政治委员会”，负责起草《行动纲领》；具体完成起草工作的是政治委员会领导的“工作小组”。“政治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多名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书记处成员以及其他方面的高级官员；“工作小组”的成员大部分是各科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和各高等学校的专家、学者。捷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委员会”、“工作小组”的三级机构，实际上是“布拉格之春”期间的民主、科学决策机制。科尔德只对“工作小组”提出原则性的要求：“文字应简练，大约只需10页。”《行动纲领》写什么？怎样写？即《行动纲领》的具体内容由“工作小组”的专家、学者去做；写好以后，提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

《行动纲领》中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部分，主要由历史学家卡雷尔·卡普兰负责；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管理体制的部分，主要由姆利纳日负责；关于经济改革的内容，主要由希克负责；关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内容由普罗瓦兹尼克负责；关于对外关系的内容，主要由奥尔斯佩格负责。为了起草《行动纲领》，杜布切克可以说是集中了全国科学和思想理论界的精英，调集由各科研机构通过多年努力所完成的几十篇有价值的研究报告，集中在布拉格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部，协作完成。勃列日涅夫极恨这份《行动纲领》，更恨起草《行动纲领》的人。1968年秋，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问西蒙：“《行动纲领》究竟是谁起草的？”西蒙回答：“是一个以科尔德同志为首的委员会起草的。”勃列日涅夫听后，生气地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想知道，实际上是谁写的。”勃列日涅夫不会明白：《行动纲领》是20世纪60年代捷

克斯洛伐克意志和智慧的结晶。

《行动纲领》当 1968 年 1 月杜布切克上台之初就开始准备了。1968 年 2 月 1 日，杜布切克在统一农业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就说：党正在准备一个行动纲领，它将明确规定“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并阐明“党在社会、国家和经济领域的当前政治任务”。2 月初，《行动纲领》起草完成。2 月 6 日，杜布切克主持召开党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行动纲领》草案。党中央主席团还作出决定：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级党组织，“都应积极参与制订行动纲领的工作”。中央将《行动纲领》草案印发给各州委员会，认真讨论。3 月 9、10 日和 17、18 日是两个周末双休日，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分别和各州、县的委员会举行 67 次会议，讨论《行动纲领》草案和其他一些新的政策思想。在讨论过程中，各级党组织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涉及到诸如：怎样使党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怎样解决民族问题；怎样使一般党员群众摆脱长期以来的消极状态；怎样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经济问题；怎样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怎样看待知识分子；怎样满足青年一代的要求，等等。党中央主席团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范围讨论《行动纲领》草案，激发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民主意识，也是全国性的一种民主意识教育和民主办事实践。这种捷共创造的、有序的民主行为和激发起来的民主意识，又反过来推动捷共中央主席团，加速为遭到大清洗的人平反昭雪。捷克斯洛伐克国土上的意气风发完全不是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无序的“文革”大民主。

在前几年经济改革的基础上，《行动纲领》的起草和上下结合的讨论，可以说是集中了当时捷共全党的智慧，反映了捷共的主要意志。1968 年 4 月 1 日，捷共召开中央全会，杜布切克

在中央全会上阐述了《行动纲领》的指导思想，提请中央全会讨论。杜布切克指出：自1月以来在捷克斯洛伐克形成了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各项政策；在经济改革中，恢复了活力的共产党能够通过民主的方式战胜其他一切泛起的思想派别。杜布切克认为：20世纪60年代已不同于以往的“冷战”年代，60年代已进入实现非对抗性时代中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现在需要创造、形成和发展一种适应新形势的政治体制，捷克斯洛伐克正是要发展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它能在一切社会组织和群众组织都享有独立地位的基础上，让共产党、政府和国民议会各自发挥独立的作用。杜布切克强调：《行动纲领》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尝试。《行动纲领》的要点是：共产党指导下的自由思想；实行融入市场的经济改革；为恐怖统治下无辜受迫害的一切人恢复名誉。杜布切克说：“社会主义运动不能简单地用命令来宣布，不能只从外部向它灌输理智。然而在我国条件下，这种理智首先在于群众的认识、群众的利益和群众的运动。”同时，杜布切克也警告：“另一方面，不要忽视有害于当前运动的极端做法。全国公民，尤其是党员应该清楚，我们所要努力达到的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别的民主。要卓有成效地实现党的列宁主义领导，而不能削弱党的领导作用。”^①

新任的、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捷共中央书记齐萨日也在中央全会上讲话。齐萨日的讲话着重谈“复兴社会主义的问题”。齐萨日要求“让复兴社会主义的过程开足马力发展起来”，不要

① 《杜布切克在1968年4月1日捷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载罗·亚·麦德维杰夫主编《政治日记，1964·1970年》俄文版，第312·313页，阿姆斯特丹1972年。

制定任何“规则”和框框来阻碍它的发展。他说：“我完全相信，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开辟了一条在捷克斯洛伐克复兴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道路。”关于民主问题，齐萨日指出：目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民主化浪潮绝不是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反对它的“反社会主义变种，反对它那至今犹存的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令人厌恶的形式”。^①

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改革政纲，即《行动纲领》。《行动纲领》的俄文本全文刊登在捷共中央委员会的专门新闻简报上，全文共63页。《行动纲领》的通过和公布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社会跨进被称作“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阶段。

《行动纲领》的内容大体上分如下的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这部分里，首先是回顾了捷克斯洛伐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史，总结了到1968年为止的捷共的活动，主要问题是由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发展水平和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僵化，导致了机械地接受和推广与我国的国情和传统相悖的设想、政策和政治主张”。“国内政治生活出现宗派主义、限制人民自由和践踏民主权利，破坏法制，专横跋扈，滥用职权，等等不良现象。许多公民、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无辜地遭到残酷迫害”。由此，造成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深刻危机。

① 《捷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齐萨日在捷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载《政治日记，1964-1970年》，第316-318页（俄文）。

《行动纲领》称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体制是“变形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没有及时发扬，革命专政嬗变成官僚主义，成为生活的一切领域发展的障碍”。《行动纲领》列举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劳动者的工资长期在原地徘徊、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基础设施落后、住房严重不足、交通事故频繁、商品匮乏、质量低劣、生活环境不文明，极大地损害了人的能力、智力、积极性高扬的可能性。“这样，人们自然对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使命、对人的精神面貌产生了怀疑，有些人精神迷茫，有些人对前途丧失信心”。造成这种“变形的社会制度”的主要责任是诺沃提尼和他所领导的党，党包揽一切，行使国家机关、经济机构和群众团体的一切使命。

第二部分是阐述党的领导作用。

《行动纲领》宣布：“党的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保证。”但是，《行动纲领》指出：党不是把自己作为社会的“管家婆”，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管头管脚，“党的使命在于激发人的社会主义主动精神，指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现实的可能性，并通过系统的宣传工作和自身的模范行为，把全体劳动人民吸引在自己的周围”。《行动纲领》在这同时还阐明党和党外人士的关系：党的政策不应使非党群众感到由于党的领导作用而影响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相反，要使他们感到，党的领导是他们的权利、自由和利益受到尊重的保障。

第三部分是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建立新的政治管理体制而奋斗。

这部分着重阐述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在捷克斯洛伐克是一直叫喊的，但实际上整个国家制度盛行“中央

集权制”；指令性规定全民的无所不包的一切，被当作生活的必需；人民参与管理被理解为仅仅是“完成指令、命令”；只会按旧习惯、旧方法办事的人，照样坐在原来的位置上。这样，尽管也对个人崇拜时期的特有现象进行不断的、严厉的谴责，但我国社会并没有走出个人崇拜时期的那种“时代阴影”。《行动纲领》宣布：要彻底改变那种对人民的积极主动精神无动于衷，对来自下面的建议漠然不予理睬的态度；要把真正关心社会主义、关心社会进步、关心人民痛痒的人安排到各级工作岗位上，去掉那些只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没有才能，但善于奉承的人。

在这一部分里，《行动纲领》还庄严宣告：要以法律手段切实保障宪法所赋予每个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一切政治和个人的权利；不能从政权当局的立场，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言论自由的一条重要措施是：在报刊上要把代表党和国家的官方观点和政治评论家的个人看法区别开来；必须在法律上切实保证宪法赋予公民的迁徙自由，特别要保证我国公民有移居国外的自由。《行动纲领》提出：要为过去年代受到非法迫害的人彻底平反；凡是因牵连自己而阻挠甄别工作的人，都不能在政治机关、检察和司法部门工作。“社会主义正是通过更广泛的民主和公民更充分的自由，表明社会主义已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有限民主”。

第四部分是关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问题。

《行动纲领》肯定，过去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很不彻底，以致现行的经济体制是在保护落后，使那些经营不好、管理水平很低的落后企业能继续存在，还享受种种优惠待遇；再也不能继续这种用损害工作好的人们的利益，来照顾那些经营

很差的人们的利益的政策了。

《行动纲领》特别提出：必须提高市场的作用；完善生产和降低成本的根本动力应该是经济竞赛，尤其是同高度发达的外国竞争者进行竞赛。《行动纲领》已把企业看作是市场经济行为的独立主体，实现企业和企业组合的自主权；企业要由市场需求来决定它的经营活动，和政府的行政行为脱钩；在劳动力配置上也要从行政行为转为市场行为，让劳动者自由择业。《行动纲领》表明，“要调整零售价格过于脱离生产成本的制度，提高某些商品的零售价格，降低某些商品的零售价格”。

第五部分是关于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问题。

《行动纲领》提出要发展社会科学，提高国民教育质量。关于文艺政策，《行动纲领》宣布：反对用行政方法和官僚主义方式来贯彻文艺政策；文艺创作不应受出版检查，“党既要捍卫和保障文艺创作自由，同时要捍卫和保障文艺作品的开放权利”。文艺工作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享有独立自主地作出决定的权利，要体现相应的“文化艺术自治”。

《行动纲领》最后说，在对外政策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与苏联的同盟与合作；捷共赞同于1968年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让《行动纲领》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复兴纲领吧！”^①

《行动纲领》的基本精神是坚持“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捷克斯洛伐克“有责任总结和利用自己比较先进的物质生

^① 《捷克共产党行动纲领摘要》，载《政治日记，1964·1970年》，第318～331页（俄文）

产基础、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无可置疑的民主传统”，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承担起捷克斯洛伐克对国际命运负有的使命。

《行动纲领》是杜布切克改革的政纲。它的公布，给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以鼓舞；苏共和勃列日涅夫也从《行动纲领》中看到了杜布切克。无论从哪方面说，《行动纲领》的公布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发展的转折。

五、苏共的思虑与决策

1. 勃列日涅夫看走了眼

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对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新领导，从支持到明火执仗地武装绑架，经历了几个转变过程。杜布切克上台前后，勃列日涅夫基本上是支持的，本书前面已作了具体的介绍与阐释。2月22日，捷共举行1948年二月夺权20周年庆典，杜布切克在庆祝大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式”的讲话。勃列日涅夫在听明白了杜布切克的基本决策之后，即从基本支持转为施加压力和观察。3月28日至4月5日，捷共中央举行全会，在没有事先得到苏共中央批准的情况下，重组了捷共中央主席团、书记处以及国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等全套党和国家的领导班子，撤换了军队、保安、司法、监察等国家暴力机关的领导人，特别是4月4日通过了实施复兴社会主义改革的《行动纲领》。以此为分界，苏共中央和勃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即由施加压力和考察转为反对和必欲去之而后快，直至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武装占领。当然，在“施加压力”和“争取”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而勃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的“争取”工作，是争取杜布切克放弃改革，停止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型社

会主义的努力，这点，连勃列日涅夫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的。因此，4月以后，勃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的基本态度和方针就已经形成了。至于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武装占领，则又有一个决策过程。

随着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就和波兰的哥穆尔卡、匈牙利的卡达尔、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民主德国的乌布利希等，开始研究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和共同采取的对捷措施。

早在1967年12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情报部门就向苏共中央报告，内称：“捷克斯洛伐克出现意识形态蜕化的威胁”，要求苏共中央予以“密切关注”。

1968年1月18日，在杜布切克即将来访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了有关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以及杜布切克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的捷共问题。勃列日涅夫向政治局会议通报了几日之前与德国统一社会党，以及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就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谈话情况。勃列日涅夫谈到：“哥穆尔卡同志鉴于捷共中央全会的情况，已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表示某种担心。”但是勃列日涅夫表示：捷共无论在内政问题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在帮助杜布切克推行一条强硬的路线，对此，苏共中央不能作明确的表态。勃列日涅夫还向政治局会议通报了与杜布切克电话谈话的情况。

不是政治局成员的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也列席了政治局会议，他奉命向政治局详细报告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契尔沃年科大使一开始就说：“我们详细通报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形势。我们先是用函件，后用电报向政治局报告了捷共最近几次中央全会的情况。……我们的报告从头至尾都是建立在经过检验和完全可靠的消息基础上的。”契尔沃年科认为：捷克斯洛

伐克局势发展的过程尚在进行之中，这个过程是复杂的，目前尚不明朗，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得出，即“集中领导软弱无力；意识形态战线的形势和民族问题趋向尖锐化。”契尔沃年科对杜布切克的评价是：“杜布切克此刻缺乏自信心。……杜布切克当然是个诚实的、忠实的人。他是苏联的忠实朋友。”最后，契尔沃年科就加强与捷共新领导的联系提出具体建议，认为勃列日涅夫同志邀请杜布切克对苏联进行非正式访问；紧接着派苏共中央高级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都是明智之举”。

这次政治局会议表明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极端关注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对捷局势的发展十分忧虑；担心杜布切克能否控制得了全国的局势，但对杜布切克本人仍然是信任的。

1月29日，杜布切克访问了苏联，但杜布切克一回国，捷共中央实际上就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出现了实际上的“新闻自由”，苏共中央似乎被这一措施触动了神经末梢。2月下旬，勃列日涅夫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首脑们都参加了捷共为庆祝1948年二月夺权20周年的庆祝活动，听了杜布切克的施政报告。庆祝活动之后，苏共、保共、德国统一社会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等代表团与杜布切克等捷共新领导，就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举行会谈。勃列日涅夫等虽然语气比较委婉，但几乎一致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出现很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言行，要求捷共中央“必须给反党言行以回击”；同时要求捷共领导层“确保团结和统一”。杜布切克和参加会谈的其他捷共领导人表示：捷共中央新领导能够控制住局势，不会让局势向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各党的首脑们并不放心。勃列日涅夫回国后，苏联国防部长、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格列奇科元帅曾向政治局提出：“罗马尼亚人想重新审议整个华沙条约。……如果罗马尼亚人想离开，华

沙条约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捷新闻界流露出针对华沙条约的批评，表明捷克斯洛伐克有可能步罗马尼亚人的后尘。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实际上取消华沙条约，或者至少大大削弱华沙条约国家的西部边界。”格列奇科的报告，增大了勃列日涅夫的疑虑。

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变化促使勃列日涅夫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等进行了紧张的磋商。1968年3月1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日益尖锐化的形势。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波诺马廖夫提出：应当由苏共中央政治局直接致函捷共中央主席团，“指出他们那里发生了报纸、广播、电视等的猖狂叫嚣，指出这一切的目的在于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苏联”。波诺马廖夫特别强调，信中应当明确地提醒捷共中央领导人：“他们是与联邦德国为邻的。……形势的确很严重。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和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形势非常相似。当年的匈牙利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根据波诺马廖夫的建议，政治局会议立即起草了致捷共中央的信。

勃列日涅夫在会上说：“对杜布切克的期望不要太大。他可能飞走，因为他控制不了正在发生的事件。”会议进行的过程中，勃列日涅夫还离开会议室，直接打电话给杜布切克，询问布拉格的局势，顺便告知苏共中央将致函捷共中央，关切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杜布切克在电话里保证：“无论在布拉格或者是全国其他地方，都不会发生任何类似波兰上演《先人祭》那样不好的事情。……波兰如果需要帮助，而我们能够对付我们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杜布切克实际上明确拒绝勃列日涅夫的“帮助”。杜布切克还请求：不要把苏共中央发给捷共中央的信函发给捷共中央，“因为这样做将使我的处境更坏”。勃列日涅

夫答应了杜布切克的请求，没有发出此信。从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来看，他对杜布切克的态度已发生了变化。他所说的“期望不要太大”包含有两层意思：杜布切克对苏联未必像原先想象的那么忠诚；杜布切克未必能掌握得住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

在这前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又发生大的变化，改革的势头不可阻挡，民族意识也高扬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舆论对经互会的发号施令、对向苏联的贷款和供货、对捷苏两国之间不是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摆脱苏联的“监护”。布拉迪斯拉发市捷国家银行行长埃夫任·洛布尔在2月20日的广播评论中提出一个爆炸性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还需要多久才能调整好在经济领域里同苏联的不平等关系？洛布尔1948年任捷外贸部第一副部长，1949年11月被诬陷下狱，并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1960年方获释。1963年，洛布尔出任布拉迪斯拉发国家银行行长，他关于捷苏贸易关系的评论具有权威性，具有震慑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力量。难怪斯姆尔科夫斯基接着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今后应该面向西欧。

3月中旬，苏共中央虽然作过努力，但仍然无法改变杜布切克改组意识形态、保安和内务系统领导的决心；眼看杜布切克将重组党、政领导班子。勃列日涅夫于3月21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勃列日涅夫宣布开会后，详细讲述了1968年以来苏共中央政治局与捷共中央主席团之间的关系。勃列日涅夫桩桩件件地列举与杜布切克接触的事实，以及杜布切克所作的承诺。勃列日涅夫说：“杜布切克保证，他们那里一切很平静，事态不会扩大到街头。”勃列日涅夫接着说：情况远不是那么回事，“群众集会、各种会议，都有着反苏的目的。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了，不是捷共中央，而是斯姆尔科夫斯基、希克和其他一些人在引导这些事件。显然，他们坚决，

或者至少早就决定最终要把诺沃提尼、列纳尔特、洛姆斯基等同志，以及其他一些苏联的忠实朋友拉下马”。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带有酸意地评价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工作。他说：“我认为，我们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同志个人的巨大功绩在于，我们平静地、自信地、同志式地、原则性地贯彻了一条从积极方面调整捷克斯洛伐克所有问题的路线。但是，这条路线显然没有贯彻始终。”讲到杜布切克，柯西金忿忿地说：“他（杜布切克）非常紊乱和失衡，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非常天真。如：有人问他，你们那里军队的情况怎样？他说：‘我们这里军队的情况一切正常，因为大部分师团的指挥官都是我的老相识’。当问到国家安全保卫部门的情况时，他同样回答：‘非常正常’。但是没过几天，内务部部长库德尔纳就被撤职。你问他，现在在主席团里你依靠谁？他回答道：‘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可以依靠谁。’他对诺沃提尼同志的态度，依我看简直令人痛恨。对我们来说，现在很清楚，当然已无力挽救诺沃提尼。……我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正在炮制当年的匈牙利方案^①，但是，目前他们还不敢实施这个方案。”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抱怨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将会对乌克兰局势产生负面影响。他说：“虽然我们的报纸不报道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情况，但是捷克事件却通过种种途径，在党内，乃至在国内不脛而走。”谢列斯特在列举了所有这类事实之后说：“问题涉及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命运，涉

① 柯西金说的“匈牙利方案”，指1956年10月24日，纳吉·伊姆雷（1896～1958）于1956年10月24日就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10月27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批准，把自10月23日以来发生的事件宣布为革命事件。10月29日，纳吉通过电台宣布取消一党制，恢复联合政府制度。柯西金把捷共的《行动纲领》看作就是“当年的匈牙利方案”。

及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我们必须更积极地寻找和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健康力量。这点，我们的机构尤应关心，应该更积极地做好这项工作。此外，在军事方面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谢列斯特的所谓“积极寻找和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健康力量”，无非是在捷共和捷其他机关中，扶持和组织亲苏人员，组成类似“第五纵队”的东西，以应急需。此外，谢列斯特还提出“在军事方面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这是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到要对捷采取军事措施。尽管3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并未就这个问题讨论下去，也并未就这个问题形成什么正式意见。当然，谢列斯特所说的“军事方面措施”未必就指武装占领，但是，仅就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另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本国人民的愿望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就提出要对其采取军事措施，已显现其社会霸权主义的蛮横面貌了。

谢列平主张采用各种方法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包括让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把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中苏联的方针告诉杜布切克，提醒杜布切克：“苏联是不会坐视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发展而不管的”。谢列平说：“杜布切克是个权宜人物。需要想想，下一步怎么办？”谢列平自问自答地说：加强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党组织、城市之间的直接联系，以便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广大阶层施加影响。“对于采取极端措施也应有所准备”，谢列平比谢列斯特更露骨地说。说到诺沃提尼，这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说：“是的，谁也救不了诺沃提尼。但是，只要诺沃提尼、列纳尔特、洛姆斯基在位一天，他们就应该在全会前请求我们帮助。他们应该向我们提出这个请求。我们的帮助会使所有的人，首先是我们的敌人清醒过来。”

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彼·尼·杰米契夫在发言中，把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政府成员分成三派：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科尔德——改革的爱好者；诺沃提尼、列纳尔特、瓦茨拉夫·戴维（外交部长，1968年4月辞职）——实际上已被摧毁者；斯姆尔科夫斯基、希克和其他人——复辟分子、彻头彻尾的敌人。杰米契夫接着说：“有人诬蔑我们干涉。我们不应该害怕。”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弗·安德罗波夫大将也说：“在军事方面也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无论如何也要研究一下。”这次政治局会议还决定，由苏共中央草拟一份向党的积极分子传达的《通报》，明确地向苏共党员解释“苏共中央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分析”。

与一个星期以前的政治局会议相比，3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基本分析已大大地变化了：首先，对杜布切克从“不能有太大的期望”到称之为“过渡人物”，要积极物色、组织“健康力量”取而代之；其次，提出要在军事方面也采取一些措施；再次，把斯姆尔科夫斯基、希克等改革派精英列为“复辟分子”、“彻头彻尾的敌人”。所以，3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是公开树起反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改革的大旗。

3月21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气氛也不像前几次那么平静，在谈到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时，政治局委员们情绪都很激动。最后，勃列日涅夫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使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领导人深为不安。日夫科夫、哥穆尔卡、卡达尔等同志都请求苏联共产党采取某些措施来调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但他们没有提出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为此，我们最近几乎天天在进行磋商。”

其实，杜布切克仍然是杜布切克。杜布切克对苏联、对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杜布切克从一上台就表明：维护和苏联的友谊、加强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高国际主义职责；华沙条约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杜布切克没有想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更不想离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而去。但是，杜布切克坚定地要走出斯大林体制的误区，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挣脱计划经济的枷锁，向市场靠拢，走“捷克斯洛伐克型社会主义道路”。对这方面，勃列日涅夫确是看走了眼。勃列日涅夫没有看到：杜布切克是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民族、民主精神的代表，他虽然有像圆舞曲般的柔和，但也有钢铁般的意志。

勃列日涅夫在3月21日政治局会议后，经与哥穆尔卡、卡达尔、乌布利希以及日夫科夫等商定，突然通知杜布切克、列纳尔特、比拉克、科尔德、切尔尼克等，于3月23日来民主德国东南部、易北河左岸的德累斯顿，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通知中规定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听取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汇报实现旨在贯彻捷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路线，以及贯彻捷共中央一月全会决议的情况”。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拒绝参加会议。实际情况是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卡达尔、乌布利希、日夫科夫等都对捷克一个多月来的局势发展极为震惊，他们想利用华沙条约这一工具对杜布切克施加集体的压力。会议开始后，勃列日涅夫面容冷峻地对杜布切克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纸、广播、电视等都不服党和政府的管辖，大众信息媒体大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被解除了职务，而他们之中80%的人是在莫斯科学习过的。”“该去执勤的军队不去执行任务，却去参加集会，军队也开始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历来推行的正确的外交政策也遭

到破坏。”勃列日涅夫愈说愈生气，最后质问杜布切克：苏共不理解捷共搞这些活动的想法，捷共究竟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何方？

会谈中，其他党的代表也跟着勃列日涅夫，说了很多和勃列日涅夫讲话的意思相同的话，有的语气更激烈。3月24日，苏、波、捷、匈、保、民主德国等党发表会谈公报，公报称：各党交流了情况和意见，坚信“捷克斯洛伐克将进一步发展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3月23日，就在华沙条约国家德累斯顿会谈举行的当天，苏共中央印发了《苏共中央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向党的积极分子的通报》。《通报》说：“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越来越引起党的工作者、共产党员和苏联大众的重视。因此，（苏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向党的机关发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简要通报。”通报列举自1967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频频发生：大学生打着反政府、反苏的标语游行；在作家代表大会上出现反对捷共政策的反对派；知识分子提出取消书刊检查制度，要求社会生活自由化；捷共党内和党外发生激烈争论，怀疑党的经济和科学文化政策，等等“令人担忧的事件”。尽管杜布切克一再表示能控制住局势，可是，事态却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通报指出：那些要求成立正式反对派、容忍各种反社会主义理论的言论日益增加；“提出关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相对应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强调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号召成立私人企业，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扩大同西方的联系”。《通报》尖锐地说：“不仅如此，一些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还不断宣传‘党与政府完全分开’；让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回到马萨里克和贝奈斯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去，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开放性社会”。

《通报》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尖锐局势不是孤立的，它是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和联邦德国力图煽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分裂，使党和人民、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工人和知识分子、老年人和年轻人、政治活动家和专家对立。“帝国主义集团不只限于进行宣传，而且企图积极影响事件的进程，使之朝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通报》最后说：苏共中央密切注视着捷克事件的发展，“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以及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兄弟党领导人保持着经常的接触”。

苏共中央 1968 年 3 月 23 日的《通报》，把捷共中央根据本国国情、走捷克斯洛伐克型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捕风捉影地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和平颠覆活动”联系在一起，并污蔑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中央“已无法控制局势”，说苏共中央正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一起，密切注视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发展”，这是向苏联全党和全国公开表明，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干涉捷国家和捷共的内政。

2. 处于包围圈中的杜布切克

自从杜布切克宣布进行改革，建设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国情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以后，他几乎就处于以苏联为首的“欧洲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包围之中，时刻被围攻。勃列日涅夫充当盟主把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引到这样的境地，确实是社会主义的悲哀。

前文已经提到，波兰在 1967 年就出现反对苏联干涉的民族呼喊，1968 年 1 月的《先人祭》演出事件酿成和苏联的外交纠纷，波兰民众高喊“杜布切克好！”这种喊声震惊了哥穆尔卡。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十分担心，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发展可能带动波兰的连锁反映，导致在波兰发生不测事件。哥穆尔卡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会成为“诺沃提尼第二”，因而对杜布切克持激烈的反对态度。1968年4月，捷共中央的《行动纲领》公布不久，他约见苏联驻华沙大使、曾经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阿·鲍·阿里斯托夫时说：“我们不能失去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将是个巨大的危险。如果我们失去捷克斯洛伐克，那么我们就可能随之失去诸如匈牙利、民主德国等。”哥穆尔卡要这位失势的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转告莫斯科“我们甚至应当进行武装干涉。我以前就有过这种想法。现在看来除了派遣包括波兰军队在内的华沙条约国的部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之外，别无他途。”

当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时，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就下令国内报刊：只刊登捷通社播发的关于捷共中央一月全会的新闻稿，以及由保加利亚通讯社撰写的杜布切克履历表；不得刊登来自捷通社的杜布切克简历和杜布切克的照片。保共中央发给杜布切克、祝贺他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贺电，保加利亚报刊在发表时，有意隐去日夫科夫的签名。3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舆论强烈要求诺沃提尼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面对这种形势，日夫科夫对保共中央说：“杜布切克同志是个意志软弱的领导人，未必能顶得住潮流。社会主义各国务应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以防止事态向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危险性的方向发展。”

华沙条约国家德累斯顿会谈后，3月29日保共中央召开全会，公然宣称：“保共中央坚决赞成在事态发展过程中，为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反动派可能需要采取的一切措施，包括必要时采取军事措施。”4月14日，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塔诺·洛佐大

约见苏联驻索非亚大使普扎诺夫时也表示：捷共领导人没有从德累斯顿会谈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如果情况像这样进一步发展下去，而我们又不采取必要的措施的话，捷克斯洛伐克的现领导人可能统统被从管理国家的岗位上赶下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卡达尔对捷共和杜布切克的改革比较理解，因为卡达尔自己也在小心翼翼地进行了改革试验。匈牙利报刊广泛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各方面改革，对杜布切克在几次中央全会和庆祝 1948 年二月夺权 20 周年大会上的发言，都详细报道。卡达尔本人还于 1968 年 1 月下旬和 2 月初，两次非正式访问布拉格，与捷共新领导建立联系，希望保持两国之间已有的友好睦邻关系。3 月 26 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科莫欣，在接受匈牙利电台和电视台的转播采访中说：目前捷共中央所进行的工作，目的在于消除党和社会生活中多年来积淀起来的困难和缺点；肃清个人崇拜的残余和清算违法乱纪行为；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解决经济困难；在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内，确保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民族的共同发展。所有这些做法，对匈牙利来说都十分重要。“我们赞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的基本意向”。科莫欣接着说：“按我们匈牙利的看法，事件基本上反映了正确的意向，但是也有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势力加入了这个事件。……依我看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力量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斗争：既要反对保守势力，也要反对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化的民族主义右派势力。”

在有关斯洛伐克民族的关系问题上，匈-捷两党也表现了理智和平等谅解的态度。1968 年 2、3 月间，斯洛伐克有些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极端分子曾指责匈牙利“强迫同化境内的斯洛伐克少数民族”。捷共新领导，包括比拉克等斯洛伐克共产党新领

导，立即表示不同意这种说法。匈牙利方面为了不使问题复杂化，也表现了克制的态度，即：不把个别人的说法看作是捷政府的态度。1968年3月29日，卡达尔在接见捷驻布达佩斯大使时说：“匈牙利境内的斯洛伐克族的情况是匈牙利的内部事务。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的是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同意将这个问题在报纸上公之于众的时候，应当考虑到它可能带来的后果。”4月18日，卡达尔在公众场合表示：理解和赞成捷共的《行动纲领》。

如果说东欧的华沙条约国家（除罗马尼亚外）对待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匈牙利算是比较客观和冷静的话，那么民主德国要算最为激烈反对的国家。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捷共领导缺乏明确的方向”；“如果需要，应当采取极端措施，以确保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成果”。

3月26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库·哈格在柏林举行的“纪念马克思诞生150周年学术讨论会”作总结发言时说：“西德的宣传中心在其掀起的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运动中，总是援引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他们不遗余力地引证林业和水利部部长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讲话。他们还详详细细地报道记者和作家对捷共的领导作用，对党中央委员会及其工作机关、政府领导人的攻击。他们公开表示对这些言论和事件的好感。……斯姆尔科夫斯基及其他人的一些讲话，使他们产生了捷克斯洛伐克掉进如施普林格新闻社所说的‘演变漩涡’的奢望。”民主德国报刊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哈格的讲话，显然是有意向捷共挑战。捷认为，哈格的讲话是“干涉捷内政”，捷政府向民主德国提出强烈抗议。民主德国就耍赖，倒打一耙，说

是“捷通社歪曲哈格同志的讲话。请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注意这一事实，相应地公开纠正错误”。捷政府拒绝民主德国政府的这一纠缠，坚持要求民主德国政府公开声明，不同意哈格的讲话。民主德国政府对此不予答理，两党、两国之间的这个“结”也越打越紧。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各党在苏共带领下对杜布切克的围困，使杜布切克不能不有所顾忌，增加了改革的困难，杜布切克面临左右两方面的压力。4月12日，杜布切克在捷共中央主席团下面设立了旨在规划重大经济决策的经济委员会，制定和贯彻《行动纲领》中提出的经济改革。已被任命为政府副总理的希克希望推出实行工业管理分权，建立竞争的市场机制，放开有控制的私人企业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在经济领域尽快将《行动纲领》付诸实施。在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不仅分散了杜布切克的精力，也使杜布切克放慢了行动的节拍。杜布切克任命卢·什特劳加尔为经济委员会主席，希克只是其中一名普通委员。这样，希克的抱负始终只是一种愿望。

4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了满足工业部门提出的、更换陈旧的工业设备的要求，准备从西欧国家购买价值4亿美元的设备，但苦于缺乏硬通货。捷政府先是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以硬通货偿还某些欠款，遭苏联拒绝。随后，捷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欧的一个财团提出贷款申请。当西方的报纸透露了这一消息之后，被苏联认为是捷对经互会的一种背弃行为，以致捷财政部不得不在4月17日加以公开否认。4月18日，捷共中央主席团指示新任的切尔尼克总理，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之间建立互利的双边经济合作关系”提出方案。杜布切克急于摆脱传统的、由捷向苏联提供设备和原材料，而苏联只用卢布支付的对苏联单方有利的外贸局面。切尔尼克在

这个棘手问题面前暂时拿不出具体办法，这也阻碍了经济改革的启动。

杜布切克真正做的工作，实际上只有平反昭雪工作这一项。当然，为过去年代的大清洗以及后来无辜受害的人伸张正义，也是《行动纲领》的要点之一。4月25日，捷共中央建议在党内和在政治上为兹德涅克·海兹拉尔彻底平反。海兹拉尔生于1921年7月18日，1939年加入捷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德国法西斯占领军关入集中营，1946年任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联盟主席、国民议会主席团委员、民族阵线中央行动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捷共中央委员。1952年10月，海兹拉尔因受诬陷被开除出党，送往卡尔温矿井的强迫劳动营改造。1955年，虽然被解除强迫劳动，但是诺沃提尼仍然拒绝为其平反昭雪，仍让他在奥斯特拉发当矿工，随后又在奥斯特拉发轧钢厂当工人、教师。1964年，在舆论的压力下，诺沃提尼让海兹拉尔担任奥斯特拉发实验学校校长。1968年4月，捷共中央宣布恢复海兹拉尔的党籍，任命他为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广播电台台长、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议会主席团委员。

在为海兹拉尔彻底平反的同时，新任的捷克斯洛伐克最高法院院长B·博切克将军下令复审“巴拉克案件”。

鲁道夫·巴拉克生于1914年5月11日，1945年加入捷共，在布尔诺的郊区党组织担任工作。1952年，巴拉克跳跃式地被选为捷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年被任命为内务部长的要职，1954年又升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政府副总理。1962年2月被捕并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1968年4月，经复审后释放了巴拉克。至此，捷最终释放了所有过去年代被关押的重要人物。

4月29日，共和国总统斯沃博达举行正式的仪式，将社会

主义勋章和一级2月25日勋章归还给斯兰斯基的家属，将一级2月25日勋章归还给奥托·什林的家属，以表达对无辜受害者的一种告慰。什林生于1912年8月24日，1934年加入捷共，曾作为国际纵队的成员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是斯洛伐克民族大起义的参加者。1945年任捷共布尔诺州委第一书记，1952年12月3日和斯兰斯基一起被处决。1963年诺沃提尼虽然在法律上为他恢复名誉，但仍拒绝恢复他的党籍。斯沃博达的仪式是为斯兰斯基和什林彻底平反。

5月1日，在国际劳动节的庄严节日里，共和国总统斯沃博达追授克里门第斯和约瑟夫·弗兰克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英雄的最高荣誉称号。弗兰克生于1909年2月25日，1930年加入捷共。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占领后，弗兰克由于参加反法西斯的地下抵抗运动，于1939年被捕，监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到1945年才获释。1946年，弗兰克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委员；1949年5月任捷共中央副书记。1952年12月3日和斯兰斯基一起被处决。

此外，斯沃博达总统还追授原共和国总统办公室国民经济科科长卢德维克·弗雷伊卡、原外贸部副部长鲁道夫·马尔戈利乌斯、原《红色权利报》对外政策评论员安德列·西莫纳、原国家安全部保卫局局长奥斯瓦尔德·扎沃德斯基等无辜受害者共和国勋章。弗雷伊卡、马尔戈利乌斯、西莫纳都是1952年12月3日与斯兰斯基一起被处决；扎沃德斯基是1954年最高法院已明确认定他无罪时，仍被诺沃提尼决定执行枪决的。

杜布切克的平反昭雪工作也使党内外一部分人从另一侧面提出更为激烈的要求，从而给杜布切克的改革增添新的麻烦。

4月2日，伊·斯维塔克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说是发现了新的证据，表明扬·马萨里克不是自杀，而是被谋杀

的。文章还要求就马萨里克的死因“调查核实”。文章虽然没有具体说明“新的证据”是些什么，但是，提出马萨里克是被“谋杀”等于在当时已经遍布爆炸因素的社会中，扔出一颗炸弹。第二天，4月3日，最高检察院立即组成以调查科长伊·科特拉尔为首的调查组，就马萨里克之死进行调查。4月16日，《红色权利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贝利亚卫队”是否在马萨里克之死中起过什么作用？文章还以挖苦的口吻，请求“我们的苏联朋友”在弄清马萨里克神秘之死的情况方面提供协助。

也是在这前后，捷国防部机关报《人民防御报》刊登新任军事检察长米·里赫特的文章，内中更明白地说：应该坦率地说，最严重的罪恶昭彰的破坏法制行为并非我国的产物，而是贝利亚的“长臂”直接造成的。

4月下旬，新闻界出现了这样的呼声：“清洗捷共内部参与镇压的人”，“清洗苏联的贝利亚走狗”！4月26日，在布拉格的捷克斯洛伐克军人之家，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戈尔德斯图克向到会的听众发表演说。他尖锐地批评了1948年2月夺权以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整个发展道路，强调当前的改革是要“创建全新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戈尔德斯图克还把当前的改革归结为两个字——自由。作家协会的普罗哈斯卡，在补充戈尔德斯图克的发言时说：不久以前，国防部副部长扬科上将的自杀“是一个正直人的行为”。接着，他戏谑地说：“当然，我不是建议要把整个总参谋部的人都枪毙。”

这类言论引来两个消极的后果。

其一是使参与过大清洗的干部人人自危，出现了一连串的自杀事件。3月28日最高法院副院长约·布雷什捷斯基“失踪”，4月2日发现他的尸体挂在布拉格以南巴比采村的树林中，捷政府宣布是“自杀”（上吊）。4月26日，曾经在1951～1952年任

鲁津监狱医官的约·索麦尔，在布拉格自己的寓所里自杀。第二天，4月27日，布拉格市公安处侦查科科长伊·波切皮茨基中校在玛丽亚矿泉疗养地附近的树林中开枪自杀。

自杀的枪声是向改革发出的危险讯号，是和“布拉格之春”不和谐的刺耳音符。

对于不堪回首的大清洗，人们所流露的激愤之情，从感情上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像大清洗这样的事情，毕竟要从政治体制上去认识。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恐怕只能让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来负，较难追究具体执行者的责任。大清洗实际上是体制性和时代性的悲剧。1956年，乌尔瓦列克和阿列什被问到为什么要把明知无罪的人送向死亡和监狱时的回答，一方面，这是基本的，说明他们这种共产党高级干部灵魂丑恶；另一方面，他们讲的是实话。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不要说是当不成官，恐怕自己也要进监狱，而且“党”也会调另外的人来执行。

此外，像大清洗这样的运动是延续很长时间、层层进行的。那种年代的干部，特别是上层干部，如果不是被“清”，恐怕也要“清”别人；既不被“清”，又不“清”人，和大清洗不沾边的官员，就比较少了。因此，对于参与过大清洗或者牵连大清洗的官员，只要不是昧着天良、眼睛发红地乱咬人，只能“思想教育为主”了。反之，如果像捷克斯洛伐克舆论提出的“清洗捷共内部参与镇压的人”，不仅“清洗”不清，肯定会给这一工作增加无限的阻力，从而使整个改革工作进行不下去。因此，这一工作应着眼于平反昭雪，而不是追究责任。这点，杜布切克是清醒的。但是，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杜布切克耗费了大量精力并且流逝了时光。

其二是这类言论明显地刺激了苏联，客观上为苏联的干涉

提供把柄。像“马萨里克之死”这类敏感的问题，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就乱捅马蜂窝，不仅无助于澄清事件真相，只能给改革增添困难。苏联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些舆论是要搞垮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政治制度、威胁所有的党政精英。

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以武装赶走了梯也尔政府，占领了巴黎。3月28日成立了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将政权移交给经过民众选出来的公社代表。巴黎公社成立仅仅5天，4月2日，梯也尔政府的军队就开始围攻巴黎，直到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被杀害。从3月18日到5月28日的72天中，巴黎几乎一直处于被包围和战争的状态中。所以，尽管公社颁布了那么多的法令，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真正执行过，也没有时间和条件去执行。杜布切克当政8个月，他也是被围困、被围攻的；他也一直处于内外和左右的夹击之中，他也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型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最后说：“现在，我们正面临着非同寻常的形势。我们将进行试验，赋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运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而要以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发展的正确理解为基础。我们的国家对国际共运是负有责任的，它有责任总结和利用自己较先进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高的教育水平和优良的民主传统。如果我们不利用这些条件，我们将无以面对历史。”杜布切克实际上也空有抱负，真正付诸政策实践的很少。

3. 杜布切克与苏共的周旋

1968年，勃列日涅夫一方面反对杜布切克在捷克斯洛伐

克进行的改革，另一方面也是鉴于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和青年学生的反抗思想，特别提出了“强化思想工作”的方针。根据几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3月29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市第19次党代表大会上讲话，把“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作为“帝国主义企图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的主要倾向来反对。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说：帝国主义者“所指望的主要是民族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简单地说，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是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战线。在这一斗争中，不可能抱着政治上漠不关心的态度和消极态度，不可能对敌人提出的目标抱中立态度。我们党一向告诫说，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可能和平共处，正如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能有阶级和平一样。”^① 1968年4月9、10日两天，苏共中央举行全会。在这次全会上，勃列日涅夫作题为《国际形势中的迫切问题和苏联共产党为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详细地评论了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局势，表示“我们党将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防上的不断加强而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这次中央全会，表示苏联在它感到“社会主义大家庭受到威胁”的时候，对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权进行武装干涉。勃列日涅夫在公开讲话中也毫不掩饰地针对捷克斯洛伐克要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说：“尽管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有各式各样的形式，有各种民族特点”，然而，社会主义的共同基础就是苏联的经验，是始终不变的。“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4集，第52页。

态度”。^①

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已是一副霸主的口吻了，勃列日涅夫也确实把苏联推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

苏联作为 20 世纪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经历了一个从创建、巩固到发展、强盛，再从盛极而衰到解体的过程。综观从 1917 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的 74 年的历史，其间，列宁时期是苏联的创建时期，斯大林时期是苏联奠定 20 世纪大国基础的阶段，赫鲁晓夫时期是苏联走向世界的阶段。勃列日涅夫当政达 18 年之久，是苏联盛极而衰的阶段，是苏联从创建到解体这一历史全过程中的转折时期。

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之后，凭借积聚起来的经济实力在全世界展开外交攻势。勃列日涅夫把拥有强大的军备和核威慑力量看作是推行强权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把取得军事优势作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1965 年的军费支出为 326 亿卢布，1981 年增加到 1550 亿卢布，15 年间增长 3.75 倍，占全国财政支出的 1/3。^② 1966~1969 年的三年间，苏联在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的数量，从占美国的 1/3 增加到同美国相当，随后几年又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苏联军事实力、特别是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的增长确立了苏联的世界超级大国地位。

勃列日涅夫争霸世界还要有一种推行强权外交的“理论”，这种“理论”就是“勃列日涅夫主义”。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到 60 年代后期，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利益有关

①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 4 集，第 75 页

② 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第 1 版第 2 次印刷，第 64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9 月

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等理论，通称“勃列日涅夫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基本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尤其是针对囊括东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根据这种理论，除苏联以外，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都是有限的，苏联的主权在“大家庭”里是无限的；谁要想变革斯大林模式，建设本国式社会主义，走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道路，苏联就有权进行干涉，直至出动军队实行“国际专政”，这是苏联的“大国特殊责任”。勃列日涅夫不能容忍杜布切克的改革。

1968年4月12日，苏联《真理报》报道了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的消息。但在同一天的《真理报》上还刊出了一篇长文，专门论述保卫思想的纯洁性和警惕修正主义危险。4月，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苏联元帅雅库鲍夫斯基两次来到布拉格，提出：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要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军事演习”。直到5月4日，捷国防部长楚尔才公开表示：雅库鲍夫斯基元帅确曾建议“在最短期间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土上举行包括苏军在内的华沙条约各国军队的联合演习”。楚尔解释说：演习的规模还没有完全确定，很可能只是一种“参谋演习”。

4月，从总的形势来说，杜布切克已感觉到来自苏联的愈来愈大的压力了。4月19日，《红色权利报》发表题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的社论，表明坚持改革的决心。社论强调：“世界上不存在包罗万象的、为所有人满意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以把它成功地应用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具体条件中去。”“机械地照搬苏联的做法会大大地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①捷、苏双方的关系已愈来愈紧张了。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苏联通知捷共中央领导来莫斯科谈判。

^① 见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526页。

5月3日晚，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比拉克等捷共中央领导，应苏共中央的邀请飞赴莫斯科。杜布切克等对这次访苏的期望是希望求得苏联的经济援助和贷款。苏共中央的基本决策是对捷共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苏共中央参加会谈的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鲁萨科夫等主要领导人。会谈中，勃列日涅夫首先提出：“捷克斯洛伐克政局发展已经超出了纯内政的范围，它牵涉到兄弟国家，如苏联。”勃列日涅夫认为，苏共“关心”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双方的争辩十分激烈。苏方对捷方提出的经济要求不作正面回答，而是强烈谴责捷方的大众宣传媒体愈来愈露骨地进行反苏和反社会主义宣传；大学生肆无忌惮地举行反苏示威，捷共中央对这些现象竟然不闻不问。苏共中央对捷共中央《行动纲领》提出要走“独特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实现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等目标表示“极不理解”，责问捷共中央“要复兴什么？”“究竟要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何方？”苏共中央还提出：五月份将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的军事演习问题。

杜布切克等对苏共中央的责难予以否认，坚持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是正常的，完全在捷共中央的有效控制之下；捷克斯洛伐克始终是华沙条约的一员。切尔尼克提出：请求苏联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价值5亿美元的黄金贷款。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会谈中，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批判大清洗运动，阐明捷克斯洛伐克正在进行的、为在大清洗年代受到无端迫害的人平反昭雪，是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行动纲领》的重要内容。苏方对斯姆尔科夫斯基虽然恨之人骨，但对他有根有据、义正辞严的讲话，却也无言以对。

比拉克的发言实际上是迎合了苏方的需要。比拉克甚至说：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发展确实威胁到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成果；目前，一些非共产主义政党居然趾高气扬。

苏、捷双方的第一次会谈持续了9个小时，实际上是激烈争辩了9个小时，双方的距离越来越大。双方正式会谈以后，波德戈尔内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还另外会见了捷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会见中，波德戈尔内诘问斯姆尔科夫斯基：“你已经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未经捷共中央和捷政府批准的政党，包括一些俱乐部^①。你怎么能够容忍呢？”斯姆尔科夫斯基回答：“关于出现一些政党的情况，一个月前就知道了；有关俱乐部的情况，一个星期前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有自身的很大特色，存在着许多特点。当然，捷共中央和政府会整顿秩序的，捷共中央主席团会控制新闻界。”^②

捷党政代表团对莫斯科的36小时访问没有什么结果。发表的会谈公报只是冷淡地说：会谈是在“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杜布切克返回布拉格后，向《红色权利报》发表了一篇谈话，回答关心局势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众。杜布切克说：在莫斯科我们同苏共中央领导同志讨论了经济问题；至于政治方面，“我们解释了我们是如何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作为领导力量的共产党而努力的。我们的苏联朋友们以谅解的心情听

① 指“231俱乐部”。“231俱乐部”于1968年3月31日，经捷克内务部批准宣告成立，属一般群众性结社，其成员基本上是大清洗中受迫害而幸存下来的人。该俱乐部的基本主张是：按照捷克刑法第231条，对那些专搞迫害人的人处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予以惩处。

② 见〔俄〕皮霍扬：《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载《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5、6期（俄文）

取了我们的解释”。杜布切克接着说：苏联领导人表示相信，“得到绝大多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能够顺利实现它的目标。在好朋友之间通常不会用客客气气的外交词令，而是互相平等地、开诚布公地进行交谈。本着这种精神，苏联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担心我国的民主化过程会被人利用来反对社会主义。必须指出，从一月中央全会以来我们党经常强调指出，它根本不同意那些反社会主义的过火行为，而且把坚决反对这种过火行为看作自己政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① 杜布切克的讲话等于承认：经济会谈毫无结果；政治会谈双方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杜布切克的讲话，实际上是使布拉格人的疑虑得到了证实。

5月6日，苏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以通报5月4日与捷共代表团会谈为中心，研究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勃列日涅夫向政治局通报与捷共代表团会谈的情况时说：“当你回想起与杜布切克同志的第一次谈话后，包括与杜布切克在布拉格的谈话，以及我们两党之间的历次谈话，他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嘴上说的是一回事，而行动上绝对是另一回事，虽然他说话时总是闪烁其词，且不具体。”勃列日涅夫为了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理，特别举例说：“杜布切克曾向我保证，将留用原来的干部。但实际上怎么样呢？杜布切克自下而上，撤换了所有干部。”勃列日涅夫忿忿地说：“杜布切克使捷共成了一个群龙无首的党。”勃列日涅夫还激烈地抨击了《行动纲领》，说：“我觉得，我们取得了一致，这是一个不好的纲领，它（指《行动纲领》——作者）开辟了资本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复辟的可能性，当然它是用各种词藻来掩饰的。”勃列日涅夫认为《行动纲领》是“复

^①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449页

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大暴露”。勃列日涅夫抑制不住愤恨地说：“斯姆尔科夫斯基虽然说话不多，但看得出，他是捷共政局中的重要、得力的人物。从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讲话中听得出，他是那么心安理得。不能指望他会提出什么好建议。”谈到切尔尼克，勃列日涅夫说：“切尔尼克的讲话既混乱，又充满空洞的允诺。”勃列日涅夫最后说：“今天，在军事会议上我们也研究了这些问题，讨论了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所采取的实际措施的具体计划。”

柯西金在勃列日涅夫讲话之后说：“捷共领导正在进行恢复名誉的工作。捷共领导这样做的真实意图在于把哥特瓦尔德和萨波托斯基搞臭，说他们的双手沾满了鲜血，而这一切都是与苏共合谋的。然后，他们（指杜布切克等捷共新领导——作者）想踢开捷共另组新的党，另组一个资产阶级党，另建资产阶级秩序。”谈到捷克斯洛伐克要求提供5亿美元的黄金贷款，柯西金说：“这是一种挑衅。他们明知道我们会拒绝这种要求，明知道我们是不会借给他们的。他们是想捞一把。”

在波德戈尔内通报了与斯姆尔科夫斯基的会谈情况之后，勃列日涅夫又第二次讲话。勃列日涅夫坚决地说：“必须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作为对捷共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勃列日涅夫说：当然，在演习的过程中，军队调动会引起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界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抗议。勃列日涅夫恶狠狠地说：“那有什么？这又不是第一次。正是这样，我们才能保住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正是这样，让每个人都要想一想，跟我们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勃列日涅夫还把捷共中央的领导人，以对苏的态度为中心点划分“健康力量”的“类”：第一类是英德拉等；第二类是科尔德等；第三类是比拉克等；萨多夫斯基被划为第四类；第五类是切尔尼克等“最不

健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政治局委员、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支持勃列日涅夫的讲话，说：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反革命分子逍遥起来了，说好听点，是第二个罗马尼亚；实际上，将会是华沙条约的彻底完蛋。”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说得更干脆，他提出：应当放开手脚地行动。另一名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利扬斯基担心：“如果一旦在捷共中央全会上解除杜布切克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可能会变得更糟。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调动华沙条约国的军队。”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谢列平认为：确有必要调动华沙条约国的军队，为此，应当尽可能快地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军事演习；还有必要把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们和政府首脑们召集到莫斯科来协调行动。5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还形成两点意见：决定由谢列斯特加强与比拉克的联系，以争取“健康力量”；在莫斯科召集除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以外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党、政领导人会议。

5月8日，苏共中央背着捷克斯洛伐克，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保加利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日夫科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卡达尔，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哥穆尔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乌布利希召集到莫斯科，举行“高级会谈”，“协商集体制裁捷共”的问题。会上，哥穆尔卡和乌布利希力主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及时的警察行动”，以便在“杜布切克这个毒瘤还没有扩散之前就予以切除”。日夫科夫也紧随苏共之后，表示支持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他说“保加利亚可以派出一支象征性的部队，这支部队可以经过黑海

运抵苏联（保加利亚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没有共同边界——作者），随苏军行动。”

卡达尔不赞成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措施，也反对由经互会出面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经济制裁。他坚持说：“应该为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找到一种政治解决的办法。”卡达尔的态度使勃列日涅夫不得不有所顾忌。苏联原打算通过这次会谈，由华沙条约和经互会出面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干预和经济制裁的强硬措施。鉴于卡达尔的反对，勃列日涅夫只好声明：这次会晤“仅仅是交换意见，目的是寻找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度过危机的更好途径”。

这次背着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华沙条约国“协商会议”，表明了勃列日涅夫口口声声的“大家庭友好合作”，不过是对别国内政的赤裸裸干涉；华沙条约组织只是苏联手中的控制东欧各国的工具。这次华沙条约国背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协商会议”还表明，勃列日涅夫已把以华沙条约的名义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提上议事日程。从这次会议以后，莫斯科就对布拉格展开了“坦克心理战”。

5月9日是苏军从德国法西斯占领军下解放布拉格23周年纪念日。布拉格的各机关大厦都挂起了红旗和条幅，感谢苏军为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所做出的国际主义牺牲。捷共中央也希望以节日的庆祝气氛缓和一下与莫斯科的紧张关系。5月10日，斯沃博达总统在布拉格郊外30英里的山村口普，向在那里集会庆祝的民众说：“我们的目的是实行民主的复兴。”

5月10日，杜布切克得悉有关苏共背着捷共召集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其他首脑在莫斯科会晤的消息。当天，华沙条约驻布拉格的联络官还通知捷国防部：“波兰等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正在调动”，以实现预定的“军事演习”。10日当天，捷通社只

好发表一则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外交记者从消息灵通人士处获悉，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曾事先得到关于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在波兰南部进行正常调动的消息。”5月11日，《红色权利报》发表了一篇旁敲侧击的文章，希望这次莫斯科会议的“参加者没有提出‘开除’捷克斯洛伐克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问题”。

在这前后，民主德国、波兰、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在报纸上展开了聋哑人式的相互批判。5月13日，布拉格电台在一则国际时事节目中评论说：苏联、民德、波兰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攻击“是如此骇人听闻，以致对这一套颇为熟悉的人也为之瞠目结舌。……我们从亲身体验中知道，少数几个人用什么方法和诡计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世界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代表。近20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明白，没有民主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①

5月13日，《红色权利报》发表题为《远离莫斯科吗？》的文章，驳斥苏联及东欧其他国家报刊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指责。文章说：1948年以后，捷克“盲目仿效苏联的全部东西，而践踏了民族的、政治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本国特点”。长期以来，捷苏关系是一种“主从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文章呼吁捷苏之间“现在既要寻求共同点；也要理解不同点，要互相宽容”。^②

当天，《红色权利报》还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红色权利报》让读者回答20个问题，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化是否为实现民主提供了充分保证？

① 见《“布拉格之春”前后》，第464页。

② 见《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527·528页。

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是我国的内政，是不是必须由我国人民的独立意志来决定？等问题。

5月14日，捷政府总理切尔尼克在布拉格安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阐明正在修改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宪法和选举法的一些问题。副总理希克和胡萨克也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切尔尼克向记者们宣布：建立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的新宪法正在草拟之中；政府的指导原则是强调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准备通过一个保障新闻报道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新法律。切尔尼克也希望“消除东西方国家间的障碍，寻求合作”。希克在讲话中向记者们宣布：政府将进一步实行经济权力下放，使企业拥有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竞争的能力。

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些举动是向苏联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复兴社会主义的努力”是绝对不会停步的。

4. 勃列日涅夫还未下最后决心

5月，就捷克斯洛伐克来说，自从《行动纲领》公布以来，社会的基本矛盾已从国内的改革与阻止改革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的矛盾，转化为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要求摆脱苏联控制与苏联力图加强控制的矛盾，这对矛盾而且愈来愈激化。就苏联来说，也已看清，捷克斯洛伐克坚持改革的决心是难以撼动的，捷克斯洛伐克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决心是无法改变的。勃列日涅夫与东欧其他各国首脑频频会晤，其中多数主张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措施，但卡达尔持不同的主张，他甚至反对经互会国家采取统一行动制裁捷克斯洛伐克。

苏共中央内部仇视捷克改革，主张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坚

决、有力的措施，予以制止，绝不能坐视捷共“离经叛道”，在这方面基本立场和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但是，是否立即采取极端的军事手段，是否立即出动军队？包括如何估计、组织、使用捷共内部的“健康力量”，却有不同意见。即使在对杜布切克的估计上，苏共中央内部也有差别。因此，即使苏共中央内部对捷采取军事干预的呼声很高，哥穆尔卡、乌布利希也推波助澜和怂恿苏联出兵，勃列日涅夫尚难下最后的决心。

5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柯西金的出访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柯西金访捷期间需要不需要会见杜布切克？这个问题，表面看似乎是属于礼宾问题，实际上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是：柯西金值不值得会见杜布切克？也即是：杜布切克作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在政治上还值不值得信赖？这个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没能取得一致意见。柯西金访问捷克期间虽然与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多次举行会谈，但在外交礼节的安排上，柯西金只正式拜会斯沃博达总统，没有拜会杜布切克，这样的安排同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分歧是符合的。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即：怎样估计捷共内部的“健康力量”？哪些人属于“健康力量”？他们能有多大的能力？这个问题，同样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勃列日涅夫认为，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列纳尔特等，都属于捷共中央内部可以依靠的“健康力量”。但是，波德戈尔内对把比拉克等作为可依靠的“健康力量”表示怀疑。波德戈尔内说：“我们把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作为健康力量、健康力量的核心。可是，瞧瞧这些人吧！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在最近的会议上是怎样评价杜布切克的讲话的？他们居然赞扬杜布切克的讲话很好。我不打算说他们的说话是不对的，也许他们

的处境使他们必须这样说。”

杰米契夫附和波德戈尔内的意见。杰米契夫说，他不喜欢“健康力量核心”这个词，“比拉克、科尔德，包括英德拉，一直主张建设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反对我们的路线。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解决问题。”杰米契夫虽然也承认，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等和比拉克、英德拉之间存在差别，但他不认为由于这点差别，就可以把比拉克等称作“健康力量”，更不认为比拉克等能在阻止或变更捷共在贯彻《行动纲领》方面有所作为。

这次出访的主角柯西金是老谋深算的苏联政坛元老。他同意其他人对杜布切克的极低评价，认为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等人，不管是否称他们为“健康力量”，但他们之间确有着共同的、一致的地方，“问题在于：他们有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这大概只有通过和他们的接触、通过和他们交谈才能弄清楚”。柯西金的意思很清楚：苏联应当知道鼓动，不管称他们为什么名称，只要他们是亲苏、反对杜布切克改革的，就让他们拿出“具体行动”来。柯西金说：“如果这些健康力量真的有自己的力量，那么就可以与他们一起开展工作。比如，他们如果能控制工人武装队伍，如果能把工人武装队伍拉上布拉格街头，这倒真是一支力量。如果他们感觉到我们在支持，就能给他们以令人鼓舞的印象。”

这次政治局会议自然也谈到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的军事演习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局的意见认为必须进行；但是，当问题深入到军事演习的目的和预期达到什么结果时，政治局委员之间又有不同看法。柯西金说：“好，我们调动军队。但是，下一步怎么办？我们自己也不明确。因此，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按柯西金的意见，举行军事演习的目的和意图在于“动

用一切手段吓唬一下杜布切克”。说到底，分歧是在于柯西金不赞成用军事干涉的手段直接解决问题。但是不管怎样，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军事演习，政治局是一致的。

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如何坚决、有效地干预捷克斯洛伐克政局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勃列日涅夫难下最后的决断：一方面是勃列日涅夫自己觉得，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发展还需要再看一看，武装干涉的时机尚不成熟；另一方面也和苏联驻捷大使馆对捷政局估计存在分歧有关。

苏联驻捷大使馆对捷政局看法的分歧，从《真理报》编委会委员、《真理报》社会主义国家部编辑卢科韦茨给《真理报》总编齐米亚宁的报告中，即可看得清清楚楚。

1968年5月17-19日，卢科韦茨受《真理报》编辑部的委托，就涉及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一篇文章，前往布拉格征求苏联驻捷大使馆对文章的意见。卢科韦茨在布拉格的3天，会见了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以及公使衔参赞乌达利佐夫、使馆参赞普拉索洛夫等使馆的官员，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卢科韦茨发现，他们对捷局势的看法，包括对杜布切克的认识以及苏联应采取的对策，都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甚至是对立的。卢科韦茨觉得这一情况非同一般，回国后立即将他所了解到的驻捷大使馆在对捷局势看法上的分歧，加以归纳、整理，上报《真理报》总编齐米亚宁。齐米亚宁看完报告，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立即将卢科韦茨的报告，转呈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杰米契夫。

卢科韦茨在报告中说，分歧主要是在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和苏联驻捷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乌达利佐夫之间产生的。契尔沃年科认为，对捷发生的事件和判断必须客观地对待。契尔

沃年科对卢科韦茨说：“在目前形成的条件下，我们应当想方设法加强同捷共中央现领导人的联系。”契尔沃年科指出：目前捷局势十分复杂，各种言论都有，但是，“不要把捷共的领导路线同个别人士的言论，尤其是党外人士的言论混淆起来。应当千方百计地根据现实情况，促进苏捷关系的发展”。

乌达利佐夫的看法几乎和契尔沃年科的意见相反。他认为，“对捷国内发生的一切，直到捷共中央的路线，都必须进行最尖锐的批评。”当契尔沃年科不在场时，乌达利佐夫对卢科韦茨说：“我们无法把杜布切克提高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水平。”

5月18日，布拉格发生了约3万名大学生参加的集会游行。游行所打的标语和口号，除了要求扩大民主化、推进改革等国内问题之外，还有要求独立自主、反对捷苏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口号，其中有一条醒目的标语：“柯西金，让我们来给你治病！”这条标语十分刺激苏联人。显然，这类口号是和5月17日晚柯西金抵达布拉格访问有关的。

乌达利佐夫当着大使的面、在全使馆人员面前，要求把这一情况报告苏共中央，并且断言：“游行是捷共中央有意安排、组织的；必须立即向捷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实际上，大学生游行的第二天，即5月19日，《红色权利报》就发表文章严肃批评大学生游行和打出反苏标语，指责大学生的行为是青年人“不成熟、不知分寸、不懂礼貌”的错误行为；游行的口号和标语“没有反映现实情况”。可见捷共中央和捷政府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已经立即谴责了大学生的不负责任行为。此外，对大学生们的这类行为也是个逐步教育的问题。大学生的游行和反苏口号是大学生宣泄民族情绪的自发行为，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行为。乌达利佐夫的这种态度和做法使契尔沃年科十分难堪，被认为是对契尔沃年科的“有意挑衅”。

驻布拉格的苏联记者还向卢科韦茨反映：“乌达利佐夫几乎只同原先接近诺沃提尼的人接触，这一情况已经引起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注意。”驻布拉格的苏联记者对卢科韦茨说：“乌达利佐夫对捷共中央现领导根本上持的是否定态度。他总是凭自己的主观看法去判断事态。他只和原诺沃提尼左右的人接触的情况，连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红色权利报》主编什维斯特卡同志在同我交谈中也提到了。”^①

从卢科韦茨的报告中看，除了反映乌达利佐夫不把大使契尔沃年科放在眼里的傲慢态度之外，反映的是苏联驻捷大使馆内部对捷局势的看法，包括对杜布切克等捷共领导人的看法，存在着分歧和对立。当然，他们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但是这些具体看法上的分歧和对立直接影响到苏联的决策。乌达利佐夫之所以如此目空一切、有意歪曲情况、寻找事端，说穿了是在为对捷采取军事行动，制造伊索寓言中所说的“狼吃小羊”之类的借口。乌达利佐夫的态度和主张正是反映了苏共中央政治局、苏军最高决策圈里一部分人的主张。所有这些情况使得勃列日涅夫难以作出最终决断。

5月17日中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抵达布拉格。苏联军事代表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安排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的华沙条约武装演习事宜，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雅库鲍夫斯基元帅、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等8名苏军高级将领。

苏联军事代表团抵达布拉格机场时，一名布拉格电视台的女记者杜·哈弗利奇科娃把话筒举到叶皮谢夫面前问：“据最近

① 《卢科韦茨就苏联驻捷克大使馆对局势的估计，给齐米亚宁的公务报告》
1968年5月20日，载《祖国档案》1993年第3期（俄文）。

巴黎一家报纸报道，将军在4月25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只要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成员提出要求，苏联军队就可以随时采取行动。请问将军是否确实有此提议？”哈弗利奇科娃这个问题提得既尖锐又直接。叶皮谢夫大概没有料到记者会这样提出问题，但是又不便发作，难堪的沉默之后，强做了一个笑脸，用俄语说“这是一件蠢事！”叶皮谢夫没有正面回答哈弗利奇科娃的问题，而且“这是一件蠢事”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提这种建议是一件蠢事；也可以理解为，这样做是一件蠢事。其实，叶皮谢夫没有驳斥“巴黎报纸造谣”，这已经默认了确有此事。布拉格电视台当晚7时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实况录像。这使布拉格人增加了疑虑，也激化了捷人民的情绪。格列奇科率苏联军事代表团来到布拉格，表面上是安排华沙条约武装部队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并不排除为军事干预作先期准备的因素。格列奇科回国后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中提到：“在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楚尔举行欢迎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招待会上，出席招待会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科尔德私下对他们说，‘快派军队来吧’。”格列奇科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把科尔德的态度看作“是某种政治倾向的表现”。这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访捷确有更深层的目的。

5月22日，格列奇科一行返回莫斯科。5月24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宣布：6月份，华沙条约缔约国武装部队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以检验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协同和指挥能力，改进部队和指挥机关的战斗准备状况。5月29日，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力量参谋长、苏军大将米哈伊尔·伊里奇·卡扎科夫率华沙条约总部代表团到达布拉格，发表公告说苏、波、匈、捷等4国的武装部队将参加这次军事演习。6月初，苏军通知捷国防部长楚尔：苏军坦克和飞机将参加计划

安排中的华沙条约国武装力量军事演习。6月3日晚，一个苏联坦克师开始运动，从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进入捷境内。军事演习于6月18日正式开始，参加演习而进入捷境内的苏军约16000人。捷共中央一直反对、软磨拖延，终于无法阻止苏军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军事演习。捷共中央更担心的是：苏军在捷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很可能与苏联一直要求在捷领土上长期驻军，而未被捷接受的计划联系在一起。5月31日，捷社会党机关报《自由言论报》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这种担心。这家报纸说：“捷克斯洛伐克现在的特殊处境使早些时候发表的、苏军不在捷克斯洛伐克长期驻留的声明成了问题。”

几乎是与格列奇科率苏联军事代表团访捷的同时，柯西金也来到了布拉格。

5月17日下午5时半、即格列奇科到布拉格的5小时之后，柯西金就紧跟着来到布拉格。5月14日，切尔尼克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曾说到：捷克斯洛伐克已经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来访，但是估计他不会在近期前来。切尔尼克当然不是随意这样说的，可见柯西金访问是先有计划，但17日的到来却是“突然袭击”。苏联的突然通知使捷政府手忙脚乱，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外交部长哈耶克、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等刚刚赶到机场，柯西金的专机也降落了。捷通社当晚发表公告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是应捷共中央的邀请来访的。柯西金同志在捷克斯洛伐克逗留期间，将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就双方关心的问题继续交换意见。”柯西金在布拉格停留了一天，与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等捷共领导会谈，19日就带着孙女到西捷克州，靠近德国的温泉疗养地卡罗维发利“休养”去了。在卡罗维发利，柯西金又与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捷共领导，就双方关心的问题

“举行艰苦的谈判”。经过几轮的谈判，双方达成了一些协议。捷共承诺：不许任何人公开表示怀疑党的领导作用，不允许建立反对党，只能由党员担任政府中的重要职务，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时要与苏方商量，对西部边境（与联邦德国的边境）保持警惕，捷人民军的行动接受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的检查，捷同意华约部队在捷、波边境举行军事演习。柯西金则答应向捷提供一定数量的贷款。这个协议当然是不平等的，是捷共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包括格列奇科来访、苏军在边境调动等军事压力面前的让步，但是毕竟是挡住了苏联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柯西金的来访也有了结果。柯西金礼节性地拜访了斯沃博达总统，于5月23日，比原计划提前4天，返回莫斯科。

5月23日，格列奇科元帅向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关于苏联武装力量代表团访捷的情况汇报。格列奇科向政治局报告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正在垮台。军队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军队举行集会。捷国防部、捷人民军新闻社宣布独立，不受自己上级的领导。军队严重缺员，驻扎在与联邦德国相邻边界的师团，兵员额只有40%~50%。”^① 格列奇科原来对军事制裁尚持谨慎态度，自这次访问之后，也转变为力主对捷采取军事行动。这次政治局会议还通过一项决议：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形势行动小组专门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佩尔谢、谢列平、马祖罗夫、安德罗波夫、鲁萨柯夫、葛罗米柯和叶皮谢夫。这个委员会尽管日后在对捷行动中并未有什么突出的作用，但苏共中央政治局特作决议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

①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沿袭苏军的建制，一个满员师约14000人。和平时期，一般都保持60%左右的兵员。驻扎在联邦德国边境的师，即使在常规状况下，应属“戒备师”，兵员应保持在80%左右。格列奇科的话意指捷人民军异常松懈，不像样子。

表明苏共中央政治局已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作为一个“非常问题”，将由“非常机构”以“非常手段”来处理。

5月27日，柯西金向政治局作访捷的总结报告。柯西金经过这次出访，同捷共中央领导人多次交谈，并且较广泛地接触了各方面人士，态度比原来更谨慎一些。柯西金的基本结论是：“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外，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控制局势。”柯西金进一步说：“对所有的谈话、会见、会谈等材料的分析之后说明，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在党内或者国内，没有比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沃博达更有影响的人物。显然，我们也应该以相应的方式调整我们的工作。”

柯西金在报告中还强调：根据他同捷克斯洛伐克各方面人士接触后，“深信在杜布切克与切尔尼克之间，没有任何莫斯科所盛传的矛盾”。谈到对捷共中央领导层的划分时，柯西金把捷共中央主席团分为三个集团：第一集团是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斯沃博达；第二集团是比拉克、什特劳加尔（时任政府副总理、捷克经济委员会主席，1968年4月以前为捷共中央书记——作者）；第三集团是克里格尔、齐萨日、斯拉维克和其他一些人。在柯西金的眼里，第三集团大概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了；他们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的。柯西金认为：“第一集团和第二集团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就其实质而言是一样的，在所有原则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同样理解形势，同样提出问题。但是，第二集团以稍为不同的形式来理解解决问题的办法，赞成采取比较果断的行动。”柯西金对斯姆尔科夫斯基有了较好的评价，说斯姆尔柯夫斯基自从5月3日访问莫斯科回国之后，“采取了非常坚定的原则立场”。柯西金对捷共中央领导层的新分析几乎动摇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所有以前关于“健康力量”、“健康力量核心”的分析。

最后，柯西金向政治局报告他访捷的总的印象：“在捷克斯洛伐克复杂的社会政治形势下，并不是十几个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有过错，而是阶级矛盾的形势本身铸成了这些问题。无论是杜布切克或者斯姆尔科夫斯基，都不是苏联的敌人。关于‘健康力量’的传闻被夸大了。……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问题可以取得理解。”柯西金的结论是：“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说话比较容易，甚至比与齐奥塞斯库、铁托、卡斯特罗谈话来得容易。”

柯西金的报告总的倾向是十分清楚的，就是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应当寻求政治解决。柯西金 1927 年参加苏共，1939 年当选苏共中央委员，1948 年就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在政府里，1939 年起担任纺织工业部部长，1940 年起成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几十年里，他在党内和政府中的职务几经上下，但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勃列日涅夫当政后，他是政府事务的主持人；政坛系统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是他的故旧。他的意见当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可是，就在柯西金结束报告时，勃列日涅夫被喊出去听电话。

电话是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负责和比拉克“加强联系”的谢列斯特从基辅打来的。谢列斯特向勃列日涅夫报告，他在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与比拉克谈话的内容。谢列斯特报告说：“比拉克认为，如果在一个月内还不能整顿好国内的秩序，我们都只好飞走，我们的‘圣徒’（指杜布切克——作者）也只好飞走。斯洛伐克人只好和俄罗斯人（联合），再一次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如果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他并不排除请求让他的家人们到乌日哥罗德（苏联乌克兰共和国西部邻近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城市——作者）去。比拉克请求（苏联）要为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而斗争；请求苏联领导人不要放过机会，我

们斯洛伐克人将予以全力支持。”

谢列斯特报告的与比拉克谈话的电话，使勃列日涅夫，也使听了勃列日涅夫转述后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十分震惊。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听了柯西金的访捷总结报告后，神经刚刚松弛一点，立刻又被谢列斯特的电话绷紧起来。

6月4日，苏联通过“特殊的外交渠道”又和比拉克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比拉克向苏共领导详细地介绍了捷共领导层的情况以及他个人的分析。比拉克提请苏共领导“尤应注意‘布拉格中心’的活动”。比拉克把希克、兼任南摩拉维亚州州委第一书记的什帕切克、齐萨日、克里格尔、内务部长约瑟夫·帕维尔、捷共中央政治组织部部长科拉格什、捷共中央国家机关部部长普尔赫利克上将等，列为“布拉格中心”的成员，说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在布拉格采取行动，以破坏杜布切克的威信”。比拉克还向苏共领导说：“这些人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内的齐萨日办公室开会”策划行动。比拉克建议：苏共领导应当找杜布切克、他本人（比拉克）、切尔尼克等“可以完全信赖的人”讨论一下局势；然后再扩大范围，把巴尔比雷克、萨多夫斯基、列纳尔特、英德拉等吸收进来，包括争取国防部长楚尔。比拉克还提请苏共中央注意：杜布切克掌握着一支约一万人的忠诚士兵和军官队伍，只要按钮一按，便能迅速投入行动。比拉克通过“特殊外交渠道”的报告，把勃列日涅夫的心也扰得七上八下。

此时，苏共中央还获得情报说：捷克斯洛伐克哥特瓦尔德军事学院、捷社会研究军事学院以及普尔赫利克上将为为首的捷共中央国家机关部等捷军队上层领导，于5月底向捷共中央主席团核心圈呈送了两份备忘录：第一份备忘录提出要“表达和定出军事领域的国家利益”，第二份备忘录要求重新讨论《捷人

民军行动纲领》。两份备忘录都直接批评了捷克斯洛伐克国防力量的状况和追随苏联的状况；两份备忘录尖锐地对“不适当的费用，为的是维持作为与北约对立的华沙条约武装力量组成部分的军队，以及华沙条约现存的不平等关系”，提出否定意见。两份备忘录还认为：《捷人民军行动纲领》“是不折不扣地移植苏军模式，是从按照统一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方针中产生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建设的反常现象”。两份备忘录都强烈吁请捷共中央最高领导：“重新审议参加华沙条约问题；重新评价华沙条约的军事、政治学说。”两份备忘录还就保卫捷国家的安全，从军事上提出选择方案：——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双方面、或者单方面宣布退出华沙条约；——中立化条件下的国家安全；——国家自卫。两份备忘录的出发点是：从根本上重新审议捷克斯洛伐克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关系、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的关系。如果这两份备忘录的建议被杜布切克采纳，那将是葛罗米柯的预言变为现实。勃列日涅夫与苏军最高领导在得悉这一情报之后，确实是又惊又怒。

5. 徘徊于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的十字路口

苏、捷双方的对立愈来愈严重，苏共中央要求对捷采取军事干预的呼声愈来愈强烈，波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党的领导也在推波助澜，但是勃列日涅夫觉得出兵的条件还不成熟。6月份，苏共中央仍然徘徊于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的十字路口。

5月29日至6月1日，捷共召开中央全会。杜布切克向中央全会所作的报告，显然是吸纳了不久前与柯西金谈判时所作的承诺。杜布切克在讲话中提到：国内反共产主义的倾向在积

极活动，保守观点也威胁党的活动能力，应当揭露和孤立这两种倾向。杜布切克宣布，不允许在民族阵线之外组织反对派，要清洗那些采取不正常做法的负责人。关于捷共的对外方针，杜布切克指出：要保留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传统安排内部事务的权利，也允许别人有这种权利；既尊重国际主义的经验和利益，也要承认这个或那个党工作中的特殊性和特点。

根据杜布切克讲话的精神，全会的决议说：“党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的根本问题，是不使政权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受到威胁，不论这种威胁来自哪一方面，来自右的反共倾向的，还是来自保守力量方面，倒退到 1968 年 1 月以前的形势是符合保守力量的利益的，而那种形势是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① 全会通过了五点具体决议：“1. 保证共产党对全社会的政治领导作用；2. 保卫社会主义的发展、保卫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的自由；3. 努力使新的政治体制能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相适应；4. 反对一切破坏法制、瓦解国家机关的企图；5. 在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捷同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际共运的关系。全会还决定于同年 9 月 9 日，召开捷共第 14 次特别代表大会。

全会的决议是遵循《行动纲领》的框架，更具体地阐述自治制度是迫切的实际任务，论及民族阵线内部的关系，以及报刊和宣传工具的活动。全会决议也婉转地反对激进派的过激言辞，认为这只能给改革事业帮倒忙，给苏联提供“捷克斯洛伐克有严重反苏主义”的把柄。全会决议说：“共产党人不应忘记，歪曲和夸大一定的意见分歧，直至散布关于‘军事干涉的危险’（如关于华沙条约国军事演习，等等）的谎情，都十分严

① 转引《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 192 页。

重地损害着当前的路线，给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集团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帮了忙。捷共中央声明，所有过去和现在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的党和政府级的会谈，其结果都是积极的，展示了加深合作和援助的可能性，这对解决我们某些迫切的经济困难是非常重要的，苏联同志表示了向我们提供这类援助的良好愿望。”^①

5月29日~6月1日的捷共中央全会，明显地贯彻了杜布切克等捷共中央领导与柯西金会谈的精神，体现了杜布切克想缓和同苏共之间的矛盾、减少改革的阻力、使《行动纲领》能真正付诸实施。这次全会，杜布切克是双拳左右同时出击，勃列日涅夫也注意到这一情况。

但是，全会的另一情况也引起苏共的关注，即全会作出对诺沃提尼，前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原公安部部长卡罗尔·巴契列克，前司法部部长什特凡·拉伊斯，前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前政府总理西罗基，前最高法院院长、斯兰斯基案件中的主要起诉人约瑟夫·乌尔瓦列克，前捷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前捷共中央书记布鲁诺·科列尔，前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前捷共中央书记、前外交部长瓦茨拉夫·戴维等6人“停止党籍”的决定，理由是：他们都“应对在个人崇拜盛行年代的大清洗承担责任；阻挠改革”。

“停止党籍”作为一种处罚在共产党对违纪党员的处罚条例中，未见诸于党章，可以看作是杜布切克的创造。这一措施确是适应当时捷共所处的特殊时势所需要。当时，捷共领导层中要求复兴社会主义、建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派与反对改革的势力，要求摆脱苏联控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

^① 转引《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200页。

道路与亲苏势力和希望托庇于苏联的保护伞的势力，双方的斗争临近最后关头。反对改革和希望在苏联的保护下过太平日子，很难量定“违反党章”，何况他们的背后是庞然大物的苏联，苏联正在寻找和等待军事入侵的时机。如果不对反对改革的势力予以抑制和威慑，那他们更会有恃无恐，改革势难推行。因此，杜布切克创造了“停止党籍”这一招——不是开除出党，也不是留党察看。

6月6日，契尔沃年科大使拜会了杜布切克。杜布切克向契尔沃年科介绍了刚刚结束的捷共中央全会的情况。随之，契尔沃年科立即将他所了解到的有关6月1日结束的捷共中央全会的情况，详细报告了莫斯科。苏共中央根据格列奇科、柯西金等的报告，谢列斯特频繁地与比拉克的联系以及苏联使馆的报告，综合研究之后，勃列日涅夫认为仍然有必要与杜布切克进行一次会谈。6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勃列日涅夫致杜布切克口头信函的决定》。当天，勃列日涅夫指示契尔沃年科大使前往拜会杜布切克并转达勃列日涅夫致杜布切克的个人信函。勃列日涅夫发给契尔沃年科的是一份信稿，要契尔沃年科照着信稿向杜布切克转述，所以叫作“口头信函”。在外交往来上，作为两国首脑人物的正式交往，这种方式也是比较少见的。

勃列日涅夫指示契尔沃年科向杜布切克转述：捷目前已处于“反社会主义势力越来越露骨和加强反抗”，“对共产党内及其领导层中的健康力量发起更猛烈的攻击。为此，不惜采用讹诈、造谣和挑拨离间等种种伎俩，并借口同‘保守派’作斗争来杀害忠于事业的正直共产党员”。勃列日涅夫要契尔沃年科告诉杜布切克：在这样的形势面前，“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你们大多数大众宣传机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仍然在从右派的、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有时还公然从反革命立场发表意见”。

勃列日涅夫在“口头信函”中还特别提到：“在捷共内部存在一个‘第二中央’，无疑使党内和国内的情况大大地复杂化了。”勃列日涅夫所说的“第二中央”，当然是指比拉克通过“特殊外交渠道”向苏联反映的“布拉格中心”的活动。

勃列日涅夫提出，要同杜布切克以及“他的最亲近的志同道合者进行非正式的双边友好会晤”。杜布切克的“最亲近的志同道合者”，勃列日涅夫开出的名单是：切尔尼克、比拉克、英德拉、列纳尔特和科尔德。勃列日涅夫为杜布切克选定的5名“最亲近的志同道合者”，其中3名是苏共中央政治局认同的“健康力量”。关于会晤的地点，勃列日涅夫提出：可以在乌日哥罗德；也可以在杜克拉山（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斯洛伐克州与波兰的新宋奇省和克罗斯诺省交界的避暑圣地——作者）。会晤的时间，勃列日涅夫认为在6月15日（星期六）和6月16日（星期日）比较合适，“会晤最好秘密进行”。勃列日涅夫要契尔沃年科记住：如果杜布切克提出“捷共中央曾作出决定，在代表大会前不会见其他兄弟党代表”；那么你就强调说：“莫斯科也考虑到了这个情况，但是仍旧认为有必要向杜布切克同志提出进行双方秘密会晤的建议”。那就是说，会晤是不容推托的。

就在这几天，6月4~14日，斯姆尔科夫斯基率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捷国民议会副主席、捷人民党布尔诺州委书记泽德尼克，捷国民议会副主席、捷社会党党员多格纳尔，捷国民议会议员、斯洛伐克复兴党中央主席亚尔坦以及6名无党派人士。6月14日，勃列日涅夫与捷国民议会访苏代表团举行座谈，苏方参加座谈的还有苏共中央书记卡图谢夫，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

主席尤斯坦斯·伊克诺维奇·帕列茨基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米哈伊尔·波尔菲里耶维奇·格奥尔加泽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国际联络局局长维索金。

勃列日涅夫在这个座谈会上，共8次讲话。根据座谈会的纪录来看，实际情况是，捷方的某个人说几句话，勃列日涅夫都抢过来讲一大通。勃列日涅夫自己说“我完全不是想要教训什么人”，这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次名曰“座谈会”，实际上是勃列日涅夫的“训话会”；因为如果把捷方几个人的几段话删掉，勃列日涅夫的8次讲话，就能连成一气。

勃列日涅夫首先教育捷方人员：不要忘记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帮助。勃列日涅夫说：当捷有困难时，苏联随便怎样艰苦，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帮助捷，“在苏联因歉收而粮食不足的最困难年头，苏方也总是准确无误地履行自己向捷克斯洛伐克供应谷物的义务”。“如果有必要，每个苏联人都会献出自己的200克面包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面包是苏联人的主食。200克面包是一般情况下的每人每日面包消耗量。意为苏联人自己不吃，也要省下来给捷人民吃——作者）

接着，勃列日涅夫愤怒地谴责了捷克斯洛伐克“有些人”，居然把苏联说成“把自己的某种方式和经验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干涉内政”。勃列日涅夫还举出具体事例，证明苏联从未干涉过捷的内政。勃列日涅夫说：“众所周知，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一个不同于苏联（《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的《统一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老实说，无论是我，或者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任何一个委员，都不知道这个章程的内容。”所以勃列日涅夫说：“把什么干涉内政之类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都是出于明显的挑衅的目的。”“捷的电台、电视台、报刊，都在加紧散布这种谎言。”说到这里，勃列日涅夫真的激动起来了，说话也

变得声色俱厉：“贵国报刊却无中生有编造各种指责我们的谎言。就拿鼓噪一时的无中生有地说什么苏联顾问与马萨里克自杀有关的宣传运动来说吧。当捷克斯洛伐克报纸上开始这种喧嚷时，我们翻阅了全部必要的档案，但是在档案中没有发现任何能证实这种捏造的文件。我们扪心无愧。我们愿意上任何国际法庭，以证明我们是清白无辜的。”勃列日涅夫自觉有些失态，和“座谈会”的气氛不大协调，只好说：“我请你们原谅，我在这里讲得有点激动。可这是我早就想说的心理话。”

然后，勃列日涅夫训诫在座的捷国民议会议员们说：“你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存在着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应当考虑到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鉴于西德复仇主义势力的活动和美国侵略政策的日益加强，很难说我们这次会见后会遇到什么样的考验。因此，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应付任何突发事件。有谁能保证，经过一段时间后苏联士兵就再也不需要起来保卫我们已取得的成果和独立了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紧密合作和加强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国防能力，乃是应付这种突发事件的可靠保证。”

勃列日涅夫又像一位家长似地训示在座的捷议员们：“像通常所说的，旁观者清。捷克斯洛伐克某些不健康的趋势使我们深感不安。这些趋势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强，在损害社会主义，在损害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痛心的是，已经对苏联、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泼了很多脏水，已经提出了很多凭空捏造的指责。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保持镇静。我们尊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尊重捷共，但是不尊重下流作家和诽谤者。”

最后，勃列日涅夫一语双关、暗藏杀机地说：“若要干净，须拿起扫帚将垃圾扫出屋子。”“我国人民，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准备重新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为了贵国的独立而并肩作

战。”

座谈过程中，捷国民议会代表团的成员们间或插上几句话，基本上是听勃列日涅夫旁若无人的讲话。

6月14日，就是勃列日涅夫教育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的当天，《真理报》也向捷共中央开火。《真理报》刊出康士坦丁诺夫的署名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责骂捷共中央书记齐萨日：同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队伍中的改良主义者一样，试图把列宁主义解释成仅仅同俄国的社会条件有关的现实，用考茨基的话来批评列宁和列宁主义。

斯姆尔科夫斯基回国后，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的军事演习也开始了。6月19日，兼任全国民兵总司令的杜布切克，在布拉格飞机场举行的全国民兵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杜布切克表示反对解散工人纠察队，并说党决心同反共现象和危及民主化进程的一切过火行为作斗争。杜布切克召集这次集会的原意在于争取民兵对改革事业的支持。但是，工人纠察队基本上是由亲苏派控制的。亲苏派乘机让工人纠察队召开积极分子会议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内称：“我们决不容许任何人污蔑或威胁列宁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原则，而我们实行这些原则的基础是我们在1948年2月奠定的。……有些新闻记者散布资产阶级报刊上的种种歪曲报道，妄图破坏我们（同苏联）的友谊。我们不能同意他们这种不负责任的行径并与之划清界限。”^①6月21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工人纠察队积极分子会议通过这项决议的消息。6月22日，《真理报》紧接着刊出了这个决议的全文。苏共中央如此重视这次会议和会议所通过的此项决议，用意自然在于希望鼓动工人纠察队与“反革命修正

①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486页

主义派”的对立，进而重演 20 年前“夺权”的那出戏。苏联这样做也是对杜布切克的一种警告。

6 月 22 日，《红色权利报》刊出捷共中央书记齐萨日的文章，回答一个星期前康士坦丁诺夫的挑衅。齐萨日只是说明，无论是马克思或者列宁都不曾预见目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当然也不可能留下如何解决目前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的处方；捷共不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只想正确地运用这些原则，不重复过去几乎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政治灾难中去的错误和过失。其实，打这类笔墨官司也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齐萨日的文章不过是回敬《真理报》的无聊纠缠而已。

勃列日涅夫已经明白：杜布切克是绝对不会放弃选定的道路的；捷共内部的“健康力量”也无力单靠他们自己与以杜布切克为代表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相抗争。

六、寒潮袭来

1. 《两千字宣言》引来的风波

当勃列日涅夫在军事解决与政治解决的十字路口徘徊、观望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们发表了《两千字宣言》。《两千字宣言》的发表刺激了勃列日涅夫，促使苏联在军事解决的道路上加快步伐。当然，这里也用得着毛泽东同志说的：景阳岗上的老虎，无论是刺激或者不刺激，都要吃人，因此不存在刺激与不刺激的问题。但是，《两千字宣言》的发表确实使站在十字路口的勃列日涅夫走向军事解决的道路。

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学通讯》、《劳动报》、《农业报》、《青年阵线报》等报刊同时发表了《致工人、农民、职员、科学家、艺术家和全体公民的两千字宣言》，简称《两千字宣言》。这份宣言是由作家卢·瓦楚利克起草的，在宣言上签名的有70名捷全国知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其中像科学院院士Б.彼得绍夫斯基教授、科学院院士Я.布罗特教授、科学院通讯院士О.波乌帕教授、В.克鲁塔教授、画家З.切赫拉克、演员兼导演Р.格鲁申斯基、作曲家И.托波尔、歌唱家И.普列诺西尔、指挥家К.克拉乌格涅尔、作家Я.普罗哈兹基以

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获得者、名闻遐迩的旅行家等知名人物，其中还有捷共中央委员。

《两千字宣言》是指宣言的捷克文约 2000 个单词，译成汉字约 5000 字。宣言的草拟者瓦楚利克生于 1926 年，青年时代从事新闻工作，50 年代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60 年代，瓦楚利克担任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刊物《文学报》、《文学通讯》的编辑。1967 年因反对诺沃提尼而被开除出党，不久又恢复党籍。

《两千字宣言》一开头就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满怀希望地接受了社会主义纲领，但是实施社会主义纲领的工作落入了那些不称职的人的手中，于是，灾难就接踵降临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头上。

《两千字宣言》这样评价捷共和捷政府：“共产党在战后赢得了人们很大的信任，但是这种信任渐渐被官职取代，当它取得了全部官职之后，其他一切就丧失殆尽。”于是，党也不成其为党了，“领导上的错误路线使党由一个政党和思想上的联盟变成了一个权力组织，使得它对那些权欲熏心的自私自利者以及胆小鬼、居心叵测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由于党政合一，党的状况也决定了政府的状况；整个社会成了“对公共事务失去了兴趣，人人只关心自己和金钱”。

《两千字宣言》对杜布切克的改革也是充满着不信任和怀疑。《宣言》说：“今年年初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民主化的复兴过程。……复兴过程并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它的有些思想和建议，甚至比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犯的错误还来得老旧；另一些思想和建议则是由于在明显的事态发展中孕育而生，如果不是受到压制，早就该提出来了。别幻想这些思想和建议现在是因真理的力量而取胜吧！决定它们胜利的毋宁说是旧领导

的软弱无能。”因而，现在“有理由对国家抱有新的希望，却没有理由举国欢庆”。

“在抱有希望的时刻”，宣言呼吁：“必须要有言论自由”；“对中央政治机构不能有更多的期望，但是必须在县里和村镇中争取更大的成就”；用罢工、公开批评、游行示威、作出决议等方式“迫使那些滥用权力的官员离职”。宣言还不指名地号召警惕苏联“干预我国内政的可能性”。^①

《两千字宣言》的内容杂七杂八，将政治问题、道德问题、伦理学问题、国际关系问题，像乱麻似地纠缠在一起；从整个倾向来看，它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捷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宣言上签名的人，多数在诺沃提尼执政的年代曾深受专横和滥用职权之害，从这点上说，可以找到一点感情渲泄的理由。但是，他们要求杜布切克政权立即偿还他们曾经丧失过甚至也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一切“权利”，而且既不考虑杜布切克政权面临的现实困难，也不顾及“权利”是只能逐步获得的。因此，他们这种“呐喊”，实际上是号召社会去追求无政府、无序状态。如果宣言只是由瓦楚利克作为个人的文章在《文学通讯》上发表，那可以看作是瓦楚利克的个人行为。问题是由全国 70 名知名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来集体签名，同时在多家报刊上同时发表，它的负面影响、它的规模极大地超越了个人行为的范围，成为一种社会公众行为，因而被看作是想以《两千字宣言》来取代捷共的《行动纲领》，把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引向歧途。

捷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6 月 27 日当天午饭后，杜布切克

① 参见罗·亚·麦德维杰夫主编《政治日记，1964—1970 年》俄文版，第 395—399 页，阿姆斯特丹，1972

立即召集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特别会议，讨论《两千字宣言》问题。不少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平常只读专门机构为领导人准备的“参考资料”，不读报纸；而当天的“参考资料”还来不及转摘《两千字宣言》。因此，不少人还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紧急地召开“特别会议”，也不知道将讨论什么问题。到了会议室，听了介绍，读了《两千字宣言》，特别会议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而且对复兴社会主义的顺利进行也是一种威胁。会议讨论得比较热烈，有的人在发言中也比较激动。比拉克、科尔德都批评杜布切克“听任局势发展到能让这样一个宣言出笼的地步”。英德拉认为是“反革命煽动”。斯姆尔科夫斯基认为《两千字宣言》是破坏改革的大好形势，只能招来苏联的武装干涉。他说：“我不愿承担使局势发展到必须用坦克来解决问题的责任。”斯姆尔科夫斯基建议，由政府出面对《两千字宣言》表明正式态度。切尔尼克提出：主席团应当有一个基本立场，政府才能遵循这个基本立场表明态度。经过讨论，主席团的基本结论是：《两千字宣言》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文件；《两千字宣言》是一个号召进行无政府主义行动的文件。

特别会议授权齐萨日和姆利纳日起草决议。决议的基本精神就是主席团的意见，谴责无政府主义，解决的基本方法是“和解”。决议声明，必须坚持和具体实行捷共的《行动纲领》，在党的路线下团结所有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当主席团通过决议时，已经是28日清晨了。比拉克、科尔德、什维斯特卡以及英德拉、雅盖什等人仍然坚持《两千字宣言》是“反革命政变的前奏”的观点，要求党作好“应变措施”。但是决议仍然是坚持谴责“无政府主义”的基调，坚持“不使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

杜布切克等人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特别会议一结束，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拉维克等接见了《两千字宣言》的部分签名者。杜布切克谴责了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希望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改革开端，诚心诚意地希望“和解”。《两千字宣言》的风波在捷国内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两千字宣言》在国外引起的轩然大波远远超过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内。苏联认为：《两千字宣言》是反社会主义和反共势力的凶恶的、破坏性的举动，企图一笔勾销 1948 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历史并为反革命复辟铺平道路，是一个反动的反革命行动纲领。^① 苏联在激烈抨击《两千字宣言》是“反革命复辟的行动纲领”的同时，也“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某些领导人，发表模棱两可的声明表示遗憾。这些领导人试图缩小《两千字宣言》的反革命危险性，声称什么‘不应该大惊小怪’。”^②

《两千字宣言》的发表确实是使勃列日涅夫坚定了军事解决的方针。7月3日，卡达尔应邀到莫斯科访问，勃列日涅夫终于说服卡达尔“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干涉是必要的”。当晚，勃列日涅夫在欢迎卡达尔的宴会上讲话，一再强调苏联“现在和将来都不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漠不关心”。卡达尔在讲话中则说：“匈牙利共产党人全力支持那些反对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阶级敌人，为保卫工人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共产党人。……我们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我们准备用一切手段给他们以国际主义的支持。”^③ 这些话

① 见《捷共和苏联对〈两千字宣言〉的态度》，载《政治日记，1964 - 1970 年》俄文版，第 399 - 430 页，阿姆斯特丹，1972

② 同注①，第 401 页。

③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 503 页

清楚地表明：卡达尔已经接受了勃列日涅夫的说项。接着，苏联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分别致信捷共中央，建议于7月7日在华沙举行六国党的最高级会议，讨论《两千字宣言》发表后出现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

7月8日，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措词几乎相同的五国共产党中央的来信。在讨论中，比拉克、科尔德以及主席团候补委员卡佩克表示应当接受召唤，前往华沙参加最高级会议；其他人都主张拒绝参加会议。最后，主席团就是否参加华沙会议，付诸表决。表决结果，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决定：拒绝参加华沙会议。捷共中央于是复信苏共及东欧其他各国党“建议不是由六国党的领导人共同会晤，而是改为由捷共同各兄弟党领导人，在最近期间举行双边会谈”。复信还说：“捷共中央主席团经过讨论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捷共中央主席团不能离开本国领土。”复信的意思非常明确：拒绝共同会晤，同意分别举行双边会谈；会谈只能到捷克斯洛伐克来进行。

7月11日，苏、波、匈、保、民德等五国党联名致信捷共中央，敦促捷共中央主席团参加华沙最高级会谈。

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了五国党的联名信，认为华沙会议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讨论，也不会达成什么协议，“只是一次宣读判决书的审判会”。对捷共中央来说，如果接受这种“审判”，就意味着放弃《行动纲领》，放弃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会引起国内群众对捷共中央领导的不满，会加深国内矛盾。如果参加华沙会议，又不接受“审判”，拒绝在意料中的联合公报上签字，那将意味着同苏联及华沙条约其他四国摊牌，无疑是给直接的军事干预以口实。主席团认为应予拒绝。

7月12日，捷共中央复信，再次拒绝与会。复信提出：如

同在9日信中的建议一样，捷共中央主席团仍主张先举行双边会谈，“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形势，不能成为这种紧急会见的理由”。复信向苏共中央提出：“捷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一致决议，邀请您（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尽可能的近期到布拉格来，进行我们两党中央主席团一级的会晤。”

勃列日涅夫看到捷共中央拒绝举行六国会谈的复信后，非常生气，立即打电话给杜布切克。在电话里，勃列日涅夫把杜布切克痛责了一顿，带有杀机地说：“拒绝会晤将决定苏共与捷共两党关系的新阶段。”杜布切克极力进行解释，说：“报刊确实有过某些错误（刊登《两千字宣言》），包括刊登关于纳吉·伊姆雷的命运的文章，有过一些反苏言论。但是现在看不到了，……一切正常了。”勃列日涅夫不耐烦听杜布切克的解释，挂断了电话。随后，勃列日涅夫与哥穆尔卡、卡达尔等磋商。勃列日涅夫向他们通报了与杜布切克通话的情况。哥穆尔卡在电话里声称：“对杜布切克别抱多么大的希望了。会晤必须进行，即使捷克人不参加也罢。”卡达尔在电话里也说：没有捷克人，会晤也要进行。不过，卡达尔还是建议：苏共可与捷克人进行一次双边会晤。

在这前后，苏联的活动极为频繁。7月10日，契尔沃年科大使会见了列纳尔特。莫斯科也通过“特别渠道”收到有关捷共中央主席团讨论是否参加华沙会晤的情况报告。这些情况都是为勃列日涅夫进行军事干预提供材料。

7月3日，雅库鲍夫斯基就说：华沙条约国联合军事演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到7月中旬，苏军仍然滞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没有撤走。种种迹象表明，形势对捷克斯洛伐克越来越紧急了。

2. “大家庭”又一次把“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关在门外

7月14日，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五国的党政领导人，在没有捷党政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在华沙举行会晤，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苏联党政代表团的成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苏共中央委员、党中央书记卡图谢夫。这是一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

苏、波、匈、保、民德等五国华沙会议，惟一内容就是起草、通过了一封《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名信。信的内容是歪曲捷国内的形势，大肆攻击捷共，粗暴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公开声明将对捷采取极端措施。

公开信一开始就说：“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对你们党和你们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进攻，有使你们国家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从而危害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利益。”联名信接着声明：“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推离社会主义道路，也不能眼看着你们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而不闻不问，因为这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一国的事情，而是我们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共同事务。”

联名信在表明了这五国的基本立场之后，说捷共中央辜负了兄弟党对它的信任和谅解，听任反动势力“发动了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及其忠诚干部的运动”；大众媒体“已经变成攻击共产

党的讲坛”；肆无忌惮地破坏捷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直至反动派用《两千字宣言》的形式号召全国起来反对共产党和捷政府，煽动罢工和骚乱，制造全国性无政府状态。这个反革命宣言书在捷共特别代表大会的前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居然受到捷共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支持。捷“已经形成了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相容的形势”。

联名信最后坚决地说：“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坚决击退反共势力的进攻，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成果，不仅是你们的任务，也是我们的共同任务。”^①

苏联等五国共产党向捷共中央发出的，虽然叫作“联名信”，但是信中使用的词和语气几乎是最后通牒中常见的东西了。

7月16日，捷克斯洛伐克在报纸上公布了在华沙聚会的苏联等五国共产党致捷共中央的联名信，立即引起捷人民和捷广大党员的极大愤慨。这封联名信被认为是对作为主权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和独立自主的捷克共产党内政的粗暴干涉，是对捷克和捷共毫不掩饰地施加压力。这封信不仅使捷人民和捷共产党发出正义的反抗，就连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也反对勃列日涅夫的这种蛮横做法，纷纷表示抗议。

7月16日，杜布切克召开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五国联名信并起草复信。7月19日，杜布切克召开中央全会，出席全会的88名中央委员，表示“无条件地赞同”捷共中央主席团对五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复信。

① 《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名信》，载《政治日记，1964-1970年》俄文版，第402-405页，阿姆斯特丹，1972。

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复信语气比起华沙五国的联名信来，要温和得多了，但是态度和立场是坚定的。

复信说：“捷共中央主席团全面地讨论了参加华沙会晤的社会主义五国代表给我们党中央的信件。来信是出于对我们共同事业和对巩固社会主义的关心。从这一事实出发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愿以同样的态度就信中所谈的问题，表明我们自己的看法。”

复信指出：目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但是这些矛盾是“捷共中央一月全会以前那些年各种矛盾积累的结果，这些矛盾也不可能在短期内都得到圆满解决”。复信承认党内也存在某些分歧，“但是这种分歧是和团结在行动纲领路线周围的过程中同时发生的，而且也是党的旧领导长期实行官僚主义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所造成的”。捷共中央五月全会已经认识到形势的特点；捷共中央也明确宣布，将采取一切措施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捷共中央主席团认为：“没有任何现实根据，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是反革命局势，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已受到直接威胁；说捷准备改变社会主义的对外方针；说捷存在着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现实危险。”

复信也驳斥了“捷和联邦德国拉关系”的指责。复信说：“众所周知，捷尽管是同联邦德国领土接壤的紧邻，却是最后一个采取措施，局部调整相互关系，首先是经济领域相互关系的国家。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早已同联邦德国调整好关系了，也没有引起任何担心。”

复信阐明，捷共中央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政治工作的目标和步骤，即：第一，使全党同过去的错误彻底划清界限，对旧领导集团里的某些具体的人追究个人责任；第二，筹备党的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第三，

全面解决国内政策方面的各种问题，建设以民族阵线和社会自治的社会主义纲领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解决联邦制国家的权力机构问题，选举国家的各级代表机构，起草新宪法。捷克斯洛伐克正处在贯彻这一路线而进行的政治斗争阶段。

复信也反驳了联名信在《两千字宣言》问题上的无理纠缠。复信说：捷共中央主席团、捷政府、捷民族阵线都一致拒绝了《两千字宣言》的呼吁，谴责宣言煽动无政府主义和破坏政治体制改革的企图。在捷共中央表态之后，全国任何地方再未发生过类似事件。“《两千字宣言》没有使党、国家和民族阵线受到威胁”。

关于“言论自由”问题，复信也作了说明。复信说：捷克斯洛伐克废除了新闻检查，给予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以合法地位。这样做的结果不过是“过去以‘小道’传播的东西，现在可以公开传播了”。我们这样做是相信“捷共能够用不同于过去那种官僚主义和警察方法来进行政治领导，能够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威力，能够用党的纲领和它的正确政策来实现政治上的领导”。

复信再次建议各党代表举行双边会晤，作为共同会谈的先期准备和条件；共同会谈应从互相协商和实事求是的互通情报出发。复信最后严正声明：“在某个兄弟党的代表没有出席的情况下，讨论该兄弟党的政策和活动，这样的会议是不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的。”^①

7月18日，杜布切克发表电视讲话，严正表明捷共中央对华沙五国党的联名信的态度和立场。

① 《捷共中央主席团对五国共产党、工人党信件的复信》，载《政治日记，1964-1970年》俄文版，第407-416页，阿姆斯特丹，1972

7月18日,《真理报》刊出了两条新闻:其一说已经获得美国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阴谋推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破坏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秘密文件;其二说在捷西部的索科洛夫县破获了一个秘密的美制武器贮藏库,该武器贮藏库是专为西德复仇主义者准备的,云云。

《真理报》编造这类新闻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即是为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作舆论准备。

3. 切尔纳会谈

7月8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在回复苏、波、匈、保、民德等国的信中,已经建议和各国党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而苏联一直坚持举行各国党的共同会谈。7月19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在回复苏联等五国代表的联名信中,再次提出应当举行由捷共和各国党的双边会谈。国际上出现的一些形势使苏共中央不得不考虑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建议。

在苏联召集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五国,不顾捷的反对,在没有捷代表出席的国际会议上讨论捷的局势,并以联名信的形式,实则是发出最后通牒式的指示,指令捷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苏联的这种行径在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极强烈的反响。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都向杜布切克伸出友好和支持的双手。他们向杜布切克表示:只要捷共中央感到有必要,随时可以到布拉格来,对捷表示道义上和其他方面的支持。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个大

党（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也表示坚定地站在捷共一边，反对苏共对捷共内政的横暴干预。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瓦德克·罗歇还向苏共中央提出抗议，反对苏共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

苏共中央还获悉：普尔赫利克上将在7月15日发表谈话，建议改组华沙条约组织。他提出：华沙条约缔约国不分大小，在决定问题上都应拥有平等的一票；华沙条约绝不应该用来为某一国的政治目的服务。罗马尼亚主席齐奥塞斯库立即表示支持普尔赫利克的建议。

在这样的情势下，苏共中央认为拒绝双边会晤将是对自己不利的，于是接过捷共中央的建议（不是接受捷共中央的建议），反而向捷共中央提出举行双边会晤的建议。苏共中央邀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于7月22日或者23日，到苏联的莫斯科、基辅或者利沃夫，同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谈。

7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与捷共首脑举行双边会晤的合理性问题。

勃列日涅夫首先讲话。他说：“目前，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正面临一个新阶段，但是时间对我们不利。现在，布拉格正期待齐奥塞斯库和铁托的到来，布拉格在纷传关于‘多瑙河协议’、‘多瑙河会晤’之类的消息。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也在支持捷人民。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呼吁召开‘欧洲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来协调行动。”勃列日涅夫估计：“捷的‘健康力量’不会求助于我们。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政治影响的办法我们都用尽了吗？采取极端措施的方法我们做了吗？我们在中央全会上声明，我们将采取一切取决于我们的政治影响措施。当所有取决于我们的政治影响措施都不能取得相应的效果时，只是到那时，我们将采取极端措施。”勃列日涅夫讲

话的意思是偏向于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施加政治压力的办法；对采取极端措施的前景持谨慎态度。柯西金立即表示支持勃列日涅夫的意见，认为举行双边会晤是对捷共施加政治压力的好形式。

但是，一些政治局委员和列席会议的人都不赞成苏共中央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看法。他们认为：苏共的耐心和等待已经到头了；现在该是采取极端措施的时候了。他们不便针对总书记，于是，柯西金就成了众人批评的“靶子”。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针对柯西金说：“我认为，实际上这种会晤（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双边会晤——作者）是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因此，您，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的名和父名。按俄罗斯的习俗，在正式场合应当称呼对方的名和父名，以示尊重——作者）不应该攻击我。他们（指捷共中央的领导人——作者）正在为自己的地位打得不可开交。……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右翼坚持自己的纲领（指坚持《行动纲领》——作者）。不仅我们在准备，他们也在准备，而且准备得非常周密。他们现在正在训练工人阶级，训练工人纠察队，都是反对我们的。”

柯西金反驳说：“我也想回答安德罗波夫同志。我没有攻击您。相反，是您在攻击。我认为，他们不是在争自己的地位，而是在为社会民主（主义）纲领而斗争。这就是他们斗争的本质。他们明争暗斗都是为了他们明确的目标，为了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又一个南斯拉夫，然后，成为类似奥地利的国家。”

在柯西金和安德罗波夫的争论过程中，乌斯季诺夫、马祖罗夫和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卡皮托诺夫都支持安德罗波夫的意见。其他人即使不反对柯西金的意见，也都认为：“与捷共首脑的双边会晤应是对他们施加政治压力的最后

措施。”

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发言结束了政治局会议的争论，也结束了关于对捷政治措施与军事措施的争论。这样，葛罗米柯的发言就成了不是总结的总结。葛罗米柯说：“4月中央全会和6月中央全会都肯定我们不出卖捷克斯洛伐克。……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双边会晤是必要的。在这次会晤中，我们应该向他们都摆出来。显然，他们不会接受我们的建议。那时，我们将有意识地采取用极端措施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现在老说‘与苏联的友谊’……我们知道这些话的价值。他们现在挂在嘴上的友谊，连约翰逊和其他美国总统候选人也老在说。”葛罗米柯不愧是苏联外交角逐场上的老手，他所说的“双边会晤是必要的”，用意是把苏联采取极端措施的责任加在捷共头上，双边会晤只是一种外交斗争的策略。葛罗米柯接着说出下面一段重要的话。他说：“应该想一想，极端措施会带来什么影响？我想，现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极端措施不可能引起局势紧张，（世界）大战也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放弃了捷克斯洛伐克，那么对其他人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如果我们保住了捷克斯洛伐克，这将巩固我们的地位。”^①这段话，解开了勃列日涅夫的心病。勃列日涅夫虽然也偏向于柯西金，对极端措施持谨慎态度，但勃列日涅夫是顾虑如果对捷采取极端措施，美国将会作出什么反应？会不会引起美苏对抗？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又将会作出什么反应？

7月22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阿·费·多勃雷宁会见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腊斯克表示：美国不想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务。

^① 以上7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均引自《1968年政治局会议工作纪录》，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6、7期。

腊斯克说：“美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论力求保持克制。我们不想干预或参与这些事件。因此我们特别惊讶，苏联想让我们也卷入这些事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介入”^①。美国总统约翰逊将于1968年任职期满。3月，约翰逊已宣布不参加连任竞选。约翰逊政府一方面由于侵越战争不断升级，同苏联的核军备竞赛不断加剧，巨大的军费开支造成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国内出现日益高涨的反对侵越战争和争取黑人民主权利的群众运动，约翰逊政府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无力干预捷事务。

勃列日涅夫在得知美国对捷问题的明确态度之后，才放手进行极端措施的具体准备。因此，7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对捷克斯洛伐克从政治解决转变到实施军事解决的转折点。

7月2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开始紧急制定对捷采取极端措施的具体工作，这些工作包括：通过决议，认为有必要派遣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部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撤换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政府的名义起草关于内、外政策的宣言；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政府的名义起草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军队的呼吁书。这些文件在7月20日草拟出的初稿的基础上，7月26日修改出第二稿；这些文件将于苏联军队和其他华沙条约国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公布。

同时，苏共中央还起草了《致苏联人民》的声明，说明苏联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① 转引皮霍扬《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6、7期

再次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和其他华沙条约国一起派军队进驻捷。《致苏联人民》说：“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认识到国家面临这种危险的深刻程度，捷共的优秀代表、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地方党组织的代表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政府，负起了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事务的全部责任。……在这样的条件下，苏联政府作出惟一的必要决定，命令苏联部队帮助捷克斯洛伐克革命政府。……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政府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与我们一起履行共同的国际主义义务。”^①《致苏联人民》也将于苏军进驻捷之后立即公布。此外，有关军事准备工作指定由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负责。

以上有关苏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的文件统统在7月26、27日两天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被确认。

7月22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方面做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又决议：继续与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双边会谈，不堵死政治解决的途径。政治局还指令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与捷共中央通报双边会谈事宜。勃列日涅夫也在玩“两手”的把戏。

诚实的社布切克专心准备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双边会谈，期待通过双边会谈取得苏共中央的理解，缓解捷、苏之间的矛盾。

捷共中央主席团在接到苏共中央关于捷、苏两党举行最高级双边会晤的信后，并不追求这一建议是由哪一方首先提出的，

① 转引《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6、7期。

而是立即由杜布切克召集主席团会议，商讨双边会晤的具体事宜。经过讨论，捷共中央主席团回复苏共中央，除对举行双边会谈表示欢迎之外提出：会谈的地点应当在捷境内；会谈的时间应当在参加军事演习的苏军部队全部撤离捷领土之后。经过紧急磋商，苏方同意了捷方的要求。

7月22日，《真理报》发布了一条消息：捷共领导人虽然还没有认识到反革命威胁的直接危险，但表现了改善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愿望。因此，举行一次直接会谈将是建设性的。苏联宣布，将在最近几天从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全部撤回参加演习的苏军部队。当天，捷共中央也发表声明：已就同苏共等党举行双边会晤问题达成协议；会晤将在主席团一级进行，会晤地点在捷领土上。

捷共中央主席团就即将举行的捷、苏两党双边会晤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讨论涉及：同苏方集中讨论什么问题？如何阐述自己的立场？对方可能提出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哪些问题上作出让步、哪些问题不能让步？等等。齐萨日谈到在“新闻自由”问题上不能让步，因为“新闻自由对社会主义来说是有益的、必不可少的”。捷共中央主席团还决定，将普尔赫利克上将调离捷共中央国家机关部（实际上是捷共中央安全部——作者），到正规部队任职。这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让步，以表示对会谈的诚意。

7月26日，《红色权利报》发表了作家科霍乌特写的呼吁书，题为《公民们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这封公开信写道：“同志们：在你们同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的前夕，我们写这封信给你们。……正如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少数几个人将决定千百万人的命运，情况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想以表示支持的这种方式对你们有所帮助。”信中说：“你们的任

务是说服苏共领导人，使他们相信，根据我国的利益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利益，我国的复兴过程必须进行到底。”这封信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奋斗目标归结为：社会主义、同盟、主权、自由等4个词，捍卫、坚持这4个词；要他们告诉苏方：“我们需要自由、和平，我们需要时间。”信的最后说：“请为我们写下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命运攸关的一页。希望你们要审慎，但是要勇敢无畏。我们信任你们。同时，我们希望所有赞成我们意见的公民，支持我们的呼吁。”^①

这份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发表之后，布拉格和全国其他城市的街道都贴满这封信的油印件，让其他公民在上面签名。究竟有多少人在上面签名，没有精确的统计，估计不会少于100万。这时，随便谁置身其中，都会感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精神的极度昂扬。

当天晚上，杜布切克在布拉格接见了工人代表。杜布切克对工人和全国公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向代表们表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神经紧张，神经紧张就会影响安全。这个艰难的时刻要求我们极端的明智和审慎，而尽量不要感情冲动。……你们放心吧，我们会成功的。我们将不仅能成功地捍卫我们的理想，而且还能赢得更多的行动自由。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采取这种态度就是对谈判的最大支持。”^②

但是，捷共中央的这些准备、捷共中央不想和莫斯科对立的虔诚愿望、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捷共代表前去谈判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枉然的，因为苏共中央只是把双边会谈作为

①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516-518页。

② 参见《“布拉格之春”前后》，第518-519页。

将军军事干预的原因扣在捷共头上的一种手段。

在捷共中央主席团认真准备、希望谈判有利于缓解捷苏关系的同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又是怎样具体准备的呢？

7月26、27日政治局会议，“准备”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发布的几份文告；同时，也“准备”了谈判的一些具体问题。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给即将举行的捷苏双边会谈定下一个基调。他说：“我认为有些问题不应该提起，如主观主义、个人崇拜等等。为什么要搬出这些问题来？为什么让他们（指捷共中央——作者）有可能抓住这些问题不放？”波德戈尔内附和谢列斯特的意见，说：“我认为，在这种场合，提出这类问题，正如材料所表明的那样，是不合适的。……应该说主要问题，如：党在工业、农业、文化事业方面做了哪些事。……一定要说说我党在‘二十三大’后做了些什么，摆摆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我们不是胆小鬼，不是懦夫，不是保守派。”^①

助手们已经为勃列日涅夫准备了一份很长的报告。所有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秘密谈话须知》。这份“谈话须知”概述了对捷共领导人的基本要求：取缔所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政党和俱乐部的活动；确保共产党对大众宣传媒体的监督；恢复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中的领导作用；撤销克里格尔、什帕切克、齐萨日、斯拉维克、希克、巴维尔和普尔赫利克（这些人被认为是“布拉格中心”的成员——作者）的职务。“谈话须知”还要求捷共中央“只有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实施这些措施的情况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可

① 《1968年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6、7期皮雷扬文章

能不采取极端措施。否则的话，我们直率地告诉你们：除了采取极端措施之外，别无他法。”^①

这份《秘密谈话须知》对捷共中央提出的“反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等要求的标准，都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定的。换句话说，就是捷社会的政治组织属什么性质，能否允许其公开活动；捷的大众媒体可以宣传、报道什么，不可以宣传、报道什么；谁可以进中央委员会、谁可以参加政府领导工作，而谁又不可以，所有这一切全由克里姆林宫来决定。如果捷共不是在实际行动上予以实施，就要采取极端措施。《秘密谈话须知》向捷共领导人提出的这些要求以及所使用的语气，和 30 年前希特勒对捷提出的要求，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只是在形式上，当年的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墨索里尼把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关在慕尼黑谈判会议室的门外，等协定签订后，再向捷代表宣读，这次是苏共代表和捷共代表面对面、直接向捷共代表宣布。

克里姆林宫希望，谈判用 7 月 29 日一天时间就够了。他们以为向捷共代表宣读文本，是不需要多花时间的；苏共领导是来向捷共领导宣布“最后通牒”的！

7 月 28 日，莫斯科和布拉格同时宣布：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将于 29 日（星期一）在蒂萨河畔的切尔纳举行会谈。

切尔纳是捷克斯洛伐克东斯洛伐克州的东南角，在捷、苏、匈三国边界交叉处附近，蒂萨河畔的一个边境小镇，人口刚刚达到 2 万。一条从苏联经过乌克兰的边境城市乔普进入东

^① 《1968 年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4 年第 6、7 期皮霍扬文章。

斯洛伐克州的铁路干线，延伸出一段支线，到达切尔纳。作为多瑙河的重要支流的蒂萨河纵切匈牙利的东部，上游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打了一个折，在乌克兰的乔普附近流回匈牙利，它的源头又在乌克兰了。世代平静、默默无闻的切尔纳，一下子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和东欧、苏联乃至世界关注的中心。

7月29日，一列火车从苏联载来由9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成的苏共中央代表团，他们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负责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前克格勃主席谢列平、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佩尔谢、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祖罗夫、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沃罗诺夫。另一列火车从布拉迪斯拉发送来捷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12名委员，他们是：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帕切克、克里格尔、科尔德、比拉克、什维斯特卡、巴尔比雷克、里戈、皮列尔以及尚不是主席团委员的共和国总统斯沃博达。

会谈是7月29日上午在切尔纳仅有的一家电影院里举行。会谈开始后，勃列日涅夫宣读了一份长篇声明，这份声明就是助手们为他准备的那份报告。声明长串、长串地摘引从捷报刊上摘录下来的掐头去尾的言论，证明“捷克斯洛伐克背叛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为帝国主义服务；新闻自由正在威胁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华沙条约和经互会”。勃列日涅夫宣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同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联盟义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这不是捷共的内部事务，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事

业。”勃列日涅夫说：“根据确凿的材料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已到了危急关头。现在的问题是，要么捷共领导找到勇气重新审查自己的看法，引导党和工人阶级采取坚决行动，击碎反动派，保住社会主义阵地；要么让我们的共同敌人来杀害共产党员。到那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就将完全由另一种势力来决定。”^①

勃列日涅夫提醒捷共中央主席团，“应当意识到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感，通过自己的力量解决所出现的局势危机”。勃列日涅夫在声明中，根据苏共中央在《秘密谈话须知》中规定的五条，向捷方提出：不许社会民主党、“231俱乐部”等政党和组织存在；恢复新闻检查；不准克里格尔担任民族阵线中央主席；不准齐萨日担任捷共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声明，气势汹汹，不容讨论。当勃列日涅夫指责捷“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时，由于职务上的原因参加会谈的斯沃博达总统，气得满脸通红。

杜布切克严正表示，捷改革的惟一目标就是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杜布切克说明，目前捷社会出现的一些过激言论是一月全会之前的诸方面矛盾积聚的结果，解决这些矛盾需要时间。至于目前的捷共领导是得到捷公众广泛支持的；捷共中央正在准备召开第14次特别代表大会，部署捷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步骤。杜布切克强调：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是正常的，是在党的完全控制之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存在反革命的危险。在勃列日涅夫和杜布切克讲话之后，双方代表交错发言，

① 《苏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在蒂萨河畔切尔纳的会谈，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结果向党的积极分子的通报》1968年8月8日。载《祖国档案》1993年的第3期，第92页（俄文）。

情绪十分对立。晚上 10 时半休会。苏联代表团乘火车返回乔普住宿。

这天夜里，杜布切克在切尔纳周围散步，同铁路工人交谈，工人对杜布切克表示最大的支持。警察阻拦了上百名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不许记者进入切尔纳镇。

第二天，会谈继续进行，双方激烈争论。第三天，7 月 31 日（星期三）晚上，会谈发生了危机。会谈中，谢列斯特以最粗暴的方式造谣，指责捷方“要使喀尔巴阡山乌克兰脱离苏联”。谢列斯特甚至不顾起码的外交礼仪，骂克里格尔是“哈里奇的犹太人（哈里奇位于波兰与苏联边界的南端，是克里格尔的故乡——作者），不配作他的谈判对手”。杜布切克等捷共中央代表团当即退出会场，表示抗议。事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此表示歉意，会谈也改为分组进行。

在分组会谈阶段，苏共中央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和捷共中央的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斯沃博达等核心人物举行“小花园会谈”，寻找妥协。在小花园会谈中，捷方作出重大让步。杜布切克承诺：控制报刊舆论；不许在民族阵线以外成立任何政治组织；加强工人纠察队和保安部队；保护“对苏友好”的共产党员；停止在报刊上与苏联争论；将克里格尔和齐萨日调离现任的职务和岗位。捷方还同意参加两天以后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华沙条约缔约国领导人正式会谈。勃列日涅夫承诺：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谈中将不涉及捷局势问题。

在切尔纳会谈中，杜布切克对各种问题的处置都是十分理智的，特别是在会谈眼看由于僵持而即将破裂时的做法，表现了一个小国、弱国和霸主国在外交谈判桌上对垒时的机智和灵活，而又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不失原则。小花园会谈中

杜布切克所作的承诺，一方面满足了勃列日涅夫的大部分要求；另一方面，这些承诺，除最后一点之外，都是用最一般的语言来表达的，在实施中可以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即使是最后一点，捷共认为只是一种承诺并无日期限制，何况第 14 次特别代表大会已定于 9 月 9 日召开，人事安排自然会有所变动。切尔纳会谈对捷共来说，重要的是坚持了《行动纲领》；坚持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

切尔纳会谈于 8 月 1 日结束，发表了一个简短公报，但保留了一份长达 500 页的正式纪录，作为绝密文件由两国各自保留。可惜至今还没有见到这份正式纪录的原件，作者也觉得是撰写此书的一个遗憾。

8 月 1 日当天晚上，杜布切克等捷共中央代表团就返回布拉格。杜布切克对记者们说：他带来了好消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可以安心睡觉了。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疑虑很多，切尔纳会谈期间的沉默使气氛紧张到近乎爆炸的程度，现在人们要求解释。那天直到深夜，仍有五千多人聚集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人们要求杜布切克出来报告情况。斯姆尔科夫斯基出来了，登上一个阳台向群众讲话。斯姆尔科夫斯基也疲惫不堪，但强打精神。他反复向人们保证，捷共的领导人没有背叛革命事业。人们仍然不满足，又有人高喊，要求杜布切克出来接见。这时，斯姆尔科夫斯基皱了皱眉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深情地说：“同志们，我请求你们让杜布切克休息一会儿。……他每天只睡 3 个小时。他的脑子要考虑多少问题，他肩上要挑多重的担子，……这是别人无法想象的。我敢保证，即使杜布切克同志来了，他用斯洛伐克话对你们说的，同我用布拉格人的捷克话告诉你们的，会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我们两个人有着共同

的语言。”^①至此，人们才逐渐散去。

实际上，杜布切克还是太天真了，正如卡达尔后来警告杜布切克的：“你还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

①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525页。

七、同室操戈，心狠手辣

1. 军事行动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

7月30日，当切尔纳会谈正在进行的时候，苏共中央政治局指示苏联驻柏林、华沙、布达佩斯和索非亚的大使们，分别拜会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和日夫科夫并告知他们：“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谈期间，根据苏共中央的建议，双方代表团达成了协议。”实际上，7月30日是切尔纳会谈双方争论极其激烈的时候，几乎濒临破裂的临界点。在这个时候苏共中央政治局给苏联驻东欧各国的大使们发去这个指示，只能表明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柯西金等的“政治解决派”（姑妄称之——作者）仍占有优势；显然是7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勃列日涅夫也没有完全放弃政治解决的希望。原定华沙条约缔约国首脑会晤推迟到8月3日举行，会晤地点从莫斯科改为布拉迪斯拉发。

苏共中央为布拉迪斯拉发会谈规定的基调是：“使包括捷共在内的所有参加会谈的党都证实自己是忠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证实自己准备发展、加强和保卫社会主义成果以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的意向。”苏共的意

图十分明白，即要求捷共担保：继续遵循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损害华沙条约组织的利益。杜布切克曾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即将来访”为由，要求推迟会谈日期，被勃列日涅夫拒绝。继之，杜布切克又提出：“邀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团一起参加会谈”，也被勃列日涅夫断然拒绝。这样，捷共只好推迟铁托和齐奥塞斯库来访的时间，参加布拉迪斯拉发会谈。

1968年8月3日，苏、波、捷、匈、保、民主德国等华沙条约六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在斯洛伐克的多瑙河港口城市布拉迪斯拉发的明镜大厅举行会谈。根据切尔纳会谈达成的协议，杜布切克率捷共代表团参加会谈；而会谈的内容也不涉及捷的局势问题。勃列日涅夫代表苏共中央，切尔尼克代表捷共中央，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领导人，通报了刚刚结束的苏、捷两党切尔纳会谈的情况。布拉迪斯拉发会谈于当天结束，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只是笼统地说：不允许任何人离间社会主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重申“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声明表示六国党都要遵循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加强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向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展开无情斗争。声明也提出：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合作要建立在平等、尊重主权、民族独立、领土完整、兄弟互助和团结的原则基础上，要考虑本国的特点和条件。

关于布拉迪斯拉发会谈和联合声明的发表，苏共中央认为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把前些时候曾在五党华沙信函（指7月14日苏、波、匈、保、民德等五国华沙会议通过的《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名信——作者）中所反映的共同

立场固定了下来。这些立场指：“如对社会主义国家已走过来的道路的评价；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性，首先是对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确认；关于必须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反击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原则；今后要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行协调和协商的相互责任，”等等。^① 苏共中央自鸣得意地认为声明中“把这些原则固定下来的事实本身，对支持捷共现领导和党内、国内的健康力量，对反击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当前帝国主义猖狂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声明是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及其图谋的一个打击。”^②

8月3日当天，捷国防部宣布：6月20~30日在捷领土上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参谋部演习的最后一批苏军已经撤离捷。但是据外国通讯社报道，进入捷参加演习的苏军并未撤回原驻地，大约有40万大军集结在靠近捷边境的地区，此外，在波兰和民主德国的空军基地还停靠着300来架待命起飞的军用飞机。当天，切尔尼克在布拉格党的干部大会上讲话，向6000多名听众介绍布拉迪斯拉发会谈的情况。他说：六国党的联合声明的任何结论都没有迫使捷共修改内外政策的原则立场；捷共可以继续实行已经实行的政策，并进一步发展它。切尔尼克还乐观地告诉党的干部听众：捷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筹备自己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杜布切克也发表电视讲话，说：六国党的布拉迪斯拉发会谈对捷共是有利的，是为捷的民主化进程开辟了新的天地；为捷的国家主权担心是

① 《苏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在蒂萨河畔切尔纳的会谈，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结果向党的积极分子的通报》，载《祖国档案》1993年第3期，（俄文）。

② 同注①。

没有根据的。8月4日，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会议，肯定捷苏两党的切尔纳会谈和六国党的布拉迪斯拉发会谈，“是与会各党代表团的共同成就”。^①

从苏、捷两党对切尔纳会谈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谈的结果的反映来看，苏、捷两党和两国的关系是既复杂又微妙的。诚然，无论是切尔纳会谈所达成的协议，或者布拉迪斯拉发会谈所发表的联合声明都采用一般性用语，笼统地阐述一般性原则，双方都可以将其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倾斜，进行符合自己意愿的解释。但是，就苏共来说，是指望捷共内部“健康力量”的集结和行动；指望通过这两次会谈向捷共内部的亲苏派明确表示苏共的态度，鼓舞他们采取行动，使苏联能兵不刃血地制止捷的改革，扑灭捷的民族独立火焰。

在切尔纳会谈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非常强调：会谈必须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的会晤。我们认为必须进行这种人员组成的会谈”。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之所以如此看重“全体成员的会晤”，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我们知道，捷共中央领导层内部不一致，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立场在捷共官方文件里没有得到反映。建议进行这种人员组成的会晤，我们是要创造条件，让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有可能了解苏共领导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真正看法，并发表自己对事件的判断，提出自己关于使国内局势正常化的必要措施的建议。我们也考虑到，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以往参加会谈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远没有充分地、而且也不总是正确地向自己的主席团阐述苏共的立场，常常错误地解释我们的看法。总想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苏共中央赞成回到一月

① 参见《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534页。

份以前的局面，反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等等。如果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都出席会谈，就可以排除这种情况的发生。”^①苏共中央把切尔纳会谈看作是自己的胜利，还能推动捷共内部“健康力量”的发展。

基于以上这些分析和判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谈以后，都纷纷离开莫斯科前往南方的黑海之滨，钻进各自的豪华别墅休养、度假去了，观察、等待捷局势的变化。不然的话，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怎么也不会有如此兴致，忙中偷闲地到南方度假。于是，这几天的局势似乎略显平静。但是，这种平静不是捷苏之间矛盾得到消除的平静，而是双方都没有从各自的立场后退，因此是矛盾即将总爆发之前的沉寂。

1968年8月初，在南方休假的政治局委员有：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谢列平、谢列斯特、佩尔谢、马祖罗夫、沃罗诺夫以及政治局候补委员格里申、库纳耶夫、马谢罗夫、拉希多夫等。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在苏联南方休假的还有一位秘密客，就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留在莫斯科的政治局成员只有党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利扬斯基。

8月8日，在南方的休养地别墅区，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苏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在切尔纳会谈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结果向党的积极分子的通报》。《通报》由苏斯洛夫牵头，由苏共

① 《苏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在蒂萨河畔切尔纳的会谈，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结果向党的积极分子的通报》，载《祖国档案》1993年第3期（俄文）。

中央书记卡图谢夫、波诺马廖夫和中央委员会部长鲁萨科夫等草拟。

《通报》在介绍了切尔纳会谈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谈的一般情况后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蒂萨河畔切尔纳会晤的发言中，依据确凿的事实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已到了危急关头。他对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直率地说，现在的问题是：要么捷共领导找到勇气重新审查自己的看法，引导党和工人阶级起来坚决行动，粉碎反动派和保住社会主义阵地；要么共产党员将遭我们共同的敌人的杀害。到那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就将完全由另一种势力来决定了。”^① 苏共中央向党和积极分子通报说：“在目前这种形势下，以最尖锐的方式公开提出问题是明智的。”《通报》最后说：克服危险倾向，巩固捷克的社会主义阵地，加强捷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所有这些“主要取决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能否按照在蒂萨河畔切尔纳达成的协议和在布拉迪斯拉发通过的联合声明行事”。《通报》认为：但是，自那时以来，无论是捷共中央主席团的立场，还是对事态发展的观察，“目前都不能让人足以相信，在六个兄弟党的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原则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在双边会晤时所作的保证，将会在实际中加以兑现。苏共中央政治局今后仍将密切注视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发展，并根据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捷共党员捍卫本国的社会主义成果。”^②

《通报》的结论实际上已经明白地告诉苏共的积极分子：捷

① 《苏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在蒂萨河畔切尔纳的会谈，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结果向党的积极分子的通报》，载《祖国档案》1993年第3期（俄文）。

② 同注①。

共中央如不按苏共中央对两次会谈协议的理解去执行，苏联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巩固其“社会主义成果”；而目前无论是捷共中央主席团的立场，或者是事态的实际发展，都看不出捷共中央会按苏共中央对两次会谈协议的理解去执行。这个《通报》实际上是向苏共的积极分子吹风：苏联为了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巩固已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将对捷采取极端措施。

8月8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都发表社论，有针对性地强调：各党都应当贯彻六国兄弟党在布拉迪斯拉发通过的联合声明；苏联对东欧“兄弟国家的情况不能漠不关心”。

8月9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访问布拉格。铁托是来向杜布切克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因为杜布切克一直在寻求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支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影响力的中国自“中苏大论战”以来，一直把捷克斯洛伐克看作是紧跟苏联的“小修”；“文革”高潮期间，对杜布切克在捷进行的改革更不以为然。铁托的来访被杜布切克看作是“雪中送炭”，而铁托确实是杜布切克的积极支持者。

早在7月12日，即苏、波、匈、保、民德等五国党联名敦促捷共中央到华沙接受裁决的时候，铁托即发表公开谈话，说：“我不相信在苏联会有人如此眼光短浅，以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问题诉诸武力政策。……毫无疑问，一个或几个国家干涉另一国家的内政将是极端错误的。”^①

① 〔英〕斯蒂芬·克利福德编《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529页，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

7月18日，即杜布切克发表电视讲话反对苏联等华约五国联合制裁捷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发表公开声明，支持捷共中央委员会及其现领导。声明说：“目前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首先反映出为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进一步发展这些关系的客观必要性。南共联盟的立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共产党及其他社会进步势力是估计本国形势和应该为解决积压多年的问题而动员起来的惟一的力量。他们最了解自己的情况、要求和能力。中央委员会深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和进步势力有足够的力量对危害社会主义成果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任何企图给予回击。”^①

铁托的来访不仅使杜布切克等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派领导人受到鼓舞，即使一般市民也把这看作是对捷极大的支持，因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当铁托来到总统府拜会斯沃博达总统时，几千名自发赶来的市民不顾保安人员的阻拦，冲开总统府的大铁门，涌进总统府的院子里，把铁托围在当中，向这位南斯拉夫领袖和英雄表示敬意。这期间，有人还试图拥抱铁托，被保安人员制止。群众的这种自发行动，虽然使捷政府和保安部门有点手忙脚乱，但毕竟没有出任何意外，反而洋溢着群众出自内心的欢欣，以致《红色权利报》主编什维斯特卡决定将报道铁托来访的版面尽量压缩，以减少影响。10日晚，铁托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南、捷两国的政治关系极好；他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显示两党的友好关系和支持捷克社会主义的发展”。铁托认为：捷的民主化进程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同时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也是重要的。当有记者问到有人要干涉他国内政时，铁托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错误的”，“这

① 《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528页。

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害的”。^①

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实际上是朝着捷共领导人的安排、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选举出席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已经完成，选出的代表80%支持、拥护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改革和维护民族独立、国家自主的方针。斯洛伐克共产党将先于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于8月26日召开代表大会。种种迹象表明，比拉克这位始终紧跟苏共的捷共内部“健康力量”核心人物，很可能难以继续担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了。

8月10日，《红色权利报》公布了将提交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讨论的党章修改草案。这个草案对原党章的突出修改是：当党代表大会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之后，少数人仍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可以要求把他们的意见记录下来存档。新的党章草案还规定：要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党的领导人；党的领导人既不应在党内兼任其他高级职务，也不应在政府内兼任其他高级职务；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报刊上批评党和党的领导人。^②新的党章草案将使捷共进一步扩大民主度。在此时的形势下，扩大民主度会继续树立杜布切克和改革派在群众中的信任度，杜布切克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已经上升为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英雄、国家的代表、捷共的领袖。

自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后的一个星期里，局势确实变得对苏联更为不利，而且将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向前滑行。

8月9日，勃列日涅夫从苏联南方休养地打电话给杜布切

① 见《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534页。

② 见《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534页。

克，敦促杜布切克赶快执行在切尔纳会谈时所作的保证。勃列日涅夫在电话里十分不满地说：“你们和我们在蒂萨河畔切尔纳会谈时所承担的义务，并没有得到执行。”勃列日涅夫要求杜布切克马上贯彻在切尔纳会谈上关于调动干部的承诺。杜布切克在电话里表示接受勃列日涅夫的意见，但是说明：调动党的领导干部岗位要通过捷共中央全会；杜布切克向勃列日涅夫保证：“10天后我们将召开中央全会。”对此，勃列日涅夫仍不满意。接着，勃列日涅夫在电话里又提出：“在切尔纳，你和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亲自答应在几天里改组和划分内务部。”杜布切克保证说：切尔尼克和列纳尔特已经制订了禁止自发集会的措施。勃列日涅夫哼着说：“这些集会已经不是什么‘自发的’了，而是齐萨口和其他反党分子召集起来的。”^① 通话没有结果，勃列日涅夫气呼呼地搁下电话。

随后，苏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向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通报了勃列日涅夫与杜布切克电话通话的结果。苏共中央政治局要求乌布利希作出他自己的努力，促使杜布切克兑现现在切尔纳与苏共中央达成的协议，包括：控制大众信息媒体；禁止社会民主党、俱乐部等组织机构的活动。苏共中央政治局在给乌布利希的信中指出：“勃列日涅夫同志希望，您、乌布利希同志在与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的双边会晤时也高度重视一下，准确地兑现兄弟党的声明的可能性，重视一下在切尔纳会晤时达成的协议的履行情况。关于那次会晤，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谈时，在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同志在场的

^① 转引《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俄文），载《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6、7期。

情况下，通报给了兄弟党。”^① 乌布利希是积极主张及早对捷采取军事行动的人，他甚至认为布拉迪斯拉发会谈也是白白浪费时间。

8月11日，苏军又沿着捷边境举行军事演习。同时，苏、波、民德宣布：从即日起在波兰和民主德国南部以及苏联的乌克兰西部举行通讯兵联合演习。捷已经是大兵压境了。7月19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军事解决的方针基本上定下来了，但是，是否付诸实施尚未最后敲定，与此相联的就是尚未完全放弃政治解决的努力，于是才有7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发给几个驻东欧国家苏联大使的指示，才有布拉迪斯拉发会谈。切尔纳会谈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谈后，莫斯科对布拉格又观察了几天。但是，一个星期来莫斯科看到的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景象。杜布切克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朝着一个方向坚定不移地前进，就是：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保障出版自由、人身自由；党对国家和社会是发挥指导作用、而不是控制作用；工业生产的决定权分散化，经济生活向市场靠拢，国家逐步向欧洲、乃至全世界开放；实施让选民自己作主、能体现选民心愿的选举制度；各民族一律平等，任何一个民族也不能拥有超过其他民族的特殊的权利。杜布切克虽然把捷克斯洛伐克定位在华沙条约的范围内，但已是一条新的道路。至此，苏联才把军事行动提上日程。8月11日苏军的军事演习，实际上是苏军进入出发阵地待命。

8月12日，乌布利希访捷，在捷西部的卡罗维发利市和杜布切克会谈。在会谈中，乌布利希向杜布切克提出一个奇怪的

^① 转引《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俄文），载《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6、7期。

问题：“我是到你们这里来访问的，但是在机场上我只听见人们一个劲儿地高呼‘杜布切克！’‘杜布切克！’听不到别的口号，这是不是由于我不懂捷文，没听懂？”乌布利希认为应当同时高呼“乌布利希”，不然就有“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嫌！对于这种诘难，杜布切克只好一笑置之。乌布利希要求杜布切克履行切尔纳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保证向“反社会主义势力”展开斗争；同意华沙条约武装部队留驻捷。乌布利希还向杜布切克提出要求：除非捷共和德国统一社会党取得一致，否则，不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不同联邦德国进行任何谈判。这项要求等于是让捷放弃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理所当然地被杜布切克所拒绝。杜布切克的回答是：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协调外交政策是重要的，但要捷同意和一个特定的国家密切配合是办不到的，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给这个特定的国家以永久的否决权。杜布切克和乌布利希会谈的气氛十分冷淡。乌布利希什么也没有得到，实际上乌布利希也不指望得到什么；乌布利希只是在苏联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燃放一个政治烟幕。

8月13日，勃列日涅夫再一次从南方休养地给杜布切克打电话。勃列日涅夫要求通话时让比拉克也在场，杜布切克没有听从勃列日涅夫的安排，而是让斯姆尔科夫斯基在场。

勃列日涅夫一上来就指责捷的大众宣传媒体我行我素，仍然在进行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勃列日涅夫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并一致得出结论，有一切理由认为目前的局势是违反蒂萨河畔切尔纳达成的协议的。我指的是我们俩单独谈话时达成的协议，我指的是我们四人会晤时达成的协议，我指的是我党政治局与你党中央主席团之间

达成的协议。”^①

杜布切克据实辩解说：“就我所知，最近没有任何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攻击性言论。”勃列日涅夫不理睬杜布切克的解释，继续说：“最近二三天的报纸继续拚命刊登诬蔑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文章。我的政治局的同志们坚持就这一问题同你们紧急交涉并发一份相应的照会。我无法不让我的同志们不发这个照会。”杜布切克耐着性子说：“我们开了一个报界工作人员会议，会议谴责了一些报刊的不负责任行为。”勃列日涅夫打断杜布切克的话，说：“萨沙（杜布切克的昵称——作者），问题不在这里，……我说的不是开开会议，我说的是要具体措施。要知道我们具体谈了贝利康（捷电视台总经理——作者）的作用问题，说到了必须撤销佩利坎的职务问题。这是整顿好大众媒体机构秩序的第一步。”

勃列日涅夫不让杜布切克说话，紧接着责问：关于内务部机构的变动和捷共中央领导成员的变动，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见诸于行动？杜布切克告诉勃列日涅夫：“8月13日，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议程中已经包括内务部的分家问题。这个问题在蒂萨河畔切尔纳会谈时已经说妥了。”勃列日涅夫马上把话截住说：“那末这个问题将如何解决呢？……我想提醒

① 引文见《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勃列日涅夫所说的“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到目前为止，在政治局会议纪录中没有发现关于履行切尔纳协议过程的讨论情况。这可能是出于如下原因：一、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没有作记录，这种情况常有；二、不是政治局正式会议，只是直接交换意见的碰头会；三、勃列日涅夫抬出“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是为自己的说话增加分量。勃列日涅夫所说的“四人会晤”，指切尔纳会谈期间，苏方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等四人，捷方由杜布切克、斯沃博达、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四人，在小花园进行的核心圈会谈，实际上是“八人会谈”。

你，你还记得，你提出这个问题时问过切尔尼克。切尔尼克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在5天内交斯姆尔科夫斯基去办这件事。那时，你再问斯姆尔科夫斯基。斯姆尔科夫斯基说：只要切尔尼克把这份文件一送来，国民议会在5天里就把它解决掉。”勃列日涅夫的话很清楚：像内务部分家这样的事，在切尔纳会谈时已说定了的，你们尚且拖着不办，不是有意顶着又是什么？

杜布切克这样辩解：“是啊，那时在切尔纳是这样说的，可是现在形势变了。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联邦化的过程，将会出现斯洛伐克联邦和捷克联邦。因此，我们今天在主席团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会有一个明确的解答，即委托政府和部长提出相应的设想。”勃列日涅夫一定要杜布切克回答：什么时候解决？杜布切克就说：10月、10月底吧！“我们坚持认为需要采取这项措施（指内务部分家——作者）。只是形势变了，这个问题需要另外考虑，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不取决于主席团了。”勃列日涅夫再提出：为什么还没有解除齐萨日、克里格尔、贝利康的职务？杜布切克则重复说：所有干部问题只能在中央全会上解决。杜布切克面对勃列日涅夫连珠炮般的诘难，反复说：形势变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提到中央全会上去，不可能在主席团里决定。杜布切克在艰难地与勃列日涅夫周旋。

勃列日涅夫阴冷地说：“萨沙，请允许我向你提个问题，即哪些事还取决于你们主席团？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你们党中央主席团什么也主持不了了。我们很遗憾，这一情况在蒂萨河畔切尔纳会谈时并不知晓。……我奉劝你在8月13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尽快就干部问题作出决定。这样，对于挽救局面还有最后一线希望，不花很大代价，不受很大损失。否则的话，事情会

更糟，所受损失会更巨大。”最后，勃列日涅夫愤然地说道：“你要知道，履行蒂萨河畔切尔纳会谈时所承诺的义务的这种态度，正在营造一种全新的局势。显然，它迫使我们按新的方式来评价形势，并采取新的独立措施。”杜布切克很清楚，勃列日涅夫所谓的“新的独立措施”意味着什么，但是并不屈服，抗争说：“勃列日涅夫同志，那就采取所有的措施吧！只要你们中央政治局认为是正确的措施。”

对于杜布切克来说，为了免遭苏联军事干涉的危险，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要面对国内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压力；还要顶住苏联和华沙条约其他国家的攻击，有时候不得不在苏共面前忍气吞声。他认为，自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以来，自己为履行切尔纳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已经做了可能做的一切；在 10 天里，再要做更多的事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可是，勃列日涅夫俨然以老子党的口吻谩骂“这是一场骗局”，威胁要“采取新的独立措施”。对于有民族正义感的杜布切克来说，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

听了杜布切克这样回答，勃列日涅夫说：“但是，如果你这样回答我的话，我应该告诉你，萨沙，这个声明是不严肃的。”

至此，杜布切克已忍无可忍受了。他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吼道：“下次在中央全会上另选一位第一书记吧！”勃列日涅夫插话说：“萨沙，别走极端，这完全是不必要的。”杜布切克继续吼道：“我到哪儿工作都可以，我不稀罕这个职位。让谁干都可以，让谁当捷共中央第一书记都可以。我不能再在得不到支持和经常受攻击的情况下工作了。……我已经精疲力尽，新的中央全会将选一名新的第一书记，我不是随便对您说的。我想离职了，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之父名和名——

作者)。请您原谅，我今天也许说了一些气话。”^①

勃列日涅夫气得连话都说不出，通话就此结束。

2. 箭在弦上

苏联选定8月20日对捷实行武装占领，是在8月10日前后。8月13日勃列日涅夫和杜布切克通话，要求和语气都带有最后通牒的气味。勃列日涅夫要求让比拉克在场，无非是想给比拉克某种暗示。通话的结果是，杜布切克拒绝了勃列日涅夫的“最后通牒”。8月10日后，待命的苏军已进入出发阵地，处于临战状态；苏共中央也着手入侵工作的具体实施。

8月14日，苏联驻民主德国的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8月16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伊凡·伊格纳捷耶维奇·雅库鲍夫斯基元帅、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大将抵达东柏林，视察出击部队的临战状态和作最后的落实。8月17日，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到达华沙，检查出击部队的战斗准备状况。

8月16日，由基里连科主持召开留在莫斯科的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基里连科外还有政治局委员波利扬斯基，政治局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彼得·尼洛维奇·杰米契夫，党中央书记卡图谢夫、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卡皮托诺夫、费德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缅采夫，以及从南方休假地赶回莫斯科的政治

^① 引文均见《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俄文），载《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6、7期

局委员马祖罗夫。基里连科在会上通报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最新消息”，并说：苏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对捷局势的最新分析，同时“考虑了也在我国南方休假地的卡达尔同志的立场”，已就处置捷局势“制订了新的措施”。基里连科还告诉出席会议的人：“卡达尔向在南方休假的勃列日涅夫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以后，并与日夫科夫、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进行了磋商。”^①

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还批准了勃列日涅夫致杜布切克的信函，苏共中央政治局指示契尔沃年科大使将信转交给杜布切克。这封打印的信共两页，由8月13日勃列日涅夫与杜布切克的通话开头，一一列举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没有履行在切尔纳会谈时达成的协议的内容。信的最后，勃列日涅夫写道：“我有这样一个总的印象，捷共中央主席团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诚意和决心去履行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而这一切对于反击右翼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对于捍卫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成果是至关重要的。某些情况可能使您很紧张，我们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谈话结束时（指8月13日勃列日涅夫与杜布切克的电话通话——作者）您作了道歉，可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始终也没有弄清楚。我不想过早评价这种延误会带来什么后果，因此决定请求您通过契尔沃年科同志给我一个回答。”

在向契尔沃年科发去这封信的同时，苏共中央政治局还给契尔沃年科一个口头指示：“只要有可能，请把信件的内容告知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里戈、巴尔比雷克、皮勒尔、什

^① 《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俄文），载《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6、7期。

维斯特卡等同志。”有意思的是，这个口头指示还指示契尔沃年科怎样把信的内容告诉比拉克等苏联倚重的“健康力量”。指示说：“在您拜访杜布切克同志时，装作偶然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内碰到科尔德、英德拉或这个集团的其他同志，并对他们说，您是来转交勃列日涅夫同志给杜布切克同志的信的。您向同志们解释一下，这样做就有理由要求杜布切克同志向捷共中央主席团公布勃列日涅夫同志致杜布切克的信件的内容。”

8月16日勃列日涅夫给杜布切克的这封信，相当于“下战表”。其更阴险的是，苏共中央意在直接鼓动比拉克、英德拉等“健康力量”，在捷共中央主席团内闹事，“邀请”苏军来“维持秩序”。这样，内外夹击，苏军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应邀”开进捷克，赶走杜布切克等维护捷民族独立的改革派，重建一个百分之百听从克里姆林宫号令的捷共中央和捷政府。苏共中央的考虑和布置可谓是周密的了。

8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提前结束休假，返回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当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对捷克实行武装干预。

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早已准备好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在全面分析了捷克斯洛伐克最近几天的形势和事件以及讨论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政府成员希望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给予他们军事帮助来反击反革命势力的请求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最近几天的发展已具有了最危险的性质。右翼分子依仗帝国主义反动派公开的和秘密的支持，正在准备反革命政变。……鉴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已经使尽了所有促使捷共领导反击右翼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政治手段，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是到了采取积极措施以捍卫捷

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时候了。为此，一致决定：以武装力量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以帮助和支持。认为有必要呼吁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和波兰的兄弟党，1968年8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议，讨论这个问题。”^①

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特别说了“关于部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邀请苏军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说：“健康力量谈了许多关于同步行动和他们自己的计划的想法。我想，就整体而言，他们的计划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所说的行动时间，8月20日、21日，也是可以接受的。”^②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批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批准了《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和军队的呼吁书》；还规定了做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巴尔比雷克、什维斯特卡等“健康力量五巨头”的工作的措施。

政治局会议还起草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宣言》。这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连一名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捷政府部长也没有，居然起草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国家宣言，越俎代庖到了离奇的程度。这个宣言说“爬上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右翼修正主义分子向人民作了种种许诺，实际上却是一些政治上身败名裂的人。……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我国政府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未来，倡议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反动派挑起的残杀同胞的战争威胁使我们必然要求助于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盟友答应我们的请求，在面临考验的困难时刻派兵支援我国。捷共中央主席团和革命政府号召

① 《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俄文）

② 同注①。

全体公民给协助我国的盟友部队以大力协助。”^① 宣言还历数杜布切克奉行的政策的种种“错误”；开列新的“革命政府”将给予人民的种种“优惠”；论证捷必须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的正确性。苏共中央政治局还指令契尔沃年科，把这份在莫斯科炮制的《宣言》的文本转交给比拉克和英德拉，并转告说：“这份文件可以作为帮助朋友起草的告人民书的材料。”

8月17日晚，一批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专家乘苏联民航专机抵达布拉格。他们与苏联驻捷大使馆联系之后，立即与捷国家全部亲苏的保卫官员会晤，为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所应采取的措施作准备。苏联克格勃的高级官员与捷国家全部接头的主要人物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全部副部长沙尔戈维奇。威廉·沙尔戈维奇在1948年二月夺权时还是一名少尉，1950年升为少校，1958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成为一名出身职业军人的党校校长，这成了他一生的优势。不久就调到国家全部任职，授上校军衔，任副部长。他积极参与了协助苏军入侵的准备工作。但是，以后苏联对他也没有多少回报，1970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8月17日，杜布切克还应卡达尔的“紧急邀请”，飞往位于多瑙河捷克斯洛伐克一侧的边境小城科马尔诺，与卡达尔“会晤”。卡达尔，这位曾经对捷的改革表示理解、对杜布切克表示赞赏和支持的人，自从7月3日被勃列日涅夫策反以后，一反原来的立场成为入侵捷的激进派。由于他曾经支持过杜布切克，也曾反对对捷采取军事措施，在杜布切克和捷共其他领导人中留有良好印象，因而，他在鼓动苏军入侵和麻痹捷克斯洛伐克

① 《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俄文）

方面能起到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所不能起的作用。8月17日，他为勃列日涅夫充当特殊说客，装作为捷着想的姿态劝杜布切克“履行切尔纳会谈所达成的协议”；同意华沙条约缔约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驻军。这次，卡达尔碰了一鼻子灰。已经知道入侵在即的卡达尔，最后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你还不知道和你打交道的是什么人。”

8月18日（星期天），派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华沙条约缔约国领导人飞抵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他们作了即将开始军事行动的最后布置和说明。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日夫科夫等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捷的危急局势”，确实已到了不能再等待的最后关头了；“表示完全一致同意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评价和结论”；毫无保留地执行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措施。当天，他们立即回国去作最后的部署和落实去了。

8月19日，勃列日涅夫召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各加盟共和国和边疆区以及各州的党的第一书记，集中到莫斯科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内，向他们报告关于即将对捷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并要他们立即返回自己的岗位，做好一切工作。

8月19日当天，苏共中央政治局还向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发去关于五国对捷采取军事行动的指示。苏共中央政治局同时批准了塔斯社将于8月20日发表的声明文本，这个声明内称：“应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鉴于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威胁，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刻不容缓的帮助。”^① 苏共中央政治局同时批准了苏联政府关

① 《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载《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6、7期，（俄文）

于“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向联合国发出的通报。

苏共中央政治局还向苏联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发出指示，指示他们在苏军采取行动之后将此事告知驻在国政府。苏共中央政治局还特别给契尔沃年科发去新的指示，指示契尔沃年科应于20日莫斯科时间23时20分，即苏军全面出动前的一小时拜会捷克斯洛伐克总统斯沃博达，告知斯沃博达：“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应捷共中央主席团多数成员和捷政府许多成员的请求，给予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帮助，以反对反革命威胁。”指示还要契尔沃年科根据实际情况见机行事：“如果总统肯定兄弟国家的帮助，那末，您掌握好必要的分寸，可以向他转交作为他告军队和人民书的文本草案。”^① 实际情况是斯沃博达立即谴责了苏军的人侵并向杜布切克报告紧急情况。可惜这些都已于事无补了。

苏联关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早已作好战斗准备，在出击阵地上待命的苏军部队只等出击的命令了。

3. 血色的“8月20日”

8月15到17日，杜布切克忙于接待来访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8月15日晚，斯沃博达在总统府为来访的罗马尼亚贵宾举行盛大宴会，各国外交使节都应邀出席。斯沃博达、杜布切克、切尔尼

① 《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载《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6、7期，（俄文）。

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陪同齐奥塞斯库围坐在一起，亲切交谈。已经知道大厦即将倾覆的契尔沃年科，单独端着酒杯站在大厅的一角，注视着一切。宴会结束，罗马尼亚的贵宾离开以后，《纽约时报》驻布拉格记者塔德·舒尔茨想请杜布切克为《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谈话。杜布切克平静地回答说：我现在很忙，能否等到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结束以后？说完就匆匆离开总统府。17日上午，齐奥塞斯库离开布拉格回国，各国外交使节也应邀到机场为齐奥塞斯库送行，布拉格的气氛仍然是平静的。

8月19日，杜布切克收到由契尔沃年科大使交来的勃列日涅夫的信。18日，苏联《真理报》又发表长篇文章，指责捷的“反革命分子”在加紧进行“颠覆活动”并要把捷拉回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去”。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纸和电台按杜布切克的要求，对苏联报刊的无中生有的攻击，都不予理睬。

这几天，捷共中央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局势暂时不会出现动荡；捷共中央的主要注意力都转到筹备即将召开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去。8月19日，是个安静的夏日。这天上午，斯沃博达总统接见了六名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天主教主教，讨论国家与教会之间的某些协调问题。这是自1948年二月夺权以来，总统第一次接见一个天主教主教代表团，表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宗教政策也将作重大调整。也是在19日，切尔尼克总理发表谈话，说：关于捷正在考虑向世界银行和西方公司要求贷款的消息不符合事实；不过个别企业确有从西方公司获得贷款以扩大生产的意向。

8月20日，捷共中央安排举行主席团会议，议题是讨论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主席团会议于下午2时开始，一直延续到晚上。杜布切克原打算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宣读勃列日涅夫的来信，由于讨论有关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

会的工作，把宣读勃列日涅夫来信的事搁下了。

主席团会议进行到晚上，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科尔德，列席会议的中央书记英德拉突然提出，要求分析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谈以来的政治形势。按计划，接下来他们将提出一个所谓“谴责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颠覆活动”的决议草案，同时批评主席团无力掌握局势，要求杜布切克辞职，重组党中央主席团，重新组织新的政府。但是，科尔德和英德拉提出后，大多数主席团委员都反对讨论“政治形势”；比拉克、什维斯特卡、巴尔比雷克等看看形势不利没敢吭声。会议认为科尔德的提议“不合时宜”，被拒绝，而科尔德也不敢把下一步计划亮出来。按苏共中央的计划，科尔德、英德拉等在捷共中央主席团内一发难，苏军就“应捷共中央主席团多数成员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许多成员的请求”，长驱直入，赶走杜布切克，另组“革命政府”，一切“顺理成章”了。可没想到，勃列日涅夫的计划一开始就遇到挫折。捷共中央主席团继续开会，讨论有关召开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工作。

苏军已经开始按原定计划行动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总指挥、苏联国防部副部长、苏联陆军总司令伊凡·格里哥利耶维奇·巴甫洛夫斯基大将早已到达指定位置。

8月20日下午4时左右，布拉格鲁津机场指挥台接到两架苏联民用客机要求临时降落的信号。这两架苏联民用客机声称：飞机出现技术故障，必须在鲁津机场等候莫斯科空运配件，机上是要去南斯拉夫的乘客。鲁津机场是国际机场，按惯例应当提供这类帮助，更何况是苏联的客机。飞机安全降落后，停靠在机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机上下来的几十人穿着统一的服装，提着统一的箱子。机场警察以为是运动员，也没怎么在意。

午夜 11 时，原来安静地坐在鲁津机场候机大厅里的几十名苏联乘客，突然从各自的箱子里取出手提机关枪，按各人选定的位置，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的要害部门。原来这批“乘客”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苏军突击队员；那两架发生“技术故障”的飞机，是活动雷达站。3 分钟后，第一架装载着坦克的苏联巨型安-12 运输机在活动雷达站的指挥下降落。坦克发出轰鸣冲出机舱，迅速占领了整个机场。接着，每隔一分钟就有一架苏联巨型运输机降落，坦克、装甲车、火炮、全副武装的苏军及各种军用物资倾泻而出。契尔沃年科大使派来的“向导”也进入机场，带领刚刚着陆的苏军迅速扑向布拉格的捷共中央委员会大厦、总统府、政府办公大楼、伏尔塔瓦河上的桥梁、捷通社、电台、《红色权利报》社、军事设施等目标。

几乎也是午夜 11 时，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军队，像潮水般地分 8 路涌入捷克斯洛伐克。入侵者没有遭遇到抵抗，就像前不久来捷举行军事演习一样。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军队计有：苏军 16 个师约 17 万人，其中 10 个师来自苏联本国，6 个师是驻在民主德国的苏军；波兰正规军 3 个师约 4 万人；民主德国 2 个师约 15000 人；匈牙利 2 个师约 15000 人；保加利亚 1 个师且不满员，约 5000 人。从军事上说，5000 人的保加利亚军队是无足轻重的。勃列日涅夫让保加利亚来参加这次苏联发起的行动，是出于“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行动”的政治考虑。这支小小的保加利亚军队，先从保加利亚的黑海港口瓦尔纳空运到苏联的敖德萨，再从敖德萨空运到民主德国与捷相邻的厄尔士山脉一线出发阵地，然后行动。如此复杂的“周游”是因为罗马尼亚坚决拒绝保加利亚军队过境或飞越其领空；以致一个多月后保加利亚军队撤回本国时，也只得按原路“周游”回国。华沙条

约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线军队 24 个师约 25 万人，无论从政治和军事上说，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都是附庸。

在苏军大举入侵的同时，20 日午夜 11 时一过，契尔沃年科大使就驱车前往总统府，通知斯沃博达：华沙条约国军队已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斯沃博达已没有时间谴责契尔沃年科，他立即驱车赶往党中央大厦；他知道，党中央主席团在开会。

党中央主席团会议进行到午夜，突然，切尔尼克被叫出去听电话。一会儿，切尔尼克回到主席团会议室告诉大家：电话是国防部长楚尔打来的，楚尔在电话里说，苏联和华沙条约另外四个国家的军队已经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境了；他在办公室里被两名苏联军官扣押，只准给总理打电话。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等人早已明白就里，但其他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确实感到像突然遭到雷击一样。杜布切克听后说：“他们真的动手了，冲着我来了！”“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荣誉保证，我根本没有怀疑过，没有料想到，竟然会有人采取这样的手段来反对我们。”克里格尔怒骂：“这是对我们民族的背信弃义行径。”有人提议：立即把斯沃博达总统请来。比拉克从座位上站起来，有点歇斯底里、又有点作贼心虚地嚷道：“你们整我吧！为什么不杀了我？！”有人提出要辞职。种种表现都说明，苏军的突然大举入侵，除了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等几个人之外，其他人确实没有想到。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6、7 月份的时候想到过有武装干涉的危险，但是，从切尔纳会谈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谈后，他们以为武装干涉的危险警报已经解除。杜布切克对于勃列日涅夫在电话里的几次威胁和 8 月 16 日来信，也当作是“威胁、威胁！”没有想到勃列日涅夫会真的动手。这也说明，杜布切克等人在政治上有过多

的理想主义成分和天真，对本国、对东欧的历史和现实缺乏政治上的深思熟虑，这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

但是，杜布切克绝对不是政治上的懦夫，没有忘记他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很快使大家的情绪安定下来，回到现实中来。主席团首先决定：谁都不能辞职，一切合法成立的机构及其领导干部都必须坚守岗位；决不能在武装干涉下成立什么新机构，搞新的任免。此时，斯沃博达总统也赶来了，他完全赞同这一决定。斯沃博达反对任何人辞职或擅离职守。

接下来讨论的是：是否号召军队和人民起来抵抗？主席团会议几乎都认为武装抵抗无论从军事上考虑或政治上考虑都是不可取的，而且也不现实。且不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毫无临战准备，军事指挥机关已全被苏军控制，指挥系统已全部落入苏军手里；就连国防部长楚尔和总参谋长贝德日赫，也一直主张和执行捷必须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防御能力”的方针，把捷的防御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子体系。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从上到下重要部门都有苏联军官，名曰“顾问”实是监督。在军队系统中，主张捷军队和防务应当走自己独立的建军道路、建立捷克斯洛伐克独立的防务体系的高级将领是普尔赫利克上将。但是，他被苏联看作眼中钉；而杜布切克又要依靠他来巩固和保卫党中央主席团的安全。1968年2月，杜布切克把他从捷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岗位上，调任捷共中央国家机关部部长，负责党中央和政府的安全保卫工作。1968年7月，在勃列日涅夫的压力下，杜布切克解除了普尔赫利克的国家机关部长职务，打算重新安排到军队系统中就职，但还没有安排。因此，捷人民军虽然有4个坦克师、8个机械化步兵师、1个伞兵旅，约14万5千人，500架作战飞机、4万空军部队，但是，想仓促上阵和苏军对抗，简直是不

可能的。

当然，从民族尊严和民族气节上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号召全民抵抗也是一种选择。不过，从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所处的形势来看，这种选择肯定成为地方性的、分散的互相射击，就如同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那样；苏军更可以名正言顺地来“镇压反革命叛乱”了。

主席团讨论的基本结论是号召人民“保持平静”，对从境外开进来的军队“不要进行抵抗。”

杜布切克想起，曾收到勃列日涅夫的来信，于是从提包里摸出那封充满诬蔑和责骂的苏共中央来信念了起来。英德拉乘机起哄，说杜布切克“私藏苏共中央来信”，酿成大祸，但是没有人理会他。

杜布切克念完信，接着讨论如何对待五国的入侵？结论是必须起草一个宣言，抗议五国的入侵，于是委托姆利纳日立即起草宣言，抗议五国入侵。宣言草案中本来还有关于为什么不进行军事抵抗的解释，讨论时被删掉了。关于“武装抵抗”的表述，则写成“没有命令军队保卫国土”。

在交付表决时，比拉克、科尔德、什维斯特卡、里戈等反对提五国武装入侵是“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无表决权，但对这一提法持反对态度的有英德拉、雅盖什等。当然，他们不敢肯定“武装干涉好”，只是说些：“这样提会使问题复杂化；共产党自己的冲突由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也有错误，我们也低估了干涉的可能性”等苍白无力的遁词。投靠外国，不顾国家、民族尊严的可怜虫，毕竟是心虚的。针对上述人的意见，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克里格尔说：谁赞同干涉，谁就是对民族的背叛。

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姆利纳日起草的宣言，即《告捷克斯洛

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国人民》，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发布。《告全国人民》说：1968年8月20日11时许，苏、波、匈、保、民主德国的军队越过了捷边界，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主席团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对此都一无所知。当时，党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讨论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主席团号召全国公民保持平静，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保卫我国的国界了。根据同样的理由，没有命令我国军队、公安部队和工人纠察队保卫国土。”对于五国的入侵，《告全国人民》表示是“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告全国人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坚守岗位，“他们是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法律和规章，作为人民的代表和他们组织成员的代表当选担任这些职务的。宪法授权的有关机关已召集国民议会和共和国政府会议，党中央主席团也正在召集党的中央委员会，以便应付业已形成的局势。”^①

此时，已经是21日凌晨2时许了，杜布切克宣布散会，各返各的工作岗位，坚守各自的岗位。

应当怎样看待杜布切克作出的号召全国公民“保持平静”，号召武装力量“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的决定？应当说：这不是放弃抵抗，而是在军事抵抗已无法统一实施的情况下，进行整体性的、统一号令的、沉默的、有序的抵抗。这种抵抗是20世纪下半期，捷克斯洛伐克，包括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被组织在苏联直接控制下的“社会主义大家庭”格局内，可能采取的、有效的抵抗方式。实践表明，如果号召抵抗，演

^①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546～547页。

变成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局势，不仅无法挽救捷改革的局势，相反，只能给捷国家带来更严重的破坏，给捷人民带来更惨痛的流血和痛苦，给捷社会带来难以预计的灾难。当然，所有这些都是苏联所强加的，但在局势已无法挽回的时候，怎样既进行全民的抵抗，又减少损失和代价，确实是政治上是否明智的问题。如果杜布切克号召进行抵抗，那末，整个局势的主动权立即会转到苏联手里；苏联就不会有后来的被动，更不会与杜布切克的重开谈判了。

杜布切克的这种抵抗，姑妄叫作“沉默的有序对抗”。这种“沉默的有序对抗”是积极的、有效的。

21日凌晨2时许，杜布切克宣布主席团会议结束。斯沃博达总统返回总统府，切尔尼克也返回位于克拉罗夫区的政府大厦，——总统府、外交部、政府大厦都在伏尔塔瓦河的东岸，党中央大厦、国民议会、布拉格电视台、捷通社都在河的西岸。切尔尼克返回政府大厦打算召开政府会议，表明捷合法政府仍在行使职权。但是，正当他在召集政府成员时，一排戴深红色贝雷帽、端着上了刺刀的自动步枪的伞兵冲了进来。伞兵们强迫捷政府官员们脸朝墙壁，站成一行，——他们被俘虏了；切尔尼克被武装的伞兵押上一辆装甲车带走。此时，尚不到21日凌晨3时。

入侵者直到21日凌晨4时以后才占领党中央大厦。留在党中央大厦里的有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卡佩克，书记处成员姆利纳日、斯拉维克、萨多夫斯基以及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西蒙。西蒙是来要求提前召开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杜布切克虽然担心召开党代表大会，捷共的代表正好被苏联一网打尽，但也不反对在布置周密条件下，提前召开党代表大会。

4时以后，一辆黑色的苏联伏尔加牌小轿车开到党中央大厦，后面跟着装甲车和坦克，包围了党中央大厦。车上下来全副武装的士兵，训练有素地成战斗队形散开。

包围捷共中央大厦的是苏军著名的塔曼师，这支英雄的部队竟成为镇压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改革、扼杀捷民族自尊的一把尖刀，也是勃列日涅夫给苏军造成的悲剧。

塔曼师的全称是“荣获苏沃洛夫勋章的近卫红旗加里宁塔曼步兵师”，组建于1940年9月，番号为步兵第217师。塔曼师在卫国战争期间，1941年8月参加惨烈的斯摩棱斯克会战，英勇顽强，在苏军中首批进入“近卫”行列，称近卫步兵第2师。此后，塔曼师参加布良斯克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3月，因解放高加索地区的特殊功勋，全师获红旗勋章。1943年10月，在北高加索方面军编制内，因解放塔曼半岛战功卓著，获塔曼师荣誉称号。在接着的强渡刻赤海峡、夺取埃利季根登陆场的登陆作战中，表现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全师有806人获勋章和奖章，19人获苏联英雄荣誉称号。1944年5月，在收复塞瓦斯托波尔的战斗中，因功获二级苏沃洛夫勋章。勃列日涅夫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这支英雄的部队蒙受羞辱。

武装的伞兵冲进党中央大楼。2名军官带着10来名士兵撞开杜布切克的办公室大门，用枪对着在室内的每个人的后背，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就这样被苏军俘虏了。领头的苏军上校粗鲁地用俄语命令“俘虏”：“不准说话，不准说捷话；安静地坐着。”苏军还扯断电话线，连盥洗室也由士兵在门口看守；使用者出来以后，士兵进去检查，连马桶也不漏过，惟恐把什么东西扔到马桶里去。

21日上午9时许，苏军上校领着两名苏军军官和3名便衣特工进来，宣布：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和什

帕切克、西蒙跟他走。杜布切克问：为什么要带我们走？一名特工回答：“以英德拉同志为首的革命法庭……”。斯姆尔科夫斯基不等这名特工把话说完，立即质问：“这算什么机构？我作为国民议会主席怎么对此毫无所知？宪法中从未有关于此类机构的存在提法。”杜布切克无奈地说道：“算了吧，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的名——作者），这是毫无意义的。”特工人员要他们交出武器。斯姆尔科夫斯基哈哈大笑起来，自己假装着翻遍衣服，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放在桌子上说：“我们对自己的人民是不需要武器的。”^①弄得几名特工十分狼狈。杜布切克用他特有的威严的微笑冲着走近他的特工说：“来，搜吧，搜吧！”此时，苏军上校也自感这场戏演得太蹩脚，就催着众人快走。临走时，斯姆尔科夫斯基从桌上抓了几块方糖放到口袋里，对同伴说：“这很有用，你们也装上点，这是我在鲁津坐牢时学来的经验。”

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西蒙以及切尔尼克等6人，就这样被苏军抓走了。什帕切克和西蒙随后被释放。

4. “革命政府”胎死腹中

早在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自导自唱草拟了一份所谓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宣言”，声称：国家面临反动派挑起的、残杀同胞的战争威胁，请求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军队来帮助”，重建“革命”政府。一面出兵

^① 见《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212·213页。

占领另一个“兄弟国家”；一面在这个国家里物色几个人建立听命于自己的“革命政府”，是苏联的拿手好戏。1956年10月，苏联镇压匈牙利事件，扶植卡达尔，处置纳吉，就是这么干的。这次，勃列日涅夫以为是轻车驾熟，老戏重演。

重提苏联当年在匈牙利拼凑“工农革命政府”那不光彩的一幕，不得不牵涉到赫鲁晓夫和卡达尔。本书不描绘匈牙利事件的全景，更不全面评价赫鲁晓夫和卡达尔，仅仅从勃列日涅夫也醉心于拼凑捷“革命政府”，却胎死腹中，从对这两番情景的比较中涉及赫鲁晓夫和卡达尔。

1956年10月24日，匈牙利人民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充当苏联的传声筒和拐棍由极度不满而终于爆发为全面抗争，全国局势，尤其是首都布达佩斯已陷于一片混乱的时候，纳吉被任命为政府总理。25日，卡达尔被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听命于苏联的拉科西、格罗把匈牙利搞得一塌糊涂，自己实在无法维持的时候，把烂摊子扔给了纳吉。纳吉诚心诚意地与也是刚刚接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卡达尔合作，为疏导人民的不满、安定匈牙利的秩序，做了他能够做的种种努力。但是由于苏联的军事干预使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化。10月28日下午5时，纳吉采取了一项果断的行动，他在布达佩斯电台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称正在发生的事件是一场“为了匈牙利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进行的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一旦局势正常，政府将成立一支由武装工人和青年组成的“国民警卫队”来取代国家保安部队；苏军应立即撤出布达佩斯，并进一步与苏联谈判苏军从匈牙利领土全部撤走的问题。10月30日下午2时，纳吉再次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宣布匈牙利政府恢复1949年以前那种有各民主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取代一党专政的政府。

第二天，10月31日，卡达尔表示积极支持纳吉在匈牙利建立多党制政府的主张，并以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解散实际上已经崩溃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重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祈望已威信扫地的匈牙利共产党^①能有一个新的形象，以便在新的多党制政府中争取新的地位。11月1日，卡达尔还对当时是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尤·弗·安德罗波夫满脸严肃地说：“我根本不考虑个人会遭到什么命运，但作为一个匈牙利人，必要时我准备战斗。如果你们的坦克进入布达佩斯，我将走上街头赤手空拳地和你们搏斗。”^②这番慷慨陈辞，无私的襟怀、无畏的决心确有点震慑人心。直到当天晚上10时，卡达尔还通过科苏特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盛赞人民起义，再次表示坚定地支持纳吉。

患难时得到的支持是最可珍贵的。纳吉很高兴能得到卡达尔的全力支持，满怀信心地与卡达尔合作，为建设匈牙利新政府和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而努力，以为布达佩斯的局势在向稳定的方向转化。

但是，当纳吉在作新的规划时，11月2日早晨找不到卡达尔了。原来就在11月1日晚上发表完支持纳吉政府、反对苏联军事干涉的广播演说之后，听说苏军即将大规模出动、苏联属意由他来另组政府时，他就钻进汽车来到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随即又由苏军护送到苏联乌克兰靠近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边境城市乌日哥罗德。11月2日晨，纳吉还蒙在鼓里，寻找卡

① 在苏联的策划下，匈牙利共产党于1948年6月12日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宣布与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并于当天召开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② 转引〔匈〕墨雷·蒂波尔著，保泽施、吴穷译《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二天——纳吉·伊姆雷与匈牙利革命》，第18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

达尔来商谈国事；此时的卡达尔已经在乌日哥罗德与赫鲁晓夫会晤了，并且受命由他牵头另组“工农革命政府”，由苏军坦克护送他回布达佩斯，对付纳吉政府，对付他昨天刚刚盛赞过的人民起义，重建匈牙利秩序。

当然，卡达尔是不赞成苏联出动大军的。但是，如果没有苏联出动大军护送，卡达尔能回到布达佩斯吗？如果离开苏军的保护，卡达尔的“工农革命政府”又从何而来？卡达尔既然弃纳吉而去，跑到苏联接受赫鲁晓夫授予的“工农革命政府”总理的桂冠，又说什么“不赞成苏联出兵”，究竟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只有天知道了！

有些著作，一、二、三、四地解释卡达尔跑到苏联大使馆去的原因。在政治斗争的激烈时刻，要为政治抉择寻找原因，这一点也不难。实际上在政治斗争风云激荡的时候，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人物确实有多种选择；而每一种选择也都有一定的“理由”，即都有某种现实的依据性和可行性。但是，究竟作出何种选择，就看处于关键地位上的人物的素养和人格力量了。像卡达尔这样，刚刚还慷慨激昂、信誓旦旦地支持纳吉政府；话音刚落，立即投靠苏联、出卖纳吉，自己当起“工农革命政府”总理。为这样的行为寻找随便什么样的原因都是枉然的！1956年10月匈牙利的命运竟是如此。

还有一种解释，说11月1日晚上是明尼赫把卡达尔推进汽车开往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即使是明尼赫把卡达尔推上汽车，脚可是长在卡达尔身上，也可以不去，又不是武装绑架。再说，到了苏联大使馆，也可以不去苏联；到了苏联，还可以不答应。

在11月1日晚，卡达尔去苏联大使馆之前，卡达尔本人或者通过第三者，已经与苏联有过接触或谈判了。不然的话，很

难想象，明尼赫这么一推，卡达尔就会半推半就地上了汽车，到苏联大使馆去另组“工农革命政府”去了。要知道，这可不像是被朋友拉去上咖啡馆喝咖啡！

总之，1956年11月，苏联在匈牙利找到卡达尔，顺利地（应当说是成功地——作者）建立了“工农革命政府”。^①

1968年8月，勃列日涅夫想仿效他的前任，在捷也扶植一个“革命政府”，勃列日涅夫对捷共的那批“健康力量”充满信心。

8月21日凌晨，即杜布切克宣布中央主席团会议结束后，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等就溜出去了，英德拉很想圆一圆总理梦。英德拉在契尔沃年科和帕夫洛夫斯基的陪同下来到已被苏军包围的总统府，递给斯沃博达一张据说是切尔尼克签名的“辞职书”，要求总统“委托英德拉组织政府”。斯沃博达总统当即拒绝并且表示：没有杜布切克参加，绝不与苏联谈判任何问题。斯沃博达的凛然正气令契尔沃年科和帕夫洛夫斯基肃然，更令英德拉汗颜。这伙人只好灰溜溜地退出总统府。

8月21日早晨5时25分，塔斯社通过伏尔塔瓦电台向全世界发表声明：“塔斯社授权声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政府领导人向苏联及其他盟国提出请求，希望给予兄弟的

① 卡达尔等在苏联乌克兰的乌日哥罗德成立了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1956年11月4日凌晨，明尼赫在索尔诺克电台广播了一份《致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公开信》，称：“我们，前纳吉·伊姆雷政府的部长奥普罗·安道尔、卡达尔·亚诺什、科沙·伊斯特万、明尼赫·费伦茨声明，我们已于1956年11月1日退出政府（实际上是11月2日），同这个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并且倡议建立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卡达尔在电台广播了《告匈牙利人民书》，宣布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正式成立，“请求苏军司令部帮助我国人民粉碎反动和反革命势力，恢复我国的秩序和安宁”。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紧急援助，包括武装部队的支援在内。”^①此外，《声明》说：苏联和其他盟国的部队已于8月21日进入捷领土。但是，向苏联和其他盟国提出请求的捷共和政府领导人是谁？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世人在等待塔斯社回答。

21日下午3时许，被苏联相中的捷共内部“健康力量”，在苏军的催促下聚集到捷共中央招待所“布拉格饭店”开会，参加会议的高层人物有比拉克、科尔德、巴尔比雷克、皮勒尔、什维斯特卡、英德拉、雅盖什、马·瓦楚利克等，这个阵容比1956年11月卡达尔的阵容要庞大和整齐得多。会议乱糟糟地开了几个小时，不得要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只好单刀直入地提出：“不要浪费时间了。大家考虑一下，能否建立一个把党和国家的职能结合起来的非常机构。在座诸位可以构成这个新政府的基础，因为大家既有合法的身份，又得到苏联的信任。”^②契尔沃年科此言一出，会场众人面面相觑不敢吱声。因为谁如果接受这一建议，等于自己站出来承认，是他请求苏联和盟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连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也没有勇气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最后，由苏联人拍板：在新的党中央第一书记产生之前，由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组成“三驾马车”主持党中央工作；由英德拉当总理，取代切尔尼克，组成新的“革命政府”。苏联人认为“政府成员名单必须得到斯沃博达总统的批准”。苏联人想借斯沃博达的名望使“革命政府”具有合法色彩。

直到22日凌晨，皮勒尔和契尔沃年科来到总统府，要挟斯

① 见《“布拉格之春”前后》，第560页。

② 转引大有、刘云编著《总书记们的沉浮》，第13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

沃博达批准苏联提出的捷党、政领导新名单。斯沃博达同样表现出凛然正气，拒绝契尔沃年科的要求。斯沃博达告诉他们：切尔尼克仍然是捷合法政府总理，有关政府的事只能同切尔尼克商讨。斯沃博达还告诉他们：必须立即释放被捕的捷党政领导人，否则，任何谈判都是不可能的。

苏联人至此方才明白：此一时也，彼一时也；1968年8月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可能再造一个“革命政府”出来。

捷克斯洛伐克之所以不可能按苏联的计划，制造一个“革命政府”出来是因为：

第一，杜布切克自1月上台至8月，在短短的半年多里已成为捷国家的旗帜、捷民族的象征、捷人民的英雄；“复兴社会主义”已凝成捷国家从上到下的共同心愿。在捷共中央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容忍和容纳了一些亲苏派人物，即苏联赞许的“健康力量”，这是杜布切克的政治气度的表现，其实，他们是没有多少号召力的。不然的话，苏联也不会坚持“革命政府”成员名单必须由斯沃博达来批准了。1956年11月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不是苏联自己批准就行了吗？

在捷共中央和政府中虽然保留了亲苏派人物，但是有一个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核心圈，即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斯沃博达等，他们分别是：党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国民议会主席、共和国总统。他们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也有分歧，但是在复兴社会主义、贯彻《行动纲领》、维护国家民族独立、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型社会主义等根本点上是一致的。更可贵的是：在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候，没有发生谁背弃谁；他们都把杜布切克奉为领袖。苏军侵入捷，抓走杜布切克之后，捷全国齐声呐喊“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这是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事先没有估计到的，也使苏联不敢轻易处置杜

布切克。相比之下，1956年的纳吉在匈牙利就没有这样的基础和地位。

第二，苏军入侵以后，杜布切克采取的“有序的、沉默的整体抵抗”方针起了作用。实践证明，杜布切克所采取的这种特殊的抵抗方式对付苏联的“特殊的战争”是正确的、有效的抵抗方式。当杜布切克已不可能以捷国家的名义指挥全国的正规军和苏军及其他华沙条约国家军队发布战争宣言、展开正式的军事行动的时候，如果号召武装抵抗，必然是无序的、零星分散的、四处冒烟式的武装袭击。这种抵抗，在二三十万苏军面前，是小兔攻击老虎；苏联正希望这样，苏联正找不到“捷发生反革命叛乱”的根据。

杜布切克的抵抗方式使苏军不敢命令士兵开枪（除非出于自卫），也不能宣布捷政府是“反革命政府”，使苏联陷入进退两难的狼狈处境。

此外，不得不说的是，杜布切克的特殊的抵抗方式保护了捷人民，使捷人民免受血光之灾。当然，捷人民出于对侵略者的痛恨和民族豪情的激愤，赤手空拳阻止苏军坦克前进时被打死30人。但是，和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相比，这个代价是很小的。匈牙利事件中被打死、打伤的不算，光出逃的就有20万人；28601人被审判，其中6321人被判刑，300多人被处决。匈牙利事件中，直接经济损失30亿福林，间接经济损失达200亿福林；1956年的国民收入比上一年减少90亿福林。^①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损失，由于微乎其微，以致在史学研究中没有被引起注意。

① 统计数字见《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380页；福林是匈牙利的货币单位。

八、“布拉格之春”意识不死

1. 捷克斯洛伐克新形式的全民抵抗

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本来信心十足，认为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雅盖什，包括什维斯特卡、皮勒尔等亲苏集团肯定能在苏军武装占领的配合下，顺利地建立起“革命政府”。苏军也“名正言顺”地是应这些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政府成员的“请求”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势力，将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坚持走自新之路的革新派领导人宣布为“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首领，如同当年处置纳吉一样“交付革命法庭审判”，予以坚决处置，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也解决了。

21日上午，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被苏军逮捕之后，被强行押上一辆苏联装甲车，来到布拉格的鲁津机场。到了机场，杜布切克等见到了同样遭遇的战友切尔尼克。不久，他们都被戴上手铐，完全是被作为囚犯押上一架苏联运输机，送到斯洛伐克的特里·杜比军用机场。然后，苏军又用汽车把他们秘密押解到斯利亚奇矿泉疗养地附近的一个谷仓里。杜布切克被单独关押，与外界完全隔离。已经一天一夜了，苏

军看守人员分给每人的食物是一片面包、一段腊肠，没有任何饮料；至于洗脸、刮胡子等即使是囚犯也应得到的卫生条件，竟被统统拒绝。

8月22日上午，杜布切克等又被押上一架苏联军用飞机，送到苏联乌克兰的利沃夫，投入监狱。两天来的阶下囚生活使他们的身心遭受极大摧残，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过度的疲劳和紧张使生命也濒临绝境。切尔尼克后来曾说：“我当时曾担心，我和其他三个同志的性命恐怕难保了。”切尔尼克的担心绝非是杞人之忧！

但是，这两天里苏联为筹建“革命政府”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成了徒劳的竹篮子打水。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出现如苏联所希望出现的“八方起火式”的射击局面。苏联虽然端着“反革命暴乱”这盆污水，却无法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上淋下去。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苏联从未碰到过的、新的抵抗局面。

布拉格的电台仍掌握在忠于捷共中央领导和捷政府的播音员和技术人员手中。8月21日凌晨1时30分，布拉格电台利用一个备用频道，广播了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全国人民》。21日，塔斯社公布了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五国的声明，声称：“应捷克斯洛伐克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请求，我们已指示我们的武装部队前去支援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斗争，这些成果正日益严重地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策划的阴谋的威胁。”^①同时，塔斯社还发表了一份单独声明：“塔斯社授权声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

① 见《“布拉格之春”前后》，第556页

政府领导人向苏联及其他盟国提出请求，希望给予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紧急援助，包括武装部队的支援在内。提出这样的请求是因为同外国仇视社会主义的势力相勾结的反革命势力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影响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① 这份声明还说：五国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间缔结的同盟条约规定的各国有权单独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原则”。此外，塔斯社还公布了一些捷共中央委员、政府成员和国民议会议员“请求”苏联出兵的呼吁书，而所有这些呼吁书都是没有署名的。这些声明和呼吁书都无法通过捷通社播发出去，苏联只好把这些声明和呼吁书印成传单，成片成片地在抗议的人群中散发。

20日午夜，全捷人民被响彻全国的坦克轰鸣声惊醒，当听了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之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谁也没有接到过什么命令或指示，但人民在听到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告全国人民书之后，都一齐拥上街头。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利贝雷茨、科希策、奥斯特拉发、克拉德诺、乌斯提等几十个城市的大街上，市民们纷纷把苏军坦克和苏军士兵围起来，阻止他们前进，向他们吐唾沫、扔脏东西并质问他们：“到捷克来干什么？”许多坦克被捷市民画上希特勒法西斯党的卐字徽记，表示捷人民把苏军的人侵看作是30年前德国法西斯入侵的重演。有的年青人爬近坦克，把石油倒在碎布上点燃后塞进坦克的排气管，使坦克在广场上和大街上燃烧、爆炸。21日整天，布拉格的市民一直在街上与苏军对峙。青年人举着捷国旗，有的国旗上还染有死难烈士的鲜血。

① 见《“布拉格之春”前后》，第560页。

布拉格全市都是响着震天的喊声：“杜布切克！”“杜布切克！”“俄国人滚回去！”市民们把布拉格主要街道改为“杜布切克大街”、“切尔尼克大街”、“斯姆尔科夫斯基大街”。对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斯沃博达等领导人表示信任的口号、标语，构成布拉格沿街装饰的主体。市民们还打出像海洋一样的横幅，写着：“列宁，快醒一醒，勃列日涅夫在发疯！”“美国在越南，我们这里有苏联！”墙上到处贴着反对入侵的口号和手工制作的标语。入侵的苏军士兵原来听指挥官说，是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拯救社会主义成果的；他们看到捷举国上下这样对待他们时，真是目瞪口呆。捷的军队虽然没有抵抗，但是全国老百姓这种方式的一致的对抗是世界上小国被大国入侵的历史上所从未有过的。20世纪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魂使入侵的苏军不知所措，也使克里姆林宫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不敢妄为。

苏军冲击和占领布拉格电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种抵抗方式的特点。

21日清晨6时，布拉格电台播发了杜布切克通过电话打出来的个人呼吁。呼吁号召人民“照常去上班”、“像平常一样地工作”。6时半，电台播音员播音，要求人民“保持平静”对占领者实行消极抵抗。

早晨7时左右，苏军指挥部决定以武力夺取布拉格电台。留在布拉格电台里面的工作人员，只是紧闭门窗，用各种重物把门窗堵死，少数保卫人员也不使用枪支武器。7时15分左右，女播音员以平静的语调广播：“老城广场的公民们，请你们散开，自动拆除用公共汽车和电车筑起的街垒。要知道，自我克制是我们最好的武器。我希望大家保持平静和克制。你们不要受人挑动，武装抵抗是行不通的。……我们的播音不知道还能

坚持多久，我们的时间很紧迫。”^① 7时20分左右，播音员又播出杜布切克的一封信。信中说：“我请求大家保持平静，在当前的局势下要保持尊严。我号召你们保持平静。”播完杜布切克的信，播音员表示说：“我们也将这样做。”^②

这段播音刚结束，7时25分，一队苏联坦克就开到了布拉格电台大楼前，摆开阵势，苏军士兵准备冲击电台大楼。这样僵持了约10分钟，又响起女播音员的声音：“公民们，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播音员的声音，不要相信他们的话！”这样，一直僵持到8时15分，电台又广播斯沃博达总统的讲话。总统说：“我以我在担任这项职务时所承担的全部责任，迫切地要求你们保持理智和完全的镇静。……为了祖国的利益，不要采取任何轻率的行动。”说到这里，播音中断。苏军士兵终于砸开大门，冲进播音室，占领了电台大楼。

在反武装占领的全民斗争中，人们每天都会创造出种种令人侵者进又无方、退又不能的斗争方式和方法，从而把日常生活变成卓有成效的消极抵抗体系，使人侵者的暴力机器一筹莫展。捷克斯洛伐克的这种方式的抵抗也是悲壮的、可敬可佩的！

8月22日，捷全国同时举行一小时的总罢工，抗议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军队入侵。在布拉格市，汽笛一声长鸣，所有工作统统停止，正在行驶的车辆都当街停下，全城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连空气也仿佛凝固了。帕夫洛夫斯基为首的占领当局和契尔沃年科大使对此一筹莫展，只好连连向莫斯科请示：下一

① 见《“布拉格之春”前后》，第560～565页

② 见《“布拉格之春”前后》，第565页

步怎么办？而莫斯科的决策者们自己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

8月22日，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在布拉格维索昌区的切卡德电器厂秘密召开。

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原定于9月9日召开。当苏军入侵之后，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西蒙向党中央主席团提议，提前召开非常代表大会，杜布切克原则上同意，还来不及具体讨论，苏军已冲进来了。杜布切克被苏军抓走以后，召开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就由捷共布拉格市委具体负责。经紧急筹备，于22日召开。提前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在于向苏共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表明：捷共是有战斗力的；即使突然遭此大劫，全党的工作仍然照样运转。

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关于目前局势问题。大会通过的决议谴责苏联等华约五国军队的入侵，要求立即撤走占领军，释放被捕的捷克斯洛伐克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有依据捷国家宪法就任的官员应全部返回原职。决议要求苏联等华约五国遵守国际法准则。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44人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和27人组成的党中央主席团，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西蒙等被苏军劫持的捷共领导人均被选进新的主席团。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经济学家、工厂经理维·希尔汗在杜布切克恢复工作以前，代理党中央第一书记。比拉克、科尔德、什维斯特卡、英德拉、巴尔比雷克、卡佩克等亲苏派领导人，苏军入侵后又在为拼凑“革命政府”奔走的人，都没有被选进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还通过了全体代表致杜布切克的信。“亲爱的杜布切克同志：今天在这里召开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向你致以热烈的、同志般的问候。我们对你为我们党和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示感

谢。……代表大会再次将你选进新的中央委员会，我们继续把你当作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坚信，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一定会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你也将和我们重新欢聚一堂。”^①从21日开始，由苏联首肯，科尔德成了“捷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捷共中央机关原来大约有500名机关工作干部，苏军占领捷共中央大楼后，科尔德主持中央工作时，每天大约只有20来人去上班。科尔德主持的中央不承认在维索昌区召开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

维索昌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显然带有特殊的性质，在当时的局势下也不可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它表明了捷共对杜布切克的一如既往的信任，表明了对苏军入侵的严正态度，体现了捷克的民族精神。仅此这些也就足够了。

2. 勃列日涅夫吃回头草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健康力量”是如此的不济，无论苏联使多大的力气，仍然是扶不起的阿斗。捷人民是如此的坚强，苏军可以占领他们的国土，但不可能征服他们的心，他们绝不和占领者建立什么联系；占领者来到捷克斯洛伐克，仿佛是陷入了冰窖，人们投射来的都是冷峻和仇视的目光。斯沃博达是如此的忠贞，面对苏联的种种威逼和利诱岿然不动。“革命政府”胎死腹中，“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应捷共和政府大部分人的请求”而出兵，自然就成了无稽之谈。

即使是苏联国内的人民也对勃列日涅夫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① 《“布拉格之春”前后》，第590页。

表示出忿忿然。

苏共中央政治局为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在国内做了大量的欺骗宣传。还在 20 日之前，苏共中央就指示各地的党组织召开各工业企业和机关职工会议，宣讲苏联为“帮助”捷克斯洛伐克兄弟，“保卫社会主义成果，有必要派遣武装部队”。苏军入侵捷之后，8 月 21 日，莫斯科市党组织向市民进行关于塔斯社声明的解释工作。各基层党组织分别召开基层群众会议，根据《真理报》印发的材料和电视台的报道进行座谈，要群众认识，苏军入侵捷是“帮助”捷共和捷人民，因为那里出现了“反社会主义势力的进攻”。21 日，莫斯科按机关的科室、处室；工厂的车间、工段、班组，召开 9000 多次会议，出席的人数达到 885000 人，有 30000 多人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21 日，工厂、机关到处都在广播关于入侵捷的“塔斯社声明”。但是，这些“轮番轰炸”不能使苏联人完全信服。据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格里申向苏共中央报告说：尽管做了这许多工作，群众在座谈会上仍提出各种各样问题，表示不理解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如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居民是怎样迎接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军队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否是合法的？现在主持捷工作的政府是否是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正常生活是否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兵而受到影响？”等等。实际上，群众是以提问题的方式表示对政府出兵干涉捷内政的不满。

苏共中央不仅向国内人民进行倾盆大雨式的欺骗宣传，而且对在苏联工作、访问的捷公民也进行欺骗性灌输。但是，这些工作同样是枉然的。一批在苏联莫斯科旅游的捷旅游者听到苏军入侵捷的消息之后，打出“我们抗议！”的横幅要上街游行，被苏共莫斯科市捷尔任斯基区党委所制止。临时在莫斯科

电视科研所工作的捷电气公司的专家们，在听到塔斯社的声明后立即表示：“这是匈牙利事件的重演。你们的《真理报》不讲真话，只会泼脏水。你们的报刊对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作了歪曲的报道。苏联军队不是在帮助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占领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谁的坦克多，谁就正确’”。在莫斯科电视科学研究所进行技术交流的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弗尔切克、普里班和勃科弗尔表示：“我们被塔斯社的声明弄得目瞪口呆。（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派波兰军队和德国军队？他们也算是来解救我们吗？”

苏共中央的欺骗宣传，即使是在苏联国内，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苏共中央政治局感到局势不妙了。苏联的军事力量虽然控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但是军事控制却对捷的全民抵抗体系难有作为；捷全民的意志处处和占领者针锋相对，而占领者却束手无策。从国民议会到各级政府机关都继续存在，照样工作，根本不理睬占领者。苏联对捷的军事占领和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这种方式的抵抗，一时之间形成胶着的、对峙的状态。捷的一份报纸对这种状态作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大象踩不断绣花针！

但是，这种胶着的、对峙的状态只能是暂时的，总得要想办法解决，无论是占领者或者捷克斯洛伐克都这样想。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苏共中央意识到：离开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是不能解决捷的问题的。勃列日涅夫只好吃回头草了。

还在8月22日晚上，斯沃博达总统宣布，拒绝关于成立“革命政府”的建议时就提出：到莫斯科去同勃列日涅夫会谈，向他们要回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斯沃

博达还说，这是他惟一可以接受的办法。当时决定23日（星期五）上午就动身去莫斯科，陪同总统一起去莫斯科的有：副总理胡萨克、国防部长楚尔、司法部长库切拉。

8月23日上午8时3刻，斯沃博达向全国发表了一个临行讲话：“昨天（1968年8月22日）我同苏联代表讨论了如何处理由于苏联等国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国土而形成的局势问题，特别是如何恢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合法机构的职能问题。由于讨论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在今天凌晨向当时在总统府的政府成员们提出要求，请他们同意与苏联最高领导人举行直接谈判。今天早晨苏联大使表示，苏联领导人对举行这种会谈抱积极态度。……亲爱的公民们！我感谢你们的支持和信任，我要求你们对我下一步的工作继续给予支持。我呼吁你们保持冷静和克制并用你们的自觉态度创造有利于我们即将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的条件。”^①

斯沃博达总统一行于8月23日上午9时30分左右从鲁津机场起飞，下午1时左右到达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苏联方面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都到机场迎接。当天下午和晚上，斯沃博达等就和勃列日涅夫开始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是斯沃博达要求苏方释放被他们扣押的捷克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斯沃博达向勃列日涅夫等表示：在四名捷领导人（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获得自由之前，他拒不谈任何问题。斯沃博达还反复表示：除非将这四人释放并让他们参加谈判，否则，在莫斯科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具有约束力。

当斯沃博达总统一行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杜布切克等也被

^①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597—598页。

苏军强行送到莫斯科。

8月23日早晨，苏军给杜布切克等人送来像样的早餐，然后，用伊柳辛飞机把他们送到莫斯科谢列麦捷夫机场。出了机场，苏军不再把他们押上囚车了，而是客气地请他们上了民用客车，来到莫斯科郊外的一所假日别墅。此时，斯沃博达总统也到达莫斯科了。

8月23日下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沃罗诺夫同杜布切克举行会谈。当杜布切克被带到会议室时，勃列日涅夫等四人已坐在会议桌旁了。

勃列日涅夫像是为了缓和一下紧绷的气氛，问了一句：杜布切克同志身体怎样？杜布切克冷冷地说：和大家一样，觉得不好。波德戈尔内问：是健康不好，还是情绪不好？杜布切克不作正面回答，只说：很沉重。

勃列日涅夫知道这种时候和杜布切克会谈，是不会有什好脸色看的，于是也不兜圈子了，转入正题说道：“咱们不再谈过去的事，咱们根据当前的形势来心平气和地谈话，以便找到有利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解决办法，使捷共能正常地、独立自主地按照布拉迪斯拉发宣言所规定的原则行事。”接着，勃列日涅夫列举捷克斯洛伐克如何如何发生“反革命势力进攻”，“日甚一日地煽起反对苏联、反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沙文主义情绪”。勃列日涅夫这样结束他的这段话：“你（杜布切克）在切尔纳的表现不妥当，做得过头了。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抛在一边。如果我们开始讲，我们之间谁是正确的，那末这不会带来什么结果。还是让我们从现有的基础来谈，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也就是你是怎么想的，应当怎样行动。”

勃列日涅夫的这段开场白完全是强盗逻辑。现实的情况是

苏联纠集华沙条约的其他四国武装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把捷国家和党的领导人武装绑架到莫斯科，无视联合国宪章和践踏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苏联应当无条件地立即从捷撤军，恢复捷党政领导人的自由，才能谈判。勃列日涅夫闭口不谈武装入侵这一践踏国际法的基本现实，却蛮横地要杜布切克承认苏联出兵占领捷是因为捷有“反革命势力进攻”，实际上要杜布切克承认苏军占领捷是“帮助”捷、“拯救”捷；在此基础上再帮助苏联摆脱由于武装入侵而造成的困境。这是杜布切克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杜布切克说：布拉迪斯拉发会晤之后，捷共党内和捷国内的情况都越来越好，“所以我和同志们都不理解，为什么经过这样长时间，我要特别强调，在我党中央全会之前，在党代表大会之前，就采取了这个五国军事措施。……没有通知捷共中央主席团，没有通知总统、政府总理、国民议会，就采取了极端步骤，采取了极端措施。照我的看法，这些措施不仅使我党和贵党，而且也使国际共运面临共产主义运动过去未曾遇到过的最复杂的问题。”杜布切克激动地说：我是被你们用武装强行带到这里的，“从那时起，我就再也知道任何情况，也无法想象国内和党内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点很重要，勃列日涅夫同志。这个举动不是通过政府、通过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准备的。因此，这个举动在党内很难被理解。我担心这会使党和党员反对这个举动。”杜布切克要勃列日涅夫正视捷克斯洛伐克是被苏军和其他华约国家武装占领这一现实，说：“同志们，我提不出任何建议，因为我是从我们办公室的窗口看到最后情景的。可是后来你们手执自动枪的人们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夺下了电话，其他也就没有再可说的了。从那时起我没有与任何人接触，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同切尔尼克同志见面时，他说他也

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也和我一样都是上述那种方式被捕的。在审查之前，他和其他人一直被关在地下室里。我们就这样来到你们这里。我们不了解国内正在发生什么，由谁去指挥，生活情况怎么样。……这是一场可怕的悲剧。”

勃列日涅夫语塞，只好说：“我把你最后讲的几句话理解为，你希望和我们，和其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道，找到一种既能使我们克服某种困难，又能使我们友好相处的解决办法。我们要的也是这种解决办法。我们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勃列日涅夫的这句话，表明苏共中央已决定释放杜布切克，并且无奈地要和杜布切克正式谈判了。杜布切克回答勃列日涅夫：“是这样。”

接着，勃列日涅夫又讲了一通：“军队进驻（不是入侵）时未放一枪。你们的总统和其他领导人号召你们的武装力量不要进行抵抗，所以没有人员伤亡。”杜布切克说：“我认为捷共中央主席团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幸亏电话线没有被切断），向我国军队和国家保安部门、工人纠察队下达了指示，并发布告人民书，命令人们在任何情况下和在任何地方都不要进行反击。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号召。”自始至终会谈气氛都是冰冷的。

8月24日凌晨，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等四人被带到克里姆林宫，与斯沃博达等相会。彼此相见，恍如隔世。斯沃博达含着热泪拥抱了他们。同来的比拉克、英德拉、皮勒尔等三人则躲在后面，连招呼也不打。

由于杜布切克的坚持，苏共中央被迫同意，从捷国内又接来姆利纳日、什维斯特卡、列纳尔特、雅盖什、巴尔比雷克、里戈。科尔德在国内留守。齐萨日、萨多夫斯基、斯拉维克、埃尔班、沃列尼克等书记处成员被苏共中央拒绝。这样，捷克

斯洛伐克代表团由三批人、分三批来莫斯科：斯沃博达总统带一批；杜布切克等一批人由阶下囚变为谈判代表；姆利纳日等最后来到的一批，代表团的总人数增加到18人。8月25日上午9时许，捷共中央代表团的三批代表在克里姆林宫会齐。姆利纳日带来了大批报纸、传单以及被苏军拘捕的捷共领导人的亲属给被捕人的私人信件，维索昌党代表大会致杜布切克的信，维索昌党代表大会选举的党中央委员会名单等等文件。这些材料对杜布切克等较为重要，因为在被捕期间苏军隔绝了杜布切克等和外界的一切联系，这也是苏军对杜布切克等进行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残酷迫害手段之一。

准确地说，这次苏捷两党的会谈是从8月23日上午开始至8月27日凌晨一时左右签署会谈公报结束。而整整4天的会谈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3日上午到24日晚上，苏共中央和杜布切克、切尔尼克；苏共中央和斯沃博达、胡萨克等分头进行会谈，内容涉及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基本估计和出现这种局势的原因、解决途径；第二阶段是从25日下午到27日凌晨，苏共代表团和捷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参加的正式谈判，其间当然也有小范围的谈判，但总的是双方代表团全体成员参加的正式谈判，是签订协议，解决现实的、实质性问题的谈判。

3. 捷共在谈判桌上的不屈抗争

8月25日，在苏、捷会谈中间，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确定与捷共会谈、签订协议的基调。柯西金首先谈了“兄弟党领导人对派兵进驻捷克斯洛伐克的评价”。柯西金介绍说：“日夫科夫有点生气。他说应该把反革命（分子）关押起来，成立

革命政府。卡达尔赞成苏联的意见（指与捷共重新谈判——作者）。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的意见同日夫科夫的意见相似，区别在于前二人是以比较模棱两可的语言来表达的。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说：‘捷共已经解体了，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没有共产党了，因此需要有一个革命政府’。乌布利希还说：‘如果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仍旧当政，那么干吗要出兵？’哥穆尔卡跟着说：‘谁也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派兵？’”^①

这次政治局会议提出三种解决方案：第一方案是建立以斯沃博达总统为首的革命政府，让切尔尼克当副总统；第二方案是建立以切尔尼克为首的政府，或者让切尔尼克当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让胡萨克当政府总理；第三方案是保留前政治领导，回到在蒂萨河畔切尔纳会谈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所承诺的条件上来，即停止克里格尔、齐萨日、希克等人的领导职务。第一、第二方案都是要把杜布切克赶出政治舞台，但是实际上做不到；无论是斯沃博达或切尔尼克，也都会坚决拒绝。第三方案是扔掉比拉克，因为成立“革命政府”的失败，比拉克已声名狼籍，在克里姆林宫的眼里再也不是什么看好的政治人物了。

在讨论的过程中，安德罗波夫主张采取第一方案，他还建议把藏在总统官邸里的捷部长们赶走，把内务部长帕维尔也一起抓起来。乌斯季诺夫也力主成立“革命政府”，手段是“让我们的军队有更多的自由”，实际上就是让军队去血洗捷克斯洛伐克。波利扬斯基提出一个折衷办法：让捷共开一次中央全会，让他们自己在中央全会上把杜布切克痛骂一顿，赶走杜布切克。波利扬斯基天真地想上演一场木偶戏，被比较现实的柯西金打

^① 转引《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俄文），载《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6、7期。

断说：“这事不可能发生。谁也不会把他（杜布切克——作者）痛骂一顿，这事办不到。”讨论的结果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谢列斯特、波德戈尔内等人的“激进派”意见未被采纳。柯西金虽然也不喜欢杜布切克，但是没有人能够领导“革命政府”，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接受杜布切克。杰米契夫认为可行的只有第三方案。讨论的结果是：无可奈何地只能实施第三方案。

这样，在苏捷两党正式会谈之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已经把会谈的内容和结果都定好了：一、保持1968年8月20日前的捷共和国家领导班子和机构，不再成立任何别的领导机构；二、不承认维索昌的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三、捷必须自己撤销由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捷局势的议案；四、占领必须合法化。

捷共中央领导人也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讨论了当前的局势和同苏共中央会谈的基调，这个有限的圈子包括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什维斯特卡、列纳尔特、什帕切克、西蒙、姆利纳日等。姆利纳日向大家介绍了自杜布切克等人被抓走后，捷克斯洛伐克在苏军占领下的基本形势；报告了比拉克、英德拉、雅盖什企图在苏联大使馆成立“革命政府”，逼迫斯沃博达总统批准而遭总统拒绝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由于捷全民消极抵抗，占领当局已陷入与捷全民为敌的困境；占领者如不对全民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就无法控制局势。维索昌党代表大会维护了捷共在人民中的威信，国民议会和政府都承认这次党代表大会。所有这一切都挫败了占领者妄想成立“革命政府”的图谋；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斯沃博达、切尔尼克等在国内享有崇高威信。只要在莫斯科达成一种解决办法，国内人民是会一致支持的。但是，杜布切克等人也认识到：妥协必须在两个前提下：一、外国军队撤出捷并尽可能规

定撤离的具体日期；二、必须保证以捷共《行动纲领》为依据的政治路线得以继续贯彻执行。根据切尔尼克的提议，草拟一份会谈公报的方案，交苏共中央政治局。起草会谈公报方案的工作又交给了姆利纳日。

姆利纳日根据小范围讨论的意见，很快草拟而成。为了顾及苏共中央的情绪，方案中承认社会上出现一股来自右的政治压力，而捷共中央领导对这股来自右的政治压力“失去影响和控制”；但是“全民族中积极的社会主义和民主趋势是主流”。公报方案承认“五个邻国对我国局势的忧虑是事出有因，而捷共对此低估了。但是，干涉本身于事无补，实际上是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所以，五国首先必须撤军”。在撤军的基础上，我国的改革运动应该照顾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拉迪斯拉发的结论是可以作为出发点的。至于国内政策，捷共中央《行动纲领》仍然是以后制定路线的基础。25日下午，姆利纳日到克里姆林宫文书处口述会谈公报方案，由打字员打印成文字，经大家审阅后，再由切尔尼克代表捷共中央交给苏共中央政治局。^①

这个方案惹恼了苏共中央政治局。苏共中央政治局把方案退还给捷共中央，并且斥责说：“这是最后通牒！你们应该明白你们自己的处境。你们的处境是不允许你们提最后通牒的。”当然，苏共中央政治局是明白他们自己的“处境”的，他们的“处境”使他们完全有权向捷共中央提出最后通牒。于是，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真的是最后通牒式的会谈公报方案。苏方的方案仍然污蔑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势力进攻”，捷共中央已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五国出兵是“帮助拯救”捷社会

^① 见《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243~245页。

主义成果，五国出兵是根据华沙条约履行“保卫社会主义共同成果”，而且根本不谈撤军；所作的“让步”就是承认和恢复8月20日前的捷党政领导。苏共中央的方案，连捷共中央的比拉克、英德拉等亲苏派都不敢在讨论会上表示赞成。

苏方的方案就是“16点提案”，苏方认为会谈的结果必须以“16点提案”为基础。这“16点”是：

1. 按照苏联的社会主义来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发展方向；

2. 宣布（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无效；

3. 通过书报检查制度巩固社会主义；

4. 捷方宣布（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过反革命活动；

5. 群众性的舆论工具不得进行反盟国宣传；

6. 在军队撤离时，其他小组（指苏联克格勃机构——作者）也将离开；

7. 解除内务部长约·帕维尔的职务，因为他不愿同苏联的保安机关合作；

8. 可以由（华沙条约）五国代表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决定，（由于五国军队进驻而造成的损失）哪些应予赔偿，哪些不予赔偿；

9. 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必须根据布拉迪斯拉发协议加以调整；

10. 捷克斯洛伐克将发表一个文件，申明捷政府过去没有要求、今后也不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

11. 部长安排问题，撤销奥·希克政府副总理、伊·哈耶克外交部长职务；

12. 发表一项声明，承认捷克斯洛伐克与联邦德国接壤的边界线上防御力量不足，必须由盟国来保证其安全；

13. 莫斯科谈判的结果应严格保密，不得公布；

14. 应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友谊和同盟关系；

15. 发表一项声明，保证为苏联工作过的人不会受到迫害；

16. 宣布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无效的声明将在外国军队撤离该国之后发表。^①

苏方提出这样“16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并作为谈判最终结果的基础，哪里还把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平等的主权国家？！

25日晚上，捷共代表团在切尔尼克的主持下，讨论苏共中央提交给捷共中央的“16点”。现在，捷共中央已经明白，捷共已根本不可能提自己的方案，只能讨论苏共中央的“16点”，使之尽可能朝有利于捷共方面倾斜。

此时，捷共中央谈判代表团在讨论苏共中央的“16点”上，大致上分为三派。亲苏派以比拉克、英德拉为首，包括以后来到莫斯科的巴尔比雷克、里戈、什维斯特卡、雅盖什、列纳尔特等。他们主张接受苏方的条件，尽快签订协议。他们有时单独商量，有时还同苏共中央的部分领导人一起密谈。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革新派，以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以及激进的克里格尔为首，包括随后来到莫斯科的姆利纳日、西蒙等人，他们拒绝接受苏方的“16点”，并且准备拒绝在最后的协议上签字。

第三派姑妄称作“现实派”。这一派以斯沃博达总统为代表，重要人物是最近活跃起来、并且立即被苏方越来越看好的古·胡萨克，此外还争取到切尔尼克总理的支持。斯沃博达认为，“每一小时的拖延都意味着群众和苏联占领军发生冲突的危险增加一分”。他从严格的军事观点出发认为：不倒向苏军就会

^① 见《“布拉格之春”前后》，第610~611页。

反对苏军；没有硝烟的对峙是不能持久的。他甚至对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说：“你们老是不停地空谈，已经谈得让人家把国家都给占了，还在谈！现在办事应该正视现实了。我这一辈子见到的死人能堆成山，我决不允许再让你们的空谈使成千上万的人死亡。”^①作为职业军人，斯沃博达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也反映出他在政治上、外交斗争上幼稚的一面。胡萨克竭力劝说总统采取“现实主义的、随和的态度”。苏方也不断施加压力，向斯沃博达总统等人宣布在布拉格的苏军部署：增加到7万人，包括2个装甲师、2个摩托化步兵师，配备有500辆坦克；侵捷的总兵力在随后的几天里增加到50万。斯沃博达还劝说杜布切克“早日结束谈判”。杜布切克也感到斯沃博达的意见“不无道理”，因为确实已别无选择了。在这同时，斯沃博达和勃列日涅夫也在谈判，争取到在最后的联合声明中不提“在捷出现反革命活动”；苏联的克格勃机构应和军队同时撤离捷；待外国军队撤离之后，才可宣布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无效等。斯沃博达还曾坚持要求苏方赔偿由于入侵给捷造成的损失；苏方只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苏方曾打算继续扣押克里格尔，斯沃博达和杜布切克坚决表示：全部捷共谈判代表团成员必须一起回国，否则他们绝不离开莫斯科。最后苏方同意让克里格尔也一起返回。

苏共中央是以屠杀捷克斯洛伐克的和平居民相要挟，逼迫杜布切克等签订城下之盟。捷方争取到这点小小的有利条件，看来只能如此了。

8月26日下午4时，在基本的条件都已按苏方的要求写成联合声明的情况下，捷共和苏共中央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继续

^① 见《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247页。

会谈。会谈由勃列日涅夫主持，并且勃列日涅夫还第一个发言。

勃列日涅夫先以愉快的口吻说了一大通关于苏捷两党和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同志关系的话，并说我们将以此为出发点就复杂和严重局势中的下一步行动，达成一致的意見。继之又转换成沉痛的心情说，苏联领导是如何怀着痛苦和惋惜的心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采取军事干预措施。勃列日涅夫有意使捷共代表团相信，他是以“社会主义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行事，不顾及个人。说到这里，忘不了赞扬几句“苏联的忠实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法西斯斗争英雄斯沃博达总统”。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算是本次会谈的开场白。

按常例，接着发言的应是杜布切克。可是，由于杜布切克的身心遭苏军极大摧残，加上这几天谈判的极度紧张，身体和精神几乎支持不住，医生给他打了针才能出席本次会谈，因而由切尔尼克接着发言。切尔尼克没有讲那些同志关系和捷苏友谊的空话，而是婉转地捍卫捷共《行动纲领》的立场；虽然婉转，但是明白地否定苏联等五国的军事干预是“维护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的说法。

切尔尼克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苏方代表的“插话”纷纷打断；勃列日涅夫装模作样地营造的“同志式气氛”立即变成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勃列日涅夫自己也加入争论，他否定了切尔尼克的说法。

这时，杜布切克要求发言。杜布切克实际上是不顾会谈程序的事先安排，作即席发言，而且是直接用流利的俄语发言。杜布切克的发言是满怀激情又极富雄辩地维护捷复兴社会主义的整个进程，并且控诉了苏联和华约五国对捷的入侵。由于是即席讲话，更加表达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感情，感染力极强。

这样一来，会谈变成了即席发言，勃列日涅夫接着杜布切克之后发言。由于也是即席发言，确是比较明白地表达了勃列日涅夫（也即苏联）控制东欧、争霸世界的霸权主义意图。

勃列日涅夫的即席发言不再讲什么“反革命势力进攻”和“社会主义共同利益”之类的虚情假意的遁词了，而是直截了当地指责杜布切克在处理内政问题时“未事先征得苏共中央的同意，甚至全然不顾苏共中央的指示和劝告”。勃列日涅夫指着杜布切克说：“我是一开头就愿意帮助你反对诺沃提尼的。在1月份就问你，他（指诺沃提尼——作者）的人对你有威胁吗？你想换掉他们吗？可是你却说，‘不用换，这都是些好同志。’然而以后，我们突然听说你把内务部长、国防部长以及其他部长都换掉了。你还撤换了党中央书记。”

勃列日涅夫不让杜布切克辩驳，接着说：“2月份，我对你的报告（指杜布切克2月22日在庆祝‘二月夺权’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本书四、1.——作者）提了意见。我提醒你说，有些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你竟不作修改！怎么能这样工作呢？在我们这里，甚至连我自己在准备报告的时候，还要请全体政治局委员提意见呢。是这样吗，同志们？”说到这里，勃列日涅夫故意环视了一下坐在他左右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勃列日涅夫左右的人则频频点头，嘴里还嘟哝着，表示赞许自己领袖的讲话。勃列日涅夫故大了喉咙说道：“我们这里是集体领导，其前提是你自己的意见必须服从大家的意见。”

说到这里，勃列日涅夫真的生气了，因为杜布切克辜负了他的信任，没有把自己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提交克里姆林宫批准。勃列日涅夫疾言厉色道：“我信任你，并在别人面前维护你。我说过，‘我们的萨沙是个好同志’。可是你却使我们大家

太失望了。鉴于这一切，我们终于明白，不能信赖捷共领导。”^①勃列日涅夫的这段话，道出了苏共中央之所以恼恨杜布切克发动“布拉格之春”改革的关键，即：杜布切克要摆脱苏共中央的控制，不听从苏共中央的指挥。

勃列日涅夫又激动地谈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所作出的牺牲，他说：“苏联以如此的代价赢得了自己的安全，其保证就是战后欧洲的分治。具体地说，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结成了永恒的联盟。我国的西部边界不仅仅是我国的边界，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边界。苏共中央政治局也没有权力使这次战争成果遭到威胁，也无权坐视苏联人民的牺牲遭到亵渎。”勃列日涅夫的这段话是苏联勃列日涅夫倡导的“大国责任论”的明白注脚：东欧的西部边界也是苏联的边界；苏联绝不能坐视这条边界受到损害，这是苏联的“大国责任”。

然后，勃列日涅夫的感情又趋于平静地劝慰道：在军事干预之后，捷的局势是困难的，人们也很动感情；有些事一时之间还看不清，也是可以原谅的，“这一切在今天对你们来说好像都是不能接受的。可是你们看看哥穆尔卡，他在1956年的时候也像你们一样，反对我们的军队帮助波兰。如果我今天说，我要从波兰撤走苏军，哥穆尔卡就会马上坐着专机到这里来，求我不要那样做。”

最后，勃列日涅夫带有杀机地说：“对我们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是不可侵犯的。我们要维护它，哪怕是冒着发生新的战争冲突的危险。可是，现在不存在发生这种冲突的危险。我问过约翰逊总统，美国政府今天是否仍完全确认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的决议？8月18日我得到回答说，如果是涉及到捷克

① 见《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272—273页

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美国政府毫不保留地确认决议；至于南斯拉夫，则要谈判。你们看，会发生对你们有利的事吗？不会。不会因此而发生战争。”^① 至于铁托、齐奥塞斯库、贝林格出来讲话，勃列日涅夫不屑一顾地说：“他们能讲些什么？你们寄希望于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可是它在50年内是不会有任何意义的。”

杜布切克忍不住起来反驳，但是被勃列日涅夫粗暴地制止。勃列日涅夫的脸胀得通红并怒吼道：“迄今的一切谈判显然毫无意义。切尔纳的事件又在重演。这是多余的，不会有任何结果。”说完之后，竟然宣布中断谈判。勃列日涅夫站了起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人也跟着站了起来，一个个随勃列日涅夫鱼贯走出谈判大厅。谈判眼看濒于破裂。

斯沃博达、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包括姆利纳日，都来劝说杜布切克：“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了！”杜布切克听着这几个亲密战友的劝说，心情非常激动，但不肯放弃自己的看法。杜布切克说：“难道你们看不出来。他们一点都不明白，他们干了些什么？”斯沃博达又去找勃列日涅夫，谈话的内容没有见到档案材料，可以想象是：解决捷的局势问题还得继续谈判。因为勃列日涅夫虽然在谈判中表现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其实心里明白：武装占领已使苏联陷于前所未料的困境。如果武装占领能解决问题，勃列日涅夫也根本不会谈判了，不会坐到谈判桌旁来了。

深夜，谈判又重新开始，逐段讨论文本，不再谈其他问题了。在逐条讨论时，勃列日涅夫变得缓和一些，只是坚持“不能把捷共《行动纲领》的内容包含在联合声明中。实际

^① 见《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第274·275页

上，杜布切克和捷共中央被迫接受了苏共中央的条件，在万般无奈中签订了城下之盟；捷共中央的谈判意图大部没有得到实现。

8月26日午夜，捷、苏两党的《莫斯科会谈公报》举行签字仪式。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像喜剧演员一样表演“苏捷友谊”的活报剧了。他们一个个装得满面春风，一齐站了起来，向长桌对面的捷对手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十几名摄影师训练有素地把镜头对准这一场面。姆利纳日拒绝从座位上站起来，拒绝拥抱，使对手扑了一个空。不管怎样，苏捷两党的《莫斯科会谈公报》总是签字了。8月27日，发表了会谈公报。

《公报》称：“会谈期间，双方在自由的同志式的讨论中，研究了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活动的加强、近期来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以及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暂时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土等问题。”这段文字，不再提捷发生“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势力进攻”，应当说是杜布切克、斯沃博达等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下，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不屈斗争的结果；是捷克斯洛伐克全民消极抵抗迫使苏联不得不作出的让步。捷根本不存在什么“反革命进攻”，那么，苏联等五国出兵便失去了任何“理由”，苏联被迫自打耳光了；苏联在派兵入侵时所大肆宣传的“应捷共中央主席团多数委员和政府成员的请求”云云，只好自己不声不响地收回，粗暴践踏国际法的社会霸权主义面目自我暴露无遗。苏联等于是承认失败。

《公报》接着表示，目前形势下的主要问题是将切尔纳会谈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所达成的协议付诸实施，苏联方面表示理解和支持捷共中央“一月全会和五月全会的决议，改善社会的

管理方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段文字是勃列日涅夫的决心，捷共中央被迫作出的让步，即：抹去了四月全会的《行动纲领》，抹去了捷改革的纲领和灵魂。这段文字表明：苏联可以承认是侵略捷，但绝不容许捷进行复兴社会主义的改革；因为承认“侵略”是涉及苏联国家的外部形象问题，容许捷进行复兴社会主义的改革，将涉及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命运问题。

关于五国军队入侵和撤离问题，《公报》这样表述：“暂时进驻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盟国军队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政。双方就这些军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条件达成了协议，这将视该国局势正常化的状况而定。”这段文字表明，苏军将继续以占领军的地位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因为“局势正常化”是个不确定的概念，而苏联可以随意延伸。在撤军问题上，捷方也被迫作了重大让步。

还有一处重大让步是：“捷方代表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要求将此问题（指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局势问题——作者）提交安理会并已向安理会提出要求将此问题从它的议程上撤销。”这是苏联坚持要求捷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撤诉的结果，也是捷方不得不作的重大退让。这一退让是捷被迫承认苏联和华约其他国家出兵捷不是干涉捷内政。

《公报》最后是捷重申对华沙条约的承诺：捷“坚决反对妄图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侵犯欧洲现存边界的不可触犯性的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和新纳粹主义势力。……将毫不动摇地履行社会主义各国间多边的或双边的协议规定的义务，以便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防御力量，使防御性的华沙条约能更有

效地发挥其作用。”^①

在会谈公报中，尽管捷共中央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但毕竟使苏共中央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根本不存在“反革命势力进攻”；被迫接受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中央领导、以斯姆尔科夫斯基为首的捷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以切尔尼克为首的捷政府行政执行机关，包括斯沃博达的捷国家元首地位，都是不能更动的，这是苏共中央的最大失败。自古以来是弱国无外交，弱国和霸国之间的谈判和签约也是听任宰割。捷苏之间的“会谈”是被占领国和占领者之间的谈判，何况捷共中央内部还有亲苏派（如果不用里通外国这个词的话）在捣乱。捷共能在会谈中迫使苏共作出这样的退缩，确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1968年8月27日莫斯科时间凌晨2时，也即会谈公报签字以后，捷共代表团（包括克里格尔）立即一起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送行。27日早晨，布拉格市民激动地迎接杜布切克等平安返回。当天下午，共和国总统斯沃博达向全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斯沃博达说，捷克斯洛伐克总算避免了平民和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军队之间发生冲突的悲剧。8月29日，斯姆尔科夫斯基发表广播讲话。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讲话实在、深刻，把谈判时的处境和思想活动都坦露在全国人民面前；把作为捷克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和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责任在决断国家命运问题上的矛盾选择，也坦荡地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斯姆尔科夫斯基的一生堪称是一名真正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一生。

对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讲话不忍作太多的删节，大段抄录

^① 《莫斯科会谈公报》引文见《“布拉格之春”前后》，第621—622页

如下：

“我们在莫斯科的谈判具有不寻常的性质。……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象到，在这种情况下作决定是极成问题的。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占领着我国，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我们同国内的联系受到了限制；我们只能得到很少的消息，甚至得不到任何消息；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对我国人民坚定态度的信任，而不是根据对局势的任何实际了解来判断问题。不过，对谈判对方的态度，我们倒是了解得比较准确，我们也猜测到，外国干涉军可能在政治上碰到了某些困难。……

我们本来也可以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从而把局势弄到外国军队永远留在我国的地步，并且承担这种局势给我国主权、政治权利和经济带来的全部后果，以及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发展下去可能给更多人的身家性命造成的损失。我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当时并没有忘记，到了某种关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坚决拒绝一切屈辱的解决办法，宁可敞开胸膛去对明晃晃的刺刀，也不能辱没我们祖国的荣誉和丧失国格。……

但是，我们的考虑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整整考虑了一天一夜。我们意识到，目前这样的解决办法也许能为我国人民和历史认可，但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背叛。……我请你们相信，我们并没有沉默，而是进行了尖锐的、反复的斗争——既同我们的谈判对手争，也在我们之间争——我们使用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论据。

我们也是在占领我国的坦克和飞机的阴影下进行谈判和决定问题的。”^①

斯姆尔科夫斯基的广播讲话虽然简短，但也和尤里乌斯·伏

① 转引《“布拉格之春”前后》，第617—618页。

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样悲壮、感人。

4. 勃列日涅夫是输家

苏军人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立即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抗议，谴责苏联和华约五国军队践踏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尊严的侵略行径。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英国共产党、荷兰共产党、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日本共产党等，都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和华约其他四国人侵捷克斯洛伐克。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于8月21日发表声明说：“外国武装部队既未受到合法政府的邀请，又未经其同意，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此事引起了我们的深刻忧虑。这种措施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遭到侵犯和践踏，使全世界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受到沉重打击。”^① 8月22日，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也发表谴责苏联侵略的声明：“华沙条约国家进行的武装干涉既未受到邀请，又违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其他合法机构的意志，这是侵犯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粗暴的形式，同时也直接违背了公认的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认为，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无权决定别国的命运和别国内的发展，也无权采取与别国人民和合法机构公开表示的意志相矛盾的措施。”^② 23日，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谴责苏联等华约五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占领。决议说：“南共联盟不承认任何人有权

① 《南苏关系——文件与评注，1939～1973》，第529～530页

② 同注①，第530页。

依仗军事干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压力，蓄意干涉一个独立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内部事务。南共联盟拒绝华沙条约五国政府提出的、企图为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辩护的所有论点，认为这些论点是完全不能接受的。”^①

8月21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共和国广场，向集会抗议华约五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群众发表讲话，说：“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是对欧洲和平、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的严重威胁。”

8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强烈谴责苏联等华约五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

8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英、法等国的联名要求下召开紧急会议，以13票对2票的绝对多数通过决定，把苏联等华约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列入议程。22日，安理会开始辩论，美、英、法等7国提出提案，谴责苏联等华约五国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要求在不使用暴力和报复手段的情况下立即撤军。8月24日，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哈耶克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发言，谴责苏联等华约五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毫无理由的，根本没有什么“请求”。正在南斯拉夫休假的四名捷政府成员也发表声明：所谓苏联等华约五国应捷共中央主席团多数成员和政府成员“请求”而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直接违反事实的”，是“纯粹的捏造”。

苏联等华约五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工入党几乎一致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侵略行径，

^① 《南苏关系——文件与评论，1939-1973》，第531-532页。

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反应十分缓和，水波不兴。8月21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宣称：“北约国家政府早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好几个星期，就已清楚地掌握了苏军的调动情况，只是未能预见到入侵的具体时刻。”对苏军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具体反应，腊斯克说：“美国国务卿希望，所有北约国家减少同有关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作为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反应。但对限制贸易往来这一点，目前暂不考虑。”^① 美国和北约国家的这种态度，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早就清楚了。

全世界几乎都齐声谴责苏联等华约五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即使是苏联国内有正义感的人民和正直的共产党员，也不相信苏联政府的欺骗宣传，反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已经到了普通苏共党员不顾个人安危写信抗议的程度了。一位1940年入党、曾经担任过摩尔达维亚某个工人村邮电分局主任的莫戈罗夫，于1968年9月15日致信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列平，请求苏共中央改变侵略别国的方针。信中说：“从我国政府最近就这个问题（指侵捷事件——作者）所采取的行动，可以看到对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学说的粗暴歪曲以及对我党所制定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违背。”信中认为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只会“给我们祖国的威望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因为这被捷人民看作是外国军队占领了他们的国家；使意大利、法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陷入困境；给我国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相互关系造成困难。最后，这封信说：“我们会失去朋友、招来敌人。我们的后代将会把这看作是祖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这封信只是表达了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我确信，我不是我党持这

① [联邦德国] 库尔特·比伦巴赫《我的特殊使命》，第276、27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10月

种看法的惟一党员。”^①

8月27日，苏共中央强迫捷共中央在莫斯科签订城下之盟以后，从表面上看，勃列日涅夫是取得很大的成功，但实际上他仍然是输家，因为这样做不仅没有缓解捷苏原有的矛盾，反而在原有矛盾之上又增加了新的矛盾；捷是绝对不会在暴力下屈服的，矛盾郁积得愈深，斗争也愈深化，等到爆发的时候就要冲决一切网罗了。这实际上是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和东欧剧变准备了基础。

捷共中央的领导人回国后，面临着解释和争取让捷人民接受莫斯科会谈公报的严峻任务；捷人民接受莫斯科会谈公报也就是“帮助”苏联改变由于武装占领捷而造成的狼狈处境。但是，只要苏军的坦克停留在捷领土上，捷人民的胸膛就像被压上苏联铁砧一样，无论如何也无法平静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苏联在组织军事入侵的同时，组织了一个直属苏共中央的宣传小组，负责在捷的宣传舆论工作。这个特别的“宣传小组”可以看作是入侵捷的另一支方面军，这支“方面军”却打了败仗。这个宣传小组的工作是非常积极的，仅在8月21~30日的10天内，就起草了20份传单，共印发了250多万份；另外还组织了昼夜24小时不停的广播以及两套电视节目转播，宣传苏军是来“帮助”捷、反击“反革命势力进攻”，结果只招来捷全国更深刻的民族仇恨。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广播电视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马梅多夫，1968年9月6日呈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承认宣传工作的无效并建议在捷采取新的宣传措施，说：“有必要进一步改进意识形态的信息工作并对这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施加

① 《奥戈罗夫致谢列平的信》1968年9月15日，载《文献汇编》1993年第5期（俄文）。

相应的政治影响。”^①

1968年9月2日，华沙条约缔约国联合武装部队第一任司令、苏联元帅、布拉格荣誉市民科涅夫，在《消息报》上刊登题为《寄语友人》的文章，以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捷克斯洛伐克反法西斯战士结下的战斗友谊的方式，要捷军民不要忘记历史。文章在赞扬斯沃博达当年英雄业绩的同时，还说：“现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亚·杜布切克曾是活跃在喀尔巴阡山一带的游击队员，当年还是个年轻小伙子。我虽然没机会认识他，但老战士们都知道他是一名勇敢坚定的战士。现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古·胡萨克（刚刚当选——作者）也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他们在战斗中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军人，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写到这里，科涅夫的文章话锋一转，谈到了正题：“我在一家报纸上读到，有些（捷克）青年把盟国军队叫作‘占领军’。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你们知道占领军和占领是什么样子的吗？我曾到过利吉采村（捷克的一个普通农村——作者）。众所周知，该村一夜之间被德军夷平了，居民也消失了，就像地面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村庄一样。占领军就是这么干的。……如果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真的相信我们是作为占领军而来的话，那么大概谁也不敢用拳头来威胁我们，也不敢挨近我们的战车。真正的占领军你们是不敢威胁的，稍有科学头脑的人都知道，拳头对付不了坦克。的确，我们的战士再一次表示了钢铁般的克己精神和良好的组织纪律性。……斯洛伐克和布拉格起义的参加者们，你们为什么不向自己的儿女们说明我国部队的真正

① 《马梅多夫和雅科夫列夫呈报苏共中央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首要措施的报告》1968年9月6日，载《文献汇编》1993年第5期（俄文）。

目的呢？你们老一辈人熟悉历史吗！”^①

科涅夫说的话不能说不是事实，入侵捷的苏军确实没有干过如同德国法西斯军队血洗被占领国和平村镇的罪行。但是，为了实现霸权主义的目的，无视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主权，派遣几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占领了这个国家；原想扶持一个俯首贴耳的傀儡政权，怎奈慑于千夫所指，亲苏派中也不敢出头当公开的傀儡；武装绑架邻国经选举产生的党政最高领导人，押解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强迫他们签订城下之盟并拒不撤军。勃列日涅夫如此横行不法，绝不是科涅夫几句关于往事的回忆所能掩盖得了的。因此，科涅夫的苍白的呼吁不仅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毫无作用，就是捷老战士们也会反问科涅夫：为什么苏军一夜之间没有任何“请求”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为什么苏军在布拉格逮捕昔日勇敢的游击队员、现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和政府总理切尔尼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苏军干了这一切难道不是占领军吗？难道要把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杀得血流成河才算是占领军吗？

1968年9月4日，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叶皮谢夫在关于对捷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而呈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要采取各种措施以改善驻捷的苏军的占领军形象。叶皮谢夫在报告中说：“根据苏捷会谈公报发表后捷克斯洛伐克形成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为克服由于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对居民和军队指战员长期施加影响所造成的积垢，恢复并加强同捷克斯洛伐克军人和居民的友好同志关系，揭露国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破坏活动，可以采取以下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在所有社会层次上加强和捷社会各种机构的业务和政治

① 1968年9月2日《消息报》（俄文）。

联系；积极参与捷地方党政机关和捷人民军的工作；组织苏军将校军官向居民和捷人民军作报告；组织和派遣优秀共青团积极分子、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特别是解放捷的参加者到工厂、学校、部队中去，做深入的工作；安排苏军将领、军官同捷朋友、尤其是二战时期的同事、同学私人会见；组织苏军和捷人民军的兵团、分队军人小组、部队之间的互相拜访；举行有捷军民参加的各种晚会，邀请当地军民参加苏军部队举行的各种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城市和农村的广场上放映描写苏军完成解放使命的电影；组织捷党政军干部在苏联军事报刊、电台、电视台上发表文章、讲话，宣传苏捷两国军民的战斗友谊；组织苏军和捷人民军之间的各种体育比赛”，等等措施。报告最后要求苏联国防部、苏军总政治部、驻捷苏军司令部“再采取广泛的措施，提高军事和政工干部以及士兵的思想政治素养，以便顺利完成在捷克斯洛伐克居民和军人中做好政治工作的任务。”

叶皮谢夫的考虑不能说不周到，苏联党政军各级干部贯彻这项工作也是不遗余力的，但是，实际收效甚微。

5. 布拉格的春天过去了，但是春天还会再来

8月31日至9月1日，捷共中央召开中央全会，这是捷共中央在苏军的占领下召开的中央全会，全会的主要内容是怎样让捷共全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人民接受莫斯科会谈公报；而捷共中央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又怎样在贯彻莫斯科会谈公报中维护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民族利益。

杜布切克在中央全会上作了报告。杜布切克在报告中，隐

晦地、然而坚定地表示：在新的条件下，仍然要执行反映在捷共行动纲领中的党在今年1月以来所实行的政策。他要求恢复全部国家机关、党的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威信，加强军队和安全机关的力量，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下进行。杜布切克说：“在目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也将努力使党的这一政策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的思想联盟的有机和创造性的组成部分。”^① 杜布切克在报告中没有否定8月22日秘密举行的维索昌代表大会，相反，对维索昌代表大会的工作还作了谨慎的肯定。

斯沃博达向中央全会作关于捷苏莫斯科会谈的报告。他强调莫斯科会谈是根据他的提议而进行的，而他是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宪政最高活动家提出这一创议的。斯沃博达是为莫斯科会谈公报分担责任。

全会没有作出任何谴责维索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是决定把党的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推迟到10月举行。

全会通过把什维斯特卡开除出捷共中央主席团并且解除他的《红色权利报》主编职务。被开除出党中央主席团的还有科尔德、里戈、卡佩克；苏共中央的眼中钉、激进的克里格尔也被开除出党中央主席团。克里格尔在莫斯科会谈时就激动地表示，拒绝在会谈公报上签字，并且说：“他们（指苏共方面——作者）能把我怎样？把我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者枪毙？我已经想到了这点。”苏共中央明白表示要继续扣押克里格尔。还是杜布切克和斯沃博达的同归于尽式的表态，苏方才无奈地把克里格

① 见《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1968年9月5日，载罗·亚·麦德维杰夫主编《政治日记，1965-1970年》第2册，第238-239页，阿姆斯特丹，俄文版，1975。

尔直接送到机场。被“开除”出主席团可以说是克里格尔自己的“心愿”。全会还免除了齐萨日的捷共中央书记的职务。齐萨日自8月21日凌晨从党中央大楼出来以后就隐蔽到布拉格的郊外去了，苏军没有抓到他，躲过了一场灾难。

中央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党中央主席团。在新产生的由21名委员组成的主席团里，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都继续当选。斯沃博达、姆利纳日等新当选为主席团委员。胡萨克的地位明显提高，他还取代比拉克成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新的书记处增选了塞拉克为捷共中央书记并且取代什维斯特卡成为《红色权利报》主编。

这次中央全会虽然具体实施了一点莫斯科会谈公报的内容，但是捷共在《行动纲领》问题上仍表示了顽强的态度。切尔尼克虽然不允许在公开出版物上称苏军为“占领军”，也避免出现“占领”的字样，但是全捷和苏军对立的情绪丝毫没有缓和。难怪苏联《消息报》在9月5日直言不讳地说：“正常化不应当仅仅限于形式上，工厂、学校、商店照常工作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关系正常化。”

9月3日，希克被解除政府副总理职务。8月20日苏军入侵时，希克正在南斯拉夫访问，无法回国，也躲过了血光之灾。此后，他一直没有返捷，随后就留居瑞士，在圣·加伦经济社会大学当教授，算是“隐退田园”了。1981年3~4月，希克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来我国访问和讲学。

1968年10月4日，杜布切克、切尔尼克、胡萨克组成捷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捷国土上的外国军队问题。代表团本应包括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但是，苏联拒绝接待斯姆尔科夫斯基。双方代表团会谈结果，捷苏两国同意签订一

项关于“盟国军队暂驻”的条约。这次会谈的公报说：“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声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将采取各种措施来履行莫斯科协议。”

10月14日，切尔尼克总理赴莫斯科，与柯西金讨论苏军驻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问题。会谈以后，苏军从布拉格、布尔诺、布拉迪斯拉发等市区撤出，驻扎到离城市不远的森林地带去。这也是苏联所作的一种姿态。两天以后，即10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政府代表团来布拉格，签署了《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华约组织的其他四国军队将撤离；捷提供苏联驻军的一切设施，承担苏联驻军的一切费用，苏联驻军及其家属享有一切治外法权。这项条约不仅使苏联占领军在捷留驻合法化，对于捷的苛刻程度，无异于19世纪西方宗主国在殖民地驻军。对此，联邦德国外交部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捷克斯洛伐克输的多、赢的少。苏联所作的让步无论如何也补偿不了捷方所作的一系列重要让步。不能把苏联答应在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正常化过程中给予援助的许诺，理解成苏军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物质援助的真诚愿望。确切地说，应当把这种许诺看作是宣布对捷内政积极的、大规模的干涉。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再次答应苏联，按苏联所希望的那样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局势。此外，捷克斯洛伐克承认在捷国内存在反社会主义势力。结果，苏联发动进攻的出发阵地得到了改善。”^①

①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克格勃副主席 H.C. 扎哈罗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2月17日，绝密，载《文献汇编》1993年第5期

根据 10 月 16 日签订的“留驻条约”，苏军在捷有了“合法身份”；勃列日涅夫多年来追求的目标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至于条约中所说的“留驻”的苏军不干涉捷内政，那真是鬼话！把军队驻扎在别国领土上这本身就是严重的干涉别国内政；更何况条约还规定，苏军在“执行勤务”时违法不受捷司法机关审理，而由苏联的有关机关“审理”；捷公民如果反对苏军，将“负有同反对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力量同样的责任。”10 月 18 日，捷国民议会以 228 票赞成、4 票反对、10 票弃权，通过了“留驻条约”；“留驻条约”算是正式生效了。“留驻条约”生效后，华约其他国家的部队开始撤离。10 月 21 日，匈牙利的部队首先撤离回国。到 11 月初，波兰、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的军队也相继撤离回国。

10 月 28 日是捷独立日，捷人民把庆祝独立日变作对苏军“留驻”捷的全民抗议示威。这天，从大清早到深夜，大学生、工人、市民都手举捷克斯洛伐克国旗在布拉格街道上游行，高喊“俄国佬滚回去”！“打倒勃列日涅夫！”“马萨里克万岁！”“我们要自由！”捷共中央、捷政府、捷国民议会纪念独立日的大会结束后，游行群众堵住了赫拉德强尼城堡的大门，挥舞国旗，咒骂“俄国佬”。出席庆祝会的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和苏联大使馆武官不敢从前门出来，只好在大批警察的保护下，从后门溜走。

“留驻条约”签订后，捷全民和苏联对抗的情绪丝毫没有缓和；杜布切克等也一再流露不放弃捷共《行动纲领》的决心，这些情况使勃列日涅夫既恼恨又害怕。11 月 7 日是苏联庆祝十月革命 51 周年纪念日，勃列日涅夫双管齐下：既烘托“苏捷友谊”；也给捷克斯洛伐克一个警告，实际上是给杜布切克等一个警告。

以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共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西蒙为首的捷共布拉格市委代表团应邀访问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 51 周年的庆祝活动。此外，苏联的图拉、弗拉基米尔、沃龙涅什、伏尔加格勒等 4 个州，也邀请捷克斯洛伐克 4 个相应的州组成代表团来访，“加强地方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节日期间，以伊凡·弗拉基米罗维奇·秋列涅夫大将为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来捷参加捷纪念十月革命 51 周年的庆祝活动。苏联挑选秋列涅夫当这样的代表团团长是用心良苦的。秋列涅夫生于 1892 年，已是 76 岁的老人了，早已退休闲居，多年不问世事。勃列日涅夫选中秋列涅夫，就是因为他的经历和现在已退休闲居。秋列涅夫参加过苏联国内战争，卫国战争前夕，担任过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和莫斯科军区司令，1940 年授大将军衔。卫国战争期间，先后担任南方面军司令、外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卫国战争结束后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1940 年，秋列涅夫成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52 年联共（布）第 19 次代表大会上丢掉了候补中央委员的职务，军队内的职务也丢掉了，从此，少有人理睬了。勃列日涅夫找出这颗“泛黄的珍珠”，是因为秋列涅夫是屈指可数的最后几个参加过解放东欧战役的苏军高级将领之一，更宝贵的恰恰是秋列涅夫早就是离开军界、政界的“民间人士”了，这样就有利于突出“民间交往”、“老战友拜访”的祥和气氛。勃列日涅夫精心布置的祥和气氛，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实质是棉里藏针，对捷进行一次警告。对捷的警告是由契尔沃年科来做的。

11 月 6 日，捷举行招待会欢迎秋列涅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这个招待会上，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旁若无人地说：捷国内的形势仍然非常复杂，“反革命分子钻进了捷共中央”，“在捷共中央里坚持正确路线的人可能连 30% 都不到”；“如果我们

不能成功地改变捷共中央的这种状况，那就不能绝对排除苏军坦克再次开进布拉格的可能”。^①契尔沃年科此言一出，令秋列涅夫愕然，以致回国后把这“重要问题”立即报告苏共中央；勃列日涅夫看后一笑置之。秋列涅夫不知道，这正是勃列日涅夫要说的话。契尔沃年科的这番言语不仅仅是虚声恫吓。11月开始，苏军在捷的驻军作了新的部署，即：从西部接近联邦德国边界到布拉格以北的姆拉达基地，向东南经摩拉维亚延伸到斯洛伐克的东南角，一线排开，把长方形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土，横着切成南、北两半；如果需要，从姆拉达基地出发，坦克在1小时内即可到达布拉格，“留驻”马上就能变成占领。苏共在明显地警告杜布切克。

11月14~17日，捷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全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有57人在辩论中先后发言。全会通过了《党在最近时期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决议说：捷共一月全会（1968年）以后的形势发展是：“许多政治过程具有自发性质；不仅右倾机会主义势力，而且还有反社会主义势力渗入到某些群众性的宣传机构里；捷共中央在领导报刊、广播和电视方面缺乏一个周密的制度。群众性宣传工具逐步变成一股不受控制的力量。”决议进一步说：“右翼势力和机会主义势力得到过多的、与其自身不相称的在报刊上发表意见的机会，以致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这种观点就是捷共中央正式政策的依据。这在客观上对反社会主义势力有利，并使部分党员和社会舆论迷失方向。”

决议只字未提8月20日苏军入侵，只说已和苏联签订了妥

① 《捷克斯洛伐克庆祝十月革命51周年》，载《政治日记，1965—1970》第2册，第394~395页，阿姆斯特丹，俄文版，1975。

善的条约，“所有共产党员都有责任履行这一条约”。^①

这次中央全会又扩大了主席团，现在的党中央主席团几乎是有些肿胀起来了。为了真正工作，在党中央主席团内又成立了一个捷共中央主席团执委会，由8名中央主席团执委会委员组成。实际上，这种安排是苏联为大换班精心设计的步骤。这次全会可以看作是个转折。

1969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实行联邦制，捷克斯洛伐克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由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

为了改变捷的领导，勃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这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和复兴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领导核心，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直到1968年9月4日一项民意测验还表明，在1882份调查材料中，拥护杜布切克的占96.1%，拥护斯沃博达的占95.6%，拥护斯姆尔科夫斯基的占73.2%，拥护切尔尼克的占72.6%。而被苏联看好、竭力予以扶持的胡萨克，在同样的调查中，拥护率只有23.6%^②，远不能和切尔尼克等相提并论，更不必说和杜布切克相比了。勃列日涅夫很清楚，如不把杜布切克等赶下台，苏联就无法使捷的“局势正常化”，于是就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一个一个赶下台。

1969年1月8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扬·帕拉赫为抗议苏军的占领而自焚。帕拉赫的悲壮赴死震动了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掀起了抗议苏军占领的新高潮。1月16日，在苏联

① 《关于捷共中央全会决议》，载《政治日记，1965·1970》第2册，第399·403页（俄文）。

② 见《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第160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9月。

的直接干预下，斯姆尔科夫斯基被解除国民议会主席职务，理由是“处事不力”。作为过渡，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联邦议会第一副主席。不久，又被“开除”出捷共中央并被解除一切职务。苏联总算拔掉了这颗“眼中钉”。

杜布切克很清楚，莫斯科的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自己。杜布切克曾多次向克里姆林宫建议，让切尔尼克接替自己的职务，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因为杜布切克实在不愿意让胡萨克来当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克里姆林宫拒绝了杜布切克的建议。1969年4月17日，捷共中央举行全会，把原来庞大的主席团缩为11人，选举古·胡萨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胡萨克当选后立即表示：捷共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党和社会的团结，以及使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胡萨克的捷共中央完全摒弃了《行动纲领》，全面中止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措施，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新的斯大林模式化计划。

杜布切克被排除出捷共中央，先是被任命为联邦议会主席。当了半年联邦议会主席，到10月，杜布切克又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大使。当了半年驻土耳其大使，1970年6月又被召回并撤销一切职务。6月25日捷共中央全会批准，将杜布切克“开除”出捷共。

现在只剩下一个切尔尼克了。1970年6月，切尔尼克被解除政府总理职务，并被开除出捷共。

胡萨克在苏联的指使下，大肆迫害拥护和积极支持改革的各级党政干部。至1970年，先后将4名捷共中央书记、9名州委第一书记、59名县委第一书记开除出党；1/3以上的中央委员、州委或县委委员被撤职或开除出党；1/5以上的党员被除名。

或开除出党。^① 1970年12月，捷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了《从捷共十三大以来党内和社会上危机局势发展中吸取教训》的文件，按勃列日涅夫的意思，文件全盘否定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全面接受了“苏联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观点。至此，勃列日涅夫算是遂了心愿了。但是，……

布拉格的春天过去了，春天又会来到布拉格！

^① 见《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539页

后 记

“布拉格之春”距今差不多 1/3 世纪了。前尘隔海，往事如烟，当年的风云人物差不多都成历史故人；就连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样的国家也成为历史上的国名了。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发展和曲折，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及其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的确，20 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给人们留下太多的思考，以致今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还来不及消化。我们写的《回眸“布拉格之春”》仅仅是对捷克斯洛伐克 1968 年改革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事件的一种历史咀嚼和回味。

不妥之处，祈求各方赐教。

叶书宗 刘明华

上海师范大学新村寓所

一九九九年六月